

情孽

作者：露丝·哈雷斯

本书描写了在女权运动和性解放的背景下，三个生活时代不同、具有各自经历和独特个性的美国女性的生活和感情经历，她们的奋斗、挣扎，她们的苦闷、困惑和不幸。

第一章（七十年代）男人和女人

第一节

第二章 过渡的女人

女人为什么不能成名立业。

她们唯一的途径是组织起来。

-巴巴拉·罗斯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三章 传统的女人

我要做一位妻子和母亲，这是否是每个女人都想做的？

伊英琳·鲍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四章 放荡的女人

什么样的我都想试一试：所有的男人，所有高贵的男人，甚至低贱的男人我也不在乎。如果我的结局象我母亲一样，我就会自杀。

乔伊·鲍姆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男人与女人：结果

第一节

巴巴拉·罗斯有一种理论：你只要一进门，就会没完没了地讲述一个开公司的男人。不管这家公司是IBM公司，开公司的男人叫托马斯·B·霍德逊，还是这家公司是萨米收音机电视机维修公司，开公司的男人叫萨米，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办公室是她的心理测验室；

巴巴拉·罗斯对开公司的男人很有兴趣：他们有钱，这她自己也不缺，在她看来，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有权。这她本人也有一些，但是觉得还不够。然而，正因为他们既有钱又有权，他们总是不乏性的吸引力。钱和权时时刻刻给人以快感。

那是1971年8月。巴巴拉刚刚走进文尔法音像公司的接待室，她去见该公司的总裁纳特·鲍姆。巴巴拉本人是杰尔德·斯伯林发行公司副总裁。她到这里是呈交艾尔夫公司和杰尔德·斯伯林公司达成的联合推销计划。

罗斯等候着鲍姆先生的秘书引她去鲍姆的办公室。她四下看了看接待室，试图能从中看出纳特·鲍姆是位何等人物。

皮制沙发是从阿特利尔购进的，巴森兹钢架玻璃茶几十分昂贵，呈六边形。海军灰的地毯是戴维·希克斯的产品，不是那种从长岛城批发商店搞来的处理货。

看来一切还不错。纳特·鲍姆够味儿。纳特·鲍姆有钱。

不过，灰涂涂的天棚纸已经涨破，一棵塑料圣诞树倒在沙发一头的扶手上，巴森兹茶几的

玻璃面也该好好地擦一擦了。

昂贵的装饰和邋遢的管理给巴巴拉的想象蒙上了一层不可捉摸的色彩。也许鲍姆先生是个不拘细节的人，也许比这更糟糕，他或许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巴巴拉知道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不过她对什么事情都喜欢琢磨琢磨：哪怕在一个接待室里等候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她说过，你一生中只不过有一次生命。所以，尽管有的时候有些事漫无边际，只要脑子里想到了，她都想从头到尾地琢磨一遍。

“你是罗斯小姐吗？”年轻的秘书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接待室的门口。

“罗斯夫人。”虽说罗斯心里想着要用新出现的介于小姐和夫人之间的一个词，但是她脱口而出，还是用了“夫人”这个词。

“纳特现在要见您。”

罗斯随着女秘书穿过混乱的走廊，朝纳特·鲍姆的办公室走去。也许他的办公室更能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结论是：接待室简直可以使人精神分裂，大概她的理论只适用于鸟类——或许纳特·鲍姆恰恰是抗心理测验的。

纳特，鲍姆的办公室很大，呈角状，四壁涂成碳灰色，摆放着带有固定座位的檀木茶几。办公室里没有力、公桌，紧靠一面墙摆放着一排勃艮第毡垫软长椅，还有几把铬架藤面的会议椅子，壁毯呈灰色，和房间的色调相配，给人以舒适感。整个房间相当谐调。

“纳特，”女秘书说。“罗斯夫人到了。”

巴巴拉看见他那，他还没抬头。他坐在软长椅上正低头看着做相册封面的清样。他年纪正相当，巴巴拉思忖着：五十岁上下。她三十四岁。他长得很帅，皮肤棕黄，加深了他眼睛周围的笑纹。他有着网球运动员的体形，身穿一件带有伟大圣人劳伦特图案的真丝衬衫。

“您好，”他说。“进来吧。”

“您好，鲍姆先生。”罗斯说。

“纳特。”他说，“大家都叫我纳特。”

“我知道了。”巴巴拉说着，有意识地坐在一把会议椅子上。她不想坐在软长椅上离他很近。让他先发制人。

“艾德·瓦雷特。”纳特·鲍姆介绍着正在把清样递给他的那个年轻人。艾德·瓦雷特带一副变色镜，上身穿着一件开胸衬衫，下身穿着一条紧贴肉皮的喇叭裤。看上去他和她所见到过的不到三十岁的美术经理一样。“他是我们的美术经理。”纳特接着介绍说。“一个天才的小伙子。”

“看得出来。”巴巴拉说，让纳特心里明白她很老练。“你好，艾德。”

艾德点了点头。

“瞧瞧，你有何看法。”纳特·鲍姆把那两个清样递给巴巴拉，很随便但却有意地让他们的手指相碰。她瞥了一眼那两个清样。这相册叫作《您的瑜伽》。了个清样是一个身穿紧身服的模特儿，正在采莲，逗狮，拿大顶；另一个清样是一个身穿游泳衣的模特儿，显得快乐，苗条。

“我没有什么想法。”巴巴拉说。她把清样放回到白木桌上，故意不把它们直接还给纳特·鲍姆。他是在做游戏，她明白做游戏的规则，他也知道她很明白。他们只是想从中索取更大的乐趣。

“没有意见？”纳特·鲍姆故作吃惊地问道。

“没有意见。”巴巴拉对《您的瑜伽》封皮当然不会有意见，那是纳特·鲍姆的事情。她对纳特·鲍姆也不会有意见——除了他性感和多事。问题是他已经结了婚。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纳特·鲍姆一家的。巴巴拉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发现了这一点。在纽约，所有那些有欲望的男人——开公司的、有钱有权又有吸引力的男人——都有妻室。糟糕透了。

“没有意见！”纳特·鲍姆又说了一遍。“你被解雇了！”

“我不在这儿工作。”巴巴拉说。“我有免疫力。”她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对他有免疫力。他听懂了，而且心里明白她在说谎。

艾德·瓦雷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们言谈中的暗示他都听得出来。纳特每次见到一个新来的漂亮女人，他都听得到这些话。对方是有答必应。艾德不管这些，他只希望纳特废话少说，决定相册封皮的事。

“职位好象是谋杀。”纳特说，“女人是不会追求职位的。”

“不过从竞争来看，我们得与众不同。”艾德说，准确地指出了所有参加竞争的瑜伽相册都是身穿游泳衣的模特儿，瘦得不切实际，快活之中有股傻劲儿。

纳特盯盯地看了一会儿清样，接着耸了耸肩。他把版本甩给艾德，打发他走了。“艾德，

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巴巴拉看出了他的意图：纳特就是想让她明白他是老板。他就是要没完没了地验证这一点。

他对这种游戏是再熟不过了，而且很擅长。她也如此。他们真可谓是棋逢对手。

巴巴拉是推销部门的经理，美国最大的出版商之一杰尔德·斯伯林公司的副总裁。她是唯一的一个有副总裁头衔的女人，她用十一年的时间获得了这一行政头衔和薪水。尽管她爱这一头衔和薪水，可是这是她当初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

巴巴拉是在五十年代长大的。在那个时代里，她该做的都做到了：二十岁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离了婚，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以及性的解放和情感的自主，这一切都是按照当时的时刻表发生的。

纳特·鲍姆虽说和上层阶级的典型人物巴巴拉不同，是个下层犹太人，但也算是一帆风顺了。他娶了一个富家闺秀为妻。四十年代末期，他开始小本经营唱片生意，最初以爵士乐和弦乐为主，后来由于摇摆乐问世，他的公司在资金方面无力和大公司竞争，便转为制作自助唱片。艾尔法唱片公司制作以健康、财富和余暇为题材的唱片，大有指望：《催眠减肥法》、《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在地产生意中增加您的三倍收入》、《三十日之内戒烟》、《性感女人的性实践》和一套由一位名叫伊格尔·普利格尼的星相学家个人的黄道诠释选集。艾尔法公司在《大都市》、《红书》、《家务管理良友》、《麦克卡尔》和《妇女家庭杂志》登载广告。生意一直很红火，纳特·鲍姆也因而成了报界的百万富翁。他有一个他珍爱的女儿，有用不完的钱，但是淡忘了他年轻时曾经居住过的艾赛克斯大街上的小舍。

巴巴拉·罗斯和纳特·鲍姆，虽说始于不同的时间，处在不同的空间，同样实现了美国之梦。

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问题，而且是个共同的问题：下一步何去何从？

“他是美术经理，对吗？”纳特问道。他指的是他做出让艾德·瓦雷特自己决定用那一个封皮的决定。

“可您是总裁呀。”巴巴拉指出。

“只是在我迫不得已的时候。”纳特·鲍姆说。“说实话，我宁愿喝得酩酊大醉。”

“噢，上帝。”巴巴拉说。“一个那样的人。”

有这种大难题的男人她起码知道百十来个：他们活着就是为了金钱，为了出人头地，整天围着办公室转悠，琢磨着热带岛屿的奇异，黄昏中的少女，没有什么责任感。

“不用说，”她说。“你会烦躁死的。”

“在我身上尝试试试吧。”纳特·鲍姆说；

他这话可过了头。他违反了他们这场小型比赛的规定。巴巴拉把这种游戏称作小型比赛。

巴巴拉言归正传，把她的推销计划概述一番：他们要面向，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和寻找就业的人员，为他们发行带有订单的宣传小册子。她讲完便停顿一会儿，看看纳特的反应。毫无反应。他坐在那儿，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着，每支吸上几口便掐灭，然后再点燃一支。

巴巴拉琢磨着她是不是完全把他给回绝了。她希望不会的——因为她根本就没想那样做。不过她已晕毫无办法了。她一本正经地接着讲下去，报了每一千份的成本、彩色单行本的价格和印刷信封、装信封以及邮寄的费用。

“开始阶段的费用由杰尔德·斯伯林公司支付，我们三十天内把一半费用的支票汇给你们。”这都是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巴巴拉把她到这儿来要说的事都讲完了。纳特·鲍姆又点燃一支箭牌香烟。

“我想戒了它。”他说。

“《三十日内戒烟》怎么样？也许你们的唱片不起作用？”

纳特·鲍姆耸了耸肩。“那是为了谋生。”

“你也许在玩世不恭中又显得非常浪漫喽。”她说道，决定从头开始这场游戏——哪怕一会儿也行。他实在迷人，不能就此罢休。

“你大概是对的。”他说着笑了，她也跟着笑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随之烟消云散，彼此变得很融洽。

“我现在可以接着往下说了吗？”巴巴拉问道。合同明确规定，纳特·鲍姆必须承认由杰尔德·斯伯林公司发行的一切广告和推销宣传。

“当然。”他说，“为什么不呢？”

“我把这些留给你。”巴巴拉指着她带来的大模型说。“如果有必要，你就看一看。”

“我看不必要。”

“你不想看一看你花钱要买的是什么东西吗？”

“我相信你。”

“谢谢。”巴巴拉说。

她说着便站起来要走，会见到此结束了，这场游戏也收场了。她拿起手提包儿和她用作档案袋的威顿大信封，朝门口走去，时间已近十二点半。这场游戏他们打了个平手。

突然，纳特·鲍姆站了起来。他的个头比巴巴拉想象的稍矮一点儿。

“和我一起吃饭吧。”他说，“我们可以多聊一聊。”

巴巴拉心里十分明白，纳特·鲍姆并不是真的请她去吃饭，他是问她想不想去和他睡觉。

在五十年代，巴巴拉·罗斯还不可能明白他这种问题。在六十年代，巴巴拉·罗斯当天下午就会上床和他睡觉。然而，这是七十年代，巴巴拉只说了声“好吧，我和你一起去吃午饭这场游戏并非结束了，他们进了电梯时，巴巴拉还在琢磨着谁将是这场游戏的胜者。

“我是那些在美国小城镇度对童年时代的最后一代人。”巴巴拉说。“我依然记着绿色小城的白色教堂塔尖，高中比赛时呐喊助威的啦啦队队长，和偷听人家电话的话务员。”

你要是问她对小城镇有什么感想，她会说：“就象你幼年时曾居住过的异国他乡。有些单词你大概还能记住，对那儿的语言你可就望尘莫及了。”

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巴巴拉·杜登。她家境贫寒，收入低微。她父母的祖先是十八世纪初期来到哈德逊山谷安家的荷兰农民。母亲是监护人带大的，父亲喜欢航海，打棒球，对经营他父亲留给他的地方保险和房地产生意却不大开窍。在二十年代，生活很富有，是什么样子，她的父母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记得过去有的是鱼子酱，现在就连夹肉面包也要省着吃。

在一座象普林这样的小城镇，人们并不十分看重经济上的差别，巴巴拉参加过一些各种形式的晚会和集会。她很漂亮，这使她在女孩子中没有多少人缘儿，她很聪明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又使她在男孩子中没有多少人缘儿。不过，她还是有过一个最好的朋友；经常按钟点和她偷偷通电话，升到高年级时，有一个相好的在六月份常常带她去高年生舞会，在以后的整个夏天，总想在星期六晚上和她睡觉。

她身穿圆型短裙，系一条松紧腹带，脚上穿着刚好过踝的短袜，用橡皮带儿缚在脚脖子上，常常在脚脖子上留下痕迹，几个小时也不消失。她脚穿一双平底便鞋，上身穿着羊毛汗衫和彼得·潘式领子的白色凸纹布假前胸。她经常用叶绿素牙膏和里佛龙冰火唇膏。她总想把自己往时髦里打扮，可又害怕那些流氓阿飞——那些身穿油腻皮前克、开车不要命的青年。她知道比姬·苏·迪斯比在低年级时就让人玩弄过。巴巴拉在自学教室从别人闲聊中听到比姬·苏·迪斯比上次去看她在芝加哥的姑妈，实际上她是到南新泽西打胎去了。

让他们见鬼去吧，什么可爱的艾克和他那高超的高尔夫球技，什么杰·麦卡锡和议会的听证会，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什么冷战和在南太平洋的原子弹试验，对她都毫无兴趣。她所关心的就是谁和谁出去了，谁和谁分手了，法国式的亲吻是不是能让青年人失去自控，还有尽管你是个处女，你是不是要用避孕套等等。

她进了威利斯力大学，因为她在高中时学习成绩很好，因为她舅舅在威利斯力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罕见的十六世纪欧州草药图解手稿，更因为大学是接触男人的最佳场所。

在五十年代，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男青年获得了博士，而女青年得到了丈夫——过了寻夫之关。

巴巴拉1954年秋进入威利斯力大学读书，带了一大衣箱的开司米毛衣，方格花呢百褶裙和好几条百慕大群岛短裤。她给男朋友织多色菱形花纹袜子；无休止地打桥牌；一坐就是到深夜，议论一旦你和人订了婚该如何如何去做，成家后要几个孩子最理想。

巴巴拉相信一见钟情，她自信只要她的目光落在那个男人身上就能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她未来的丈夫。她只要有时间，很顺从，保持着最新发型就足够了。

1955年10月的某一天，她见到了狄克·罗斯。曾经和巴巴拉住在一个宿舍的托比·格里弗伊丝主动提出来要给巴巴拉安排个住处。狄克是托比男朋友的密友，托比介绍说，他这个人很帅，正在攻读船舶工程博士学位，才貌双全，是美国西部人。托比一边向巴巴拉介绍详情，一边用一把旧牙刷和胭脂擦着她的那个二点四克拉的钻石订婚戒指。这是托比的习惯：每天早晨

和晚上她都要把这个圆形钻石戒指擦一擦，直到发亮为止。巴巴拉也渴望能有一个托比那样的戒指。她总想跟托比说一说，让她试着戴一戴，可是又不敢开这个口。很多女孩子一听说谁要试一试带她们的戒指，一种可怕的恐惧感便会油然而生。这就等于背叛或者和魔鬼打赌——实在太危险：

“他学习船舶工程就是为了不当兵。”托比说。“他不想被派到朝鲜去打仗——现在他就快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在全班排第二，前程似锦。”

虽说巴巴拉和狄克·罗斯不是一见钟情，但是她起码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他了。他下身穿一件灰色法兰绒裤，上身穿着花呢运动前克衫，里边衬着一件牛津衬衣，扎一条红黑条的棱纹平布领带，他白白的牙齿也许很脏，但是他体形匀称。

“你愿意去什么地方？”他问道。他能交上如此好运，真有点儿意外。他早就听人家说过她很漂亮，可是她还只是个娃娃。这他可没有想到。

“有一家奶油馆儿，小伙子都到那儿去。”巴巴拉说。还有成利斯力酒店，不过去那儿很贵，再说第一天约会就提出来要去一个很贵的地方也不大好。

狄克打开他那辆灰色汽车的车门，把巴巴拉扶进车里。巴巴拉把裙子往自己身子四下掖了掖，她很喜欢听掖裙子时发出的沙沙声响。她觉得这沙沙的声响似乎可以引起性感，不用露出内衣就能让男人意识到你的内衣。她很侥幸那天下午洗了头。头发从右侧分开，一个椭圆型的银色发夹别住分开的头发。

她心里思忖着，他们俩是般配的一对儿：巴巴拉和狄克。

他们一边喝可乐吃汉堡包一边交谈，彼此间有了了解。狄克来自科罗拉多州艾斯本的乡村，再读一年研究生就毕业了，正在筹划毕业后的去向。

“麦克劳佛林钢铁公司和阿帕克斯造船公司已经和我谈了。”

“你打算去哪家呢？”巴巴拉高兴极了。人们都知道，到学校招工的人员，几乎在学生还有一年才毕业的时候就主动上门，找班级中最好的男同学谈话。

“那就要看工资和实惠怎么样啦。他们还没最后谈条件呢。”他又耍了些可乐。“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文学，我喜欢塞林格，不喜欢克罗斯克。上星期我看了《道路》，对比兹一家人可真受不了。他们是那么肮脏，生活中什么目标也没有。存在主义只不过是惰性的一种开脱罢了。”

“我看书的时间不多，不过我觉得《弗兰妮》和《珠伊》太棒了。”狄克说。他担心巴巴拉会没完没了地评论起存在主义来；他对有学问的姑娘没有多少好感——当然了，她长得那么漂亮，不象是个有学问的姑娘。

“那你说弗兰妮是不是怀孕了？”

“真是的，那还用说吗。百分之百怀孕了。”

“教我文学的教授说，她是在体验宗教生活。”巴巴拉试探着说。她不喜欢和男人争执不休，但是教她文学的教授似乎把她说服了：弗兰妮的经历决非是肉体上的。

“这和宗教有什么关系。她怀孕了这是事实。”狄克说。他是学科学的，不喜欢那些模糊的抽象的理论。对他来说，不论模糊理论还抽象理论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年轻人大部分都认为她怀孕了。”巴巴拉说着便换了个话题。她告诉狄克她曾经念过公立高中（她想一带而过，免得狄克在这个问题上钻空子），她还说她觉得艾尔维斯·普雷斯莉令人讨厌；她希望玛格莉特公主能得到她姐姐的允许，和唐森德上尉结婚。

“那不是太浪漫了吗？”

“一定很浪漫。”狄克说。“可是话又说回来，我看女王绝对不会打破几千年形成的传统。”

巴巴拉赞同地叹了口气。尽管是这样，女王也许会出乎人们的预料同意这桩婚事呢。

“依我看，真正的爱情总会胜利的。你说对吗？”巴巴拉问道。

“真正的爱情会带来很多痛苦。”狄克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好了小费。

巴巴拉耸了耸肩。

“这个我不相信。”她说，“我将来也不会相信。”“那你不会有这个问题的。”狄克说道。他们的对话越来越认真起来，他想马上换个话题。

“你是说哪一个？”巴巴拉追问道。“是真正的爱情，还是痛苦？”

“痛苦。”狄克说，并且说他知道她喜欢听这个。

“我可不这样想。”巴巴拉说。

她毕竟还年轻，不懂得什么免疫力。

他们第二次约会时，狄克带她去看电影，他们看了《黑石的糟糕之日》。看电影时，巴巴

拉虽说让狄克握着她的手，但是很当心不让狄克搂着她。他们第三次约会分手时，她让狄克吻了她，但她双唇紧闭。狄克对这种事和她一样明白，所以也就没有做得太过分。

时隔不久，巴巴拉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后来每个周末都要和狄克在一起。他们吃汉堡包、意大利饼，看电影，下午学习功课，白天手拉手，晚上拥抱接吻。在五十年代，性的规则似乎正式参照十八世纪加伏特舞步设计的。一个月之后，巴巴拉便允许狄克隔着衣服摸她的上身。渐渐地，她就让狄克解开她的外衣钮扣，从外边触摸乳房，紧接着又允许狄克把手伸进最里边抚摸乳罩和乳房。感恩节前夕，狄克送给她三条红白道的哈佛围巾，披在驼绒外衣上。她知道狄克确实认真起来了。

一月份，在他们过完圣诞节假期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狄克跟巴巴拉说他真的爱上了她，而且请求她佩带他的名章。巴巴拉异常激动，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点了点头。狄克双手颤抖着把他的名章别在巴巴拉那件粉红色的毛衣上，紧靠着乳房左边一点，离心脏最近的地方。巴巴拉和狄克启唇接吻，舌头紧碰着舌头，巴巴拉自言自语地唠叨起魔语来：订婚是为了再订婚。

巴巴拉全然忘记了什么叫一见钟情，她似乎发现了更加完美的东西：真正的爱情。

1956年，福特汽车公司把一亿零二百万美元的股票抛向市场，引起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股票浮动。在第一周的交易中，美国人花了六亿五千七百万美元占有了部分美国经济的前景。同年，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州的蒙特格莫里组织了公共汽车大罢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谴责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在苏伊士危机中滥用武力；米吉·曼德勒摘取了美国杯棒球赛的桂冠；瑞典科学院决定不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下毕年，艾尔维斯·普雷斯莉在艾德·苏立宛表演时上身裸露着演唱了“猎狗”和“令人心醉的旅店”。

巴巴拉的父亲没有利用福特公司出售股票这个机会；他认为马丁·路德·金是主挑起事端；他见到了女儿的未婚夫，并且对女儿的选择表示赞同，至于以后如何和他就毫不相干了，因为暮春时节他就告别了人世。他临死前依然那样彬彬有礼，体贴他人。

他在普林农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正准备向第三个球座发球，突然气喘吁吁，嘴唇苍白，继而又变成蓝色，紧接着便倒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太阳镜恰好摔在木球上，把右镜片摔得粉碎。他的球伴和球童都往俱乐部会所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医生。

“遇到这种麻烦事，我很抱歉。”司机和医护人员把他放在担架上，滑进救护车时，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救护车警笛鸣叫；拉着他向医院驶去。

这是彼得·杜登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刚刚办好手续准备去急救室时他就咽了气。他的死亡证明明确地记着由于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父亲死后，巴巴拉和狄克陪母亲住了一个星期。伊万吉兰·杜登成了既没有丈夫又没有钱年仅五十四岁的寡妇。彼得·杜登虽说一直从事保险业务，死前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保险金。他给她留下的唯一的财产也不过就是她住着的那幢房子，身上穿着的衣服和三千二百元的现金。她整整哭泣了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穿。巴巴拉和狄克整天地陪伴她，安慰她，想着法子让她高兴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巴巴拉说。

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心里边琢磨着彼得·杜登那股犟劲儿是不是让他的女儿继承下来了。如果没错的话，这也就是女儿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唯一财产。她想到这儿又哭泣起来。

“妈妈，”巴巴拉说。“您别哭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会好起来。”这次，伊万吉兰强令自己相信了女儿的话。

“你打算怎么办呢？”狄克问道。杜登夫人本应该为他那朴实的态度祝福他。

“不知道。”杜登夫人说，“我看我得找份工作干。”

那天夜深人静时，杜登夫人才上了那张孤独的床睡觉。狄克对巴巴拉说：“依我看你以后不必工作。”

巴巴拉不知为什么没听明白，就开始哭起来。父亲去世后她还是第一次哭。她把头埋在狄克的怀里，哭个不停，眼泪湿透了狄克的衬衫，湿乎乎地沾在狄克的胸脯上。

“别这样。”狄克说，“我是说将来我照料你。”

狄克这样说并不是有心埋怨她父亲，不过其含意再清楚不过了：她父亲在世时并没有照料好她或她母亲。干嘛这样讲呢？巴巴拉确信她父亲是爱她们的，她们也爱他。彼得·杜登也只不过不那么现实而已。巴巴拉用狄克递给她的手绢擦了擦鼻子，冲着他笑了。她此时此刻认识到，自己要嫁给的人和她父亲截然不同，他给了她安全感。

狄克的父母没到丹佛机场接他们，这使巴巴拉感到很意外。那是圣诞节的假期，巴巴拉和狄克一起坐飞机去狄克家，第一次去见狄克的父母。她心里想：他们一定急着要见到我，就象

我急着要见到他们一样。

“现在是我父亲最忙的季节。”狄克说。他领着巴巴拉赶紧穿过机场的人群。他在人群中被挤得直不耐烦，总是推推搡搡地往外挤。人群引起了巴巴拉的好奇心，她总想停下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他这个人不喜欢占用做买卖的时间。这个季节的时间不长。”狄克的父亲在几家小旅店出租滑雪用具，经营食品。从十月到复活节这段时间里，他得挣够钱维持家里的一年生活。狄克领着巴巴拉来到赫尔兹柜台，在那儿填了一份表格，然后出示了他的驾驶执照，随后人家给了他一把一辆蓝色道奇车的钥匙。

他们驱车向艾斯本驶去。一路上，景色异常迷人：高耸云端的山脉与荷兰农村绵延起伏的山岭形成鲜明的对照。到处是皑皑白雪，那些高大松树的树枝也挂着白雪。他们驱车驶过很多一下子难以形容的小村镇，不过这些小村镇的道旁都有前面铺着柏油马路的木房蔬菜水果店、邮电局和加油站。

“你看你父母会喜欢我吗？”算这一次巴巴拉已经问了有一百遍。

“那还用说。你放心好啦。”狄克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巴巴拉知道她不该说这么多话。狄克不喜欢开车时人家跟他说话，他说那样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巴巴拉拿定主意先看他父亲和母亲的态度，然而她再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要是拥抱她，她就拥抱他们，如果他们吻他，她也吻他们，假如他们和她握手，她也会跟他们握手。

汽车上了罗斯家的车道，还看不见房子。车道是土道，没铺柏油，坑坑洼洼的。当巴巴拉终于看见房子时，感到很失望，可她又说不出为什么。她虽然没期待着那是一座瑞士式的木制农舍，可是罗斯家的房子也只不过是一座普通的美式房屋，而且也该粉刷了，和你在长岛，明尼伯利斯或沙克雷曼的农村看过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

巴巴拉跟狄克沿着上道从停车场来到房子的后门。巴巴拉透过窗户看见一个妇女站在厨房水池旁。狄克把门打开，巴巴拉走了进去。她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小门厅里，左边是厨房，右边是起居室，正面是通向楼上的楼梯。她等罗斯夫人先开口说话。她知道罗斯夫人在等着她。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巴巴拉听见狄克跟他母亲讲要带一个姑娘回家。“她与众不同，妈妈。我想让你和爸爸见她。”然而那个女人站在水池旁一动不动。巴巴拉心想自己急着见到罗斯夫人，可是罗斯夫人怎么不急着要见自己呢。

“妈妈，您好。”狄克说。他用胳膊搂着她，巴巴拉发现母亲和儿子没亲吻，“这是巴巴拉。我跟您说的那个姑娘。”

“你好。”罗斯夫人说。水池子里装满了水和土豆。有些土豆已经削了皮，有些还没有削。罗斯夫人接着用一个小金属削皮刀不停地削土豆皮，巴巴拉琢磨着她削土豆皮还能看清楚吗，五点多多了，厨房已经黑了。

“您好，罗斯夫人。我一直渴望见到您。狄克没少跟我说起您。”

“我本应该和你握手，”罗斯夫人说。“可是我的手都湿着呢。”她没把手从水池里拿出来，只是一边削着土豆一边示意示意。

起码她还是想握手的。起码她不是一见了巴巴拉的面就讨厌她。巴巴拉站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穿着这身特意穿来给他们看的达尔顿毛衣裙子觉得很尴尬。

“您应该把灯打开了。”狄克一边说着一边打开灯。房间小而实用，地上铺着亚麻油毯，已经破旧不堪但却擦得干干净净。电冰箱是那种老式的，绕组在上边。火炉是那种烧木头的，义大又黑。除了在新英格兰古玩店见到过这种火炉，巴巴拉在别的地方还真没见过。

“我们提前到了五分钟。”狄克说，“看来今天的风一定很顺。”

“好。”罗斯夫人说。灯亮了，巴巴拉这才看清楚罗斯夫人头发花白，盘成一个髻儿，身上穿着很便宜的印花棉布衫和一件编织得相当好的褐色毛衣，一种怜悯之心顿时油然而生：生活似乎使她疲惫不堪，对罗斯夫人的另一个儿子，狄克的哥哥伯德，巴巴拉也多少了解一些——她知道罗斯夫人对他抱有希望，还知道他在一个她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叫什么波克·乔普山的地方——死去的那候，罗斯夫人对他抱有的希望又是如何破灭的。

“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削土豆皮。”巴巴拉说。

“这样削完的土豆就不会变黄了。”罗斯夫人说。

“爸爸去哪儿了？”狄克问道。

“去二号店了。”他母亲说。巴巴拉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很显然罗斯夫人对她提前回来不是那么当回事儿，尽管这样她也不挑什么。狄克早就跟她讲过他们家不会那些客套。

“今年的生意怎么样？”

“现在还很难说。”罗斯夫人说着往搪瓷锅里灌上凉水，把削完的上豆放进去。“这样做，到吃饭时土豆也不会变成黄色的。”

“我能帮您干点儿什么吗？”巴巴拉问。

“你可以把桌子摆上。狄克，告诉她餐具都在什么地方，”罗斯夫人转向巴巴拉，第一次正眼看她。她们目光相遇，罗斯夫人脸上现出了笑容。

巴巴拉把那些大小不一的刀叉精确地摆在光秃秃的饭桌上。她又叠了一些餐巾，放在每个叉子的左侧，最后她把那种加油站用来作为奖给用户的玻璃杯摆放在每把刀子的上方。

“这不是，你爸爸回来了。”罗斯夫人说道。狄克从厨房窗户向外望去，巴巴拉也朝外边望去，他正从车里走出来。巴巴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竟是一辆浅蓝色的四门凯迪拉克车。

圣诞节那一周，艾斯本这座漂亮的城镇到处灯光闪烁，一派节日气氛。巴巴拉每次想到要穿上长裙，开司米毛衣，和狄克在一家酒店火光熊熊的炉火前饮上几杯酒时，她都毅然地放弃了这种念头。相反，她利用一切时间陪伴着狄克的父母。他母亲是个少言寡语、从不表露感情的女人。巴巴拉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她很喜欢艾利克斯·罗斯，至少他还有点话说。他给巴巴拉讲他都经营什么货物，跟她说用户对他们租用的器具是如何的不经心，等他们把器具还回来时都弄得不成样子。他还报怨那些他出于无奈才雇用来的大学生。

“那些人哪，没有一个能按着我每天发给他们的工资的工作量好好地干上一天活。”他说。巴巴拉点头赞同，可是狄克却面无表情。他说他讨厌做买卖，只有工程学的必然性才能使他满意。至于一个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不在于有没有那些幻想式的会计学理论，不在于那些需要监视的不守本份的工作人员，不在于能够毁掉整个季节收入的变幻莫测的天

“他天生就不是块做买卖的料，”罗斯先生说，“糟透了……”他突然把话收住，巴巴拉以为他要提起狄克的哥哥伯德，然而他没有再说什么。

“世界也需要工程师嘛。”狄克为自己辩护说。

“我看也是。”罗斯先生说，他似乎还不大同意这样的说法。

巴巴拉用了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想方设法让狄克的父母喜欢她。她觉得她对狄克的母亲是枉费心机了。罗斯夫人是个虔诚的摩门教信徒。她不喝酒不跳舞，不看小说也不看电影。他们的房子总是那么暗，原因就是罗斯夫人不喜欢铺张浪费。她说铺张浪费是一种罪过。

相反，艾利克斯·罗斯固执己见，活泼可亲，待人热情。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对什么天主教、犹太教、新教和摩门教都嗤之以鼻。

“宗教只适用于愚蠢无知的人们。宗教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教堂倒富起来了。”他常常这样讲。他的宗教就是金钱。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把当天的收入盘点一番，可是生意从来就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令他心满意足，艾利克斯。罗斯说，在那些不守本份、不能胜任工作的大学生帮手与那些国家财政部门贪得无厌的人之间，生活是生存的斗争。

巴巴拉倾心于艾利克斯·罗斯的精神，甚至对他的生意产生了兴趣。他把生意变成了富有乐趣的行动，有胜利也有失败，有可恶的敌人也有忠实的朋友，他的生意是个广播连续剧，里边拥有众多的角色，他自己扮演着主角。到后来，艾利克斯·罗斯对巴巴拉生活产生的影响，竟然远远大于狄克自己对巴巴拉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当然这指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

“我要是有胆量，绝对不会给那些杂种交钱。”他是说交联邦所得税。“这个该死的国家一定是共产党掌管的。”

“艾利克斯，注意你的语言。”罗斯夫人经常说他。

“我说什么话是我自己的事。”

“也是上帝的事。”

艾利克斯和莎拉·罗斯除了相信勤奋劳动和勤俭持家之外，似乎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莎拉·罗斯早晨一起床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整天地洗呀、擦呀、涮呀，做饭。她很得意地让巴巴拉看了地窖，架子上摆着一趟趟的玉米，西瓜咸菜，甜菜，还有她在入秋前做的赖马豆罐头，每年这个时候是赖马豆丰收的季节，价格便宜。

“你看他们喜不喜欢我？”巴巴拉和狄克刚刚钻进租用的道奇车里，巴巴拉就问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沿着坑洼不平的车道驶去。艾利克斯先生肯定喜欢她，她心里有数。狄克的母亲是不是喜欢她，她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

“喜欢你。”狄克说。

“你怎么知道？”巴巴拉希望有证据，需要说得具体些。

“我心里有数。”狄克说这话时有点儿含糊其辞。这可不象他说的话。

“是不是很意外？”狄克的笑容说明了一切。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出来呢？”

“很快。”

“小气。”巴巴拉说。她移到前座，把左手放在狄克的右大腿上，琢磨着他们一家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

对于狄克，伊万吉兰·杜登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很明显他是爱上了她的女儿；他通情达理，又是哈佛的毕业生，要名有名，今后也决不会缺钱花。任何一个女人都会觉得狄克作为一个女婿是无可挑剔的。

尽管这样，伊万吉兰还是有些担心。他过于安分守己。虽说她不怎么愿意承认，但是她打心眼儿认为自己的女儿也有点儿太安分守己了。他们要是在一起的话，就象是一对儿结婚有四十年的老夫老妻，每天吃完晚饭只是满足于一起看电视十有一天晚上他们是和另一对儿刚订婚的恋人打的桥牌，有一天夜晚他们带着杜登夫人看的《周游世界八十天》。她纳闷儿他们就没有什么别的乐趣。

丈夫去世使伊万吉兰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她学会了如何经营彼得·杜登留下的生意。最初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无奈：她需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才下决心学着做房地产和保险生意，辞去了在当地商店的工作。没有多长时间，她便意外地发现她不仅仅喜欢这种工作，而且还很擅长。把财产卖给那些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的买主，她还真有一套。她还发现，把保险和房地产合起来做似乎更容易，也用不着那么大的功夫。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她就挣了她丈夫在世时一年才挣得到的钱。

她添了新衣服，把厨房也重新改造一番。她每当回想起当年结婚时的幸福时刻也不流泪了。她最喜欢的是回顾彼得向她求爱的那些日子：那是二十年代初，他们常常在一辆敞篷旅行车里拥抱亲吻，那辆车是彼得二十一岁生日时，他父亲送给他的。那是十一月份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把车篷放下欣赏着满月，天气冷得足以使人染上流感，但是他们换来了欢乐。他们在晚会上喝香槟酒，第二天醒来头直疼的情景依然萦绕脑际。她还记得为了显得不那么愚蠢，他们象查理斯顿人那样在香槟酒里对些禁酒一起喝。她还记得凯蒂送给她的双绉内衣和香水，那个时候，一切都那样令人陶醉。

她每次看见狄克和巴巴拉在一起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都使她心里不大得劲儿。但她也不说什么，她毕竟是从爵士年代过来的人，现在时代不同了。五十年代是理智的年代。

“这是我母亲让我送给你的。”狄克说道。狄克，巴巴拉和她母亲饭还没吃完，狄克就从小衣兜里掏出了一个用薄纸包着的小包。巴巴拉把小包打开，发现里边竟然是一个装璜简单但却闪闪发亮的二克拉的钻石戒指，她顿时高兴得流出了眼泪。狄克帮她把戒指戴在她左手的中指上。此时此刻她双手颤抖起来。

“这就是你说过的，你知道她喜欢我？”

“她把这个戒指给我时，让我告诉你，她希望你和我能象她和我父亲那样幸福。”

“我也希望那样。”巴巴拉抽泣着说。现在她不仅仅觉得自己的的确确订了婚，更重要的是她未来的公婆，承认了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她举起左手以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欣赏着手上的戒指。随后她把手伸到母亲跟前。

“太漂亮了。”伊万吉兰·杜登说。确实漂亮，是一块白中透蓝，完美无暇的钻石。“你母亲太令人感动了。”

“她不会表达，”狄克说，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也不善于表达，对他来说，无声的动作也许会来得更快。

“我爱你。”巴巴拉说着，当她母亲的面吻了吻狄克。

那天夜里，巴巴拉几次醒来，打开灯，把戒指拿到灯下边摆弄着——红、黄、蓝、绿色彩缤纷，闪闪发亮。她吻了吻戒指，接着又戴到手上。它，在她的手指上显得那么沉重。她想着她能不能适应这种感觉。她不希望如此，这个戒指实在宝贵，不能随随便便地把它给淡忘了。

巴巴拉完全陶醉在幸福之中，每时每刻都在琢磨着莎拉

罗斯所说的那种幸福婚姻究竟是什么样子。然而，她却没有想到象莎拉·罗斯这种生活刻板的女人竟会有如此昂贵的钻石戒指。

“现在我们可以了。你已经有了订婚戒指。”那是新年后星期二晚上九点钟，密尔顿·勃利的德克萨演出刚刚结束，狄克和巴巴拉两人独自呆在起居室。他左胳膊搂着巴巴拉，右手无名指擦着钻石戒指。密尔顿大叔身穿女人服装拼命地向观众作怪脸时，巴巴拉和狄克正在热烈地拥抱着、抚摸着。巴巴拉身上外套的扣子都开着，裙子也都掀到了大腿根儿，臀部下边也不那么平坦，因为她紧身短裤的分叉被扯到一旁。她觉着坐得很不得劲儿，狄克要是不告诉她，她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巴巴拉说，很长时间以前，在威利斯力大学宿舍，她和她朋友们就一致认为，只要你订了婚就可以无所顾忌。尽管这样，巴巴拉对眼下要干的事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一

旦干了，就要于到底，不要收缩，不能打退堂鼓。这是巴巴拉有生以来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甚至比做出了要嫁给狄克的决定还事关重大。因为要嫁给谁的决定总是可以改变的：订的婚约是为了解除它。

“我爱你。”狄克说，“我需要你。”

“你敢肯定那样可以吗，真的可以？”

“当然可以。”

如果狄克说可以，巴巴拉就会听他的。他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骗过她，她知道他是绝对不会骗她的。“咱们来吧，”狄克说。

起初，巴巴拉有些陶醉，她对他细致的抚摸和体贴，甚为感激。象是交响乐的序曲，渐渐地把她引入一个她向往已久的意境，一个五十年代较为保守的意境，歌声细语，温存风雅，一切都象是初春的河流，微微的波浪拍击着大地的萌动，然而这一切却泛着灰蒙蒙凉意，缺乏令人荡魄的热烈。狄克还时有间断，这使巴巴拉感到不快。但她把这种感觉隐藏在自己心里。

她爱他，更多的是精神。

理查德·罗斯夫人。

巴巴拉·罗斯。

巴巴拉很得意她的新名字，练习着写成各种字体。有的时候，她拿不定主意究竟是用印刷体好还是用草写体好，就连在支票上签字时，她也要停下来想一想该用什么字体。她买了很多印花文具，用来答谢那些送她结婚礼品的人，还从阿尔特曼商店买了床单、毛巾和浴垫。

到1957年感恩节她和狄克结婚时，她是全班同学中第一个成为夫人的姑娘，其实她当初并没有这样打算。

“你打算要几个孩子？”托比·格里弗伊丝问巴巴拉。那是感恩节前，学校停课放了四天假。巴巴拉正在收拾包裹准备永远离开威利斯力。托比盘腿坐在巴巴拉的床上。

“四个。”巴巴拉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我恨不得要它一屋子。我总想要个弟弟和妹妹。”巴巴拉从来没问过她母亲为什么只生了她这么一个孩子。恐怕她心里明白：孩子多花费大，麻烦多，这两项就足够她父母忙活的。

“四个正合适。我也想要四个。五个我可就忙不过来了，三个是令人讨厌的数字。一位奇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托比一边说，一边用她的格子花呢裙子擦着订婚戒指。巴巴拉琢磨着托比能不能把戒指给戴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们马上准备要孩子。趁你年轻时要孩子才好呢。”巴巴拉说着，叭的一声把第二个皮箱扣上，实际上，对这个她心里也没有数，只是那些权威——《麦克卡尔报》、《周报》杂志上的儿童料理版，还有斯博克博士——似乎都认为年轻的母亲是最理想的母亲。“作为小姐，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点行装了。”她说，“你知道吗，我下次再这样收拾就该去度蜜月了。”

“哦，你可真幸运！”托比高兴地尖声叫道。

感恩节后的星期五，巴巴拉和狄克在普林的那座小小的荷兰新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巴巴拉身穿长长的白色礼服。严格地讲，她已经不是处女了，但是她觉得自己并没有欺骗狄克；因为她的童贞是狄克所得，而不是别人。他们的婚期提前了几个月，这完全出于她的爱情和承诺。婚礼结束后，巴巴拉和狄克开车去曼哈顿，准备在那儿度过暂短的蜜月。伊万吉兰·杜登用车把新婚夫妇送到艾都威尔德，准备坐飞机回丹佛。

“你们的儿子是个好小伙子。”伊万吉兰说。

“每年挣一万块钱。”艾利克斯·罗斯说道。他总觉得狄克这人不实际，他哥哥才是个经济脑瓜儿。他想说明，一个人刚开始要是走错了路……“我刚开始可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先生。”

伊万吉兰没有告诉罗斯夫妇，她和彼得·杜登开始就很富有。她二十三岁就有貂皮衣服，她和丈夫乘坐一等舱到法国安第斯群岛度过蜜月。彼得的父亲不仅仅留给彼得一笔兴隆的生意，还留下一笔二十五万元现金的遗产。他们用这笔钱喝香槟酒，买貂皮服装和闪闪发光的旅游车。最后把钱花得一千二净，彼得·杜登不知该怎么办，这些伊万吉兰·杜登也没有讲给他们听。现在他们都平等了，伊万吉兰心想。他们成了普通的美国人，拿着普通人的工资。

相反，艾利克斯·罗斯没有告诉伊万吉兰·杜登，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告诉了他的律师，他现在有一百五十万美元。狄克的哥哥去世的时候，他改写了遗书……哦，该死的。他现在很得意这位刚刚过门的儿媳妇，也许他又要改写遗书了。这事和任何人无关。最主要的问题

是不让国家财政部门的人把手插进来。

刚刚结成的亲家互相笑了笑，在美国航空公司机场道别分了手。他们各自尽了义务——养育了他们的孩子——而且出色地尽了义务。从现在起，以后的一切完全取决于狄克和巴巴拉他们自己了。

巴巴拉和狄克来到纽约，住在广场酒店。他们度过了新婚之夜，喝了一瓶香槟酒，一共花了三十五元钱。星期六晚上他们在章伯德吃了顿晚餐，看了《窈窕淑女》。这场剧他们都非常喜欢，后来安德鲁·赫本被选中代替朱丽亚·安德鲁斯在电影中扮演丽莎，他们觉得这样实在不公平。

他们同房，喝酒，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半之后，便开始找公寓住了。麦克劳佛林公司办公室在松树大街，所以他们最好能在维利格找个住处。可是一九五七年是找公寓住最困难的一年。五十年代初，纽约的建筑少得可怜，找住处简直是件伤脑筋的事，价格也相当高。他们先在第五大街二号看了一个三室半的大套，每月租金二百七十五元，后来就在西十街一栋新盖的三室半的小套公寓住了下来，每月租金一百九十元，墙薄如纸。外面的庭院光秃秃的——不过他们当时也只有那么大的能力，巴巴拉觉得这房子要是很好地装饰一番还是满不错的，至少在他们有第一个孩子之前可以暂时住上一段时间。他们结婚后的星期一签了两年租期的合同，星期二就搬了进去。

房子里什么家俱也没有，他们只好买盒式中餐吃，睡在毯子上。第一天晚上他们是在地上过的性生活。

“我明天第一件事是去买一张床。”巴巴拉说，“我的后背实在受不了。”他们都笑了起来。他们又一次做爱后，便互相搂抱着人睡了。

蜜月结束了。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巴巴拉急不可待。

巴巴拉的母亲和罗斯夫妇给了他们每个人一千块钱作为结婚礼物。狄克白天上班，巴巴拉去商店选购碗筷和厨具，到维利格古玩店和廉价商店看家俱，学着做饭做家务，每个星期四她要看克莱格·克露格尼的小说，她学会了使用代替捣蛋器的打蛋器，学会了做奶酪时房间的温度要适宜，只有用高温熏烤的办法牛肉才能烤得透黄。

她喜欢摆放饭桌，准备饭菜，擦洗她母亲送给她的银器。她还喜欢经常看一看狄克的衬衫和袜子够不够穿，定期把狄克的西服和领带送洗衣房洗烫，她不乐意擦烤炉，不喜欢除电冰箱里面的霜，讨厌在浴盆里使用阿杰克斯，讨厌换床。她报怨时，狄克跟她讲了他喜欢画蓝图，但不喜欢参加经费预算会议，他无法跟其他工程师谈话时，共和党人总是强迫他去谈话。可是这一切毕竟都是工作。巴巴拉不再报怨了，而且多少次都在想，她能嫁给一个对生活具有如此稳重看法的人实在很幸运。

狄克之所以喜欢他的工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老板：爱德华·斯蒂尔逊司令官。

“他和电影里的军官一样。”狄克说，“花白的头发，褐色的皮肤，你会觉得他很性感。你知道吗，他有一棵橡树叶似的银星，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的。”

“凡是戴橡树叶银星的人都性感。”巴巴拉说，“对他们这些人简直没有法子抵挡。”

“你最好想点办法。”狄克警告说。巴巴拉在厨房正在洗沙拉菜，狄克就把她从里边拽了出来。“要不然我可要打你的屁股。你是属于我的。我的私人财产，不许别人侵占。”

他们上了床，有的时候巴巴拉会完全忘记床上的事——她讨厌甚至不愿意自己承认——她觉得狄克娶她为妻，莫不如说他娶了麦克劳佛林公司。

“话务员吗？我要个私人电话，请接理查德·罗斯先生。”巴巴拉把狄克在安纳伯利斯的电话号码报给话务员。狄克正在海军学院替麦克劳佛林公司为海军从事研究工作担当顾问。巴巴拉是在七十七街帕克伯尼特大厦斯查拉弗特商店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那是1958年1月5日，一个雷雨交加寒冷的日子。艾森豪威尔第二次连任总统的第二年刚刚开始，德雷尼特在全国广播电台仍然很走红，据电影杂志报导，莉兹·泰勒和迈克·托德发生了真正的爱情。话务员用了很长时间才把电话接通，尽管天气很冷，巴巴拉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心情异常激动，脸色涨得发红。巴巴拉终于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是理查德·罗斯先生吗？”话务员问对方，巴巴拉说的罗斯这个词用口头拼写了一遍。

“狄克？”

“对不起。”话务员说，声音听起来很机械，似乎要结束她的话。“要私人电话，在没有和对方接通之前您不要讲话。”

巴巴拉心里明明知道这种规定，可是她无法抑制自己。狄克在哪儿，他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

“喂。”他终于讲话了。

“我爱你。”巴巴拉说。这句话她本来没想说，但是却情不自禁地冒了出来。

狄克那边没有了声音。

“我爱你。”巴巴拉又说一遍。“咱们的孩子爱你。”

声音在电话里需要一秒钟的传递时间。“你怀孕了。太好了人什么时候？”

“七月。我刚刚从大夫那里检查回来。这次肯定了我才打电话告诉你。”

“七月？好极了！”狄克心中美滋滋的。他一直盼望自己能作父亲的那一天。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象对这件事那样地渴望着，就连结婚也不例外。当然，这他从来没有跟巴巴拉讲过。他担心讲了她会想到别处去。

“是男孩还是女孩，你介意吗？”

“只要结结实实的就行。”狄克说。其实，他打心眼儿里希望是个儿子。男人都希望要儿子。这是再自然不过了。

“有的时候我想要个男孩，可是有的时候又想要个女孩。我自己也说不准。”巴巴拉说道。

“你不要想那么多。”狄克说。

巴巴拉听着笑了起来。那天她第一次感到心情很轻松。接着她又想起了什么事。

“可是我要是发胖了，能吃了。你还会爱我吗？”

“我会更爱你的。”

巴巴拉的母亲知道女儿有了身孕，心里自然很高兴，可是她自己又私下琢磨着，巴巴拉和狄克干嘛非要早早地把他们束缚起来呢。罗斯夫妇俩似乎也很高兴，可是他们毕竟离那儿很远，似乎又不那么明显。巴巴拉心中暗想，他们对这个孙子辈儿会有什么反应呢。这可是他们的第一个孙子。

巴巴拉等待着七月份的到来。在这段时间里，她请来了救助队，让他们把她在邦·马切商店订购的那个饭桌和四把柚木椅取回来。既然还有一间半房子空着，巴巴拉开始装饰一番，准备给即将出生的孩子用。她母亲把她小时候用过的儿童床和高背椅子送给他。她在麦克赛商店买了一个盆，在药店买了一个多抽屉橱柜，上面是平的，好给孩子换衣服时用，她还办了很多货，什么尿布，小圆刷子，棉花球儿，汗衫、法兰绒睡衣，还有婴儿秤，婴儿体温计，消毒器和二十多个带奶嘴儿的奶瓶子。巴巴拉不打算喂自己的奶，不听那些医生们说的什么喂母乳健康又有抵抗力。她从一个朋友那儿听说，喂母乳可疼了，有时候孩子还会咬你的乳头。

巴巴拉看过斯博特博士的书，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大夫送给她的一本叫作《健康育婴》的小册子。她眼看着自己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乳房隆起。婴儿在胎里乱踢乱蹬时，她都是以爱战胜疼痛，最后几个月，乳房上出现了粗大而发蓝的血管儿。她担心狄克看见了会觉得很难看，她错了。

她问狄克时，狄克用舌头顺着血管儿舔来舔去。“我跟你说过，”他说。“你要是怀孕了我会比以往更爱你。”

“现在我也更爱你了，这是不是发疯了？”

“是发疯，但却是真正的爱。”狄克说。

“那我就永远象这样怀着孕。”

“那我也不反对。”

临产前三个星期，巴巴拉行动已经不方便了，可是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同房，巴巴拉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性欲亢奋。她总觉得不满足。

“我现在成了色情狂。”一天夜里她跟狄克说。他们躺在滚得皱皱巴巴的床单上，胳膊和大腿交叉着缠在一起，浑身是汗，疲惫不堪。

“我就是要你这样。”狄克说。

“一个色情狂？”

“一个怀着孕的牝鹿。”说完他们又一次做起爱来。

七月十日上午十一时，巴巴拉开始觉得腹痛。当天晚上六点半，巴巴拉生了一个女孩。她分娩时稍有难产，不过在婴儿降生一瞬间，她还很清醒，听见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她伸出双臂，大夫把婴儿的眼睛洗擦完毕才注意到。

“你现在还不能抱她，得先把她送到育婴室登记。”巴巴拉心里一阵强烈的失望，不过只持续了瞬间，快感便油然而生。她现在是个妇女了——她生过孩子了。她证实了自己的存在。

“你是位很好的姑娘。”医生说着，拍了拍巴巴拉裸露的后背，然后看了看表。“现在离八点半我们去看电影还有足够的时间。我妻子和我正急着去看《音乐之声》。我希望别的姑娘都能象你这样体贴人。”

巴巴拉冲着他笑了笑。她没给医生造成多大麻烦，心里感到很快慰。她父亲在世时也很得意她那股整洁和听话劲儿。

巴巴拉总担心生完孩子就会闲着没事几干了。她以前问过母亲这种事。

“我那个时候可没闲着。”伊万吉兰说，“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保姆。”他们都知道伊万吉兰那个时候的经历，对她女儿已经不适用了。

巴巴拉又去问刚刚生了一对儿双胞胎的托比。

“产后会闲着，你是在开玩笑吧？有了这两个孩子没有你闲着的时候。”

其实，巴巴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多余的。相反，她觉得自己犹如一名奥林匹克运动员，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之中，刚刚获得一枚金牌，目前她体力依然很好，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

艾妮特十分可爱，皮肤粉红，头发卷曲着，总是笑个不停。她生就一双机警的蓝眼睛，巴巴拉只要一抱起她，她就开始笑。有些书警告读者，刚刚有了孩子的父亲也许会表现出对婴儿的嫉妒；然而，狄克和巴巴拉一样，被艾妮特的可爱劲儿迷得销魂夺魄。他甚至忘了他更喜欢儿子——想要儿子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他照了照片，还给他的父母寄去了来纽约的机票钱，让他们来看一看他那位新生的千金。

艾妮特改变了艾利克斯和莎拉·罗斯的态度。他们紧紧地抱着她亲吻她，罗斯先生还叽哩咕嘟地跟她讲儿语。自从伯德去世后，他们老两口还是第一次这样激动，倾出了大海波涛一般的感情。临回艾斯本前，他们不但把机票钱还给了狄克，还给巴巴拉和狄克他们留下一张一千元支票，留着急用。

有些书还警告读者，刚刚有了孩子的父亲和妻子同房的兴趣，也许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狄克却不同。他似乎比以往更爱巴巴拉，而且巴巴拉对狄克的性能力更为崇拜敬畏，因为它竟然具有如此的神力，给了她象艾妮特这份奇妙的礼物。

他们决定尽快再要一个孩子。

1958年，太空竞争严峻地开始了。苏联人遥遥领先，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和太空狗——拉伊卡。下一步，俄国人即将登上月球。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太空探索和国防开支急剧增加。麦克劳佛林公司接受了数项比较大的海军合同。狄克定期地往来于五角大楼。其实，当时巴巴拉给狄克打电话告诉他她又有身孕时，狄克就在五角大楼参加一个有关间谍侦察机飞越领空的绝密会议。狄克跟她说太好了，他得回去开会。他手指交叉，但愿能生个儿子。

1959年春天，他们一家搬进了格雷摩西公园附近的一幢定期付租的六室公寓。他们花十五元钱请了一顿客，贿赂到一把进公园的钥匙。公园的门都是经过装饰的铁门，绿色的树木被格雷摩西公园协会雇用的园工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是一座英式公园，幽雅壮观。巴巴拉为告别那到处是老人下棋，醉鬼酒后躺在长凳上睡大觉的华盛顿广场公园而感到欣慰。这两座公园的差别恰恰说明了五十年代末期经济气候急剧上升时，罗斯他们一家所经历的上升趋势。

巴巴拉第二次怀孕时和第一次一样，尽管遵照医嘱特别留心，每天早晨还是有反应。她发现，起床前要是吃一块杰克博华夫饼干，就会感觉好一些。第七个月时，她腿上暴起很粗的紫血管，用儿童车推着艾妮特去公园都觉得疼痛难忍，就连站着不动也疼。她去找医生诉苦。

“别担心。”医生说，“第二次怀孕都是这样。”

“可是书上说，两个孩子要近一点，这样他们在一起不打架。他们互相看作是同盟，不是敌人。”

医生笑了笑，“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一点儿不错。可是，有的时候怀第二个孩子体力会消耗过多。我看没有必要担心。很多女人这个时候都有这种静脉曲张现象。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这一次该轮到巴巴拉笑了。医生说的和书上介绍的完全一样。但是，巴巴拉一方面想，要是夏天去海边，她的腿裸露在沙滩上，她可怎么办？一方面她又安慰自己用什么东西盖一盖就好了。

“有时候，”医生说，“生完孩子，静脉曲张现象就会自然消失。”

巴巴拉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后心里有了数，她也会象医生说的那样：曲张的血管会自然消失。

巴巴拉一开始分娩就马上去了医院。她分娩两天半，终于于1959年7月13日生了个儿子。她生下孩子时已经精疲力竭，神志不清，她大流血，输了两次血。从医学角度上看，她不该出现这种难产现象。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谁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就我们看也没有什么毛病。”她出院那天医生讲。“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一次，医生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房间时跟她开了句玩笑：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在这个地

方再见。巴巴拉强打着精神惨淡地笑了笑。

巴巴拉觉得全身上下一点几气力没有。出院时得狄克抱着儿子，他们以伊万吉兰的父亲的名字给孩子起名叫克利斯蒂安。狄克一只手招唤出租车，把巴巴拉扶进车里。格雷摩西公园公寓和他们原先的比几乎大一倍，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可是巴巴拉和孩子一回到家里，她就开始患上了可怕的幽闭恐怖症。她总觉得四周的墙壁把她封闭在里边，似乎要把她碾碎，呼吸不到氧气。她按电铃唤电梯，只要电梯上到八楼稍微慢一些，她就会不耐烦；她极度紧张，自己顺着楼梯往下跑，穿过大厅，跑到大街上，至少大街上没有墙壁。呆在家里她实在受不了，可是又离不开，克利斯蒂安没人照看。

小克利斯蒂安患有腹痛病，夜里不停地哭叫。他的饭每次都扒得到处都是，整个公寓到处是孩子反奶的污腥味儿。无论巴巴拉怎么冲洗，也除不去。白天，要是天气很好她还可以躲到公园去，一到晚上她就被拴得牢牢的。不管怎么样，狄克一觉睡到天亮。巴巴拉可就不行了。孩子一哭她就听见了。她摇啊晃啊，给孩子唱催眠曲，唱摇篮曲。有一次她竟然对孩子手淫，因为她从书上看到没有文化的维多利亚保姆常常这样做。可是横竖都不行。克利斯蒂安就是个哭，烦死人啦。艾妮特也受了影响，从一个讨人喜欢的娃娃变成了一个整天哭哭啼啼令人讨厌的怪物，巴巴拉只要多照料一会儿克利斯蒂安，她就没命地叫。如果巴巴拉顾不上克利斯蒂安，克利斯蒂安就哭。巴巴拉要是去哄克利斯蒂安，艾妮特就哭开了。艾妮特已经开始蹒跚行走了，她整天坐在地上，抓住巴巴拉脚脖子不放，缠着她。她要是不理她，她就扯着嗓子叫。

这一次罗斯夫妇俩来看他们的孙子孙女，净说些客套话。他们尽量把时间均等地花在孙子和孙女身上。尽管这样，巴巴拉还是发现他们和艾妮特在一起玩儿的时间，要比和克利斯蒂安在一起的时间多得多。她还注意了他们临走时没留下一千元钱的支票。她觉得沮丧极了，但又无法跟狄克提这码事儿。

巴巴拉开始认真地考虑她正在丧失理智。她的幽闭恐怖症越来越严重。好好地睡上一宿觉是什么滋味儿，她根本就没有一点儿印象了。她体重明显下降，显得十分憔悴，眼睛下边也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她莫名其妙地就冲着狄克大吵大嚷，对性生活变得兴致索然。有时，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法不想听见克利斯蒂安的哭闹声，可是她反倒觉得床在动，她知道狄克在手淫，她不理睬。她无可奈何。她觉得过意不去，但又无可奈何。

这个建筑的电源配线实在太陈旧，无法安装空调，房子里的热气和湿气增加了巴巴拉的封闭感。她真希望克利斯蒂安死掉。她几次让他睡在窗户附近的桌子上，然后离开公寓，准备去联合超级市场。她希望他突然从窗户掉到八层楼下摔死。然而，她每次一到街上，一种内疚似乎把她送上了断头台，她又顺着黑乎乎的楼梯一口气跑上八楼，心想可千万别跌倒。她推开房门一把把克利斯蒂安从桌子上抱起来，她紧紧地搂着他，亲吻他，全然不顾孩子身上反奶的味道。克利斯蒂安就哭呀、扑打着手臂，她尽管内疚也无法使他安静下来。

巴巴拉的医生告诉她不要担心。他跟她讲，患有腹痛的婴儿往往是自然消除腹痛的。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炎热潮湿的七月和八月总算一天天地熬过去了。狄克忙着为核潜艇设计一种新型水力系统。巴巴拉总有那种恐惧感：她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似乎要结束了。

“也许是住在城市的缘故。”一天晚上狄克说。“也许我们应该想一想搬到市郊去，”

狄克在起居室，巴巴拉在闷热的厨房里正在涮洗奶瓶子，给奶嘴消毒。书上介绍说，要两个很近的孩子，好处之一是，你可以用同一个奶具喂他们，这样节省。可是书上没介绍，这样一个奶瓶子究竟应该反反复复地涮洗多少次，干燥多少次，消毒多少次。

“斯蒂尔逊家很喜欢住在维斯特·鲍德。住在郊外你也许不会感到这样憋得慌。”狄克尽量作出姿态。巴巴拉跟狄克讲述过得幽闭恐怖症是什么样。她这才认识到狄克竟然以为，治疗这种病就象那个窝那么容易。

“到维斯特·鲍德去住，我们的钱根本不够用。”麦克劳佛林公司每年付给狄克一万四千元的薪水，这是很可观的。但是在维斯特·鲍德那种地方还是远远不够。“那么去长岛？和我一起做事的一个伙计刚刚在纳索县买了一处很好的住处。”“你是说勒维托尼吗？”巴巴拉尽量用狄克喜欢的合情合理的口吻同他说话，可是口气中透着颓丧和消沉。“成为一个住同样房子的同样家庭？”她经常嘲笑那些纽约讽刺画中的男人，夜里回到家时，竟然不知道哪幢房子是他们自己的。她的笑声听起来和一个疯女人一样。

“不是勒维托尼。”狄克说。他现在起了戒心。她的笑声说明了问题。“更好的地方。到处是绿色，还有树。孩子可以在院子里玩耍。你也不用去公园了。”

他想尽量把她的生活安排得协调些，可是他刚才却恰恰把唯一能使她的生活协调些的东西

夺去了。

“我喜欢那个公园，”她说，笑劲儿一过，她的声音如同她本人一样，僵死了。

“在麦克劳佛林公司，人们都喜欢住在郊外。他们认为麦克劳佛林公司家庭就应该有这样的一切优越条件……”

巴巴拉僵死的声音竟然使狄克解除了戒心。突然，他意识到他听到的声音不对劲儿，戛然止住，走进厨房。孩子的奶瓶子都在地上，摔得粉碎。片片玻璃在日光灯下闪烁着亮光；巴巴拉坐在地上用手指缝筛着破碎的玻璃。狄克进来时她抬起头，两串泪珠缓缓地从眼睛里淌出来。

“你把这扫一扫，好吗？”她轻声问道。她把额前一簇头发向一旁拢了拢；额头留下一块血印儿。她的手掌划破了。

“对不起。”她说，“我现在想睡觉，”

狄克望着自己的妻子艰难地走过起居室，琢磨着这究竟是怎么啦。他从扫帚柜里拿出工具，开始打扫地上的碎玻璃。

十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狄克是在蒙托克度过的。麦克劳佛林公司在那儿举行了一次“智囊会”。为了让公司人员加强思维能力，麦克劳佛林公司决定：他们在戈尼酒店脱产学习一个星期。

“你干嘛不到我这儿来呢？”狄克在电话里说。“星期五晚上来，下个星期我可以休息一周。”这是自从摔奶瓶子事件以来狄克头一次正式和巴巴拉对话。他对她很担心，觉得她不稳定，不想冒任何风险把她推向绝路。他又怕失去她。尽管她不喜欢他们之间的生活，可是他喜欢。他喜欢自己的日常工作，他爱自己的孩子，他爱自己的妻子。

“孩子怎么办？”

“你母亲总说要看他们，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她，看她能不能带他们？”

伊万吉兰自然很高兴。星期五一过午她就开车来到曼哈顿。她身穿一件意大利棉织衫和一条斜纹粗棉布锥形裙子，看上去潇洒迷人。她见面亲吻女儿时，闻到了巴巴拉身上的科隆香水味儿。巴巴拉也记不得她最后一次用香水是在什么时间了。

“我刚才还在想你打算什么时间走。”伊万吉兰问道。“说真的，你看上去很难看。”

巴巴拉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褪了颜色的衬衫。这件衬衫还是她在大学那留下来的，现在她体重一下子减轻了那么多，穿在身上眶里眶荡的。她只把嘴唇轻描淡写地化了化妆，反倒使她的皮肤显得很苍白。她母亲说对了。

“我知道，我的心情也不好。我但愿能永远离开这里。”巴巴拉不假思索地冒出了这么几句话。她母亲的温和和关心解除了她心里的重重顾虑。“你和狄克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吧？”伊万吉兰。杜登很少问及这样的个人问题。这种事她总是避而不问。

“我不知道。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孩子……”巴巴拉现在也不再乎自己说话的口吻了。她的自尊所剩无几，不想捂着盖着的，不想跟人讲她是多么多么的幸福。

“可是你当初那么想要孩子。”

“这我知道。”

“你也一定知道要孩子就要花功夫。”

“那我可没想到。”巴巴拉说，这她还是第一次想到。“我想要孩子是因为人家都要孩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就象麦克卡尔上的那些画片一样——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们，他们总是在一起欢聚，不是做这个就是做那个，做有趣儿的事。”巴巴拉停顿下来，接着她耸了耸肩。“我看我是上了那些宣传的当了，”

“这么年轻，又这么苦。”她母亲说，“振作起来。瞧。”她母亲说着递给她两张一百元的支票。“重整旗鼓。这个你都留着自己用。买几件新衣服，把头发好好地做做型。不要自暴自弃。”她说着把支票叠好放进巴巴拉的手提包里。她心里在想以后会怎么样呢，她女儿觉得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她也只能给她些钱去买些新衣服，把头发好好地收拾收拾。

“谢谢。”巴巴拉扣上手提包。

“挑逗挑逗狄克。”她母亲一边说一边拼出狄克的名字。“你要是挑逗不了他，去挑逗别人，”

伊万吉兰抱起两个孩子，把门关上就走了，只剩下巴巴拉一个人。离去潘恩火车站还有一会儿功夫。此时此刻，她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她母亲五十七岁，她二十二岁。

仅仅二十二岁。

长岛铁路专线上，星期五下午的火车厢里是扶手转椅，上面套着长毛绒座套，铺着雪白的头垫。列车员殷勤地送着饮料，空调使车厢的空气干爽无味儿，给人以舒畅之感。巴巴拉敢断定司格特·菲茨杰拉德以前就是这样旅行的。她要了两份加橙汁的杜松子酒，接着便看起当年最畅销的《艾克索杜斯》来。她想到自己的生活，决定按母亲的主意办。明天，她第一件事就是去做发型。她要象妻子一样对待自己的丈夫，重新恢复女人的气质。她决心要为自己着想，该如何度过以后的生活。她仍然年轻，不想在无人指点下步入歧途。火车抵达蒙托克时，巴巴拉拿定主意冲撞一下自己的命运。

狄克在火车站接她。他看上去非常精神——皮肤晒得黝黑，精神焕发——巴巴拉感到很吃惊，他看上去竟然如此漂亮。他们一起安安静静地吃了顿饭，一本正经地议论着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成为州后国旗上一共有了五十颗星，看上去耐人寻味儿。他们决定去看一看有争议的新古根海姆博物馆，商定每个星期，一个晚上雇用保姆，狄克也下决心每天下班早点回家，他们认定他们最喜欢看的电影是《广岛》和《我的爱》。

之后，他们回到房间。床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房间里有个淋浴器，可以喷出热水，一面镜子又长又亮，镜子下面是两个洗手池。巴巴拉对他们刚才吃饭时喝的葡萄酒不习惯。她脱光了衣服，说她象个妓女。

“那就试一试。”狄克说，“要象真的一样。”

“我会竭尽全力的，”她说。她确实做了。

那个星期，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天空碧蓝，温暖至极。每一天，他们都要沿着荒废的长凳散步很远。每天下午他们都到那个老式的冰淇淋售货亭，买上两份热奶油圣代，每天晚上他们都饱餐一顿龙虾或牛排或烤牛肉什么的，每天夜里他们都温情脉脉，享受着性爱的乐趣。凡是看见他们的人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儿欢度蜜月的恋人。

圣代——顶部加有压碎的水果、核果或果汁等的冰淇淋。

“我不打算回去了。”

星期五傍晚，他们坐在一个沙丘上。观望大西洋的波涛懒洋洋地拥向海滩。六点半了，夕阳刚刚西下。白日的温暖依然随着清新而带有咸味儿的空气飘荡。

“我是说我再不想过我刚刚离开的那种生活方式。我再不想给孩子换尿布，再也不相信斯博特博士的话了。我要去工作。”她屏住呼吸，等着狄克拒绝她。

“孩子怎么办？”狄克小心翼翼他说。他不想惹她生气。他也不想重新回到原先那样。可是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他心里也没有数。

“我们雇个保姆。”

“要是雇个全天的保姆，我拿不起这份钱。”狄克一边说一边在一根草上打了几个结。

“我会挣工资的。咱们可以用我这份工资。”

“你一分钱也挣不到。”

“那又怎么样？”

巴巴拉看了看狄克，然后站起来，顺着沙丘走去，离开了他。他看着她走了一会儿，接着便站起来跟着她，最后大步流星地赶上去。

“亲爱的，”他说。“我不知道你要工作的欲望这样强烈。”

结果，对那些威利斯力学院主修英语、不会速记只会打字的中途退学学生来说，想在纽约找到工作确实不那么容易。巴巴拉找过大都市生活刊物，索克尼石油刊物和由一家巴巴拉一直没有弄清名字的公司资助的一个舞蹈季刊的编辑，她都被一一拒绝了。《观察》杂志也拒绝了她的申请，这家杂志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最初有意雇用她作接待员，后来他们听说她戴一副眼镜就回绝了她，他们觉得到麦迪逊大街488号的来访者，一下电梯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戴眼镜的姑娘不大体面。

最后，《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份招聘编辑助理的广告，她来到了《哈佩尔市场》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麦迪逊大街和五十六街附近的一栋旧建筑里，实在陈旧不堪。她的这位后来的老板是运动服编辑。

艾迪丝·斯坦尼兹五十多岁。她头发灰白，和芭蕾舞演员一样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个髻儿，鼻梁上架着一副耿谓眼镜，手上带一大块方型男式表。巴巴拉以前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带男式手表。她被这一创举深深打动了。在整个会面期间，艾迪丝·斯坦尼兹夫人一直都在给一个座垫锁边。她问巴巴拉是什么地方人，把普林周围的景色描述了一番，并且说：“那些旧粮仓好极了。”她问巴巴拉在哪儿上的大学，告诉巴巴拉威利斯力学院的院长是她姐姐在威沙学院的同班同学。她问巴巴拉有没有孩子，有没有保姆给看孩子，最后说她觉得格雷摩西公园面包房是那个城市最好的一家，尤其是黑面包。

她向巴巴拉介绍说，她的工作将是协助摄像，作市场调查的助手，直接为撰稿部收集附加资料。她最后跟巴巴拉说她喜欢巴巴拉，如果巴巴拉愿意，这份工作就给巴巴拉干。

巴巴拉当面向艾迪丝·斯坦尼兹夫人表示感谢，表示她愿意干，并且说这份工作听起来很有趣儿。“有趣儿，嗯！”艾迪丝·斯坦尼兹说着剪断了黄色毛线头儿。“不会那么轻松。”

说实在的，雇个人照看克利斯蒂安和艾妮特比被雇用还难。巴巴拉转了一大圈儿找到工作后就回家了，开始挑选保姆。

她先后回绝了好几个人：一个名叫普托·里坎的妇女，这个人总是面带微笑，可是不讲英语；一个黑人妇女，浑身上下尽是杜松子酒和水果口香糖味儿；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来见她时带了一条拐杖和一个取暖垫，说什么她有有关节炎；还有一个长相漂亮的瑞典姑娘，她想当模特儿，不过当模特儿之前她可以光给人看孩子。这个姑娘几乎每天在外面寻找那些有可能帮助她成为模特儿的人，很晚才能回来，所以提出来她能不能每天中午开始看孩子。

还有些人回绝了巴巴拉：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式保姆，表情严肃，心地善良，非常可心，她问巴巴拉他们雇没雇用别的保姆，因为她只是看孩子的，她拒绝清扫，做饭，洗衣服，跑腿传舌；还有一个从巴拜杜来的黑人妇女，说起话来轻快而有节奏，她说她只找住在七十街附近第五大街的住户，因为她的朋友都在那儿附近干活，每天要在七十二街的操场见面；还有一个中年同性恋者，这个人看上去倒满不错，可是她告诉巴巴拉她无法给巴巴拉干活，她觉得巴巴拉房子的摆设使人有一种太沉闷的感觉，她知道她在那样极为消沉的环境里没法生存。

就在巴巴拉开始觉得，她永远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时，维拉·索察克出现了。索察克夫人讲英语，稍稍有点口音，她介绍说她虽然出生于波兰很富有的农场主家庭，但战争期间她被送到了英国。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被关进德国集中营，土地也被元首给没收了。在英国时，她遇到了一个捷克人，名字叫波夫洛夫·索察克，和她结了婚。后来他们搬到纽约，他丈夫在五十六街一家很有声望的海关裁缝店做事。他们自己没有孩子。索察克夫人对孩子亲得不得了。她曾经给别人看过孩子：她以前的雇主是布隆明戴尔商店的进货员，名字叫纳曼·马库斯，离了婚，就在马库斯离婚后搬到得克萨斯时雇用了她。她拿出来几封非常好的推荐信，巴巴拉当场雇用了她，每周八十元钱——这个数恰恰是巴巴拉每周从《哈佩尔市场》所挣到的。

巴巴拉当初作出要找工作的决定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她心中一直在琢磨着人们会如何看待她。她发现有些人，比如托比·格里弗伊丝·维尔斯羡慕她时，她倒觉得很惊讶。一九六年初春，她和托比一块吃午餐。托比正有身孕，肚子大极了，穿了一件用两片衣料拼在一起的淡绿色外套，上身是一件加肥罩衫，下身是一条袋式裙子，腰间扎着一条松紧带。他们在第五大街附近，一家很讲究的法国饭店见的。巴巴拉的工作，那些模特儿和摄影师的轶事强烈地吸引了托比，对她更有吸引力的是巴巴拉能以批发价买到模特儿服装。

“太令人着迷了。”托比说。她那显而易见的羡慕之心使巴巴拉大为震惊。她本来没打算让自己的朋友如此艳羡。

“没有那么迷人。”巴巴拉说，“我整天锁边，烫裙子。大部分时间就象是个高级的洗衣女工。”

“你看上去哪象什么洗衣工啊。”托比羡慕巴巴拉那身多纳德·布鲁克斯长裙和新做的爆炸式发型。

“你那一对儿孩子怎么样？”

“这两个孩子可把我坑苦了。和书上讲的一样。”

她们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托比没想告诉巴巴拉她丈夫现在是BBo & o公司的总会计师，他承认和他的女秘书有那种风流韵事，她现在怀着的孩子成了他们之间和好的纽带。巴巴拉不想告诉托比她心里十分内疚，她每天早晨巴不得离开公寓和孩子。她心感不安，因为她的孩子实际上是让一个陌生人带大的。她贪婪地读杂志上刊登的每一篇心理学文章，文章说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质。

巴巴拉和托比不知不觉地来到外边的人行道上，就此道了别。她们心中都明白，尽管她们有那种“另寻新欢”的朦胧打算，她们是不会那样做的。什么多色菱形花纹袜子，无休止的桥牌游戏和钻石订婚戒指早已成为过去。每个人的现实都是个令人担心的未知数。

伊万吉兰·杜登对她女儿的活动能力感到惊讶。巴巴拉一直吃新鲜蔬菜，不再吃那些速冻的了，这使她深受感触。她现在感到宽慰的是巴巴拉那种绝望情绪已经烟消云散。

“我真看不出你是怎么干的，不过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她母亲说。

“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吧：我列了各种清单：有菜单，家务清单，工作清单，还有育儿清单，购物清单，就连各种清单我也列成了清单。”母亲和女儿都大笑起来。伊万吉兰·杜登心

想，巴巴拉这股热乎劲儿究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1960年7月，艾利克斯和莎拉·罗斯趁他们不太忙来到东部看望孙子和孙女，例行一年一度的责任。巴巴拉担心他们可能不会赞同她工作这一轻率的举动。结果恰恰相反，莎拉·罗斯和维拉·索察克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艾利克斯·罗斯主动给她出了不少主意，告诉她要如何博得老板的信任，好给她增加工资，得到更高的头衔。

“你如果再要孩子那该怎么办？”莎拉·罗斯问道。

这个问题使巴巴拉消除了防范心理。她早忘了她和狄克刚刚有了艾妮特时，曾经答应过狄克的父母要四个孩子，所以她回避了这个问题。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讲她不想再要孩子了。实际上，就连跟狄克她也没说过——这个话题他们从来就没谈过。

艾利克斯信心十足。“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就该是个副总裁了。”他说着吻了吻巴巴拉。这还是第一次。莎拉罗斯也跟着吻了吻巴巴拉。巴巴拉打心眼儿里感激她的公公和婆婆。艾妮特出生时，他们来到这儿就很活跃，现在巴巴拉有了自己的职业，他们似乎对她更关心了。巴巴拉吻别了公公婆婆，结婚以来她第一次希望他们下次再来。

对巴巴拉去工作唯一无动于衷的就是她的丈夫。这是她意料之中的，因为他强加于她的唯一条件是，她去工作无论如何不得影响他们的婚姻。巴巴拉决心每天要比狄克先回到家，帮助维拉·索察克把扔得到处都是的糖纸和杂志收拾好，重新化化妆，在狄克回家之前把晚饭和加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准备好。那么对于狄克来说，他回来时只要巴巴拉在家，正在等候他，他对自己的婚姻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不知道，巴巴拉也不知道，他们整个生活其实是虚构的——精心筹划，全力维持，然而也是虚构的。他们生活在幻境之中。

幻境中的时间飞快地流逝。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他的夫人征服了维安娜和赫鲁晓夫总理，他的孩子们——卡罗琳和约翰，约翰赢得全国的奖赏。和平部队成立了，猎湾成了一场无法缓和的灾难。佩勃洛·卡赛尔斯在白宫举行了演出，玛莉莲·梦露因使用安眠药和酒精过度而死于非命，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电话。

狄克在麦克劳佛林公司一直受到提拔，每当和斯蒂尔逊一家吃饭要很长那间的话，他们就把它看作是工作的需要，巴巴拉很乐意陪同丈夫前去，而且也很高兴能够尽妻子的天职。

巴巴拉在艾迪丝·斯坦尼兹那儿做事，被她迷住了。艾迪丝知道如何只用一个下午的摄像课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嘴嚼口香糖的半文盲年轻人从一个布隆克斯分子改变成一个女神；她还知道用什么角度，可以使一件二十元钱的衣服看上去象一个二百元钱的创造；她一眼就能看出用什么样的化妆、发式或内衣，可以使一个彩色专页销售猛涨。她总能有所新盼创举。她根本不用看着就能缝绣花边。

巴巴拉对她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效仿她。她买了一双丁字带凉鞋，和艾迪丝每天穿的那双完全一样。她买了一块男式手表，把头发拢在脑后，和芭蕾舞演员一样盘成一个髻儿。她模仿斯坦尼兹夫人说话时的干脆劲儿。她从来没有听到艾迪丝·斯坦尼兹谈起家庭、孩子、朋友或者与《哈佩尔市场》业务无关的任何其它生活。巴巴拉从另一位编辑那听说，艾迪丝·斯坦尼兹已经离婚七年，据传说她是同性恋者，她决不相信。后来巴巴拉离开了《哈佩尔市场》，到一家叫作《渣打书行》的平装书出版公司，担任电影探索的编辑。直到那一天为止，她一直潜心学习艾迪丝·斯坦尼兹的言行举止。

艾迪丝·斯坦尼兹说，巴巴拉走了她感到很遗憾，然而这她早就料到了。“你干这种工作实在委屈你了。”艾迪丝·斯坦尼兹跟她说。她带巴巴拉到库特·巴斯克吃了告别午餐，并送给巴巴拉一个维多利亚贝壳药盒，作为离别留念。巴巴拉哪会知道这个贝壳盒是从麦迪逊大街古玩店买来的，价值一百七十五元。十二年后，艾迪丝·斯坦尼兹从俯视公园大街的十八层楼坠楼身亡，纽约时报在第二版的第一页刊登了讣告，介绍她对时髦世界的贡献，称她是“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人物”。关于她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报导，巴巴拉心想，她的那些绣花边会怎么样，她自己仍然保留着那个贝壳盒，那个时候她才认识到它的价值，并把它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里边装着曲别针。艾迪丝·斯坦尼兹总会得到社会的公认。

渣打书行给巴巴拉提供就业机会时，巴巴拉征求狄克的意见：一告诉他每周工资一百二十五元，还说要给她封个头衔——助理编辑——她将负责协调以电影为题材的书刊，她问狄克这个差事怎么样，她应不应该接受。

“如果你想干的话，”他说。“你用不着我同意。”

“可是，什么事情要不问你，我是不会干的。”

“只要你能负起家庭的责任，我自然会为你的成功而自豪。”

“一个星期一百二十五元。你瞧，我终于可以挣钱了。”巴巴拉说。她现在觉得想喝狄克

为庆贺她第一天开始工作带回来的那瓶香槟酒了。尽管她觉得自己的工资增加了，也应该给索察克夫人加点钱，可是她每个星期照样付给索察克夫人八十元钱。

“我最好还是走着瞧吧。”狄克说，“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该养活我了。”这句话的内涵很幽默。巴巴拉含蓄地回答了他。

“首先我还是你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

“这个我不担心。”狄克说，他是不用担心。他心里十分明白巴巴拉知道什么是先什么是后。然而他从来没有想过，巴巴拉也许明白，但是不一定会接受。这一点就连巴巴拉也是到后来才明白。

六十年代，一切都变了。

音乐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披头士乐队和斯通尼那种粗鲁野蛮的狂喊乱叫。

政治变了。1963年8月，巴巴拉加入进军华盛顿的队伍，听了用扩大器广播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她以为这样肯定会有些益处。三个月后，李·哈威·奥斯瓦尔德枪杀了约翰·F·肯尼迪，杰克·鲁比击毙了李·哈威·奥斯瓦尔德。玛利娜·奥斯瓦尔德说她丈夫患有阳痿，玛格利特·奥斯瓦尔德坚持认为，李·哈威·奥斯瓦尔德是无辜的，凡有责任感的人们都在思索着，是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阴谋集团用其魔爪触动了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低级下流的地方。

服装变了。玛丽·奎特设计了超短裙；威代尔·萨松发明了几何发型；安德列·库雷格斯指望实现其令人鼓舞的太空服计划。

战争变了。士兵们被称为技术顾问。六十年代初期，几乎无人问津越南。

城市生活变了。在炎热的夏天，底特律和瓦特的黑人区愤怒了。年轻的黑人强抢行淫。

女人变了。他们阅读拜蒂·佛洛丹的《神秘的女性》，想找出女人的天地是不是真的在家的答案。

男人变了。他们购买皮艾尔·卡迪恩设计的服装。并开始感到他们的性生活缺乏保障。

这一切的一切都影响着巴巴拉。她剪了发，换了短裙，1964年，她二十七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她害怕过三十岁生日，然而三十岁生日已经近在眼前。看着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留着短发的狄克，她感慨万端，六十年代没有使他发生丝毫变化。

当约瑟夫·利维尼电影公司准备聘用她时，她问工资是多少。每周一百五十元。她问聘用她做哪些事。宣传利维尼制片公司的明星。她当场应聘，当天晚上就把她的决定告诉了狄克。她想她没事先和他商量他一定会不高兴。可是，既然他什么也没说，她也就没什么。

她为几个明星料理膳食：一个是电影明星，严格控制有机食物，一个是两性摩托车偶像，他告诉巴巴拉在纽约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最好的皮靴，在巴黎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最好的真丝内衣，一个是老演员，经常扮演地位显赫的律师角色，很喜欢年轻黑人；还有一个是扮演牛仔最有名的演员，他把自己那把金黄色六响枪的塑料复制品送给了巴巴拉，以表示感谢巴巴拉为他所做的一切。

巴拉总是故意显得十分滑稽可笑，白日十分开心，夜晚家务缠身，她取笑自己白天在市场的五室套间里，用勺子给一个意大利电影明星的法国长卷毛狗喂鱼子酱和香槟酒，晚上回家后烤土豆，在洗浴间浴盆里洗涮她的乳罩。白天她和一个异性去蒂凡纳商场买东西，晚上帮着艾妮特作算术。她在办公室说话低级下流，夜里她就装作听不懂丈夫说的他老板说过的那些下流笑话。

他们就这样持续了七年——从1959年到1966年。美国土崩瓦解了，巴巴拉的婚姻也支离破碎了。

1966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三晚上，巴巴拉下班后急匆匆地回到家，冲个澡儿，换上一条黑色羊皮超短裙，一件银白色紧身毛衣，黑色紧身短衬裤和黑白色的夜便鞋。

“你穿的那是什么东西？”她刚穿完狄克走进卧室。

“这是干什么？检查吗？”巴巴拉心里知道他们又该为什么吵嘴了。他们吵了不知道有多少次，这次又马上开始了。

“那裙子把屁股都露出来了。”狄克很少用这种语言说话。他们完全撕破了脸皮。

“人家都这样。”

“在麦克劳佛林公司就不是这样。”

“麦克劳佛林公司从来就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六十年代了。”

“我要你换上看上去稳健一些的衣服。”

“学校留下来的那些衣服我现在一件也没有了。那是五十年代，你可不要忘了。”

“换上稳健一些的衣服。”狄克双唇紧闭着。他拒绝追求巴巴拉想开拓的那些偏僻小路。

“那样的衣服我根本就没有。”巴巴拉理了理箍在她左膝上的衬裤。她抬起头看着丈夫，她平时抑制着的那种轻蔑顿时涌进心头。他一想起麦克劳佛林公司就十分担心，他担心他的老板会怎么想。他现在正竭尽全力向上爬。他真是傻瓜，一个十足的傻瓜。“那么你想让我什么也不穿喽？也许你的老板喜欢这样？”

狄克打她一个耳光，这一下实在太重了，她觉得面颊剧痛，眼泪缓缓涌进她的眼睛。她死死地盯了他一会儿。

“你混蛋。”她说。

“对不起。”他说。

“你滚开。”

他们一声不吭，乘电梯下了楼，在出租车里狄克抓起巴巴拉的手想弥补刚才的过失，她把手缩了回去。

斯蒂尔逊一家住在公园街和七十四大街附近的一个普通的合作大楼里。他们敲响公寓门铃那，脸上都涂上一层笑容。南希·斯蒂尔逊把门打开。

“你好，巴巴拉，”南希说。虽然斯蒂尔逊夫人认识巴巴拉已经有十年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叫巴巴拉称呼她的名。狄克解释过，在海军里，下级军官的夫人从来不称呼上级军官夫人的名。这只是海军的习惯，没有别的。

“你好，南希。”巴巴拉说。斯蒂尔逊夫人一怔，露出不悦的表情。“你好吗，南希？”巴巴拉停顿下来。她跟什么人什么话都敢讲。

“您好，斯蒂尔逊夫人。”狄克说。屋里的每一个人都默默地认定不要理会巴巴拉有失检点的举止。每一个人，除了巴巴拉。

斯蒂尔逊司令官出来了，把巴巴拉和狄克领到起居室里。起居室里的装饰都是哗叽：哗叽地毯，哗叽窗帘，哗叽沙发套，带着哗叽罩的美国早期淡棕色灯具的仿制品。斯蒂尔逊夫妇准备了轻淡的米色饮料和用仿造的锡镞盘盛着的旅怕利吉农场金鱼。他们一起讲起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在学校取得的进步，坎贝尔的产品是如何如何比海恩兹的产品好，麦克劳佛林公司正在搞那些了不起的项目。他们避免提及这位司令官对越南好战的态度和斯蒂尔逊夫人对吸烟、饮酒和放荡的意见和看法。大家都没有看巴巴拉那条短裙究竟有多短。

斯蒂尔逊夫妇带她们去了派希，一家老牌饭店，只有那些有钱的保证付小费时不找任何麻烦的人可以去。斯蒂尔逊司令官也没征求大家的意见就又要了些饮料，接着便问巴巴拉她整天都在忙些什么。

她开始给他讲起她准备写一部叫作《毕业生》的迈克·尼考斯新电影的计划。狄克狠狠地踢了她一脚，这第二次肉体上的袭击使她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活还没讲完就不说了。她知道狄克想让她讲孩子们，讲艾妮特的算术，讲克利斯蒂安体育方面的天赋。斯蒂尔逊夫妇根本没有察觉，司令官又要了一巡饮料。他和狄克开始专心地谈论起那些枯燥无味儿的办公室琐事，巴巴拉把咖喱鸡里的大米粒捞出。大米粒太粘了。

“你的孩子现在都多大了？”斯蒂尔逊夫人问道，尽量显得世故，自己也是个妻子。

“一个三十五，一个四十。”巴巴拉说。

南希·斯蒂尔逊面带惊奇地看了看巴巴拉。一层心理变态的阴影笼罩着狄克的双眼。爱德华·斯蒂尔逊对此丝毫没有注意到，从他脸上那粉红颜色，巴巴拉意识到这只老山羊已经喝多了。突然，司令官把身子俯过桌子，碰翻了一个水杯，拍着巴巴拉的肚子。

“这烤炉里有玩意儿吗？”他含糊他说，同时斜眼瞟了瞟她。

巴巴拉看了看和她在一起的那三个人。爱德华·斯蒂尔逊，老气横秋，醉醺醺的；南希·斯蒂尔逊，干瘪瘪的，纯属那种特权人物；狄克，她曾经嫁给的一个男人。

她拿起提包，二话没说，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了。饭店里的服务员，服务员助手和女老板被她搞得直发愣。

“现在人家在考虑大力提拔我。”狄克嘴唇四周深深的皱纹，使巴巴拉意识到他这次决心要来强硬的，但是要适度。他为巴巴拉的行为道了歉，硬着头皮吃完甜食，喝完咖啡。他回到家一看，巴巴拉已经躺下，等着看卡尔森的演出。维拉准备来作客，巴巴拉早听说她很聪明，她渴望能见到她。

“我说了……”狄克又开口了，巴巴拉俯身向前，扭大了电视机的音量。德克斯·安东尼正在预报第二天天气晴朗，气温暖和。“我说过。”他又开口说，巴巴拉死死地盯着荧光屏，不理睬狄克。

“你干嘛这个样子？”他问道。

巴巴拉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只知道这样会惹狄克生气，狄克生气她倒觉得很开心。这也是

让狄克不要不把她当回事儿的一个办法。如果什么事情都一团糟，狄克可受不了。什么事他都觉得要有条不紊，在蓝图上标得清清楚楚。

“亲爱的，难道你就不关心我？”狄克的语调使巴巴拉的气消了一些。

“我当然关心。”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实话。

“现在正在考虑我接替司令官的位置。”狄克说，声音中流露出他无法控制的自豪感。

“你？”巴巴拉感到惊讶，大为感动。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责任重大，工资可观。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狄克稍停片刻，然后回答说：“我以为你不会感兴趣。”

巴巴拉没吭声。没有什么可说的。

上床睡觉时，巴巴拉意识到她自己早就知道的一件事：她那蛮横的行为和狄克的倔强劲儿并没有引起又一场舌战。谈不上谁是胜者——至少这一次。他们注定会结束他们的婚姻，而且他们俩人都将败下阵来。

唯一的问题是：还需要多长时间？

1966年2月，日兴正式向商业界宣布并吞麦克劳佛林公司：一亿美元的交易，包括转让股票，资本资产，延期利润和项目现金流通的周密分析。这是由一个父母是日本人、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人提出的，这个人因他的联合企业日兴工业而被列为美国第二十七位最富有的人。山木健一于1961年始于一家小代理商，办理向西海岸市场进口日本产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子部件的业务。山木健一借用其代理商分理权的项目利润在赛利那斯山谷和附近购买了桔子树林，然后分成几片租赁给——不是卖给——不动产开发商。最后他买下了一家向正在开发退休居住区的企业家出售预制板的胶合板公司。紧接着他又买下一家管件固定装置供应商和一家大的电器批发商店，四年后他便把所有那些和开发配套的设备，卖给那些最初向他租赁土地的开发商。

到1965年，山木健一在汽车零件供应、纤维工厂、石油储藏、炼油厂、大型货车、小型电子生产、海运和码头设备等行业都有股权，最后合并麦克劳佛林公司。山本健一机制、管理和宗旨得到采用。长期在麦克劳佛林公司担任董事的人有的给了更高的职位，有的发给工资打发走了，还有的退休了。山本健一从不解雇工作人员，哪怕这些人怎么无能：他坚持东方人保留面子的原则。当一切调整结束时，这次调整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之短令人惊异。爱德华·斯蒂尔逊先生到高校作演讲，向学生们介绍船舶设计的可观前景；狄克成为整个船舶工程处的负责人，管理二百一十二人的工作，有制图员，海军设计师，博士毕业生和一大批分配到麦克劳佛林公司的海军人员。当时，狄克脸红起来，打心眼儿里感到自豪。就连他父亲也深受感动，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有了一切——甚至更多——这是我为之而奋斗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狄克摇着头，简直不敢相信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梦想要远比那些想入非非中的梦想更好。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从不感到厌倦。

艾妮特眼看就到八岁了，她在那所他们拿不起学费的私立学校成绩优秀。然而学校的心理学家通知巴巴拉，这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形象。看上去艾妮特引诱所有的男性雇用人员，从校长到英语教员，到看门人；克利斯蒂安快七岁了著作，从没说过想爸爸，他父亲现在在华盛顿和安纳伯利斯，比以往更忙。可是巴巴拉要是不让克利斯蒂安穿狄克的睡衣，克利斯蒂安就不睡觉。

1966年6月，巴巴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她一生中的两个重要的变化：她有了第一个情人；找到了第一个重要的工作。1966年7月，命运本身发生了变化，使她的生活发生了她从来没有预想到的变化。

在纽约，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午饭的时间，就连通奸也是如此。

尤金·斯坦尼特是个文学代理商。看上去象个会计，和赛马运动员一样好冒险。他有一份畅销书书单指南。在人们大多都穿卡尔丁西服，扎宽大领带，留着大鬓角，扮成富翁派头的时候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物质是世，他仍然穿着深灰色带白道的西服，里边套着马甲，脚上穿着翼梢鞋。

因为约瑟夫·利维尼办公室经常洽谈由尤金·斯坦尼特办公室提出的财产问题，巴巴拉经常见到他，常常和他一起吃午饭。她见过他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一次在性这个问题上打过他的主意，在大动荡的六十年代，每个男人都总是那样粘粘乎乎，寻找水性杨花的女人，可是尤

金·斯坦尼特正人君子，彬彬有礼，行为端正。有一天，在西班牙餐馆吃过午饭后，他向巴巴拉提出猥亵下流的要求时，巴巴拉几乎昏了过去。

“我简直让你给迷住了。”他说道，也许他描述松仁饼干时也用这种声调。“我已经结婚了，你知道嘛。”

巴巴拉不知道，但是她一声没吭。尤金·斯坦尼特接着说。

“我结婚了，已经结婚十八年，我没有要离婚的打算。不过我想带你上床睡觉。”

斯坦尼特从来没有碰过她，那时他也没有碰她。他等待着让她考虑考虑。巴巴拉注意到他的皮肤是那么结实干净，她记起来了，也许是联想到的，她以前总觉得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真够性感的。

“你说得对。”她说。她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轻松地答应和他通奸。她就是觉得有欲望。她很长时间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欲望。

“来吧。”他说，签好支票，加了点小费。“咱们到楼上去。”

他带巴巴拉从饭店前门出来，沿着公园走了几步便进了靠近利兹塔的门厅。他们乘电梯上到十五楼，来到一个长期被一个商人租用的套间。那个商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拉克齐。他们互相看了看，便热烈地亲吻起来。

尤金·斯坦尼特是个做事心细，想象力丰富的情人。他们每星期有一个下午见面，除了办公时能碰见外，这是巴巴拉能看到他的唯一时间。她从来没有想过她爱上了他，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和他长久相处下去的念头，或者向他询问关于他妻子或孩子的念头。他住在哪儿，或者他周末都干什么，她才不管呢。她只问了他一个个人问题：

“你有过很多情妇吗？”

“不。”他说，“没几个。”看他说这话的样子，她知道他没有说谎。

作为一个有了外遇的女人，巴巴拉变了。她买了新内衣——鲁迪·吉尔雷斯第诺乳罩；上班开始穿紧身短裤了；使用假眼睫毛和大量香水。她敢肯定这些狄克都注意到了。她担心狄克会说三道四的。可是没有。一点几事也没有。

“我越老就越多用化妆，少穿内衣。”她说。那是一九六六年，巴巴拉二十九岁。

狄克没有反应。

她还想试一试这个话题，这回是和尤金·斯坦尼特，因为她早就想说这个问题。

“不要那样庸俗，”他说道，“你不该那样子。”

“可是现在是六十年代。”巴巴拉说，“这样多疯狂。你不爱这样吗？”

“我爱你。”尤金说。这话他就说了这么一次，他说得那么温柔，巴巴拉似乎觉得他说得太晚了，现在无法回答他。不过没关系，因为巴巴拉不爱他。她谁都不爱，这样她倒觉得非常自由自在。和尤金·斯坦尼特有这段风流韵事的最妙之处、是，这是巴巴拉一生中唯一的秘密。这给了她力量。

由于业务的关系，巴巴拉认识纳德·杰尔德已经有好几年了，在性的方面她打过他的主意，后来把他当作一个没有性功能的好人给放弃了。纳德是杰尔德·斯伯林发行公司的销售经理，这是少有的那么几家私人拥有的发行公司之一。这家公司的总裁利昂·克拉瓦特在接受《纽约时报》星期天商务版的采访时说，只要他管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就将抵制合并和联合的倾向。他说，在商业体制中，一家独立的小公司仍然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和那些大公司比，杰尔德·斯伯林公司也许不算大，但是它很富有。多年来，它靠参考书刊和教科书刊一直在获取极大的利润。

在密斯特拉饭店吃洋葱淡菜时，他说道：“我们现在要从事贸易方面的发行工作。我们要同那些大块头较量较量——什么西蒙和苏斯特，兰德姆。蒙思，道伯戴伊。我们要马上行动。”

“你是说你们想搞商业化？”巴巴拉问。

“完全对。我们有钱，有人。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推销和宣传专家。”纳德·杰尔德说。杰尔德·斯伯林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建立的，需要有人懂得如何让作者和卡尔森和莫夫·格里芬挂上勾，需要懂得如何给特写版编写故事，如何激发公众的兴趣，激发书刊俱乐部和电影界的兴趣。“你们搞电影的人在这方面当然很擅长喽。”

巴巴拉点了点头。约瑟夫·利维尼和所有那些成功的制造商一样，在推销其产品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纳德·杰尔德认为推销书也可以运用这种办法。他这样想是对的。

“我现在正琢磨谁做这件事合适。”纳德·杰尔德说，“你也许认识哪个人，他有兴趣到我们这儿来。”

“是的，”巴巴拉说。“我。如果条件好的话。”

纳德·杰尔德被她这突如其来的答复闹了一愣，过了好一会儿才省悟过来，然后给巴巴拉讲了条件：她将作为推销经理助理：每周工资二百五十元；她还会有自己的办公室和自己的秘书。

“还想什么？”巴巴拉问道。“这些条件合适。”每周的工资要比约瑟夫·利维尼付给她的多五十元；再说她对那些电影明星，对他们的代理人，业务经理和他们的自我都腻透了。纳德·杰尔德这个时机选得再恰当不过了。

狄克此时正在华盛顿，巴巴拉打电话对他讲了她新我的这份工作。

“一个星期二百五十元？”他显然很高兴。“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可是太了不起了。”

巴巴拉让他先评论一番，决定不回答什么，只是说：“等你回来时咱们再庆贺庆贺。”

她的话巧妙地弥补了狄克自己并不知道的他所受到的伤害。

七月份，巴巴拉的生活开始出现了大转变。

她急着能见到狄克的父母。她知道这样有些孩子气，可是她迫不及待地要把她新找的工作讲给罗斯听。她知道艾利克斯·罗斯如果听说她现在领导着五个人——一个打字员，一名美术经理和他的助手，一个制作管理人员和一个全日制秘书，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她也非常想听一听艾利克斯·罗斯对她老板的评价。她私下说纳德·杰尔德是隐身人。他十点到办公室，十一点半就走了，而且下午也很少露面。她觉得这是和该公司的创始人有亲属关系的特权，人们对他有各种离奇古怪的议论，她也听到过。她敢肯定艾利克斯·罗斯一定有他自己的判断，她非常想听一听。说来奇怪，狄克的父亲对巴巴拉的事业似乎比对狄克的事业更感兴趣，更为之高兴。她觉得艾利克斯·罗斯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机械的复杂性和那些核水力系统建设与分析方面莫名其妙的技术术语厌烦透了。

和每年一样，狄克和巴巴拉开车到肯尼迪机场去接罗斯夫妇俩。美国航空公司广播了从丹佛来的飞机已经到达时，狄克和巴巴拉正站在楼上观察室里，看着那些大型喷气式客机起飞和降落。巴巴拉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统计，肯尼迪机场平均每六十秒钟有二十四架飞机降落和起飞。这个数字实在惊人，每次当一架飞机抵达或离开时，毫不夸张他说，他们正在里边站着的那个建筑物都在摇动。巴巴拉为住在附近的人而感到难过。难怪他们竭力反对扩大跑道区。不断的噪声和房屋的震颤足以使人发疯了。

“噢，我的上帝！”狄克一声惊叫，把巴巴拉从遐想中唤醒，她朝狄克指着的简易机场顶端望去。一架飞机断成两截，前部分歪歪斜斜地朝机场的一侧疾速冲去，恰好另一架飞机正从那个方向起飞。两架飞机相撞，接着爆炸了，一团桔黄色火球象气球一样，从那片乱糟糟的银白色金属碎片中升起。火焰飘向机场的横幅，点着了流淌到场地上的汽油，燃起熊熊大火。飞机尾部靠着自己的惯性向前滚动，碰在正在起飞的那架飞机前部，才停了下来。巴巴拉看见人们站在飞机断成两截的参差不齐的洞口里。他们高地面太高，没法往下跳。他们站在那里，心神不定，不知所措。就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火焰突然串进尾部，将其吞没了。

警笛鸣叫，卡车滚滚开进机场，开始喷撒白色泡沫，力图控制火势。在观察室里的其他人开始尖叫起来，直绕圈子转悠，没完没了地问那架完蛋了的飞机是什么飞机。

巴巴拉没用问就知道了。

巴巴拉和狄克到丹佛去处理狄克父母的后事。

“你可怎么办呢？”死人的时候该怎么办，巴巴拉一点儿主意也没有。她父亲死的时候，全是她母亲里里外外地张罗着办理的后事。

“把房子卖掉，把他的生意安排安排。”狄克说，“我想也就这些事儿。”狄克对他父母死亡这事非常讲究实际，喜欢把需要料理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摆出来，而不是在那儿表现他是多么悲伤和多么痛心。同往常一样，狄克战胜了一时的感情危机。他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工作，呆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了，规划蓝图的时间也更多了。他把悲痛都消耗在工作上。巴巴拉真希望他能哭，哪怕就一次。然而她了解他，她知道他是不会哭的。

他们正在他父母的卧室收拾衣柜，把东西包扎起来捐献给医院的旧货店。这时，艾利克斯·罗斯的律师打来了电话，表示悼念。他告诉狄克，他父亲留下一份遗嘱，问他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到他家去可不可以。

爱德华·泽托很年轻——巴巴拉想，大概有三十岁左右。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有点大腹便便。他显得很腼腆，不过巴巴拉以为也许是周围的气氛使他表露出异常恭敬的举止。他跟狄克和巴巴拉又说了一遍，他对两位老人的逝世感到十分难过，说他是如何地喜欢他们，他还告诉他们，他对艾利克斯·罗斯的经营能力极为敬重。他说得真挚热情，巴巴拉这才知道除她自己以外还有人欣赏艾利克斯的为人处事，心里自然感到高兴。

“你父亲和你商量过他的遗嘱吗？”

狄克摇摇头。

“他的经营范围你都了解吗？”

狄克还是摇了摇头。“我父亲总以为我这个人太不实际。”他说着苦笑了一下。“也许他是对的。”

爱德华·泽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巴巴拉看得出来他真的不知道再如何往下说好。她预感到他一定是有什么很糟糕的话要说。她所能记得的就是她父亲去世时没留下任何保险，只是一份破了产的生意。难道艾利克斯·罗斯会欠下一大笔足以使她和狄克在以后的生活中陷入困境的债务？她觉得她快要窒息了。

“你父亲的遗嘱很简单。”爱德华·泽托说，很显然他知道了该如何公开这个消息。“它把所有他的财产分成两份。一半归你，狄克；另一半归你的妻子。”

“归我？”

“您是巴巴拉·杜登·罗斯吧？”爱德华看出了她那不知所措的反应。

她点了点头，不知说什么好。可是这位老人给她留下的究竟是什么，再说他干嘛要把她单点出来呢？

“为什么归我？”她最后说。

“他喜欢你。”爱德华·泽托说。“再说他有的是，够分的。”

“有的是？”狄克问道。他脸色苍白，流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你父亲总共有一百五十万美元。你们每人拿到一半。当然已经上过税了。”

谁都没讲话。他们围坐在那个老式房间里的破旧餐桌旁，你瞧着我，我看着你。爱德华·泽托似乎在等着反应。没有反应。不论是对财产的数量还是对财产平均分配的方法。巴巴拉一心在想：我发财了。

她想抑制而又无法抑制的第一个想法便是：我发财了——而且我自由了。

“你那份钱打算怎么办？”他们回到纽约时狄克问道。自从爱德华·泽托跟他们说了遗嘱的事，狄克就一直对巴巴拉没好气。巴巴拉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父亲待她如待他的新生儿子一样？还是因为她现在可以独立了？

“不知道。”巴巴拉说，“我把钱存到银行去，等我习惯了再说。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该怎么办了。你的那份你打算怎么办？”

“放在银行里。我对钱没有那么大兴趣，这你知道。我想用现在的就足够了。”

他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讲到钱的时候都是用“我”或“我的”，而“我们”和“我们的”这一类同连个影儿也没见着。

1966年10月，纳德·杰尔德关上办公室的门。“我要跟你讲一讲有关我自己的事。”他对巴巴拉说。“因为这几个月来你一直干着我的工作。”巴巴拉听了很高兴，他承认了实际上是在管理他的部门。她安排工作计划，检查执行的情况，处理日常棘手的事，凡是这个部门的人都认为她是老板，而不是纳德。官方虽没有这样说，然而巴巴拉·罗斯在管理杰尔德·斯伯林公司的销售部这一事实，不论在公司内还是在公司外，已经得到了非正式的承认。

“我患有气管炎。”纳德·杰尔德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这种病，从来没有治好过，现在靠吃药、心理疗法控制。我每天十一点半去和我的精神分析学家见面。如果回不来，我就是犯病了。我喘不上气来，我得打一针，再到医院一个消过毒的氧气房去治疗。”

“很抱歉。”巴巴拉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外边有好多关于我的闲话。”纳德接着说。

“我没听到什么。”巴巴拉说，她听说的是他是个酒鬼，同性恋者，海洛因吸毒者；还听说他喜欢三人游戏，穿女人服装，并且有人看见他在大中心的男厕附近转来转去，图谋不轨。

“可是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诉苦的。”纳德说。“我想告诉你我很欣赏你接管我的工作，我已经跟利昂·克拉瓦特谈了，你应该拿更多的薪水，得到更大的威望。”

巴巴拉想问一问利昂。克拉瓦特是怎么答复的，可是又实在担心那样会显得急不可待，野心勃勃。虽然她在电梯里看见过利昂·克拉瓦特那么一两次，可是还从来没见过面。他的办公室在巴巴拉办公室的楼上，她觉得他看上去和温莎公爵长得象极了——矮矮的个子，服饰极为整洁，但显得很弱。

“他说，有几位作者已经跟他提到过你的工作，他还说，他对杰尔德·斯伯林公司搞的这种宣传很满意。”巴巴拉情不自禁地笑了。她干得很出色：时报星期四食物栏刊登了一个关于杰尔德·斯伯林公司烹调书作者的介绍；好几个杰尔德·斯伯林公司的作者已经和戴维·佛罗斯特导演挂了钩；ABC晚间新闻广播了一个性生活指南的艺术广告，并且非常成功。

“他没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当副总裁？”巴巴拉用开玩笑的方法问道，希望能避开话

锋。

“他说了你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几年后，我退休的时候你要是接替我的工作，我一点儿不会感到惊异。”纳德从桌子后边站起来，来回踱着步，拍着巴巴拉的肩膀。“我不让我告诉你，可是我控制不住，这能不能作为我们之间的秘密呢？”

“我们的秘密。”巴巴拉说，把右手无名指触在胸口上以示达成契约。

纳德黯淡无望地笑了笑。“谢谢。”他说，“非常感谢。”

巴巴拉的秘密又增加了。尤金的秘密使她觉得有了力量。纳德的秘密使她觉得无懈可击。

几个星期后，民意测验的结果证明，对约翰逊的信任开始下降；辛格勒斯舞台被社会学家认为是值得研究的下层社会；一名狙击手因大脑性麻痹症发作在得克萨斯大学塔顶上杀了十四人，伤了三十一人；狄克也发生了出人预料之外的变化。那天，巴巴拉刚刚把晚饭端上饭桌。

“瞧，孩子们，你们喜欢一年四季都游泳吗？”狄克对两个孩子说。

“太好啦！”克利斯蒂安说，他去年在学校游泳比赛中拿了一块奖牌。

“浪大吗？”艾妮特问，她天生就是个谨小慎微的姑娘。

“一年四季都游泳，你是什么意思？”巴巴拉莫名其妙。狄克在说什么呢？他事先什么也没讲，怎么在孩子面前蹦出这么句话来？他难道没跟她说就在哪个该死的市郊买了一座可怕的房子，一座用他继承下来的钱买的带有游泳池的房子？

“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他的声音一听就听出来，他很害怕巴巴拉的反应。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孩子面前提出这件事的原因。狄克对吵架受够了，想方设法避免对抗。他是个巴巴拉鄙视的那种胆小鬼。

“我不觉得怎么样。”巴巴拉说。

“这还差不多。”狄克说，几乎是轻松地叹了口气。“我自己今天才发现的。正式的。”

“正式的什么呀？”这是怎么啦？狄克为什么没跟她讲呢？

“我们拿到了一份合同。价值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重新设计核动力舰队的现有水力系统。整个它妈的舰队。”狄克很少骂人，巴巴拉感到奇怪，他竟然显得如此激动。他和他父母太象了，总是掩盖自己的感情。“问题是我们得搬到潘沙克拉去。下个星期我就得到那儿。”

巴巴拉一声不吭地盯着他。

他也只好接着说下去。

“你得给孩子们办理离校手续和公寓转租手续；咱们得有一份转租协议，对吧？不过不用急，你可以等到一月份；新学期开始的时候，麦克劳佛林公司给我们留一套房子，所以你要在这边要办的，就是把东西保管起来。”

“我能不能有一个跳水板？我差不多能做后翻转了。”克利斯蒂安说。

“住嘴。”巴巴拉说。她真不敢相信狄克竟会如此无情、自私，不理解她的生活。她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说才好。“我的工作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尤金·斯坦尼特，纳德·杰尔德，里昂·克拉瓦特一个个地掠过她的脑际。“我这该死的生活怎么办？”

艾妮特开始哭起来。她从来没有听到她母亲冲着她父亲这样叫喊。

“你就不用工作了。”狄克说。“我们钱不是有的是嘛。”

艾妮特离开她的椅子，没命地哭着，把头紧紧地贴在巴巴拉的肩膀上。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巴巴拉不知道该和狄克说些什么。她的生活，她的自我对他来说都不现实。如果你对一个人来说不是真实的，那你怎么能让他理解你呢？

“你会愉快的。那儿的气候好极了。还有很多麦克劳佛林公司的妻子……”

“麦克劳佛林公司的夫人们还在用饰针别她们的头发呢。我去坎尼斯。你懂吗？我的生活和她们们的生活之间相差一百万光年。”她其实是说她的生活和狄克的生活之间，相差一百万光年，可她没那样说。她不能那样明说。还不到时候。

“别生气了，妈妈。”艾妮特抽泣着说，担心她母亲也会冲着她发火。

巴巴拉吻了吻艾妮特的面颊，抚摸着她那柔嫩的皮肤。

“可是你可以试一试，好吗，亲爱的？这对我事关重大。”

巴巴拉没有要拒绝他的决心，所以她答应他试一试，并且说圣诞节放假时，她和孩子们去看一看潘沙克拉。

“你想开了？”狄克说。

“当然了。”巴巴拉说，她恨自己说了违心的话。

她很明白狄克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根本不用说出来。他在为保卫国家而工作。她的工作微不足道：传播几个小时的廉价娱乐。那天深夜，他们上床时，狄克把巴巴拉搂在怀里。

“我爱你，这你是知道的。我爱你胜过我爱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狄克说。

“我知道。”巴巴拉说。他们生活的不同选择是他们谁都主宰不了的。巴巴拉感到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爱的波涛和对狄克的同情。他做了她这么长时间的丈夫；他一直是好丈夫，老实忠诚。他是个有价值的人。为了她，他可以竭尽全力。问题是他的权力，和每个人的权力一样，是有限的。这一强大的欲望之潮几乎使她退下阵来。巴巴拉采取主动姿态，开始和狄克做爱。

“圣旨”（巴巴拉是这样称呼的）由公司的邮件寄来。利昂·克拉瓦特邀请巴巴拉于11月17日和他共进午餐。一点钟，在意大利饭馆。

巴巴拉故意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给《时代生活》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问她是不是能搞到一份利昂·克拉瓦特档案的影印件。第二天早晨送信的就给送来了。

美国商业名人录

利昂·克拉瓦特1910年生于北卡罗来纳。他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纺织生产商，利昂就读于迈阿密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他原打算回到安松威勒开办家庭磨房。然而，受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磨房破产。利昂到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给莱佛伦公司当法律顾问。当时莱佛伦只是一家生产唇膏和指甲油的小公司，利昂在司法部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查尔斯·莱佛伦就发现利昂具有作为一个商人的先天才能。到“唇膏和指甲油并用”这句话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时，利昂身价倍增，被葛蒂公司招去，那个时候葛蒂是一家具有巴黎标志的独立的威望很高的公司。在利昂的指导下，葛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最后公司被普菲泽尔医药公司买下。当利昂的管理合同被普菲泽尔用一大笔钱买下时，利昂·克拉瓦特与普菲泽尔管理部门的“个人冲突”就算消除了。

巧极了，在五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杰尔德·斯伯林公司正遇到财政困难。流动资产是零，实际上连流动资金也没有。公司由创始人的后代管理，把公司管理得一塌糊涂，因为那些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向哲学和纯文学方面发展，而忘记了该公司的最基本的原则。董事会很自然地要在外界寻找人才来挽回财政损失。他们寻找六个月之后，决定了利昂·克拉瓦特这个人选，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冷若冰霜的人，还认为如果提到钱他是个魔术大师。

利昂·克拉瓦特为自己谈了他的交易——他毕竟是以律师起家的。他接受的条件暗示着杰尔德·斯伯林公司处于崩溃的边缘：在人员雇用和解聘方面，他享有全权处理权；在一切编辑、销售、分配、推销和广告问题方面，他享有最后决定权。除此之外，他的合同还申请在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提请他的部分补偿将以杰尔德·斯伯林的股权支付。利昂成了该公司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其股权的外界人。

利昂·克拉瓦特在第一次董事会上就证实了他冷若冰霜但却刚强果断的名声。他向董事会宣布三年见效益。他还宣布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只要对于他管理杰尔德·斯伯林公司的方式不满意，就可以马上请他辞职。

他非常沉静地打开一个马尼拉纸信封，把未签日期也未签名的辞职书影印件，分发给董事会的董事们。

“只要董事会愿意，我可以随时在这份原件上签名和签日期。”他说这话时面不改色心不跳。

他的姿态激动人心，足可以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财政版上报导，当一个记者请他具体地谈一谈时，利昂·克拉瓦特告诉时报，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时时放一份辞职书是他的原则。

这是最终的法人武器，利昂·克拉瓦特从来就没有用过它。杰尔德·斯伯林公司的效益示意图上的标记和利昂·克拉瓦特预想的完全一样：第一年亏损，第二年不盈不亏，第三年盈利。盈利年年增加，最后杰尔德·斯伯林公司在芝加哥市郊自己买了印刷机，在加利福尼亚和马里兰州建了计算机控制的仓库。

六十年代中期，杰尔德·斯伯林公司引起社会的关注。华尔街称它“性感”，其股票价格螺旋上升，好几个急于搞多种经营的联合大企业主动表示了兴趣，但均被一一拒绝。利昂·克拉瓦特的股票价值一笔巨款；然而，他仍然把他那未签字的辞职书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把董事们的放在屁股兜里。

《时代生活》的档案结束时，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利昂·克拉瓦特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居住在长岛海蛎湾。他没有明显的嗜好和外界兴趣。

利昂·克拉瓦特招见书上的三言两语使巴巴拉产生了戒心，她强令自己晚到意大利饭馆十分钟。这顿午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涨工资？提拔，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跟纳德·杰尔德讲过他对她很满意。利昂·克拉瓦特已经坐在一个角桌那，面前放着一瓶开了盖的桑·帕雷格里诺矿泉水。服务员把她请上座位时，利昂·克拉瓦特看了看手表。巴巴拉注意到了，她忍住不去

解释是交通不便才来晚的。

到现在为止，双方交了个平手。

他们没有象往常吃工作午餐那样客套一阵，直接要了饭菜：利昂·克拉瓦特要了莫扎里拉鸡蛋饼，巴巴拉要了鲸鱼泥。她等着他先发制人。他先发制人了，从侧翼发起。

“你知道我们每年给纳德·杰尔德多少工资吗？”

“不知道。”利昂·克拉瓦特的鲁莽使她大吃一惊，但却马上作出了反应，这正是利昂·克拉瓦特要听的。

“三万五千元。”利昂·克拉瓦特说道。“他不配拿那么多工资。”他停了停，吃了几口鸡蛋饼。“实际上你在于他那份工作。”

巴巴拉无言以对。利昂·克拉瓦特是怎么知道的？他在另一层楼上的总裁办公间，与人隔绝。他不会有超人的视力。任何人都不会有。

“对吗？”

“是的。”巴巴拉说。她要是跟他说谎未必太蠢了；然而违背了纳德的秘密又使她不安。她看了看盘子里的鱼，把它推到一旁。

“你看你值三万五吗？”利昂·克拉瓦特那双冷若冰霜的眼睛打量着巴巴拉。

“你要把纳德的工作给我干吗？”她问。他能粗鲁无礼，她也会针锋相对。

“不。”利昂·克拉瓦特说。

“那你为什么请我吃午饭？”

“我想见一见你。”

“这样你就可以看出我是不是每年值三万五？”巴巴拉拿定主意最好把牌全部摊开。这是利昂·克拉瓦特的方法，因此，这也是对付他的最好武器。

“你自己处理得很好。”他说。

“谢谢你。”巴巴拉说。很明显，利昂·克拉瓦特没打算直截了当答复她。她心里很明白不能再强迫他。

利昂·克拉瓦特似乎把刚才他们的交换没当作什么，又问她如果杰尔德·斯伯林应该砍去广告代理，变换一下怎么样。

“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的概念，这倒是个好主意。”她说，“否则就不是。”

对她的评论，利昂·克拉瓦特没作反应，打招呼结帐。巴巴拉看着他一支马克·克罗斯牌金笔在支票上签了字。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他那双手实在大小了，比她的手还小，而且是经过专业修剪过的。然而，虽然修剪过了，也看得出来利昂·克拉瓦特咬手指甲的习惯。好一会儿，巴巴拉暗暗想象如果和他在床上睡觉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她在脑海中始终消除不掉那双指甲被咬过的小手放在她乳房上的幻觉。那样可能会既激动又厌恶。

利昂·克拉瓦特送她到街上，他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扶进车里。他把车门关上，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巴巴拉觉得她好象参加了一场考试。可是她不知道考题是什么，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通过了考试。她只知道利昂·克拉瓦特是个老师，她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很多。

巴巴拉带着孩子到潘沙克拉去过圣诞节。艾妮特要见到父亲了，别说有多高兴了，高兴得在飞机上跳起来两次。克利斯蒂安表现得很冷淡，他对波音707的设计和工程细节的兴趣，似乎比他快要见到他父亲的兴趣大得多。巴巴拉不停地忙着照料艾妮特，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次见到狄克会是什么情景。

他们下飞机时，狄克正站在那儿，站在耀眼的阳光下。看上去他很疲倦，巴巴拉注意到他的体重增加了好几磅；他的皮带上堆下一小圈儿柔软、不太明显的脂肪。孩子们冲着他跑过去，直往身上爬，狄克咧着嘴笑，抱起艾妮特，用力在克利斯蒂安的肩膀上击了一拳。狄克和孩子们融合在一起的那种自然的情景，总是打动着巴巴拉的心。他待他们非常好，显得非常融洽。

“你好，亲爱的。”她说，吻了吻狄克的面颊。

狄克冲着她微笑，在阳光下眼睛稍稍地眯缝着。“车在这儿。”

艾妮特讲学校的事。克利斯蒂安讲尼克斯一家的事，巴巴拉望着窗外，心里琢磨着在潘沙克拉这两个星期该怎么打发。每个街口几乎都有个银行和加油站。全美国最引人注目的事物，巴巴拉心想：汽车和金钱。狄克使劲把车开过一扇镀锌铁皮大门，把一个塑料皮身份证递给一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卫兵把身份证放在一架机器下面，发出一道蓝色光线，接着挥手让他们通过。黑色柏油路通向一群模式相同的拉毛水泥房子。房子涂成黄色，随着方向的转变时而粉红，时而发蓝。没有草，沙土遏制了草的生长。这儿或那儿偶而有那么几棵从沙土里探出来的

歪歪扭扭的松树。

“我们快到家了。”狄克说。

家是指海军部分给他的一座房子。这座房子是粉色的，有一间起居室，里边安放一个美国早期沙发的仿制品，表面是一块不大不小的桔黄色粗布毛花呢，有两把筒式椅子，套着用同样布料做的椅子套，有一块四边用棕黄色胶带固定住的绿色的地毯，有一个熟铁架玻璃面的咖啡桌，还有两幅大沼泽地的画片，挂在沙发后面的墙上。有一间小厨房，两间卧室和一个洗澡间。

“你体重有点增加了。”巴巴拉一边打开包裹，一边说。

“对那咖啡服务车一点办法没有。”狄克说。看上去他显得很尴尬。巴巴拉明白他和她一样都不大得劲儿。她想一两天他们这种不得劲儿的感觉就会没有了，其实就是他们两个月没见面的原因。

那天晚上，他们到一家路旁汉堡包餐馆吃的晚饭。孩子们饱餐了一顿汉堡包和椰子果冰棍。他们急着第二天到海边去，都觉得圣诞节时间能游泳怪新鲜的。

那天夜里，正象巴巴拉预料的那样，狄克又和她同房。可是他们都没有冲动，没有快乐，因为他们结婚以来狄克第一次力不从心。

“也许是有些紧张。”巴巴拉说。“过一两天就会好的。”她与其说为狄克开脱，莫不如说为她自己开脱。

“嘿，伙计。”克利斯蒂安说。“找到那就扎个猛子。我是个真正的水耗子，对不对，爸爸？”他们正开车去海边，克利斯蒂安激动得坐立不安。

“你当然是了。”狄克说，“自从你会爬时就是了。”

“我可不是水耗子。”艾妮特说，“我讨厌耗子。”

“克利斯蒂安不是说真水耗子。”狄克说，“人们习惯这样说，意思是这个人喜欢水。”

他们租了一把绿杠和白杠相间的太阳伞，狄克帮着巴巴拉准备的野餐：冷鸡块，油菜和卷心菜色拉，水果，点心和保温瓶装着的冰茶。

“我以为你最喜欢尼克斯一家呢。”艾妮特说。

“我喜欢尼克斯一家是因为我喜欢看他们，可是我喜欢游泳是因为我喜欢游。”克利斯蒂安站起来，冲着他姐姐的挑战说。狄克也跟着他们孩子般地争吵着。巴巴拉没法不让他们吵。显然，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们身上是为了躲避她。她手忙脚乱地摆弄着毛巾，心里嘀咕着怎么一晚上的力不从心，狄克竟会如此自卑。她从书上看到过，所有的男人都会偶尔有一阵子不太起劲。这不是男人生殖机能衰退的迹象。

“噢——噢，‘拳击家’。”他们往水里走去时，狄克说。“‘战舰’也露出来了。”

“那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在北方你很少看得见。只是这里有。”

狄克把他们带到水边，让他们看“战舰”。只见它躯体呈胶状，细长，透明，在深绿色水中懒洋洋的，不活动。

“噢！”艾妮特叫道，嘴唇紧紧地缩着。她向后退了退，离开水边，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它们吓人。”狄克说，“当心。”

“胆小鬼。”克利斯蒂安冲着艾妮特说，“我不怕。”他走进水里，捡起一只“战舰”朝他姐姐身上扔去。

艾妮特尖叫起来，狄克抓住他胳膊，把他从水里拽出来时，巴巴拉打了他一记耳光。他不服气地看着父亲和母亲。他们答应他让他游泳，可是现在他们又不让了。这就是所谓的圣诞节，连一棵圣诞树也没有，只有那么几棵不象样子的棕榈树。没有象第五大街那样，有映着活跃的人影的窗户。克利斯蒂安气得闷闷不乐，二声不吭。艾妮特被“战舰”吓得够呛，加上对这种圣诞节气氛十分失望，便抱着巴巴拉呜呜地哭起来。

不管怎么样，那一天总算过去了，巴巴拉感到宽慰的是，狄克也没再要和她同房。

巴巴拉担心克利斯蒂安的手可能会让“战舰”咬得肿起来，但是很幸运没有肿。第二天大家都同意呆在麦克劳佛林大院，在大院里的游泳池游泳。克利斯蒂安练习他的后旋转，艾妮特在水浅的地方拍打着水玩，小心翼翼，怕把头发弄湿了。狄克和巴巴拉坐在铝架尼龙面的椅子上看着他们。他们互相之间觉得非常别扭。最后狄克问巴巴拉她要不介意的话，他就去办公室签个到。

“当然不介意。”她说。他们都尽量掩饰着他们各自松了一口气的心理。

整个下午，巴巴拉观察着游泳池周围的那些麦克劳佛林的夫人们，他们有的打纸牌，有的看筒装书。她觉得她仿佛钻进了一个时代的胶囊。他们嘴上抹着鲜红的唇膏——他们似乎不了解

淡色唇膏在流行。有的还在用发夹，他们这些人几乎都穿着棉布游泳衣，然而，只有穿上男孩子穿的那种短裤才可以使粗壮的大腿显得苗条。难道一本《时髦》或《鞋力》杂志也没有到过南方，象潘沙克拉这样的地方？他们不看电影？他们没看过《亲爱的》？他们没听说过性革命和比基尼游泳衣？显然，狄克喜欢这里。他很适应潘沙克拉的空气。巴巴拉看出了狄克的新心思。

“你喜欢这儿，对不对？”晚饭后巴巴拉问狄克。

“当然。为什么不呢？”

“似乎有些过时。就象五十年代。”

“那么我也就是个五十年代人了。”狄克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从狄克那种辩解的语气中，巴巴拉看得出他觉得很委屈。

“我没什么可委屈的。”狄克说，他看出了巴巴拉的心思。“我没想到一个六十年代人，竟会如此脾气暴躁。”

“你是说我，对吗，”

“至少我了解我自己。”狄克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以为跟得上每一个时尚你就了不起了。”

“总比落伍好吧。”

“我看最好是你要了解你自己。尽管你只是个五十年代人。”狄克挖苦他说，有些冲动。

“至少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不知道吗？”

狄克保持沉默。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从来没见过你饭后喝酒。”巴巴拉说，尽量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

“我想告诉你，”狄克说，他坐在硬梆梆的椅子上很不舒服。“我见过一个人。”

“噢。”他们坐在丑陋的起居室里，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怎么办。

“她是个寡妇……有三个孩子……”

“而且她想作个妻子，当个母亲。她不想工作，”巴巴拉说完后，自己也不知道竟说了些什么。

“我会更高兴娶一个主要兴趣放在家里和她丈夫身上的人。”

“你想和她结婚？”巴巴拉问，巴巴拉不觉得惊讶。狄克不是那种好风流韵事的人。他看重家庭，赞同一夫一妻。

狄克点点头。巴巴拉意识到一九五七年他要她时，她是他心目中的那种女人。问题是她变了。她变成了不会再使他幸福的女人。

巴巴拉站起来，走进厨房，准备给自己对一杯酒。狄克拦住她。“坐下。我给你对一杯。”他去了一会儿，拿回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谢谢。”巴巴拉说，“我们离婚吧。”她说。

“最好这样。”狄克说。

“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律师？这种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巴巴拉只要心平气和地和狄克谈，才不至于大发雷霆，她可以装作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我想看看孩子们，”狄克非常踌躇他说。

“我不会那样。”

“是的，”狄克说。“这个我知道。我想抚养孩子们。这你知道。”

“这一切我想律师会安排好的。”巴巴拉说，她突然感到疲倦极了，她只想睡上一觉。

“我大累了。”她说。

“我在这儿睡，在沙发上。”直到最后狄克还是个正人君子。

“我是爱你的，”巴巴拉说，“我真的爱你，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我也是。”狄克说，“我曾经爱你胜过一切。可是有的事情发生了变化……”

“事情就是这样。”巴巴拉说着，走进了前天晚上还仍然属于他们俩人的卧室。狄克跟了进去，把她搂进怀里。他的动作没有欲望，只是同情。

“请不要这样。”巴巴拉说，她实在受不了他的同情。“圣诞节前夕竟会发生这种事，实在令人痛心。”

第二天上午，他们装模作样地度过了圣诞节。他们给艾妮特准备了一套冒牌化妆品，几本新书和一件毛背心，给克利斯蒂安准备了一件尼克斯汗衫，一本新书和以他自己的名字签了字的体育画报订单。巴巴拉把她在纽约给狄克买的古希腰带送给了狄克，狄克给了巴巴拉一瓶香水。

二十六日，巴巴拉和孩子们按原计划提前八天，登上了飞往纽约的飞机。对于计划的变化孩子们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生气：艾妮特早就想她的朋友了；克利斯蒂安因没能在海里游泳仍觉得挺委屈。能把“战舰”刮回到大海里的风还没到来。

狄克拥抱和亲吻了孩子们，和他们告了别，不知所措地在巴巴拉面颊上吻了吻。巴巴拉看了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把安全带系好后，意识到他们几个人对这次探亲能提早结束都感到很宽慰。她觉得这次探亲是对一个结束了的婚姻的最凄凉的总结。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家汽车旅馆的阳台上被人暗杀。5月，那些穷人在华盛顿游行时，安代·沃霍尔又被人用枪击伤。6月，罗伯特·F·肯尼迪被B·舍尔翰刺杀。墨西哥诺加累斯地方法院判决巴巴拉·杜登·罗斯与理查德·罗斯离婚，这一切都是由狄克与巴巴拉操办的，巴巴拉觉得这种事办起来真是轻而易举。

巴巴拉在离婚书上签字时，几乎无动于衷，因为很早以前他们的感情就已不和；然而从潘沙克拉回来后，孩子们却都表现得不正常。他们在纽约的时候，艾妮特拒绝看望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妻子。克利斯蒂安把尼克斯运动衫送给别人，借口说自己穿着不合身了，他俩晚上常做恶梦，得抱到巴巴拉的床上哄才行。春季的早些时候，巴巴拉请教了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说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的反常行为是由于心烦意乱引起的，都属于正常现象，过一段就会好的。她才放下心来。

“我对你和狄克闹到这个地步，感到遗憾。”一天，巴巴拉带着孩子到她母亲那儿度周末，母亲对她说。“但我不想掩饰对这件事的惊奇。”

“我怕你会生气的，”巴巴拉说，“这在咱家毕竟是头一次。”

“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确信自己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吗？”巴巴拉的母亲想探知究竟，巴巴拉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

“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决定，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狄克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现在的我，是1957年的我；而我现在已不再是那时的女孩子了。”

伊万吉兰·杜登镇静了一下，说：“我想这是变好了。”

当巴巴拉长大时，她开始越来越理解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少有的实际和理想相结合的人。她承认现实，深知没必要去设法改变不能改变的事情。六十六岁了，但她看上去比她五十四岁还年轻。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变化真是令人吃惊。她从一个消极依赖型的小城市妇女一下子变成了复杂的、活跃的成年人。巴巴拉曾想过她母亲是否有再婚的想法，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离婚已大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观。

“请告诉我，如果你和你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度过夏天如何？”

“我得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巴巴拉说。这是她不想做出的决定，对于离婚，她已深感内疚。

然而，艾妮特和克利斯蒂安对在普林度过整个夏天的想法喜出望外，对于他们这是非常新奇和令人异常兴奋的事。而对巴巴拉来说，也是件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他们度过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几个月的痛苦生活之后，他们盼望着有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而她对此也不感到内疚，这是他们的选择。

“你需要单独有一些时间，”她母亲说。“你需要考虑一下你自己和你的生活。”

当巴巴拉驾车回城的时候，她回忆起，在她去蒙托克见狄克之前的1959年秋天与她母亲的谈话，她母亲对她首先要使自己起变化的劝告奏效了：她的劝告使她离婚了。现在既然婚姻结束了，而这劝告似乎比以前更加有价值了。她确实需要自私，把时间留给自己，考虑她自己的生活 and 将来。

巴巴拉决定，现在是结束消沉局面的时候了，她认为，自觉控制自己生活的时刻已经到了。

格雷摩西公园的公寓使她感到扫兴，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好的和坏的。它们潜伏在那里，无时无刻地侵扰着她的心境。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对她来说在此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与你曾在一、起生活的人分离以后——你住过的地方。巴巴拉自己所作出的第一件重大决定就是搬家。

她从未动用从她公公那里继承来的那笔钱。她仍然把它存在银行里，巴巴拉常想，把这笔钱投资出去，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去问谁。而现在她对没有把这笔钱投资出去而感到高兴，这笔钱终于有了用处。

巴巴拉花了八万美元在第77东大街的派克和麦迪逊之间购买了一套五居室的公寓，尤金对她的谈判方式很赞赏，因为他就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谈判者，享有令别人畏惧的盛名，而巴巴拉这一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巴拉一有了新的公寓，就作出了第二件重大决定：她把结婚时所得到的全部物品都捐献给斯龙——凯特灵·斯瑞福特商店。她把在50年代后期买的保尔·斯图雅特沙发、狄克母亲送给他们一套莱诺斯瓷器、在家俱行一起为孩子们买的家俱都给了商店；她又卖掉了装饰用的织物，地毯，混合酒具，两台电视机，一台加法机，狄克的制图桌子和灰色金属椅子，她的全部夏装，他们的双人床及床单，枕套和毛毯。

然后，她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大采购，买她摆脱沮丧的出路。她为自己买了一张新床，买了新地毯、新床罩、新盘、碗、新沙发、新桌子、椅子和镜子，给孩子们买了双层床，这样他们可以留客人住宿。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布隆明戴尔，波绍尔，W·J·斯隆和罗德·泰勒等商店里。她每天都买新东西，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有许多新的包裹需要打开，总是有些新的东西让她去占有。真有些荒唐，她想。然而，艾利克斯·罗斯的钱从他儿子那里给她买到了自由，此外，又买到了一个新的自我。

她那所有的大胆而又富有戏剧性的决定，到目前为止，其效果都极为显著。渐渐地，她的沮丧、内疚和懊悔都消失了，而逐渐开始感到更加坚强而自信了，她最感到遗憾的，是她的被动。她在狄克知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知道了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她对此却无计可施。直到最后，只好离婚。回首往事，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缺乏勇气，不能首先摆脱那种生活。

在过去，巴巴拉一向以自己在处理事物中作为主导角色而感到自豪，现在她已认识到她有能力强在他们的行列。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们开始谈论解放了，巴巴拉明白她们的抱怨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不得不在工资少，不满意的工作中挣扎。她已把她的要求排在了狄克和孩子们的要求之后，她假装谦卑和消极，她那时坐在能量与愤怒的火山口上。

过去的十年，在一片混乱之中消逝了，对生活的想往未能实现。举国上下玩世不恭，越南战争造成了极度痛苦，巴巴拉认识到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她已从消沉变成了活跃。

巴巴拉不能把目光从利昂·克拉瓦特的被咬掉了指甲的手上移开，她被它们迷住了。他注意到她在凝视着他的手，但他强制自己不把手移开。

“斯但利·白尔曼，”他说。“你认识他吗？”

“听说过他。”斯但利·白尔曼在威尼城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经理。巴巴拉不知道为什么克拉瓦特在谈话中把他的名字拉了进来，因为纳德·杰尔德已经退休，她就在克拉瓦特的办公室里，讨论她的新的工作，利昂·克拉瓦特已经告诉她，要给她加薪，年工资将从一万五千美元升到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并有了新的头衔：推销经理。

“他将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克拉瓦特说。“将对我们公司增加许多力量。”他停了下来，很明显，他期望着巴巴拉对他的突然决定会表示祝贺。

“那很好。”巴巴拉说，她想知道白尔曼会安插在什么地方，是否会影响她。除非他另有目的，因为利昂·克拉瓦特决不是那种把他的计划泄露给他的雇员的人。

“他将被任命为推销董事长。”克拉瓦特继续说，有点心不在焉。

“我将向谁汇报工作呢？”

“嗯，向斯但利·白尔曼，他将在管理委员会。”

“而我不是？”巴巴拉看穿了：他们给她提薪以使她保持安静，给她提职以堵住她的口。他们给她的更多是责任，然而他们却安排进来一个对本部门工作一无所知的人来进行管理。

“只有各部门的负责人才是管理委员会成员。”利昂·克拉瓦特说，好象他在和一个白痴说话。

“我认为我才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毕竟领导这个部门已经二年半了。”

利昂·克拉瓦特把手搭成桥形，双手的手指磨擦着指甲下的粗肉。“我们知道你所做出的贡献。”他说。“我们觉得在这样的部门中，让男人听从女人的命令会使人感到耻辱。”

“他们已经听从我的命令有二年半时间了，他们很喜欢我。”巴巴拉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服从女人的命令。”

“我并没有那样说。”

“你没有必要那样说。”她的手开始颤抖，她也不想控制它们。

“不要感情用事。”利昂·克拉瓦特以屈尊和宽宏的态度说，“要象我们那样去观察事物。”

“我决不会象你们那样去观察事物。”

利昂·克拉瓦特开始说一些安慰她的话，然而巴巴拉什么也未听进去。她站起身走了出去，把他和他那半句话一起扔在那里。

感情用事？五分钟后，在利昂·克拉瓦特的办公室里，巴巴已变成了威胁者。

利昂·克拉瓦特手里拿的这封未署名、未署日期的辞职信犹如一柄剑，悬在董事会的头上。这封信就放在巴巴拉的办公桌上的《时代与生活》的案卷内。不到一分钟她就发现了这封信，她用红色铅笔涂去利昂·克拉瓦特的名字，打上她的名字，署上日期。然后把它放在内部办公室邮箱内，并在信封上写上“个人”字样。

她把她的化妆盒，电话本，记事册塞进本代尔购物包内，最后一次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她直接回到家里，就在打一个电话的时间内，她就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一周之内她就要到帕利塞德出版社——平装书公司上班，职务是推销董事长，提薪三千五百美元，六个星期前，她曾拒绝过帕利塞德，当他们得知她改变主意时，非常高兴。

五点三十分，利昂·克拉瓦特给巴巴拉打了电话。

“你的行为是很出格的。”他说。很明显，他不想用自己的刀砍掉自己的头。

“你的行为也是一样。”

沉默，这是利昂·克拉瓦特的第二招拿手戏。

最后，“我们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他说，“你知道我们很重视你的工作。”

是啊，巴巴拉想。那就雇佣另外一个人来享受这种荣誉吧。然而，尽管这样的回答很漂亮，但还是让过这次机会吧。

“你真的让我重新考虑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巴巴拉注意到他把复数人称“我们”变成了单数人称“我”。

“好吧，条件是我要做推销董事长，我要进管理委员会，每年工资提高三千五百美元。”

“我相信你是知道我们公司提高工资的政策。”克拉瓦特说，巴巴拉很喜欢那种委婉说法：增加。“我们每年增加工资量只是百分之十，要在执行委员会审查这项请求之后才能定。”他在装腔作势地念着官方的台词。在执行委员会后面设有一些障碍，以使管理人员避免与那些不满雇主的雇员发生争执。

“幸运的是，帕利塞德出版社未听说过你的政策。”巴巴拉说。

又一次沉默。这次沉默巴巴拉认为是：利昂·克拉瓦特不知道她有了另一份工作。她等着他的反应。

最后，他终于说：“我们希望你新的工作岗位取得成功。”他又把人称变成了“我们。”

“我们谢谢你，克拉瓦特先生。”巴巴拉说完，挂上了电话。

就是这样，她想。

巴巴拉·罗斯——利昂·克拉瓦特的这个章节到此结束了。

或者她是这样想的。

1969年。月2日，巴巴拉开始了新的工作。这一天，艾森豪威尔下葬在堪萨斯的阿贝林。巴巴拉的天真与美国的天真同上帝一起，在六十年代的某个地方死去了。

天真并不能象凤凰涅槃，它不能在幻想和成熟的死灰中复苏。巴巴拉对它的逝去表示遗憾，但是，正象她妈妈一样，她是个不情愿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她承认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连续几年的越南战争，尼克松和约翰逊无休止的扯皮，美国的天真已被痛苦和对权力的蔑视、自暴自弃的享乐主义所代替。巴巴拉的天真被获得的知识代替；在1969年她三十二岁时，巴巴拉开始明白了所需的是什么，并且如何去得到它。

从斯伯林出版公司到帕利塞德出版社就象从迪法尼到旧车辆市场一样，在帕利塞德，每月都有二十四本不同内容的书籍出版，在斯伯林公司一年两次：春秋两季。贸易表里有二四个精选并仔细编辑的选题，而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帕利塞德出版社在七年前就已成立，一个被称之为疯子的杰。伯格仍然拥有该出版社。

1962年，用《男性杂志》分送员预付的钱，杰·伯格开始每月出版四本色情书，在传统的平装书中，他们把封面改为铜版纸，里边为软纸。在这些年，如果出版商在书中夹杂淫秽，吸引读者花75美分买书而又不受社会谴责和不进监狱，踏出一条路来，这是一项绝好的买卖。而杰·伯格恰恰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的天才。帕利塞德繁荣，壮大起来了。一直到杰除了干合法的事外，没有别的选择为止。帕利塞德开始出版受人欢迎的幻想和纪实小说，每月出版数量都在增加。结果，合法的出版物所带来的收入与出版色情书的收入几乎一样，而在集会上，杰·伯格发现人们把自己当作“出版商”来介绍，这种称呼非常适合他的媚上做下的本性。

杰曾对他的职员吹嘘说，他从不读刊登有关帕利塞德的书评。他觉得只要编辑把书中情节简单地向他介绍一下，他，杰就倾力扑在选择书封面设计上。这样，他就能把书更好地卖出去。对这样的分工大家都满意；杰从不浪费时间去读帕利塞德出版的便宜货，而且在主编与具有文学偏见的出版商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争吵。

除了其它的特点外，杰·伯格是个十足的妄想狂，他办公室的墙上点缀着古代和现代的武器及战争用具。室内一角立着一副盔甲，弩、弓、箭、刀、长柄刀、毒环都安排在展示箱内。一颗手榴弹作为镇纸，当问到这些不合常规的装饰物时，杰·伯格说：“它使我感到安全。”

除了他对武器感兴趣外，杰很怀念色情业。色情是他真正的事业，他继续经营帕利塞德出版社是因为该社能挣许多钱，他的心思却放在他和他妹夫一起创建的一个新公司里，这个公司的名字叫“蓝色电影有限公司”，生产低级的色情影片。主题简单，裸体镜头居多，它们挣不了大钱，但是自从帕利塞德变得小有名气之后，却给他带来了他所怀念的那种满足。总之，杰·伯格是个幸运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能得到大饼，并且可以吃掉它。”

只有少数几位美国人能够讲这样的话。

性革命已经开始并取得胜利，这时巴巴拉三十一岁，离婚了，但她发现自己仍有魅力和能力。起初，她是那场革命的胜利者。虽然青年文化声称生活在三十岁结束，但是，巴巴拉发现六十年代末期的纽约，是男人的节日，而她则是主要的主持人之一。

纽约到处是男人：各种类型、年龄和身高的男人，他们运用各种口味，场合，活动，地位和试验。有在旁搞小动作的已婚男人；有的有小孩和没有小孩的鳏夫；有职业的单身汉；有离婚和分居的男人。男人们想要从同性恋的床上解脱出一个晚上。并想要从——利用愤怒和有敌意的女人作为证明他们嗜好的优越性——同性恋者的身边解脱出来。有些证券经纪人，他们的冲动随着杜·琼斯的变化而变化，有些吸毒者、骑士们徘徊在P·J和艾林周围，费了很大劲却没有激情；还有些年轻人，他们感情专一的时间决不超过他们冲动的的时间。

巴巴拉在工作中、舞会上、集会上、会议上会见男人。在瑞金西旅馆的酒吧里，有两次她允许自己被带走，并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在第三大街的熟食店又一次允许自己被带走。有一次，巴巴拉采取主动，约会飞往华盛顿特区的东方航空公司的市场经理。巴巴拉对已婚的朋友迎接不暇，在小型晚宴上，她被介绍给朋友的朋友，她的电话号码几乎都是不相识的人，又给了完全是陌生的人们。

所有的惯例都改变了，第一次见面就拉手，第二次见面就亲吻，已不再是问题了。六十年代后期，如果一个女人接受了男人的邀请，一般双方都会明白，她也接受了一同他睡觉的邀请。在现实生活中，这倒非常实际，因为巴巴拉不久就发现，如果她喜欢与一个男人到了愿意同他外出散步的程度，她也非常愿意与他同床而眠。

在她离婚后的两年里，巴巴拉与电视广告商同居，他由于吸食大量的大麻，致使性欲大减，无能为力。一个有权有势的政治家曾对她表明永恒的爱慕，而在床上度过了一个热烈的周末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她曾与一个深懂心理分析的律师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他对她爱得发疯，而后来，他承认了心理上的原因：离过婚的女人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摆脱这种奇怪的纠缠。她与一位著名的电影编剧一起看日场戏，他告诉她，他真正愿意三人同住，并且问她，如果他邀请了另一个女人她是否介意。巴巴拉表示反对，他耸耸肩，并且问她如果那样，可否给他洗袜子和内衣，因为察里利——他所居住的地方的洗衣服的费用太昂贵。

有两次，巴巴拉认为自己陷入了情网。她与艾列克斯·普罗斯卡同居了几个月，他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艺术家，他把联盟广场的工作室搬到了巴巴拉的公司，几个月后他说她毁了他的艺术。他搬走了，留下十英寸见方的油画，作为告别的礼物，而在当时，它能值五千美元。

在艾列克斯离开半年后，一个叫莱恩·克隆纳的律师闯进了巴巴拉的生活。莱恩离过婚，他有魅力而又坚定。他向巴巴拉求婚，两周后她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是莱恩事先没有通知巴巴拉就又与他的前妻复婚了。这次的被遗弃使她遭到很大的打击，为了修复她那破碎的情感，她要找更多的男人。就在这时，她在华盛顿机场遇到了这位市场经理，她发誓要使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许多时候，她一夜只与一个男人约会一次，二星期内则有种种韵事。只要向她提出要求，她愿意和任何一位有魅力的男人一起睡觉，有时早上醒来，由于房事兴致未尽，她竟想不起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的名字。她有同时作爱的癖好，一次与两个男人作爱。殷勤和竞争使她兴奋；有时以恶作剧把一人从另一人面前隐藏起来，又使她亢奋异常。

一段时期，这种事情是很有刺激性的，就象一个似是而非的电影一样，巴巴拉爱上了她自己。爱自己的影子，爱能够吸引许多男人的这位女人。但是巴巴拉开始认识到她所爱的影子并

不爱她，她认识到她处于一个持续亢奋状态中，这种亢奋状态要依靠下一个男人，下一个电话、下一个约会来解脱。这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激情。

巴巴拉知道从感情上不能进行杂交。从一个男人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从一张床走向另一张床，仍不能使她满足。她发现在她与一个男人睡过几次觉之后，她变得依附于他，依靠于他，总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更多。自相矛盾的是，她为自己建立的生活方式却不能使她得到更多，不能使她满足，她所付出的代价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她嗜毒成癖一般的性欲，内心饥饿无比。她发现在她那走马灯般的剧院、音乐会、穿超短裙和大礼帽的生活后面，没有家也没有家人。家只是个躯壳，她怀念那种老式的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也怀念她的孩子们。有趣的是，在她怀念家庭生活时，却不怀念狄克，事实上，每当想起他和他们一起生活那的情景，她就头痛。在她真正想起他的时候，她只能回忆起她是如何地疲倦：她对婚姻，事业和孩子们感到厌倦，对安排的时间表和购货单感到厌倦，对去干洗店和儿童医院感到厌倦，对从上午七点到深夜那样无休止的工作，对作为妻子、母亲、女主人和事业型女人都感到厌倦。那时她未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她太累了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精疲力竭之中度过了她二十多岁这段黄金时光。现在她三十刚出头，处在欣喜若狂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却与一种绝望的疯狂边缘相连接。

但是，巴巴拉不顾失望，而继续走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生活中有些事是循环的，早些时候头脑中的事情有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现；而有些事情是一次性的：即有初始、发展和结束。以我们看来，不可能知道哪种经历归于哪一类。当巴巴拉进入三十岁的时候，她已有两种经历：一是一次性的，如她的婚姻和意想不到的从她公公那里继承的遗产；二是循环性的。

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到巴巴拉在普林的中学去是循环性的。第一个夏天分别之后似乎非常自然，同意让孩子们和外祖母在一起。在五十年代，巴巴拉曾憧憬过马考尔式的同居生活。这样的分离会使她感到恐惧。但是现在，七十年代了，离婚，独居，忙干事业是实用的。巴巴拉想，也许她是寻求借口，但是这是处理这件事的的一种方式，即实际上是她的母亲，而不是她，哺育了她的孩子。

他们二人都喜欢乡下：克里斯蒂安喜欢室外运动，艾妮特毫无畏惧，走着去上学。对巴巴拉的孩子们来说，这种没有拦路强抢、没有少年犯罪、没有贩毒的生活，要比处在危险之中的城市生活强得多。

实际这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把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介绍给麦里纳先生也很容易，麦里纳先生以前是普林中学学校的校长，当巴巴拉在那儿读书时，不知他是否说谎，他说他仍记得她曾写过一篇文章而获得过雄狮俱乐部奖。作周末母亲是很容易的，只是在星期五晚上到达，从智慧玩具商店和斯沃兹商店带来的装满教育玩具和系着丝带的箱子就行了。

巴巴拉很难相信专家们的警告——他们以前多次带她走在花园的小路上，很难想象克利蒂安将来会是同性恋者，艾妮特是个孤独的酗酒者。她正让她的孩子们在没有父亲的强壮身影情况下长大，而她自己又经常不在。

并不是巴巴拉不爱她的孩子，并不是不想为他们作任何事情，包括给他们提供如专家们所说，对男女青年健康感情发展至关重要的男性气概。但巴巴拉别无选择，祖父和外祖父都去世了，狄克住在潘沙克拉，为另一个妇女的三个孩子作了父亲，而巴巴拉还未遇到她认为可以结婚的人。那时巴巴拉的生活充满了一系列基于试验性的情人及过夜的男朋友，据专家们认为，这些人都是绝对靠不住的人。男人们的那种朝三暮四是再坏没有的了。

所以跟着一个抵抗力小而实践能力大的警察，并让她的孩子们与她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则易如反掌，又很难忍受这种草率决定所造成的内疚。所以巴巴拉一想到，她竟以为自己的生活比孩子们的生活更有趣时，就很不安。她还从未听到过或看到过任何其他的女人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她对自己的无情和自私感到自责；她怀疑她是否正在失去作母亲的本能，上帝，她真希望那几个说“重要的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时间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专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后来，由于妇女也认为哺养孩子是令人厌倦、枯燥，而且可能会有第二个，以及永久的婚姻，巴巴拉终于大声地承认了她的内疚，这样也就从内疚中解脱出来了。

1970年1月，经过三十二个月的战争、饥荒，比阿佛拉认输了，牛仔队总是输给强队而闻名，在吉保尔以16：13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大家都预言阿里马克洛和利安奥尼尔的《爱情故事》是本年度最红的电影，时髦的设计者们认为五十年代是适合这种复苏时代，巴巴拉以自己的条件，又回到了斯伯林出版公司工作。

巴巴拉再也不想看他一眼，利昂·克拉瓦特打来电话，邀她去意大利餐馆一起吃午饭。

“布拉塞尔怎样？离我办公室很近，”巴巴拉说，该是她要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生活的

时候了。她知道那个旅馆，认识那里的管理人员和侍者，看起来这些人好象是她自己的人。

“一点钟如何？”克拉瓦特问。

“好吧，一点。”

巴巴拉准时到达，她已向利昂·克拉瓦特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不久他会告诉她的。

“你是否考虑一下回J&S作？”他问。他已经告诉她，当然是秘密地，斯坦利·白尔曼不能“胜任工作。”

巴巴拉本来在一年前就可以告诉他这一点，但是一年前利昂·克拉瓦特并未问起过这事。

“我的条件不变，”巴巴拉说。她显得满不在乎，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满不在乎。她喜欢帕利塞德；帕利塞德也喜欢她。她受到很好的待遇，她有充分的自由，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斯伯林出版公司需要她回去，他们也要同样对待她。

“我们准备见见他们，”利昂·克拉瓦特说。他的声调没有改变，但很有分寸。如果IBM可以生产一台使自己焦虑不安的计算机，那它就是利昂·克拉瓦特。

“职务，工资及地位？”巴巴拉问。

“一切都照样，”利昂·克拉瓦特说。“我们让你走，是犯了个大错误。”

他承认了错误是多么好啊，巴巴拉想。他等待着她的回答，她让他等着，她搅拌着黑咖啡，挤一挤在小托盘里的柠檬皮。利昂·克拉瓦特的右手放在白色的桌布上，她就坐在他的右边，她冲动地捧起他的手，仔细地观察着。

“你知道，利昂，”她说。“你真是太老了，而不应再操心了。”

胜利是无休止的东西，《纽约财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她，他准备写一篇报道职业妇女进步的文章，包括从咖啡服务员到政策的制定者。她在广告俱乐部就书籍的推销和广告的问题作了讲演，《出版商周刊》登了他的部分讲演，《作家简讯》就巴巴拉的迷人、能力和光明的前途大加吹捧；

巴巴拉得到了钱和地位，她已学会了大胆反抗，学会了如何取胜。她的生活在继续，电话和交易，最佳销售员和作者引人注目的旅行、情人和爱情、孩子及用钱和权利能买到的放任——这一切一直延续到1971年的夏天。

那年八月，她遇到了纳特·鲍姆。

开始时，一切如同五十年代一样，又重复了一遍。在他们第一次吃午饭时，纳特未建议去看下午的演出，他等了一个星期才给她打电话；他们在圣·赖纪斯酒吧吃的饭，过得如此痛快，以至于两人都取消了其它的进餐约会，他们又一起进餐。当他领她进了出租车后，他在她的前额上吻了她，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肉体接触。第三次见面时，他来到利·曼奥里，带来了一朵黄色的玫瑰花，并送她回家在她公寓的门厅处吻了她的嘴唇，祝她晚安后离开了。

第五次见面，他们一起上了床，这是双方同意的，也是双方共同的欲望。午夜以后，纳特穿好衣服回家了。

“明天怎么办？”他问。巴巴拉很喜欢他的衣着：他穿着从圣·劳伦特买来的绸衬衣，扎着一条与衬衣相衬托的领带。她认为他是她所遇到的男人中衣着最讲究的人。

“你的妻子会怎样想？”巴巴拉问，自从他俩相识以来，第一次涉及到纳特的婚姻，他倒很镇静。

“我们有安排。”他穿上裤子：鸽灰色喇叭裤，没有兜。他的穿着都很精致，开司米、丝绸及柔软的法兰绒，他是巴巴拉所遇到的最使人从感官上感到快乐的男人。

“你干你的，她干她的，是吗？”

“可以说是这样。”他穿上鞋：柔软平底便鞋，几乎和卧室里的拖鞋一样。不是古茨鞋，纳特·鲍姆太世故了，赴这样晚的幽会是不能穿古茨这种鞋的。

“你很有欧洲大陆人的特点。”巴巴拉说。

“我只是一个来自欧洲东部的漂亮的犹太人。”纳特·鲍姆说。“此外，我所要问的是我明天能否再见到你。”

“当然可以。”巴巴拉说。

她喜欢让别人挫伤自己的锐气，她的成功使她变得大自信了。她非常坚强，也深信这一点，但她不喜欢这如此，也没有能力控制它。这可能使她有些伤感，这是五十年代留下来的，她认为这不适合女性。如果他是的，而她是错的话，那么有人告诉她把它改掉时，她会很高兴的。她已超越了他们默默达成的协议，他们所签的只是为了玩得痛快。

“明天见？”纳特问道，并最后一次吻了她，使她希望今晚只是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

“明天见。”

九月。十月。十一月。他们互相占有对方。互相占有，互相迷恋。

“我没有办法不想你，”纳特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内都在想你，你是否知道我正在忍受着无止境的磨难，这是很难忍受的，我快要发疯了，你正在使我发疯，”

巴巴拉也是如此：“你就象海洛因，令人生痛，而又禁忌。”她说。“我不能得到满足，我是个有纳特·鲍姆瘾的人。”

他们互相迷恋：年老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

“你怎么可能比我几乎大20岁呢？”巴巴拉问。“这不可能。”

“这是日历上的出现的错误，”纳特说。“他们会重新改写的。”

“也许我认为你可以作我的父亲。”巴巴拉开玩笑他说。

“比作母亲好。”他回答，他们又融化在一起了。

纳特同巴巴拉所认识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对她昂贵的住宅，华丽的衣服感到恐惧而又被它所吸引。巴巴拉已观察到男人们愿意和富有的女人睡觉，她认为这样又增加了她征服他们的意识。

“我喜欢富有的女人，”纳特说，“她们独立，她们总是能告诉你滚开。”

巴巴拉知道纳特的妻子很有钱，她不知道他的妻子为什么未告诉他滚开。如果她的丈夫作出和纳特那样明显的事来，她会这样做的。

“放规矩点，”巴巴拉说，“我不会告诉你滚开的。”

“假如我行为不端呢？”

“如果你行为不端，就滚蛋。记住，已经警告你了。”巴巴拉喜欢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喜欢那种渴望，喜欢已加强了的感觉上的细微差别，喜欢那种不断变化的力量，这能使他们的性欲不断升级。

“现在，你的行为？”他说，他的吻使她驯服了。然而还有宗教，他是犹太教，她是异教徒。

“有意思，”巴巴拉说。“你不象个犹太人。”

“真可笑，”纳特说。“但是你象。”他们觉得这对话真让人热血沸腾。

“犹太人热情又多情，不象上层人物，”巴巴拉说，“你只有一件过时的东西，纳特·鲍姆：你的脸皮一点也不厚。”

“一点也不厚，”纳特说。“过来。”她走了过去。他们又投入到奇妙无比的爱河之中。

他常常在办公室里给她打电话：“我要你。”他们就会离开各自的办公室，聚在巴巴拉的公寓作爱，直到他们气喘嘘嘘，精疲力尽，头晕目眩，然后，再上班，在五点半又倒在对方的怀里，如同发情的猫一样。

他们没法使手离开对方，沉浸在半公开的情爱中。有一次，在从庞德·里迪吉的艾米丽·肖餐馆，开车回来，在纽约州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巴巴拉竟倒在纳特的身下，当时车速是每小时七十五英里。有一次，他们站在比克曼剧院通向前厅的过道上干事。有一次他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矿物展室内门后的折叠椅上干事，只避开了在门厅内巡视的门卫的视线。

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纳特告诉他的妻子说他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业务会议，然后就从家里溜了出来，与巴巴拉在床上度过了一整天，他们倾其想象，增添他们相爱的内容，并且还有创造。六点钟时，两人热切又疲惫地对视着，纳特勉强他说他该走了。

“真是妙极了。”他们站在门口时，巴巴拉说。

纳特说：“对开拓者来说确是如此。”

他们相互探寻对方的奇思异想，他们达成协议要一直干下去，在他们浪漫的生活中将永无止境。他们沉溺于人类最原始的肉欲与放纵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一致的默契，他们可以完成对方未说完的话，看透对方的思想，当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怎能会是这样？尽管他们有许多不同点，他们却是一个人：一半是男，一半是女。

除了周末和假日，他们每天都见面，这是献身于一位已婚男人的代价的一部分，而巴巴拉并不抱怨。纳特·鲍姆无论给她什么；都使她满足。她盘算着将来的幻想，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足，纳特是有家庭的人，而且他对他的婚姻也不想做出任何的事。

“我毕竟混过多年了。”他说。

“以前我也与已婚的男人有过私情，而且很多，”他们是成年人，他们知道理由是什么，他们都很主动，并且他们能够处理此事。

感恩节，巴巴拉是在普林度过的；而纳特在新泽西的东奥兰兹与他的妻子，妻弟，弟媳一起度过的。纳特问巴巴拉，她是否能一同与他外出到伊利赛拉度过一个星期。

巴巴拉安静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她把兴奋发泄在买东西上，她买了法国式的比基尼，漂亮的海滨外套，深海钓鱼的工作服和到免税港买东西穿的白色裤子，配裤子穿的四十美元的布上衣，舞会和宴会上穿的长袍，和开司米外套（五十年代复活的）。她又买了新内衣和睡袍，运动鞋，白天穿的便鞋和夜间穿的厚底鞋（四十年代复兴鞋）。在T·安托尼买的新行李，在阿登把腿涂上蜡，在唐·李处做的发型。她订购了新的深色度化妆品与棕黄色的洗面剂相匹配，和一台适用于欧美电流小型干发器。

巴巴拉并未意识到实际上她是在买嫁妆。

一个星期五下午，纽约上空又暗又脏，纳特和巴巴拉登上了经纳索到洛克·索德的飞机，下飞机后，他们乘出租汽车到了纳特租用一周的房子。这所房子是一位英国国家俱设计师的，坐落在白色海湾之滨。大海象透明的翡翠，棕榈树修剪整齐，清晰的游泳池底是葡萄牙式手工喷漆瓷砖铺成、房间的内部漆成白色——白色的小地板、墙一天棚漆成天蓝色，家具是自然藤条和英国古董的结合，漆成白蓝相间的几何图形，其它的装饰品也全是白蓝相间组成的图形。

房间内的设施奢侈至极；凡能想得出奢侈品它都有：有很少见到、且从不讲话的四名仆人；一间芬兰蒸汽浴室；嵌有镜子的运动室和练芭蕾舞的扶手旷洁白的浴室中各种设施都成套：污水槽，洗澡盆，淋浴喷头以及马桶；房间里有个小冰箱，冰箱里有香槟、杜松子酒、滋补品和柠檬；毛巾是波特豪尔的大个毛巾，棚顶上嵌着太阳灯，有空调；两个洗澡水龙头，一个是冷水，一个是热水；还有一特殊的浴盆，如果你想要洗海澡，这个浴盆可提供海水，而不需要离开房间。

租用的房子还包括两辆汽车：一台旅行吉普车，一台黑褐色罗斯牌轿车。一艘帆船，一艘备有深海钓鱼装置的机动游艇，滑水板，网球场，保龄球场，一个船库，备有各种钓具，及一小块登陆用细石铺成的路。

这是地球上的伊甸园，而纳特和巴巴拉并未利用任何用具。整个星期，他们只在床上度过。

他们以过去做过的和几种新掌握并不熟练的方法作爱，玩尽花样，品尝相爱的滋味。

他们没有在吃和喝上浪费时间，虽然他们有时也向膳食人员订些甜酒等混合饮料，他们却从未从容地吃喝过。

星期日下午，他们二人分开时，谁也未料到七天会是如此之快地过去了。巴巴拉乘飞机回到斯伯林公司，纳特乘晚一，点的飞机，去迈阿密参加唱片发行人员会议。他们吻别并说再见后，巴巴拉朝着停飞机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门走去，她听到纳特的喊声并觉得他拉住了她。

“巴巴拉！”

她停下脚步，她所想的是他可能把他们的一周时间延为两周。

然而不是。

“你嫁给我好吗？”

她相信未听懂他的话。

“我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嫁给我好吗？我很认真。”

广播里最后一次广播旅客可以登机了。

“我知道你很认真。”

他还未能回答之前，巴巴拉穿过了登机门。她不记得是怎样登上飞机，怎样系安全带，怎样着的陆，怎样过的海关；怎样回到曼哈顿，怎样回到自己的公寓的。

她希望她已死了。

不。

她希望他已死了。

去他的，巴巴拉想，真不公平。他们有恋情，对这种关系都同意，不离婚，也不结婚，没有更深的意义，只是恋情。没有责任，没有承诺，没有未来。而现在，纳特没有事先告诉她，就撕毁了这个协定。他要他们之间的直线关系变为曲线关系。

她要告诉他滚开，婚姻已经死去了，现在是六十年代，人们不再结婚了，纳特·鲍姆应把他的想法丢掉。

巴巴拉发怒了，几乎要气炸了肺。最糟糕的是这个狗娘养的在迈阿密，使她的愤怒无处发泄。他已经投下了炸弹，并且爆炸了。由于她的狂怒没有靶子发泄，只能自生自灭了。巴巴拉为自己的过火反应感到局促不安，然而她感到高兴的是纳特这一周都不回来，使她有时间来仔

细想一想。

她知道，第二次结婚的问题，毫无疑问迟早会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她坚信，这个时间仍在遥远的将来。每当她的母亲提出此事时，巴巴拉总是回答说，等时机到来时，她会考虑的。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考虑它又有什么用呢？

但她从来也没敢想过，纳特·鲍姆竟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曾经说过，难道他忘了吗？他们之间只是恋情，这种恋情，就人的本质来说，是有的，有开始，有发展，有结束，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恋情将会在将来的某个地点结束的，他们会相互厌恶，总有一天，感到腻了，他们的感情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在这同时，他们也同意按现状生活，互相享受对方，而不考虑其后果或者承担永久的义务。

现在，纳特突然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而巴巴拉也知道，他正期待着一个严肃的回答，当然，她知道回答是什么：回答就是不。她不能与他结婚，也将不与任何人结婚，她有许多充足的理由而不再结婚。

十分明显，纳特·鲍姆已经结婚，他不得不首先离婚，而办理离婚需要很长的时间，巴巴拉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四年了，而男方还在等待与前妻离婚，而妻子却寸步不让，坚决反对，尽管如此，最后他胜利了，他们结了婚。巴巴拉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度过那样一些时间以后，竟又有了烦恼，他们现在的关系是法律上的结合，没有任何意义，四年的等待，艰难困苦、摇摆不定似乎给他们留下的只有厌烦和疲倦，而且他们之间不再是事事都指责妻子，而是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与他们在一起吃饭，就象是佛吉尼亚·伍尔夫戏剧中的一个场面，令人可畏。巴巴拉不想卷入那种折磨人的消耗中去，她也不想经受财产分配之争和长期的分离。他不能忍受做“那一个女人；”

还有别的事情困扰着巴巴拉，她试图不理睬它，但都办不到。她内心感到极度害怕，怕的是纳特能抛弃一个女人，就能抛弃第二女人，而这个第二个就是她自己。对他怀有这种不光彩的想法使她感到内疚，她设法尽量压制住这种想法，却做不到，而这些想法仍然在困扰着她——她看到了四十五岁的自己，被厌烦的丈夫遗弃的情景。然而，四十五岁时离婚，比三十一岁时离婚更加糟糕，她将是两次婚姻的失败者，那以后，谁还会要她呢？

巴巴拉对考虑婚姻对她是多么重要这一点感到吃惊和烦恼，她认识到自己仍然依赖于男人的接受和喜欢而使她感到不安。她已经三十多岁了，难道仍然象不到二十岁时一样不能自持吗？这使她感到恐惧。

而且孩子们，孩子们怎么办？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又突然萦绕在她的脑海里，他们刚刚安顿下来，他们在学校学习很好，与朋友交往。他们等待着每个假期都去看他们的父亲，和每个周末去看他们的母亲。他们已经适应了生活中的变故，巴巴拉觉得要求他们再做一次更大的调整是残酷的，不公平的。把一个陌生人抛到他们面前，并期望他们接受他作为新的父亲，这公平吗？纳特的女儿乔伊会怎样呢？她快到二十岁了，据纳特说是个时髦的孩子，她比巴巴拉只小十几岁。除了自己和纳特外，还有比两个人想要和需要的多得多的事情要考虑，有五个人需要考虑，如果包括纳特妻子，是六个人。

纳特的妻子，伊芙琳。

伊芙琳·鲍姆不认识巴巴拉，纳特也不常提到她，而巴巴拉出于礼貌和不感兴趣，也从未问过。巴巴拉也不知道伊芙琳。鲍姆的长相如何，怎样消磨时间，对纳特的不忠行为认识如何。就巴巴拉所能看到的，伊芙琳是位不是女人的女人，据巴巴拉所知，她从未与纳特争论过，从来没有要求，从未责备过他的私通行为，巴巴拉想，也许伊芙琳·鲍姆只是满不在乎。

是的，巴巴拉有许多理由不与纳特结婚，他们很好，又都在说谎。巴巴拉不想和纳特，鲍姆结婚的真正原因，就是她认为婚姻就是失败，尽管她发疯般地爱着他。

巴巴拉是在被认为女人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结婚，而结婚实际上就是“要忍受直到死亡”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她痛苦地发现她受到了谎言的欺骗，她感到精疲力竭而又愤世嫉俗。当它与狄克·罗斯结婚时，她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同他离婚，在他俩人的家庭中从没有离婚的，离婚只是对电影明星和女继承人而言的，离婚是在想象中的天地里发生的，与巴巴拉和狄克·罗斯无关。现在她几乎不记得狄克了，他的长相如何，他的声音怎样。

结婚？这使她害怕。这些奇怪的事情是不会有结果的，看一看统计数字吧，结婚吗？它意味着失败，而巴巴拉不能忍受失败。结婚吗？冒险性太大了。尽管如此，一俾到结婚又使巴巴拉承认了自己的现实。她恨纳特，因为他强迫她做这样的事。问题是正因为她爱纳特，才使她既恨他，又使拒绝他成为不可能。

如果她拒绝了他，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而这是她不能接受的。纳特·鲍姆已成为她的一部分，他们如此相似，似乎他们就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其它时代和其它地方来的避难者，他

们已离开了他们的根基，在与他们的命运抗争，而他们得胜了。如果她失去了纳特，那么她就会自杀，然而她要活下去。

巴巴拉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才找到了解决他们争论的答案。她一想到这件事，她就感到吃惊，她花费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显而易见的。纳特应离开他的妻子，然后和巴巴拉一起生活。

六十年代和性革命已成为既定事实，人们在信箱上有不同名字的地方过夜，守门人对公寓内的住户频繁更换名字也不再吃惊了。巴巴拉所面临的是七十年代的问题，而她以五十年代的心理状态探讨它，然而明显的解决办法是七十年代的解决办法。

一起生活？违心地结婚？婚姻已经死了。

巴巴拉要马上告诉纳特。

他们又团聚了，有香槟，鱼子酱和山谷中的百合花。

“我从未想到我想你，会比想任何人都厉害。”纳特说。

“你的意思是说批发商和封·丹白露也比不上我？”

前法国皇室别墅，巴黎南30英里处。

“甚至赛狗也比不上。”纳特说。“虽然我赢了。”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钞票洒落在床上，有十元的，有二十元的，也有五十元的。“一千一百美元。”他说。

“这些就是我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吗？”

“多得多，过来，我给你看看。”

她过去了，他也过去了，他们在钱中作爱，票在他们身上起皱，压平，这是堕落的娼妓行为。

“就象三十年代的柏林一样。”巴巴拉刚刚看过助兴舞。

“如果这是三十年代的柏林，我就是去布肯沃尔的路上。”

“噢，上帝，那我可受不了。”巴巴拉试图把他吸引到她的身上，以保护他不被幻想中的纳粹所伤害。“我不让他们得到你。”

纳特从纽约回来第一个夜晚，是与巴巴拉一起度过的，她认为这是对纳特妻子的胜利。这证明纳特更喜欢她。巴巴拉同样认识到，这也证明了她是不安全的，尽管事实上纳特·鲍姆已要她与他结婚。但她仍然需要信物和保证，巴巴拉想，究竟要到多大岁数你才能真正地充满自信呢？

“你是怎么对你妻子讲的？”巴巴拉对他如何解释他的私通很好奇。

“没什么，她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噢。”

巴巴拉喜欢纳特的冷静。当她欺骗狄克时，她精心编造了各种谎言来解释为什么她不在。有一半的时间狄克根本没注意这些谎言，对巴巴拉提出的这些借口，甚至从未问过，她发现，对“不在”所编造的谎话比对犯罪行为所编造的谎言要好些，这些谎言使生活简单多了，不需要记忆，即使你真的有运气，这种事情也不会再次提出了。

“对欺骗伊芙琳，你不感到内疚吗？”

“你呢？当你骗狄克时呢？”

记不起了，事情已过得那么久了，而且那时她是个与现在不同的人。

“有时我感到内疚，有时感到骄傲，你知道，是胜利。我想这是自作自受。”

“我也一样，男人和女人区别并不那么大，”纳特说。“只是构造不同；但情感相同。”

巴巴拉也这样认为，虽然她不会加入提高觉悟组织，但她同意大多数妇女解放的主张。

如上所说，女人和男人的不同只是在生理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她问他。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使我感到平等。”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床上喝了桔子汁和咖啡，后来又在莱姆普米尔饭店吃了早午餐。他们要了鸡蛋、腊肉和英国烤面包，而二人同时都在想着纳特的建议，由于不同原因，他们谁也不愿意先提及这件事，直到后来巴巴拉终于忍不住了。

“我一直考虑着你在机场上说的那件事。”纳特不表明态度地嗯一声，如同一个分析家一样，只表明鼓励，不表明赞同或反对。

“这太不公平了，你使我一直在考虑着这件事。”

她大口地喝咖啡，他也喝着他的咖啡。

“我爱你，我想让你嫁给我。”喝完咖啡，他说。“明白了吗？”他微笑着，他的笑脸使

眼睛周围出现很深的皱纹，比平时更加有吸引力，巴巴拉被融化了。他抓起她的手说：“你嫁给我好吗？”巴巴拉几乎脱口而出“好吧”。“好吧”正是她感觉的；但是，“好吧”是在自我麻烦。

“我将与你住在一起，”她说。“我已考虑过了。”

她开始讲起了她那深思熟虑的话，并且认为讲得很好。她解释了同居比结婚优越的各种原因。

“我们将住在一起，”她结论性他说。“这样我们可以相互得到欢乐，而无须有离婚的缠绕。”

她等待着纳特的同意，她所说的每件事都十分明确，而且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

“废话。”

“那不是——”

“废话，我太老了；不能这样暂居，那是小孩过家家。那对乔伊很合适，但我不是。我是成年人，我需要成年人的关系——结婚，所有的责任，所有的承诺和如你所说，所有的缠绕。”

“我正作出许诺，”巴巴拉说。“我看不出结婚有什么必要，没有人再那样作了。”

“我要这样作，”纳特说。“所以我是老脑筋，我对‘让我们互相考验，并看我们如何地相互爱慕’不感兴趣，这三十天是可退还的交易，我要一切，或什么也不需要，我太老了，不想过家家了。”

“我并没说过家家，”纳特的最后通牒使巴巴拉感到害怕。“我愿意承担你需要的任何许诺。”

“那么，嫁给我吧。”

1972年2月，美国对北越轰炸开始升级，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德里的血腥的星期天，打死七人、伤十六人；那时，克里弗德·欧文临危不惧；歌星尼娜·范特兰特在圣·瑞基斯签了演唱合同；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中国，并签署立法结束西部沿海船埠的罢工；这时纳特·鲍姆在争论，劝说，哄骗，恳求，高谈阔论，威胁和引诱。

开始巴巴拉对他的每一步都抵抗着。

“如果你的婚姻是如此可怕，你为什么不在你遇到我之前早些离婚呢？”

“没有理由要那样做。”纳特说。

“你告诉我你婚姻已经死亡，这理由还不充足吗？”

“还需要替乔伊考虑一下，那时她年龄很小，那样对她不公平。”

“你认为一个孩子在分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好吗？我不这样认为，看看我的孩子，他们都适应了，如果狄克和我只是为了他们而硬撮合在一起，那样会更糟。”

“我不那样看，至少乔伊有母亲和父亲，乔伊挺好，你还不知道你的孩子们正在起变化。”

纳特关于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的话触到了巴巴拉的痛处，她改变了话题。

“我不想成为破坏你们婚姻的祸根，我不想对任何别人的生活负责。”

“不要自私自利，我并不是因为你才离婚，我离婚是因为我的婚姻已名存实亡了。你与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在很早以前就离婚？”——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了，始终围绕同样的观点无休止地争吵，而毫无结果。

纳特对巴巴拉非常关心，并送给她大量礼物，他每天给她打几次电话，他们每天见一次面，有时二次，给她一磅波斯鱼子酱，一对香水瓶——“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水”，给了他贵重的本尼·古德曼的唱片，温柠树枝，几束黄水仙和一块刻着“永远”字样的金手表。

纳特的努力奏效了。他使巴巴拉失去了镇静：一会儿进攻，一会儿指责；接着是他求爱的誓言和手势使她感到窒息。在某个问题上她停止了反驳，开始回避。她没有意识到这种微妙的变化——但纳特已看到了，为什么重视这种变化：这是进步。

“我所要知道的是，”他问，“你为什么不作许诺。”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心理上有毛病？”

“我只是说你为什么不作许诺。”

“我可以作许诺。”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

她没有回答。他改变了他的方式，变成了她的同盟者：“你怕什么？”

“我不害怕。”

“不，你怕，如果你不怕，那么就嫁给我。”

“我不害怕，什么也不怕，我只是不相信婚姻。…”

“你在说谎，”他以轻柔、理解的语气说。“你害怕，告诉我你怕什么？”

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说出这句话。

“我怕你离开我。”

她崩溃了，他在后面扶着她。

“你真的害怕我离开你吗，”他竟能如此温柔。既然她已说出了这些话，伤痛已经过去了，他已解除了她的最可怕的恐惧。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她承认道。

“好吧，我不会离开你。”他说。

“你答应了？”语调非常强烈，这语调本身就使她感到害怕。她原想使事情轻松些，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清楚，过于接近会影响她的判断。

“如果你有圣经，我将对圣经起誓。”他举起了右手。

巴巴拉笑了。“这话对我就足够了。”

他有所缓和，过了一天，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使你如此害怕？”他非常同情，巴巴拉认为这种同情的方式只有一流的分析家才能有，他想要帮助她理解她的恐惧，以便克服它们。

“我的婚姻欺骗了我，我已对结婚丧失了信心。”巴巴拉说。

“但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指出。“你总不能让一次失败毁掉你今后的生活呀，你说呢？”

“那就是私通，我已有了多次的灾难，太多了，男人拒绝我，我也拒色男人，我已麻木了。”

“不，你没有，你只是心灰意冷罢了。”

巴巴拉思考着他的话语，当然他是对的，她确实是失败者，不敢再试一次了。

“我想我应该反击。”

“不是反击，”纳特说。他知道争斗使巴巴拉烦恼，她已承认她缺乏女子气概。“但要敢于去生活，要勇敢，勇敢并不是缺乏女子气概。”

他又对了。真奇怪，他了解她竟比她自己了解得更清楚。他对她心底的感情有着准确无误的直觉，她感到她可以完全依靠他，这种想法使她得到无限的安慰。

“你一直让恐惧主宰着你。”

“我猜想你是对的。”

“你不是猜想我是对的，而是你知道我是正确的。”

“我懂。”

巴巴拉顺从地承认他是对的；承认他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对她总是不对已厌烦了，她对同时两面开战已腻了：一个是反对纳特·鲍姆，另一个在反对她自己。这使她感到疲惫不堪，与他相斗使她厌倦了，与自己相斗也使她厌倦。

纳特·鲍姆具有她在男人身上所需要的一切：敏感，知识渊博，幽默，富于情感。她想，她若是继续使他远离自己，她一定会疯的。她还要什么呢？还期望什么呢？

事实上她爱他，要嫁给他。结束他们俩痛苦的时刻已经到了。

纳特在闰年二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日晚上到来时，巴巴拉一打开门就投入他的怀抱：她拥抱着他说：“你赢了。”

他抱着她如同捧着易散而又难以处理的水银一样。

“你也赢了，”他说。“我并不是个坏家伙。”

第二天纳特来时，带来了一个蒂法尼文具店的购物包。

“我为你买了点东西。”他说着把包交给她，巴巴拉打开里面的浅蓝色的盒子；里面装有铅板印刷的信纸：“纳特·鲍姆太太”的字样，用大写字母印在每页米黄色信纸的上部，印在每个信封背面的上盖上。

“一旦我们决定在哪里住，他们说他们可以把地址后加上。”纳特说。

“你知道我能同意！”

巴巴拉所想的是制作这些信纸至少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这就是说纳特从去年十二月份就

开始考虑与她结婚的事了。也就是说很久以前，他就去了蒂法尼文具店并定作了信纸，选择了信纸的格式和纸本身的光泽度。这一切似乎他早已提出过，而她也早已接受了。他的自信心没有受到内心深处的疑虑和突然出现的不稳定情绪的影响，巴巴拉很希望她也能那样做，也许她与他一起生活时间久了，她也能够获得这样的自信心，也许这能象风疹一样，能够传染。

“我想我有了一个争论的机会。”纳特取笑着她说。

“假如我说过‘不’呢？你知道一开始我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礼物，蕴含着永恒的意义和他那种认为占有她是理所当然的和蔼态度，这使她又兴奋又恼火。她需要坚持自己的权利，她不想被他所征服。“我也可以拒绝你，那么你还将怎么办呢？”

“那我就只有等待。”

“你真那样想要我吗？”

“不是想要，是需要。”

“我爱你。”

“我也爱你。”

那天晚上，纳特和巴巴拉沉浸在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之中。她为他们将举行的宴会准备了菜谱；她与他选择他们准备去访问的美丽又浪漫的地方；与他商量的房间的家俱，甚至问到了如把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合法过继过来，会有何种感觉。

他告诉她，晚宴上人员不超过八个人，这个数字进行谈话是最佳的；他们将去土耳其和马拉卡兹；他们的公寓将是当代电器和古董混为一体的建筑，如果她需要孩子们，狄克·罗斯不反对的话，他更愿意过继她的孩子。

巴巴拉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她年轻，富有，自由，而且最主要的是她有一个她所爱的男人。

现在她倒很高兴以前结过婚，她将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过去她所做错的一切事情，将来都要从头做起。现在她有能力建立一个情感、性欲和理智都满意的婚姻，然而，使人不可思议、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的真正需要的全部满足都是他们之间的相互需求。

过去的六个月里，由于巴巴拉越来越迷恋纳特·鲍姆，从职业她也越来越迷恋于他。他给了她行动上的自主权，事实上她正在管理艾尔法·鲍姆的广告部。从卖方到用户，所有的发行份数，图片，每条广告，每件邮件都是由斯伯林出版公司的巴巴拉力、公室安排的，她对艾尔法的一切都办得井井有条，所以，纳特并不需要察看工作的进展，因为他非常相信她的判断力。

她取笑他的自由劳动，并告诉他，他应把她安放在艾尔法的财务处。如果可能，会使她更加接近纳特。她感到双方分享越多，他们的关系就愈密切，就愈加融洽，回想起以前婚姻的失败，她感到她和狄克职业生活的分离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每天晚上他们聚到一起时，不知道对方在一天之中作了些什么；以至于每晚他们都要相互印证一下他们的婚姻。现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她和丈夫将相互分享职业生活及个人的生活，其结果必定会增进他们目标、问题和兴趣的一致性。实际上，她和纳特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她是否应离开斯伯林公司到艾尔法全日工作。

巴巴拉是幸运者之一：她有第二个机会——而这是纳特·鲍姆给她的。

那天清晨两点，纳特刚刚离开，巴巴拉坐下来，用在蒂法尼文具店订制的信纸给他写了第一封情书，巴巴拉认为这是他们真正婚姻开始的象征。

她对写上艾尔法唱片公司的地址并注明“私人”信件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迷人的现实。”三个星期后，巴巴拉说。“我明天告诉他们。”这是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五；过去的几个星期是一次蜜月。在她的生活之中，再也没有比爱纳特·鲍姆更加彻底真诚的了。他给她回信问，他一直要等到五十岁才遇到一生中的爱情是不是太不幸了，巴巴拉回答说，晚要比永远得不到爱好得多。然后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用幸福作成的茧中。

幸福是不完整的，巴巴拉关于她的婚事迟迟没有告诉孩子，现在她感到不能，也不应该再拖延下去了，而且她也急于想让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见她们的新父亲。“星期日晚上给我打电话好吗？”他问纳特，坚持要求他再次确切地答复。

“你知道我会的，你不要再问了。”他说。

巴巴拉对于不能给他打电话感到的烦恼，已超出了她所能容忍的程度，他仍与妻子住在一起。纳特已找到了一位离婚律师，律师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先搬出来，这在离婚裁决中对他的权利是有利的，否则将为伊芙琳起诉他要遗弃她而铺平道路，那样在经济谈判和探望孩子方面他将失去特权。法律也真怪，人们本来不想在一起，而它却强迫他们在一起生活，巴巴拉认为这似乎太不人道了。

“你什么时候能搬出来？”

“等我们找到地方时，我不想让伊芙琳用乔伊来要挟我。”

“她不会那样做的，是吗？”纳特很喜欢他的女儿，而伊芙琳可能会不让他见乔伊，这对巴巴拉来说真是不可想象。

纳特耸耸肩，“我不知道。”他说，并摇摇头。他的脸上浮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巴巴拉紧紧地抱着他，直到痛苦的表情消失。

纳特告诉她，和伊芙琳一起生活的痛苦几乎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他变得神经过敏，并开始酗酒。有时巴巴拉在五点遇到他时，发现他已喝了许多酒，当她给他指出来时，他变得很急躁，并告诉她，他已开始喜欢喝酒，并打算将来继续喝下去。唠唠叨叨不是巴巴拉的天性，所以她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这只是暂时的问题，一旦纳特搬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同时，他更需要理解，而不是争吵。

“星期日我给你打电话，”他说。“如果我能出来，我会来的，我爱你。”

“我也爱你。”巴巴拉说。她恼恨经常的分离，她无法等到她和纳特团聚在一起这一天的到来，她理解他的急躁，因为她自己也感觉到了。不断相会和分离就象理乱麻一样，那天晚上他刚离开她的公寓，她就开始期待着星期日的晚上，再见到他。这种生活方式是可怕的，而巴巴拉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从没有人谈过爱情的痛苦。这也许是美国保持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吧：爱情也会令人伤心。

第二天，在普林，巴巴拉告诉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关于他们的新爸爸的事，他们的反映表现出了他们性格的不同。

艾妮特现在快十四岁了，对大卫·凯西迪已厌烦；并在大街上用象征的手势，把她收集的一百三十张大卫·凯西迪的照片送给了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已长大，并梦想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与奴列耶夫一起跳舞，并野心勃勃地想与戴维·佛罗斯特结婚，因为她喜欢他那奇特的口音。艾妮特现在所希望的是象珍·佛恩达一样。艾妮特说，珍·佛恩达是个理想的女人，思想解放而又有献身精神。她也想发表反对战争的演说，虽然这意味着她可能会被捕。

克里斯蒂安，快十三岁了，他的守旧就象他姐姐的现代开放一样。他喜欢运动，具有男子气概。巴巴拉想，也许是住在女人们的家里使他比一般人更强烈地坚持男人的特权。艾妮特骂他是大男子主义的走狗，而巴巴拉倾向于同意艾妮特的看法。他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他对巴巴拉的决定大发雷霆。

“一个家庭中有一个男人就足够了，”他说。“此外，我已有爸爸，我不需要另外一个爸爸。”

他的愤怒使巴巴拉震惊，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也许他仅仅是害怕竞争。

“你不认为有一个可以谈话的男人更好吗？他会站在你的一边。”她指出。

克里斯蒂安想了想。“他不能使用我的椅子。”他宣布。吃饭时，克里斯蒂安坐在桌子的横头，也就是伊万吉兰·杜登所声称的“爸爸的椅子”的位置，克里斯蒂安并不想把它放弃。

“他不会要你的椅子的。”巴巴拉说。“他愿意做你的朋友，你不喜欢新朋友吗？”

克里斯蒂安感觉到他使他的母亲处于守势，而且在本周末的余下时间里，他拒绝与她谈话。巴巴拉责骂着自己，这是她自己的错，巴巴拉承认克里斯蒂安已被他姥姥、被他自己的溺爱和他姐姐的轻浮给惯坏了，他的庄园领主的傲慢正是她自己的翻版。

艾妮特的反应是自相矛盾的，关于纳特，她首先问他是干么的，当巴巴拉告诉她后，她说：“商人，啊，我恨商人，他们所考虑的只是钱。”

“是什么使你这样认为？”巴巴拉想知道艾妮特从哪儿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有的商人都是资本家，资本家都是膨胀的猪。”艾妮特说。“安吉拉·戴维斯这样说的。”

巴巴拉什么也没说。她究竟怎样来对付一个十三岁的共产主义者呢？她立即决定对一些问题还是避开好些。

巴巴拉已对她的母亲谈了纳特。好的方面是他知识渊博，诚实，敏感，热情。不利的是他已结婚，现在正在离婚；他虽然是犹太人，但从不去犹太人教堂，当然不会相信犹太教的话，最后，最担心的是他几乎比她大二十岁。

“会有许多问题的，”伊万吉兰·杜登说。

“我知道，”巴巴拉说，“但是我们的相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坚信……”她母亲说。她的母亲不是没有慈悲心怀，但巴巴拉希望她会更加热心些。她认为她太老了，不应期望母亲给予支持。毕竟她也是位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们，和他们将来的忧患，严重的忧患。

“不管怎么说，”巴巴拉说。“你会喜欢纳特的，我知道你会的。”

伊万吉兰·杜登点点头，她祝愿女儿幸福，并打算不作出决定。

星期日晚上巴巴拉离开时，艾妮特把她拉到一旁。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纳特？”

“不久，很快。”

“啊，我想知道……”艾妮特开始犹豫他说，因为她要背叛珍·弗恩达。“我想知道的是我应穿什么衣服。”

巴巴拉本周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你想知道什么？我爱你，你长大了！”

“我也爱你，妈妈。”艾妮特说。然后她严肃起来“你是说珍·弗恩达也注重衣着吗？”

“我坚信是这样。”巴巴拉说。

虽然她和艾妮特的最后谈话使这个周末有些甜蜜感，而事实上很令人沮丧，在巴巴拉开车回曼哈顿的路上，她已屈服了。她母亲明了的观点使她困扰。克里斯蒂安对继父的敌对态度使她烦乱，在一个月内的异常幸福后，她第一次怀疑起她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巴巴拉感到痛苦难忍，使她突然产生冲动要把车开到北方佛蒙特，一个没有人能够找到她的地方。但是这种冲动只持续了一会；这是心理安全阀，回想着与纳特在一起所做的一切，她知道她是正确的。任何痛苦都是值得的，只要与纳特在一起，任何事情她都能应付。

当她在车库下了汽车回到公寓时，她的心境异常的好。刚刚七点，一会儿她就能接到纳特的电话，他和她能够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她打开收音机，调到摇滚乐以适合她那复苏的心情，并做了点虾沙拉。她把白酒放进冰箱，拿出一些乳酪，切了黄瓜丝，把水芥放在冰水里使其爽脆，她知道电话铃随时都会响的。

八点了，纳特还未来电话，到八点半时，巴巴拉开始考虑应打电话给他。若是伊芙琳接电话该怎么办呢？

巴巴拉早就记住了纳特的电话号码，虽然她一次电话都未给他打过。在与他第二次约会之后，她便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并认为这意味着他就住在八十一和第五大街，同她只隔几幢楼。她抓起电话，听到电话的嗡嗡声，刚开始拨号。如果是伊芙琳接电话，就挂断，这是故技重演；如果是个男人接电话……

那就不是很有趣的了。

巴巴拉放回电话，正想着为什么纳特还不来电话。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了他，使他不能打电话。她决心不再猜测。她翻了翻星期日的《泰晤士报》周末版，浏览斯伯林出版公司的广告，看了看本公司的书；浏览一下市内园艺的书目；她想倒一杯白酒，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有些紧张而又分心，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回忆着以往的这种周末；她一直在想是什么把纳特拖住了。这是一种折磨，她什么也不能做。她无能为力了。

终于在九点半，电话铃响了。是纳特，他喝了许多酒，精神沮丧。

“我不能忍受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象这样生活我受不了。”

他是在第三大街的一个酒馆里打的电话，他把巴巴拉的心撕碎了，她尽力想安慰他，但是他已超出了安慰的范围。

“我很痛苦，我不能忍受与你分离。我受不了。”他继续说。她可以听到酒馆里的吵闹声，谈话声，笑声，碰杯声，衬托着他那痛苦的声音。

“你需要我去接你吗？”巴巴拉对他很担心。担心他在这种失态的情况下会被偷或被打，担心他会卷入肮脏的殴斗之中，担心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她要保护他。

“你一定恨我，我醉了，我令人作呕。”巴巴拉告诉他不是这样，她不恨他。但她感到被遗弃了，他喝得大多了，她没法与他说明这一点，也没法得到他的安慰的话语，所以她不再想了。她想知道那个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想知道他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不管是什么，一定是坏消息。伊芙琳。鲍姆说了什么——或作了什么呢？伊芙琳第一次开始存在了。一个真正的控制着她的生活和幸福的人；巴巴拉必须知道，所以她问了她所害怕问的问题。

“是伊芙琳出事了吗？事情很糟糕吗？”

“我恨自己，让我无法忍受。”纳特含糊不清他说，由于吵闹声很大，很难听清他的话。

“我爱你，我崇拜你。”他说。

“我也爱你。”她说。这正是打电话的原因。巴巴拉从未见到过他醉到如此程度，她害怕他会在酒馆呆到闭店的时间——凌晨三点？四点？——喝得越来越醉。她想要个出租车接他回来，把他送到他家楼前。但她决定不这样做。她不要把他象小孩一样对待。她不想做他的守护人，她要做他的女主人，做他的妻子。

她把痛苦埋在他的痛苦里，她上床了，却不能入睡。克里斯蒂安，她母亲，甚至伊芙琳·

鲍姆——巴巴拉不断想着。她明白睡不着只能使事情更糟。她终于在两点三十分起来了，从瓶里倒了一大杯苏格兰酒，把西柯纳尔镇静剂吞下。她知道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但是只这一次，并使她在六小时之内忘记一切。

明天她将把她周末的事告诉纳特，并了解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事，那么伊芙琳说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关于头天晚上夜里的事情她觉得镇静剂药力还未过去。巴巴拉口干、头庸。在她穿衣去工作时，喝了两杯矿泉水，一杯桔子汁，一瓶冰镇可乐。她脸色灰暗，因此她吹了风，多喷了些莱迪以使自己装扮起来。她到办公室时，喝了一杯浓咖啡，吃了半片烤麦饼，浏览一下邮件，给上星期五留下的电话回话，向艺术董事口述了重新修改室内园艺一书的备忘录，现在她才感到自己仍是个人。她在要吃午饭时给纳特扫了电话，他们决走晚上去她那里一起吃晚饭，他们谁也不提头天晚上的事，他们决定面对面地谈一谈。这样会容易些，文明些。

纳特带来了从麦迪逊大街的帕里斯·伍德沃斯花店买的一篮郁金香花。

“我该说些什么？如何向你道歉？”他问。看起来他好象怕她打他——或把他扔出去似的。他脆弱的表现，巴巴拉一下子感觉到了。

“你不要这样，记住：我爱你。”

他们决定不出去了，订了中国式饭菜。今晚他们要单独在一起，不受饭馆的吵闹，点菜，订饭，侍者的问话和其他就餐人谈话的干扰。巴巴拉把周末的情况告诉了纳特：她担心母亲的保留态度及克里斯蒂安公开的敌对态度。

“我原想他们不会如此……持反对意见。”她说。“我认为不会如此困难。”

“会有办法的。”纳特说。

“你这样想吗？”巴巴拉认为自己是能自由、独立做决定的，但有时也需要帮助。感谢上帝：纳特总是在提供帮助。

“我明白。”他说。“这只是时间问题，每个人都会习惯于继父和继子的字眼的。”

这样做似乎是有道理的，当然事情会解决的，生活之中事情总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很敬重你；你总是解决一切事情，不是吗？”巴巴拉问。“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无论何时作错了事，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问问纳特。纳特是解决问题的人。’”

他的笑容和话语中表现出一种讽刺。“我倒想作一个这样的人。”

“你是的，”巴巴拉说。“对我，你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吃着蒸包，中国蔬菜大虾和四川式牛肉。他们谁也没有喝酒，只从巴巴拉的冰箱里喝了可乐。

“今天上午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巴巴拉不知道如何把谈话引向昨晚的事情，引向纳特喝醉酒的愤怒、对他的失约的怨恨、和她所尝到的被遗弃感的话题上来。她实际比自己能意识到的还要愤怒得多，所以她开始以责备自己及轻松而又不伤害别人的语气开始讲话。“我睡不着觉，所以，我真愚蠢，喝了点西柯纳尔镇静剂和一些苏格兰酒。”

“对此有个名字叫作——”纳特说，“自杀。”

“我只服了一片西柯纳尔。”巴巴拉说。她不想告诉他用了几乎六盎司的苏格兰酒才喝下它。

“向我保证一件事：你以后再也不要混着酒吃药了。”

“我保证，”她说，她非常温顺他说，她更喜欢他那严肃的声调。这也是以她的愤怒来惩罚他的一种方式，用不着承认它。这是令人满意的。

“喝点酒睡觉，”他说，“或者吃一片西柯纳尔。但是不要同时用两种，否则你会死的。真的，你知道人们都是这样做的。”

“我知道。”他的关心感动了她，把她包在温暖的保护层。“我发誓我睡不着才那样做的，我实在睡不着。”她说。然后，又犹豫他说：“我为你担心。”

“我是头蠢驴，是个白痴。我模糊记得给你打过电话，是吧？记不起来了，真感到羞耻，”

巴巴拉很吃惊，她没有意识到他真正醉到了何种程度。

“是的，我们谈了话，你是说你什么也记不得了吗？”

“我是否说了……什么？”

她的神经本能地发出了信号，但她不理睬他。

“说了什么事？”她小心地问，把糕点屑倒掉。

“噢，”他说。“任何事。·你知道，都是愚蠢的。”

“当然没有。”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怎么能说那些愚蠢的话呢？你是我所知道的人

中最不蠢的人。”

纳特耸耸肩。“我猜我是个偏执狂。”

“难道别人不是吗？”巴巴拉笑了，她的神经放松下来。警报解除了。他们又是情人了，什么也未改变。干扰已被排除，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你喝得那么多，让我不安，”巴巴拉说，“我觉得被遗弃了，再也得不到你了。”

“喝得那样我也讨厌，”纳特说。“虽然你得承认我并不经常喝得那样。”

“是的，昨晚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他说，“讲一讲头脑还记得的东西吧……”他把手放在头上。“今天早上我仍头痛，看不清楚，好象……真怕。”

“是啊，至少我们是一起在遭罪。”

“也许我们应停止责备我们自己了。”

“你说的完全正确。”

现在她再次感到他可爱。因为她和纳特之间的一切如同以前一样温暖，娇柔，相爱，甚至更多。一同穿过地狱的人会更加亲密，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天晚上，他们的作爱极为成功，用他们的身体写成了细腻柔情的诗篇。

伊芙琳·鲍姆的名字再也不提了。

四月是个残酷的月份。世界似乎要粉碎了，而巴巴拉·罗斯的生活也要粉碎了。

四月是在北越四年来最大的反攻下开始的，炮火席卷中立非军事区。尼克松总统以海空的优势进行猛烈回击，在巴黎，和平谈判停止了。在伊朗南部，地震摧毁了三十个村庄，四千人死亡。在北爱尔兰，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发生了巷战，贝尔法斯特的足球露天运动场被炸弹毁。

是否卫星偏离了轨道，或者那个月人们变得愚昧了。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破坏。四月不是开始，而是结束。

四月是残酷的月，巴巴拉了解到纳特·鲍姆过着两种生活——而她一半也没有增加。

当纳特第三次拒绝实现他的诺言去普林会见巴巴拉的孩子和母亲时，真相大白了。当巴巴拉指出这是他第三次食言时，他非常生气。他指责她全部依赖他。她否定了他的指责。她只想让他见见她的家里人，而时间在流逝。他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他是如何焦急地期待着去见他们，并使他们喜欢他，不是吗？那么又为什么总是一次又一次推迟呢？

她可以理解他会感到紧张，然而她把纳特的事情告诉他们时，她又是多么紧张。但她还是这样做了，并经受住了。实际上，并不象想象的那样难办。

她把这一切都指给了他。

“并不是那样难，”她说。“我们这个周末就去把它解决了。”

“我不能去，”纳特说。“本周末我不能离开。”

“为什么？你以前不是也这样做过吗？”怎样才能更简单些？巴巴拉想。以前他曾与她一起偷偷地度周末。时间在热情和亲密之中流逝，偷偷摸摸会更加甜蜜。“而且，”她说。“正是以前你把我们的事告诉你妻子的。”

纳特看着她，完全明白他应该作什么，他把真实情况直率地告诉了她：“巴巴拉，我还未告诉她，她不知道。”

麻木，刺痛，耻辱，愤怒在燃烧，而又无能为力。

巴巴拉情感上反应如同核反应链一样熔凝在一起。

她把能够想得起来的一切脏话全用到他的身上，骂得他狗血喷头，她指责他所犯下的她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罪行，并把一瓶他给她的乔依牌“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水”摔到了门厅上的卡尔·斯普林长镜上，香水瓶和价值九百美元的镜子一起碎了。

他让她独自发脾气，直到愤怒自己燃尽为止。

当她累了，乏了，坐在沙发的角上，尽力离开他远些时。他把她抱起来，在一阵违心地反抗后，她就屈服了。

“我将会告诉她的。”他允诺。“只是需要给我时间。”

她同意了，她太爱他了，太喜欢他了，太迷恋他了，她没有别的选择。她已走得太远了，不能走回头路了，她已经受到了制约。

那晚作爱时，他们如同十六岁孩子一样笨拙，而又无所顾忌。

第二天早晨当巴巴拉醒来时，房间里充满了乔依牌的香水味，在她以后的生活里，她将违

心地承认它的香味。

她强迫自己不问他，每当她想要知道他是否已说了什么事时，她一次次咬住牙关忍住了。她有超人的控制力；但是到了无休止的四月底，她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向他是否已对伊芙琳说过了。

“不只是伊芙琳，”他说，“还有乔伊，”

巴巴拉未想到这一点。她有两个敌人：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从未想过他女儿的愿望也应得到满足。她知道乔伊将近二十岁了，而且自己生活。她父亲与谁结婚对她有什么关系呢？她正忙于自己的生活，不是吗？

“不要把乔伊卷进来。”纳特带着警告的口吻说。

“我的意思不是……”

“只是不要打扰我。”他说。

“好吧，”她说，并停下了话题。

她并不想使他烦恼，也不想使他生气。每当他生气，他就撇下她，几天不来看她甚至不给她打电话。没有他，她无法忍受，所以她不问他，不敦促他，不强求他。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最后又作了最糟的事：就是她什么也不做。

残酷的四月过去，迎来了血腥的五月。

在尼纳蒂·奥尼的凯罗格银矿火灾中，有九十七名矿工死亡。乔治·沃利斯州长在马里兰的劳瑞尔商业中心被枪击，致使腰以下瘫痪。一个疯子挥舞着锤子，毁坏了圣彼得的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抱着基督死尸哀戚的塑像，温莎公爵为了所爱的女人抛弃了宝座，活了七十七岁。

而纳特·鲍姆还未对妻子说。

五月下旬，在普莱厦旅馆的橡树房间内，一切都表面化了。

他们已吃完了主要的菜，他为她要了牛肉，她为他要了三明治，纳特要了第二瓶酒。他们都略带醉意。

“纳特，我们不要玩把戏了，我要嫁给你，你也要娶我。勇敢些，告诉你妻子吧，那样做只须几分钟的时间。”巴巴拉恨自己恳求的腔调，但她已毫无能力去控制它。

纳特呷着酒；局促不安，不去看她。

“‘纳特，不要让我恳求了，这使人耻辱。’”

“所以不要再恳求。”他说。

“我不是在恳求，我是在问。”“问”这个词，她想：能给她留下尊严。“恳求”使她成了乞丐；“问”可以使她平等。巴巴拉轻轻地把他的手从酒杯柄上移开，抓在自己的手里，一个个地吻着他的手指。她吻完后，他马上把手撤了回去。又喝了些酒。他还是只字不讲。他正在强迫她做所有的事情，一切。

“如果你不这样作，”巴巴拉说。“我将写信给她，在我的信封上。这些信纸信封是你在蒂法尼家具店给我订购的。上面印着‘纳柵·鲍姆太太’的名字。”主意妙极了。巴巴拉很后悔为什么以前未想到这一点，她开始构思信的内容。

“亲爱的鲍姆太太，”她开始构思道，又马上改变了主意。“或者我应该称‘亲爱的伊芙琳，’”

纳特喝完了一杯酒，又倒上了一杯。

“亲爱的伊芙琳，”她又开始说。“这是通知你……”

突然，动作如此迅速，橡树房间内没有人注意到，纳特用沉重的烟灰缸打碎了巴巴拉的空酒杯，并抓起酒杯的碎片对着巴巴拉的脸。

“停止你的胡说八道。”他咬牙切齿他说，一时间，巴巴拉感到十分恐惧。他们相互凝视着，为把对方逼到此种地步而害怕，一会儿这局面就过去了。他笑了笑，把碎片扔到烟灰缸内，并让侍者拿走。

“一点意外。”他说。

侍者走后，纳特的身体前倾，靠近巴巴拉，她也倾向他，使一切都正常。他一只手伸进另一侧的口袋掏出一角硬币。他把它交给了她。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用意。

然后她接过钱，象同谋者一样，他们走到了电话间。电话都空着，巴巴拉选择了离门最远的一台。她把硬币放进槽内，听到了电话的忙音。她看着纳特，把电话交给了他。

“你至少应做的是拨了七个号码。电话接通后，他把电话交给了巴巴拉，正好她听到了伊芙琳的声音。

“嗯？”

“喂，鲍姆太太。”

“是的。”

“我是巴巴拉·罗斯，我与你的丈夫在一起，我们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纳特要与你离婚。”电话的那一端这样说。并停下来等着回答，没有回答。继续说。“他要与我结婚。”这是个女人的声音，轻柔而肯定。

“谁……”伊芙琳开始说，以后又想最好就去它的吧。她不想再听下去。在这个声音再次说话前，伊芙琳挂断了茶几上的蓝色公主牌电话。她总是喜欢这种颜色，喜欢这种蓝白相间的印花墙纸，与鲍姆公寓卧房内的结构相匹配。人们都说伊芙琳有个很好的工作，应是一个优秀的室内装潢师。伊芙琳喜欢恭维，她是这样一种女人，得到的不多，却珍惜它们，把它们贮存在记忆里，当它们可能支持她时，再把它们从记忆里取出来。它们无济于事，至少现在是这样。她开始哭了起来，并伸手去拿纸巾。

虽然才九点三十分，伊芙琳已上床睡觉了。她并没有病，但是近年来，乔伊离开家住在外边而纳特又经常出去，她喜欢早些吃晚饭，——一张鸡蛋饼和一盘色拉或羊肉丝和菠菜，——洗个长时间的澡，然后上床读书。伊芙琳是达布尔德的最好读者，只要它们一出现新书，她马上就买来，一星期就读四五本。书是伊芙琳的催眠药。

当她取纸巾那，她的书《萨尔斯堡的线索》一书从腿上滑到地上，现在她捡起书。她想要再次埋头于这本故事中，沉醉于另一个女人的生活和情感中。这是发生在奥地利的一个间谍冒险活动的故事。女主人公受到秘密间谍的追捕，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被捕了逻辑学德国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作之一。又称《大逻辑》，但是伊芙琳记不住谁在哪一边，谁是双重间谍，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伊芙琳试图读下去，想记住这个情节。她不愿去想那个电话，她已花了过去的三十年，不去考虑这件事情。

这件事，说明了她的处境，她和纳特的处境，实际上是纳特的处境。纳特和她们，不管你怎样称呼她们，姑娘们。他的女管家和女秘书们，伊芙琳想象着。她们年轻，有象乔伊一样的长发。性解放的姑娘们，她们事先服了药，不必担心怀孕，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也许一个晚上，没有犯罪感，没有内疚，第二天早晨也不想这件事，从不想他的妻子独立在床上看着一本好书。他们只知与伊芙琳的丈夫在床上进行身体上的娱乐。

伊芙琳已经知道纳特在欺骗她。对此，他从来未否定过，也未说过他与他的朋友们不同。他的朋友们坐在伊芙琳餐厅中的餐桌周围，大吹他们的征服能力；在城市里的夜生活中，那些身体从不离二十岁妙龄的少女们。他们互相开玩笑宁静的涅槃境界，才能求得解脱。在美学上，他是反现实主，捧腹大笑，尽力在桌子周围昂首阔步地走着，引诱恭维伊芙琳，让她也参与他们的下流秘密。

伊芙琳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她知道纳特的所有朋友，四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多岁的男人，成功，富有，并且是成功的股票拥有者，律师，保险业人员，广告管理人员，他们都干这种勾当，他们都在骗他们的妻子，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是别的东西。对他们的卓越的性本领互相取笑，他们感到纳特的马丁尼酒及伊芙琳的葡萄酒和食物很慷慨，并让她参加他们之间的亲密会谈。伊芙琳听着，很少插话。如果故事非常有趣，她会大笑，如果非常下流，她会以笑掩盖她的窘迫。事实是他们的恭维对她确实起了作用。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明确看到他们完全相信她，他们知道她不会向他们的妻子们告密。他们最主要的恭维是：他们把她一个人当男孩子对待。

伊芙琳知道得十分清楚。她知道纳特所有的朋友都在鬼混。确实，实在荒唐，但她认为，这是无害的。只不过是伊芙琳从未想过纳特会这样做。她从未想象过在上东区一家四个女人住的公寓，一间肮脏的卧室内里的一张小窄床上，四个女人和他在一起，他张开嘴，湿润的嘴唇吻着某个年轻的姑娘的场面。她从未想过，他那由于出汗而湿热的浓密的胸毛压在别的女人乳房上。

所以纳特也在鬼混。伊芙琳已知道了，但她以最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不去想它。强迫自己把它藏在自己意识的最底层。当他在凌晨三点钟，带着空虚的表情回来时，她一次次地接受并且相信了他的荒唐的借口。她迫使自己不要问他，——她怕争吵嵌入说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用来反对反映论，怕他生气。她已接受了这一点。当女人老了时，她们的男人便不忠了。

但是纳特的存在已不再特别重要了，这与纳特的实际生活无关。那些小贱人，那些女雇员和女秘书们，都被伊芙琳拒之在她自己和她的婚姻周围所建造的城堡以外。

当伊芙琳蠕曲在床上时，《萨尔斯堡的线索》无声无息地掉在了地毯上；这次没有贱人，这次整夜的出走，不必用他们都假装认为是真实的那种谎言来解释。他们的堡垒是欺骗的大厦，而现在，一个电话就使它开始崩溃。

1945年是毁灭的一年。那年4月12日，弗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的哭，有的笑，亨利·S·杜鲁门，前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服饰经销商，就任美国第三十三届总统。不到一个月后，五月初，乘飞机视察了日本城市广岛，三个月后，八月六日，艾诺拉·盖伊号在日本城市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八月九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九月二日，日本在米苏尔号战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

战争终于结束了。

1945年同样也是个开始兴盛的一年。10月24日，在旧金山创立联合国，在盟国瓜分了德国，并在柏林建立了占领区之后，世界已放弃了战争，千方百计转向和平。杰克·帕尼和玛丽，弗尔·哈里斯，唐·威尔逊等一伙于星期日夜返回了国家广播公司。布匹定量已经结束，服装走俏，服装制造商兴奋地预测到，妇女们会自从战争开始到现在第一次炫耀她们的服装。亨利·福特二世，二十八岁，接任福特汽车公司经理，大战期间，福特公司远远落后于通用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又有两种新的东西介绍给了美国的家庭主妇：泡沫磨擦器和比尔斯伯里的馅饼和糕点混合的快餐糕饼。从南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出色运动员，杰克·罗宾逊，与布鲁克林道加组织的布朗奇·里基的一家主要俱乐部签订了合同，当时里基当面称呼罗宾逊为黑鬼，以试验罗宾逊对这一词汇的反应。电影童星秀琳·邓波儿已17岁，与空军军官24岁的约翰·艾格尔结了婚，婚礼在好莱坞的维尔赛尔·梅索迪斯特教堂举行，邀请了五百名宾客和几千名呼叫的影迷们。那年的电影是贝利·威尔德导演、雷·米兰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末》以及《哈弗》——关于一个男人的幻想和看不见的兔子的影片，获得了本年度的普利策戏剧奖。

甲45年，美国忘记了战争，到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在一次舞会上，伊芙琳·艾德华兹遇到了纳特·鲍姆。

这次特别舞会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一次联谊会，是在十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纽约布莱克里夫学院的礼堂举行的。伊芙琳·艾德华兹，十八岁，是该大学的学生。纳特·鲍姆，二十五岁，一个平民百姓，正寻找他理想中的姑娘：富有又显赫。

“我们会有许多漂亮的孩子的”这是纳特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这个精明漂亮的家伙闯入了伊芙琳的生活。埃尼·考夫曼哪去了？她有些不安。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圆滑的事情。她被人恭维，有些局促不安，虽然用四十年代的标准来看她，是位很有吸引力、身段优美、具有全美国标准长相的漂亮姑娘，但她并非天生如此。她的父母把姓艾普斯丁改为艾德华兹。他们把伊芙琳牙齿弄得平直，给鼻子整形，把头发弄直使它两边垂肩，后边向内卷梢，伊芙琳外表很美，穿着时髦的圆领口开得很低的红绿相间的短袖毛外套，以友肥大的裙子和金色羊皮芭蕾舞鞋。内心里，她还是俭朴的伊芙琳·艾普斯丁，腼腆又谦逊的姑娘，喜欢开心，怕伤感情，稍稍有点鹰勾的鼻子，一下雨头发就起卷。

“你在哪儿读书？”伊芙琳问，她知道这不是个合适的问题，并感到她自己有些窘迫。

“哥伦比亚。”他说，并把她拉紧，她能感到他的胸膛抵在她的胸上，这使她有些不自在。当他把脸靠在她脸上时，她更不自在了，她推开他，他的手搂着她的背部，把她的头调到他所需要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够脸贴脸地跳起舞来。

“你的专修科目是什么？”她真希望她没有开口，她不想在他面前表露自己的惶惑。

“嘘……”他说。她别无选择，只能听音乐。这是首《坚持到底》，是流行歌曲中最好的曲子。它那亲切、罗曼蒂克的旋律使伊芙琳愈发感到对这个甚至不知姓名、漂亮老成的男人更加亲近，这一切使她心神荡漾，他们拥抱在一起了。

“我们将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说，“两个孩子最好，你不这样认为吗？”

“噢，不。”伊芙琳说，她没有意识到她在说什么，她过于心慌意乱，竟不能把话停下来。“我要有个大家庭。”

“那好吧，”他说。“那么我们将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这样你就高兴了吧？我要使你高兴。”

还没等她说什么，她的心神还未平稳下来，埃尼回来了，尽管别人约了你的舞伴，而你又把人截回来是违反常规的。录音机播放着“如果我爱你”，伊芙琳和埃尼在跳舞，感谢上帝，

她庆幸自己没有与那个整洁的陌生人跳这支温柔又浪漫的曲子，同时她又希望她仍在他的怀抱里，脸贴着他的脸。她在猜他的年龄，至少二十四岁，并确信他是个退役军人。她想知道他是否到过外国，是否受过伤，是否得过勋章。他们把这些勋章称之为水果沙拉，她想象着他戴着水果沙拉、穿着军服的形象。她坚信她一定是个军官。他十分自信，对自己充满信心。

埃尼静静地跳着，以伊芙琳和他都能接受的距离拥在一起。他们在新泽西州东奥兰吉一起长大，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埃尼让她看过他的小鸡子，她也让他看过她的。后来这件事他们谁也未提起过，现在他们几乎把它忘了。考夫曼和艾德华兹两家人同意让在宾夕法尼亚学习法律的年轻的伊芙琳和埃尼结婚。因此他们给予了埃尼和伊芙琳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自由，两家都很保守，不赞成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以战争为借口，到处鬼混，以便匆匆结婚，两天的蜜月，七个月生孩子，上帝知道还有什么。

埃尼和伊芙琳随着《如果我爱你》曲子跳完了狐步舞。下一个曲子是《阿基森，托罗卡和圣诞老人》，象往常一样，埃尼领着伊芙琳向舞场边上的折叠椅走去。

“这些快步舞……”他耸耸肩，便离开去给他们两人拿饮料。

突然那个陌生人又出现了，并向伊芙琳伸出一只手，她摇摇头表示不会。

“我不会跳林迪舞。”她说。

“我会，并且我也是个合格的教师。”他抓着她的双手，把她拉了起来。

“真的。”她的脸又开始红了起来，在剧院安装的特殊灯光下，她的脸变得深红，灯熄了，又全打开了。“真的，我真太不好意思了。”她不安地摆弄着宽而低的领口，突然觉得怕把那狭窄的吊带露出来。

他把她的手移开。

“别担心，”他说。“露不出来。”

伊芙琳希望埃尼快点回来。和这样一个竟敢谈论她的内衣的富于挑逗的人在一起，使她比平时更加局促不安。

“来吧，”他说。“我来教你跳林迪。你不会让我们的孩子认为他们的父母是保守的。”并用两个食指做了个保守的姿势。

“噢，埃尼把饮料拿来了。”

“无意义的谎话。”这次他把伊芙琳推到舞场中心，并鼓励她慢慢地跟着他学，不要害怕。他的左臂放在她的腰部，侧面与他站在一起，他们的双手伸向前方，开始了林迪。突然他使她旋转，她笑着，对自己很自豪。她等不及地让他再作一次，有头晕的感觉，地板很热，穿着耀眼的芭蕾舞裙和平跟鞋的姑娘们的即兴的错综表演令人眼花缭乱。虽然伊芙琳从未想到与她们一比高低，但是她感到她已经是她们中的一员了。

男孩子们都穿着黑色的西装，系着领带，伊芙琳对她的舞伴感到有些羞愧，——后来得知他叫纳特·鲍姆——穿着爵士服。细褶皱的肥裤子，双排钮扣的西服大翻领露出紫红色的衬衣。以前，伊芙琳从未遇到过穿这样衣服的人。这又增加了点胆量，当演奏到下个曲子《你回家来是如此令人愉快》时，她感到更加激动，纳特把她抱得更近了。

伊芙琳希望舞会永远不要结束，当它结束时，埃尼过来接住了她，纳特·鲍姆不见了。那晚其余的时间里，伊芙琳透过埃尼的肩头，无结果地寻找着他，她一直让埃尼等到十二点半，直到工作人员对留下的几对年轻人清场时他们才离开。

后来，她苦苦地想，他也可能在停车场上与某一位与他一样彬彬有礼的、并不着急要走的姑娘消磨时间。他们甚至会进行法国式的亲吻，而这正是埃尼要做的，但伊芙琳认为这样的吻令人厌恶，并带有唾液和病菌。她告诉埃尼，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且他们可能处理不了。埃尼接受了她的借口，并给了她满意而纯真的、闭嘴的晚安的吻，伊芙琳开始认为法国式亲吻不会如此令人厌恶。既然她遇到了纳特·鲍姆，她在想象让他进行法国式的亲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她知道自己从未体验过。象这样浪漫、大胆的事她从未做过。

伊芙琳尽一切努力以使纳特·鲍姆给她打电话。用水手的红墨水在她的笔记本上胡乱地写着他的名字。有一次，她在她钱包内的通讯录本里面写下了“伊芙琳·鲍姆”的字样，看一看写下来以后会如何。这是她愿望的该死的证据，用她自己的生活保守秘密。当她确信只有她自己时，她才看着那个通讯录。这是她留给自己私下时刻的特殊的，而又可望不可及的享受。

一天在英语文学课中，老师正讲着《麦克白》中的三个巫婆和《李尔王》中的三个姐妹之间的象征对比，伊芙琳在《莎士比亚选集》第一页上用正楷写下了纳特·鲍姆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下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勾掉了所有的元音，当她数元音时，她又发现他们的名字中有七个元音字母。七个！也就是说命中注定：她和纳特·鲍姆要相爱。然后她又查了剩下的辅音。有13个。13意味着不祥，她再也不见他了。

伊芙琳的情绪就象数字所变幻出的精灵一样疯狂地跳跃不已。

一些夜里，伊芙琳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纳特打电话，女管家找她时她会在那里。一些夜晚，伊芙琳故意呆在别的女孩子的房间里打桥牌，但并没忘记在她的门上留个条，条上说明她在哪里。如果他打来电话，就会告诉他，她出去了，也许他想知道与谁在一起，并且嫉妒起来。

电话留言明贴在一楼伊芙琳宿舍外女舍管理人房外的公告板上，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告板已成了折磨她的刑具。每当有她信息时，她的心便激烈跳动，但消息总是她母亲的或者埃尼的，而伊芙琳，心脏仍然在狂跳，吃力地爬上二层梯，沮丧又失望。她开始与命运定公约：如果她有足够的自制力，到下午六点仍来看公告板，命运将奖励她一个消息，鲍姆先生来电话了。

什么也未发生。命运忽略了她的请求，她对命运威胁和讨价还价，尽管伊芙琳试图强迫自己忘掉纳特·鲍姆，她固执的情感却不能服从她的意愿。她不能理解只见一晚上的人，对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她想知道自己。她感到这是神经质的预兆，虽蠢她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是神经病。不论伊芙琳如何责备自己的行动，应象个商校的学生，但是关于他那鲜明的衣着，匀称的身段，他的脸挨着她的脸的感觉，这些想法一直很自然地闪现在她的脑海里。他没有打过电话，虽然伊芙琳知道到哪儿可以找到他，但她从没想过主动找他。到了感恩节，纳特·鲍姆就象个电影明星一样遥远而又可及。

感恩节是最典型的美国人的假日，也是艾德华兹一家的传统。犹太人的西蒙·艾德华兹在三十年代初，就把他的姓由艾普斯丁改为艾德华兹。当时，父亲柯林反对基姆族人的激烈言词正好附和了希特勒著的《我的奋斗》中的主张。虽然西蒙从未加入过犹太教，虽然他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是对放弃了他父辈传下来的姓仍感到内疚。他权衡一下他的内疚，发现他使他的家庭避免了犹太人即使在美国所面临有意的和反复无常的虐待：禁止他们住某种旅馆，不准加入某些俱乐部；在私下，甚至在公共场合受到嘲弄。为弥补空虚，西蒙放弃了继承遗产，把信仰转向了美国，美国对他的转变给了奖励。

西蒙经营的买卖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进口猪鬃，用以制做牙刷、发刷及工业和医药上用的毛刷。艾德华兹（曾叫艾普斯丁）的优质鬃毛店在萧条中生存下来，并随着对产品需要量的增大以配备给装备精良的部队，甚至被送往前线，在危险的战争中成长壮大。沃尔塔·考夫曼曾给他提过忠告和建议，现在艾德华兹和考夫曼都繁荣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正期待着共享和平。

1945年的感恩节是个特殊的节日，有一二个原因。第一，战争结束了，被安置在夏威夷而从未见过真正战争的伊芙琳的大哥彼得平安地返回家。他开始每天与父亲一起去纽约的办公室，以了解业务，就象西蒙从前和他父亲学习一样。第二，而且很重要的原因是考夫曼和艾德华兹正等待着宣布伊芙琳和埃尼订婚。

埃尼将在1946年6月从法律学校毕业，并去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他和伊芙琳结婚，会加强老一代人所创建的亲密关系，而且随着埃尼和伊芙琳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将完成这一循环。

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感恩节。所有的人，但伊芙琳除外，她知道对她期待的是什么，但她却不知道怎样说“不”。她不能使她的父母失望，也不想让沃尔塔叔叔和比埃尔婶婶生气，她从孩子时起就爱他们。她不敢蔑视他们，并且对自己的叛逆行为感到恐惧——同时，她又不想与埃尼结婚。十九岁了，她不想让她的生活按照预先计划好地那样进行。由于不知道如何来表白自己，并对她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表现的荒谬的深厚的感情感到恐惧，所以那个周末，伊芙琳比平时更加文静和谦卑。

星期四两点三十分，埃尼和他的父母到了，在起居室喝了雪利酒后，他们坐下来吃了一顿巨餐，有火鸡，草莓果冻，甜薯，青豆，热的甜面包和肉汤，火鸡形状的冰激凌和甜点。主餐由一位有色女佣人备置的，她来自纽沃克，在这一天帮助伊芙琳的母亲做饭，备置主餐和洗碗等。

谈话涉及到商业和政治，废话和琐事。西蒙和沃尔塔谈论了目前用越来越多的尼龙鬃毛做低档刷子对西蒙的冲击。他们认为人造品一定会影响到西蒙进口的低档产品，但也一致同意质量好的产品总是有市场的：如野猪和牛，骆驼和驼马等稀有的鬃毛等。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消费水平比从前也将上升到更高的水准。他们又谈到了杜鲁门的新政，及公平政策；战后的通货膨胀；黑市的增长，从麦子到汽车等等。

大家对彼得西服上衣衣领处磨破的鸭子图案很感兴趣，而当沃尔塔叔叔把胳膊放到她肩上，亲切地搂着她，并要求她在大家的面前宣布她和埃尼订亲之日时，伊芙琳正在回想着纳特·鲍姆是否也穿着这样一件衣服。

“现在是你们年轻人公开此事的时候了。”他说。沃尔塔·考夫曼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高高的，瘦瘦的，因为他那刷子式的红胡子让人发痒，伊芙琳总是避开他的亲吻。“我希望在左手第三个手指上看到宝石。”

伊芙琳脸红了。作为大家关注的中心，她非常不安。大家都看着她——她母亲，彼得，比埃尔婶婶；埃尼及沃尔塔叔叔——都等待着她说点什么。人生中她最了解他们了，但还是脸红并结巴起来，后来她父亲出来帮了她的忙。

“是呀，先生，”他说。“我们得在这个家庭里雇个律师，以节省沃尔塔的花销，行吧。”

大家都笑了，这次是埃尼的脸红了。最后还是伊芙琳的母亲范尼出来解了围。

“不要理他们，我想一个姑娘的建议，是她想在私下里说的事情。”

“和往常一样，你是对的。”她丈夫说。西蒙朝伊芙琳微笑着，使她摆脱他给造成的窘迫。他忘记了他那平静又腼腆的女儿多么敏感，她的感情多么深厚。她是如此地心慌意乱，很容易忘记所有的感觉。但是西蒙知道她没有忘记她的感觉，而且很珍爱他女儿对终身大事的令人喜欢的敏感性。

西蒙走到餐柜旁，拿出一盒他省下来，只有特殊场合用的古巴雪前，并把烟盒递给彼得和埃尼，要对他们二人平等相待，一个是刚刚从空军退役回来的儿子，一个是未来的女婿。

他们把烟点燃后，西蒙看着为客人所重新准备的光洁的餐桌，对自己的创立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他父亲为德国人所作的最坏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上百万的犹太人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死去。现在报纸上开始刊登如达豪和贝格贝尔森这些地方的可怕的照片，挂在铁丝网上的饿死的骷髅，毒气炉和堆集如山的衣服。甚至一个叫H·V·卡但伯恩的德国人自己也承认“纯化种族”而制造的令人恐怖的暴行。一夜又一夜，收听国家广播公司关于卡但伯恩的广播，使他回忆起自己所受过的伤害和攻击。

西蒙认识到，如果他父亲不是在本世纪初，离开布莱梅的话，现在他们谁也不可能坐在这充满阳光的餐厅里，锦缎的帷帘，半透明的瓷器，宴会后进行的清扫，厨房的有色女佣人。西蒙是个没有自己特殊政治主张的人，他不信任对任何一个党派过于热心的人，为了只求保险起见，他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事业同样看待。这是他保护自己的好办法，从而使他的家庭即不偏右也不偏左。

恐怖已经过去，西蒙·艾德华兹正盼望着将来。他期待着逐渐把商务交给彼得，期待着看到伊芙琳幸福地嫁给一个好丈夫，并且由于一些活泼的胖孩子使她忙碌不休。西蒙对自己成为父亲非常高兴，更高兴当祖父。他把客人们领回起居室喝咖啡。

“我们出去开车兜兜风吧。”埃尼对伊芙琳说。

他借了父亲的凯迪拉克牌轿车，带伊芙琳到他们常常去的那个地方。她们象往常一样，把车停在有树林的山坡土路上，俯视着西桔公立中学的足球场地。体育场内无人，今年传统的感恩节对东桔队的比赛在外地进行。正如伊芙琳所知他要做什么那样，埃尼搂着她吻她。

“你认为爸爸说的对不？确定个日期？”

伊芙琳没说话，埃尼对现实的建议很关心，他茫然地继续说：“我们在圣诞节订婚，在我毕业后一月份结婚。爸爸准备以让我们去哈瓦那度蜜月，做为我们结婚的礼物。”他说，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伊芙琳仍未说话，埃尼认为她太激动了。他自己也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他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衣服上，以为她默默地接受了。当她突然甩开他的拥抱，两臂随着挡泥板而晃动，低下头呜咽起来时，他有些张惶失措。

他无法了解，她正思念着一个轻浮的年轻人曾谈论过她的内衣布带并说他们将有漂亮的孩子。

感恩节周末的星期日下午，伊芙琳从格兰德·森特拉乘一点五十分火车去布莱克里夫。车内乘客寥寥无几，伊芙琳自己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乘务员帮助她把小箱于放在头上的行李架上，她向前来送行的父母挥手告别。她的父母开车把她送到纽约，步行到火车站，去韦斯彻斯特的火车从这里发出。

伊芙琳透过脏玻璃凝视着窗外，她的感觉如同第25大街上的建筑物一样灰白而又冷漠。她爱她的父母，用沉默隐瞒他们。她知道他们是如何盼望着她的订婚、结婚、哈瓦那之行及不久就会随之而来的孩子。她不愿意告诉他们她不喜欢埃尼，相反她却什么也没说，而他们认为她的沉默，就是她已接受了他们热心为她准备好了的计划。她对那些爱她的人们的信任，则报之以逃避和不诚实。伊芙琳对欺骗还没有经验，她感到羞耻。她恨自己的优柔寡断和胆小如鼠。

当火车终于减速，驶进布莱克里夫车站后，伊芙琳坐进了学校的黑色大轿车。布莱克里夫

对它的学生们照顾得非常周到——他们都是来自富有家庭的姑娘，习惯于保护和奢侈。这辆大轿车在每周末的星期五，她们离开校园时送她们到车站，并很诚实地在星期日接她们回去。

大轿车在管理部门门前停下，伊芙琳下了车，在桌上签了到，便出了后门，走上了通往她宿舍的小道。她把箱子从右手换到左手，开始考虑着埃尼。整个周末她都使他很痛苦，在蒂法尼买戒指时，对他的提问她未给予确切的答复。对她来说，她并不是有意的执拗，一是她没有勇气告诉她不想与他结婚，另一方面，又害怕再也无人向她求婚。伊芙琳知道她梦想着纳特·鲍姆。只是梦想。

伊芙琳认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自我。她并不是那种要使男人发疯的姑娘。她的记事日历上并未预先填上几周的约会日期。她曾去过一次，也是仅仅的一次足球周末，是同宿舍的一位朋友安排的灾难性的盲目的约会。伊芙琳不穿薄纱和塔夫绸的衣服，不参加舞会和电话约会，不参加宴会和诗会。她不去斯特克俱乐部跳舞，不在陆海军的娱乐场从长颈瓶到苏格兰牌酒喝得酩酊大醉，她并不是那种姑娘，她们把订婚和毁婚，看成她们穿的肥大的衣服一样经常更换，把归还宝石戒指，同时又接受新戒指作为她们善于操纵的有趣的游戏。

尽管鼻子和牙齿都经过了整形手术，平直的头发，有从比斯特和阿特曼买来的最时髦的套装，然而伊芙琳仍是个朴素的姑娘，因为她觉得她要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就应该象一个人那样行事。男人们会很快捕捉到这种气息，他们便丢下她然后去寻找别的美女，即找那些知道如何调情，在轿车的后座上能干些什么的姑娘们，那些在五岁时就知道如何与男人相处，并且已经学会如何让爸爸在三顿饭之间为自己买到被禁止的草莓果或一大瓶粉红色浴膏的姑娘。

现实并未使伊芙琳消沉，她并不怕承认或接受现实。只是在遇到了纳特·鲍姆后，她一生中第一次出现了梦想，是人所渴求的事情。她知道这是多么愚蠢，多么不现实，然而对于一个梦寐以求的姑娘，要她从已深陷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是多么难呀，并且这是一件需要足够理智的事。

当她穿过校园时，对它的景色毫未注意。即使是十二月的太阳有些灰暗，校园还是相当漂亮。石头的建筑物上爬满了常春藤，在精心照看的主要草坪的中心竖起一个风景如画的阳台。春天，姑娘们拿着书，坐在阳台周围读书，享受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和刚剪完草坪的新鲜气味。当她从岔路口向右转走向她的宿舍时，她决定那天晚上给埃尼打电话，她将确定日期，与他在蒂法尼店相见，他们将选买一个戒指。她该停止幻想而应回到现实中来。她开始在脑海中想她要说的话，她要让人听起来她很热情，文静，她要做这件正确的事，而且马上就做。

到了宿舍门前，伊芙琳放下手提箱，这两扇橡树门很重，她总是得用双手才能打开，当她用力搬沉重的铁门栓时，有人握她的胳膊，伊芙琳吃惊地转过身来。

“我想在我们有了自己孩子之前，应先互相认识一下。”

纳特·鲍姆站在那里，把沉重的铁门为她打开，他示意让她过去。好象他已做过上千次了，他提起她的手提箱，带了进来，放在女宿舍管理人的门前。“我一直站在这里等你，都冻僵了。”他说，伊芙琳看到他的布上衣，突然对自己穿着的水獭皮暖上衣感到不好意思，这件衣服是她父亲作为她高中毕业礼物送给她的。“她——”纳特示意女舍管理人的门，“——不会让我进去的，她说没有约会任何男人都不准进去，我可以是你的约会人吗？”

伊芙琳点点头。她太害羞了，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简直不敢想象，这件事正在发生。

“你愿意和我吃晚饭吗？”纳特·鲍姆问道，相当郑重。

“谢谢”伊芙琳说，“我愿意。”她停了一小会，然后，她又问道：“我可以把东西先拿到楼上去吗？”

“当然。”

她需要时间来思考，当她走上楼梯时，纳特·鲍姆喊道：

“带一条围巾来。”

一条围巾？她于嘛需要一条围巾呢？

纳特·鲍姆的汽车是一辆柿红色的、带有折叠篷的新哈德森牌汽车。伊芙琳感到奇怪，他是怎样弄到手的，汽车经销商那里等着买车的名单多得无数。她父亲去年三月就预定了这种新牌机动车，而现在他还在等着交货。汽车制造业还未全部投入生产，谁开一辆新牌车，谁就是一位有势力的人。

“来，我们把篷放下来。”纳特说。

“可这几乎是十二月份了。”伊芙琳说。她还从未听说过，大冬天开车可以把篷落下来。

“那有什么关系，太阳还在外边，而且我们又在一起。”

没等伊芙琳回答，纳特·鲍姆就把帆布篷顶口打开了。放下后面的卡子，把帆布折起放在后座。

伊芙琳现在有时间考虑了，真是绝妙的主意，富有刺激性想象力。当纳特把车挂上一档时，伊芙琳围上了围巾，这就是围巾的用途。

他们驶向怀特·普赖斯，到了这个镇子的平民居住区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里边很暗，蜡烛插在意大利红葡萄酒的空瓶上，红色桌布，地板上有锯屑。自动点唱机放着陌生的意大利抒情歌曲，一位身穿旧而平整的红色上衣的侍者，走了过来。

“您想要点什么？”

伊芙琳有些犹豫不决，她以前从未去过没有菜谱的餐馆。

“通心粉，”她终于说，想不出任何别的意大利菜名，她相信他们会有通心粉的。

“你真的想要通心粉吗？”纳特问。

“这是我能想起的唯一的菜。”伊芙琳承认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来给咱俩点呢？”

“我倒很想这样，”

他转向侍者，点了开胃的食品，龙虾，有油和大蒜的腌鳕鱼，一瓶红葡萄酒。这些菜大多数伊芙琳都不熟悉，她每样都尝尝，她发现每样都很好吃。

“战争期间你在哪？”她问。

“地狱，不，”纳特·鲍姆说。“那是为容易受骗的人设的。我给黑人军队演奏爵士音乐，我有一个办公室，一个秘书。我可不想把头让人吹掉。”

伊芙琳对他的这种亵渎神圣的比喻感到震惊。她对他只存有在瓜达尔群岛的沙滩上顶风冒雨的形象，或是占领安基奥堡垒的形象，或是在埃·阿拉门呼吸沙漠灰尘的形象。她从未想过他会坐在办公室，摆弄纸张。

“开枪不是赢得战争的唯一办法。”纳特说，对她脸上的表情做出反应。“而我认为那是谋杀，谋杀是不道德的。”

“我从未那样想过。”伊芙琳说。她确实没有。她对战争的态度是由电影和盟军形成的。事实是她从未想到过真正的活人在流血，死亡，受伤。战争对伊芙琳来说是技术彩色的夸张。不是谋杀。纳特·鲍姆示意开餐。“但我想你是对的，我想杀人是谋杀。”

“你知道，”纳特说，离开关于谋杀的哲理讨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黑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们当然为战争付出了许多。”伊芙琳曾在征募有色人入伍时，读到过黑人军队所取得的胜利。起初，许多人认为黑人不会成为很好的战士，他们懒，不守纪律，但这种认识结果错了。事实证明他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尽管在战争初期，认为他们勇猛，甚至有些冒险。

“我演奏爵士乐，有比德·帕克，迪基·佳尔斯庇，班克·约翰逊，甚至路易·阿姆斯特朗。”纳特轻易他说出一连串的名字，而伊芙琳从未听说过。“这是让黑人军人知道军队很赞赏他们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士气高极了。我们在伦敦、巴黎演出——法国人对美国爵士乐简直发狂了——那不勒斯，关岛，中途岛，阿留申群岛……”

伊芙琳起初对纳特当兵没上过战场，没放过枪感到失望，现在却使她敬慕发呆。她从未想过军队的士气的事，除非她一周给纳特写一封——邮件转交军邮地址。

“你经常听爵士乐吗？”纳特问。他感觉到伊芙琳已被打动，便更加和蔼而不致于使她感到低下。

“不，”伊芙琳说。“我从未听过。”他的温和和红酒悄悄鼓励了她的冒险欲。

“我们下次见面对此可以作些体验。”他说。

他那从容的他们将再次见面的保证，使伊芙琳的心狂跳不止，她可以感到胸腔内心脏的跳动。她有些害怕他看到，但他继续谈下去，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你知道，爵士乐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原始无意识的表现。”他继续追溯着。美国的爵士乐源于非洲，它随着拥挤昏热的贩毒船来到美洲大陆，南部棉田里干活的黑人打发日子所哼的古老的曲子，一直到新奥尔良爵士乐的诞生，那都是在贫民区的下等酒馆、妓院里演奏的曲子。纳特·鲍姆说，后来，爵士乐被认为是一种下流音乐，不过是妓院的低劣产品。它溯密西西比河上传到芝加哥，最终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音乐家们的尊重和承认，才成为一种真正的美国艺术形式。

纳特解释了音乐对心灵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非文学历史的重要意义。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话阐述创造力，引用荣格的话解释集体无意识；他批评斯宾格勒有关有色人种的堕落以及他们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观点。并提到在维利德的晚会上同但盖和亨利·米勒的会面。

伊芙琳倾听着，几乎听不懂他讲的事情。他们喝光了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纳特又要了一瓶。他使用的词汇都是伊芙琳从没读到过的，所提到的人名她也从没听到过，他使她认识了一

个她前所未闻、激动人心的、充满活力的世界。她不知道如何回报他。

到晚饭结束那，她与他分喝了那两瓶葡萄酒。坐着敞开了篷的轿车回到布莱克里夫，夜空中的星星闪着微光，冷风抽打着她的面庞。她恋爱了。

纳特在大铁门前停住车让她下来。

她没有问什么时候再见面，第一次接了吻。

在以后的三周里，纳特驱车到布莱克里夫去了六次。他正在出席哥伦比亚陆军会议，与另外五名退役军人在莫宁塞德街同住一套四间房的公寓。虽然纳特正式注册学习学分制的经济学课程，但不久就发现经济学的教材是凯恩斯编著的，由金本位制的现代会计程序和不规则变化分析构成，他天真地以为它能教人如何赚钱。于是，他立即终止了课程，去旁听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他告诉伊芙琳，只要山姆大叔继续付他的学费，他就学下去，他喜欢刺激直到厌倦。他承认，一旦离开学校，他还没想好如何挣钱糊口。他有两个雄心，一是成为二十世纪有广泛兴趣和相当学识的现代人；一是成为富翁。同时发誓决不从事每天九点至五点的刻板乏味的工作，那样他就会觉得自己象鸟一样被击中、被束缚住。

他带伊芙琳去剧院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音乐，去了西52街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听约莫尼乐队演奏，又去了唐人街地下室的会客厅，然后到桑给巴尔黑人夜总会跳舞。他借给她一本《陌生的果实》一书。让她把长长的卷发梳成马尾松式。拿他一件大而旧的毛衣给她穿上，配上紧身短裙、短袜、便鞋。给了她一盆“忧郁的蓝色”磁带，说这是珍品，并取笑她对《低沉的钟》的喜爱。

他告诉她，他决意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她，纳特第六次带她出去时告诉她，他已经终止同其他女孩子的来往了。

“我已跟她们分手了。”

“哦，”伊芙琳说。自从第一次同纳特在怀特·普赖斯吃晚餐时起，她就拒绝见埃尼，她爱着纳特，不愿去想埃尼，他的法律学位和他以前那些接吻。她快乐的、理所当然的认为纳特象她爱他一样深深爱着她。

“哦，”尽量隐藏起背叛者的强烈感觉。纳特以为她的“哦”是漠不关心。

“我不想再到处逛了。”他说，“你看呢？”

伊芙琳第一次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丝无把握的语气。还从未见过他缺乏自信，他希望得到他的鼓励，碰碰运气，伊芙琳点点头，不明白他俩之间的权力平衡为什么会突然变化。

“我愿意只跟一个固定异性约会。”他们坐在哈德森牌轿车上，车停在校园铁门对面的空地上。纳特不安地划着一根“幸运”火柴。伊芙琳能听到他的呼吸。“你愿意只跟一个异性约会吗？”

伊芙琳对权力还不习惯，不习惯别人请她帮助或征求她的意见，这种感觉使她害怕，她宁愿让别人拿主意。她坐在前排，想着如何表示同意，这费了她许长时间。

“你不愿意也不要紧。”纳特说。

他含有委曲的语气伤害了伊芙琳。

“我愿意，我爱你。”她抑制不住了，脱口而出。她明白，

象别人一样，男人应该第一个说“我爱你”，然后才轮到姑娘说，这是伊芙琳一生中少有的几次破例之一。

“你将只同我约会吗？”他十分正式地问。

“是的。”伊芙琳回答，抬起嘴唇吻他以示保证。她感到这是神圣的时刻。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度周末了。”纳特说，“我可以在纽·霍普的朋友那借个地方。”

他匍伏在她权限下那短暂的一刻不复存在了。他轻轻地吻她的鼻子，漫不经心的自信丝毫未减地恢复了原态；变幻不定的二十五岁男孩子的那种担心遭到拒绝，怕承认自己情感的心境统统消失殆尽了。既然他恢复了原态，伊芙琳希望他那样多保持一段时间就好了，她非常爱她。

“怎么样？”他问，“你将在纽·霍普过夜。”

他想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在性爱角斗中他所赢得的迅速抚摸已很难使他镇定下来了，倘若她需要他，她就得屈从，伊芙琳对这一时刻是又怕又想。假如她同意了，被父母发觉了，她就再也没脸见他们了；另一方面，如果拒绝纳特，她相信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根本没时间考虑。

“我问问艾弥，看看她是否愿意告诉我父母，我将和她一起度周末。”伊芙琳肯定她会答应。艾弥和她同住一个宿舍，当她的未婚夫，一位那鲁大学三年级学生，在夜晚打来电话时，而艾弥同布莱克里夫的小型巴士司机夜出未归时，伊芙琳就常常向他撒谎。那位司机是那种大学城居民中，颇能引得约翰·强菲尔德的女孩子们想入非非的外表冷峻的英俊小生。

“你和艾弥定一下，我星期五四点左右接你。”

快十点了，该是伊芙琳回宿舍的时候了，纳特陪她走到门口，当着守夜人的面，张大嘴吻她。守夜人不知见过几千次类似的事了，他希望他们快一点，他好锁上门，然后偷偷溜掉。

“星期五，”纳特说。守夜人第二次大声咳嗽。“就在我们出发的地方接你。”

他们明白他的意思。

守夜人也不例外。

伊芙琳对性爱是一无所知。

1939年她十三岁开始来月经时，妈妈给了她一本薄薄的叫“机密手册”的蓝本书，告诉她里面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没解释什么，书上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统图，图画得很规整、精巧，并加以谨慎的说明。

伊芙琳对自己的身体也一无所知。

伊芙琳快上大学时，才获得一些生活知识。一次体操课上，一位女生问她什么是强奸，当时十五岁的她，还从未听说过这个词，那女孩告诉她，强奸就是男孩子强迫女孩子；当伊芙琳请她详细解释一下，女孩子十分生气地走开了。剩下她独自一人在那迷惑不解。后来她从教室溜到图书馆，确信没人注意她翻的字典的页数后，找到强奸一词。词义是：强行发生性关系。

性爱，根据老于世故的人们说，是男孩子们喜欢、女孩子们不愿意的事情。性爱是肮脏的。一个女孩子要为她的丈夫保持贞节。女孩子要时常警惕着，别让男孩子抓住拖进空地或者盥洗室之类的地方。根据同样的说法，如果男孩子对你干了那事，很可能导致你出血而死。

伊芙琳还知道，性爱会产生婴儿。精子和卵子结合产生了婴儿。尽管她花了大量时间琢磨它，却从没能弄明白它们是怎么结合的，因为它是肮脏的，没有女人会让男人对自己干这事的。

伊芙琳的胸部很小，她为此而庆幸不已。她为同班叫肯达尔的女孩难过，因为男生们总取笑她那对过大乳房，最后她不得不哭着求她父母让她转学。可她还知道，拉娜·特纳是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是人们羡慕、崇拜的偶像，而肯达尔的乳房和拉娜的一样大，却是被嘲弄的目标，这使她不得不穿蓬松的羊毛夹克衫加以掩盖，就连夏天也不脱掉。

伊芙琳进布莱克里夫大学时，知道了有关性的更多的事情，并且懂得了女孩子们也喜欢它。在那鲁大学，常举行兄弟联谊社晚会和类似冬季狂欢节的盛大周末晚会，她想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但一方面她羞于启齿，另一方面又没有什么名气，因此没被邀请参加。而在宿舍，有关性爱的谈话又那么遮遮掩掩，半句话不到就会引出一番歇斯底里的格格大笑。

埃尼从不提及性这个话题。一次，伊芙琳问他，他说他非常尊重她，是一种敬意。当时伊芙琳接受了，但仍没弄明白她想知道的事情。

到了1945年，伊芙琳十九岁，对自己的身体，情感及疑问仍没找到满意的答案。她接受的性教育是典型的教育，她的无知、迷茫和痛苦都具有代表性。在四十年代，没人谈论性问题，妇女之间不谈论，男人们是妇女的敌对者，除非他们象埃尼那样敬重你。

纳特从没提起过尊重。他碰伊芙琳的胸部，遭到阻止时，也不听她的。一次，他曾试图抚摸她的大腿，她迅速并拢腿，不让他碰，直到迫使他答应不那么干了。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胜利。

她事后思索了一下，想着真正赢得了什么。到了星期五四点钟，她准备好了同样的理由，但这次，准备要输的。

纽·霍普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巴克斯，是座风景如画的小镇。是成功的及失意的艺术家们的圣地；也是一些发表过及没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富有的离异者、同性恋及职业游荡之人的聚集地。纳特和伊芙琳九点三十分到的，在普林斯顿希腊餐馆就晚餐。饭店是另一个外国风味的场所，纳特似乎有用不尽的钱。伊芙琳跟着他走进又小又热的厨房，两个戴着高高的白帽子的厨师掀开各式各样的大锅盖，让他们看里面做的菜。他们要了热气腾腾的羊肉咖喱，香气喷喷的羊肉韭菜，拌上大蒜番茄酱和厚厚的橄榄油，还有沙拉配黑橄榄和希腊奶酪，一条条又厚又硬的面包和一瓶葡萄酒。伊芙琳开始时喝不惯这种酒，但渐渐就适应了。接着是她不曾喝过的一小杯未加牛奶的苦咖啡，就象熔化的岩浆。

“份饭能减少脂肪，”纳特说。他俩走向红色哈德森车。

“我知道这一定有原因的。”伊芙琳说。他笑了。

自从遇见纳特，伊芙琳惊奇地发现自己变得幽默了，能逗他发笑，每次就象是匆匆上了木马的金色转轮一般。

在纽·霍普，纳特把车停在一栋小楼前，楼顶是由被风雨剥蚀而变灰的木板铺成，顶部耸起，楼前有一座小院，一条铺着卵石的小径直通向前门，门被漆成黑葡萄酒色。

“我们从后面进去，”纳特说。伊芙琳跟着他绕到楼的侧门，他拿出钥匙打开门，伸手进去开灯。

“怎么阴森森的？”伊芙琳走了进去说。粉过的白墙没有刷漆。纳特的朋友正在亚利桑纳过冬。普通的木板铺的地板，上面溅满了油漆，有一张旧门改制的桌子，由锯木架支撑着。一把折叠金属椅，一个空的黑板架，一个砖砌的在大壁炉占据了整个后墙。

“我希望你看看阿里克斯的作品。”他说，“他是位表现主义者，非常有天对。在亚利桑纳有类似的建筑，楼下是走廊，楼上是卧室。来，点上灯，上楼看看。”

伊芙琳有点害怕，紧张，怕纳特，怕自己，怕性爱。不知道将会怎样，又想逃离，又想赶快克服它。在楼后雨布下面拿木头时，有一堆《纽约时代周报》掉下的发黄的散页，她不再紧张了，点燃报纸，火光把白墙映成桔粉色，空荡、阴凉的屋子一下变得那么温暖、浪漫。

“咱们上楼。”纳特说，牵起她的手。她跟着，想看看画家的生活。楼梯没有传统的扶手，却有扭在一起的粗绳子——用于把船固定在船坞的绳子，连在每隔四阶插着的木柱上。楼上卧室实际上是个平台，能看到下面的走廊，直对着大壁炉。厨房里有轻便电炉，半个冰箱，鞋盒大小的水槽，还有洗澡盆。伊芙琳还是头一次光临浴盆设在厨房的公寓。认为非常有外国味儿。

一张大双人床上铺了一床粗花床单，纳特说那是墨西哥人的床毯。屋里有桔色板条做的书架，松木做的带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一个木座上有一把铜壶。伊芙琳眼总盯床，既怕又想。

“过来，看着火，我给你算命，”纳特坐在床边，伊芙琳靠在他旁边，没挨着他。

“你会看火算命？”

“颜色能显出你真正的个性，”他说，伸出胳膊搭在她肩上，轻轻一拉，她正好靠到他身上，以前，他们多次以这种姿式坐着，这种坐姿使伊芙琳感到安慰，克服了恐惧感。

“你看，”他用另一只手指着火。“底部呈蓝色，然后是橙色；上面是黄色。”

“我从没注意到。”伊芙琳说，“代表什么？”

“把头靠在我肩上，我就告诉你。”

她靠过来。

“好吧，”他说，“蓝色代表忠诚；橙色代表爱；黄色代表太阳。太阳表示明天，未来。”

“太浪漫了。”伊芙琳说。

“火说的是事实。”他开始轻轻地吻她，然后带着激情，伴映着火光，直到烈火在他们胸中燃烧起来。

他待她是那么温柔，亲切，体贴。

“你愿意吗？”他问，开始了第一步。

“愿意。”她低声回答。

“肯定吗？我要你肯定。”

她点点头。

“这也行吗？”他问，实行了第二步。

“行。”她回答。

“我不会伤害你。”他的嘴紧贴着她的耳朵，根本不用说：她就能感觉到他的话，没必要听见。

“是的，不会伤害我的。”

“我使你高兴吗？”

“高兴。”

她没注意他的技巧，早已心醉神迷了。

“进一步呢？”他问。

“可以。”

“现在……”他说。

“不！”她突然警觉、害怕起来。

“为什么不？”他轻轻地。

“不，我害怕。”

“怕什么？”又一次轻轻地。

“怕告诉你。”

“别怕。”

“我怕怀孕。”

“为什么？”

她害怕告诉他。

“没事的。”他说。

“怎么没事？”

“我们会结婚的，那有什么两样。”

“哦，我不知道。”她说。

“我们要结婚的，对吧？”

她点点头。他仍旧抚摸她。她神情恍惚，忘掉了一切。为什么从没有人告诉过她，或者暗示一下？为什么直等到碰到纳特才知道这一切、假如她不认识纳特呢？或许她就会永远不知道了，也许一生都不会知道的。

他们一整夜互相拥抱着。第二早上，纳特教她用茶壶煮茶，吃着前一天晚上从饭店偷偷拿出来的面包。

“谢谢你。”吃饭时，伊芙琳说。

“谢什么？”

“你把自己给了我。”她说。

他们星期天一天都躺在床上作爱，然后迎着十二月的寒风散步，买些奶酪、水果，加上随身带来的葡萄酒，在床上野餐起来。没有时间适当的饭店里吃顿悠闲的饭。

清晨，终于得离开了，他们驱车回布莱克里夫。伊芙琳紧靠着纳特坐着，但却相当安静，沉思着。她不明白他看中了她什么，她不漂亮，是个乡下人，又缺乏经验；他英俊，通晓一切，知识渊博，到底看上她什么？

而纳特也不能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碰见伊芙琳。女孩子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大腿上，穿着昂贵的海狸皮大衣，这是刚接受的礼物。她可爱，温顺，她的生命里有他一直想得到的那种品质。她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还在梦想得到；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一个他祈望进入的、生命中最重要世界。

在布莱克里夫的校阿前吻别时，伊芙琳终于说出了她的想法。

“我不明白你看中了我什么？”她说。

“看中了你的世界。”他说。这是的的确确的实话，而她还无法理解。

纳特的生活经历使伊芙琳感动得流了泪。

他生于曼哈顿东区依赛克斯街的一幢多家合居住宅。他有两个兄弟，比他大两岁的戴维和小两岁的埃迪住一间屋和一张凹凸不平的床。既当卧室又当厨房。屋内有一个透气孔，墙上黄色的假漆在夏天粘乎乎的，冬天则湿漉漉的。

纳特的父亲，是一位从基辅移民来的俄国犹太人，酷爱下棋，极厌恶工作，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后来，勉强去了一家制包厂，一天十二小时缝制女用钱包。纳特的母亲，整天听着老头子的哀怨，做饭，洗衣，缝衣服。在纳特七岁时就死于肺结核。

在戴维十二岁生日那天，他父亲宣布自己辞职了，因为十二岁的男孩就可以拿到工作许可证。父亲声称自己已当了过长时间的奴隶来供养孩子，现在该轮到孩子们养活他了。戴维在药店找到了一份活计，打扫店铺，送药，配药等。尽管他没有许可证，也没经过任何训练。

轮到纳特了，也是刚满十二岁就干活了。放学后或者周末给人送货，提言人袋子和箱子来回上下五、六段楼梯。当慷慨的家庭主妇给他一美分小费时就十分高兴了。十三岁时纳特到华尔街一个团体俱乐部餐厅打杂，从铺着亚麻市的桌上收拾脏盘子、空威士忌酒杯，那些抽大雪茄烟、出口凡百万的人只给他五分镍币的小费。十四岁时，到华阿马克尔饭店工作，跟着两位粗壮的爱尔兰领班在接收处干活。顶着七月的酷暑，冒着二月的寒风卸货箱，没有小费，但却可以随时了解到、偷到他想要的东西。他给自己及两个兄弟拿温暖的棉衣，亚麻手套，裤子，毛衣，围巾，游泳短裤和鞋。十五岁时，他负责照管远区的一栋楼，一生中第一次把真正挣来的钱同赌赛马为生的人打赌，此人经营第八街区和第三十三街区拐角处的快餐店。纳特父亲怀疑儿子隐瞒了他，每星期五晚上揍他，逼他交出更多的钱。

1936年，十六岁的他受够了这一切，他退了学，瞒了年龄，报名到军队服役。军队工作稳定，津贴固定，并能远离在暴君的压迫和统治下的贫困的家庭。由于在军队里表现出色，在他快满三年时又延续服役期。他喜欢纪律，喜欢自己能有一张床，喜欢周末的自由，口袋里足

够的钱看电影逛妓院。

他早就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即能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和睦相处，懂得如何冒犯纪律却又不引起任何麻烦，如何不加奉承就能得到军官们的恩惠。他对爵士乐的兴趣，这种诞生于南方妓院和士兵酒。巴的乐曲，在战争开始、黑人被征入伍时，成了他的一种职业。

1941年，纳特中尉被调到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福特·梅尔地区的特种部队，部队举行爵士音乐会招待那些等着乘船去欧洲的黑人士兵。指派纳特协助一位上校卫作，这位上校在当老百姓时曾负责掌管过留声机；纳特帮助组织演出，组织节目，安装照明和音响设施，并保证音乐家们到场，让他们清醒、及时地演奏爵士乐。他同音乐家们相处得不错，他们教会了他抽大麻。他用钢丝录音带录下几段特别喜欢的节目用以自娱。演出受到士兵们的特别欢迎。纳特把活全包了，并且也愿意干。上校离开基地与女友幽会，也乐意白拣功劳。后来，纳特请上校杰克帮忙，杰克上校想起他以往对自己的帮助，也只能乐于从命。

战争结束，纳特当上了上尉。尽管向谁都没透露，包括伊芙琳，他早已想好如何赚钱。他厌恶贫穷，贫穷是一种耻辱，它妨碍自由和到处流动。他发誓无论如何，永远不再贫穷。

他的经历及对生活的热爱吸引着伊芙琳，他的饥渴所产生的背景离伊芙琳生长的昏庶的中产阶级阶层相隔大遥远了，她为纳特所忍受的贫穷与奋斗而流泪。他吻干了她的泪水安慰她。

“都过去了。”他说。

“你会成功的，对吧？”

“非常正确。”他说道。

“你非常诚实。”伊芙琳说。她不知道别的男孩子是否这么公开承认自己的野心。

“这是我的蛙力之一。”他说，“我的诚实。”

“你的一切都有魅力。”伊芙琳说。

“哦，不。我有一些令人讨厌的毛病。”

“举个例子。”

“我的进攻意识太强，我需要大家喜欢我，这是严重的性格缺陷。”他说，“我有点感觉迟钝，更关心自己的情感，很少注意别人的感情。”

“我不相信这个，”伊芙琳说，“你对我可不这样。”

“你就不同了。”纳特说。

“我真高兴。”

他们接着吻。那是星期二，在纽·霍普过了周末后的第一次见面。坐在哈德森车前座上拥抱，车象以往一样停在布莱克里夫学院门前的空地上，纳特手摸到伊芙琳裙子，伸了进去。

“别在过，”她说。由于周围的灯光而特别窘迫。

“我想要。”纳特说。

“我也想。”

他俩停了一下，意识到这不是地方。

“我们的年龄太大了，不适宜在车里卿卿我我了。”纳特说，“我们应该在一张大床上拥抱。”

“我明白，”伊芙琳说，“但别无选择。”

“有的。”

“有吗？”

“当然，使它合法化。我找你父亲谈谈，行吗？”

这就象纳特以前做的一样，是个非常正式的提议。

星期六，伊芙琳和纳特对视了一眼，然后放声大笑起来。伊芙琳已经和父母谈了她和纳特的事，他们请他周六去吃晚饭。尽管伊芙琳担心父母会瞧不上纳特的那身装束：上衣及膝，裤子瘦长，鞋尖上还带着个外包，但她没勇气建议他为晚饭更换服装。她爱他，她将和他站在一起，支持他的一切，包括服装。

为了这重要的晚餐，伊芙琳改变了装束。平常为取悦纳特所扎的马尾松，所穿的宽松毛衣和短袜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保守的海军蓝，白衬衫加束带，和一双长袜--这些都是经母亲同意九月份从阿尔特曼商店买来的，她还到发廊去做了一个三七分的齐肩童花头。

当她看到纳特后，禁不住大笑起来。他的思维显然和她的相同，保守的海军蓝制服里是一

件白衬衫，领口系着一条浅色领带。他甚至走了极端，把他那直立挺拔的头发剪成了保守的商人式发型。

“我们俩简直棒极了！”伊芙琳说。

“正如常言所道：英雄所见略同。”纳特应道。当他们坐上红色的哈德森汽车驱车去她的家时，他们骄傲极了。

在这之前，伊芙琳和父母谈起纳特时，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是否爱他，当她使他们确信她爱他胜于爱世界上别的一切，嫁给他是她生活的唯一愿望时，他们问她埃尼怎么办。

“我们一直以为你和埃尼会……”他们说。

伊芙琳耸了耸肩：“我明白，可我不爱埃尼，我只是喜欢他，那与爱是两码事。我爱的是纳特。”

她的父母简直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羞涩腼腆的女儿竟会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她如此捍卫自己的权利，对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此明了肯定，根本不象往日她。这使他们猛然意识到他们的小姑娘长大成人了。

伊芙琳的母亲嚼位起来。一想到自己的小女儿儿现已长成女人，她就止不住要哭。怀念往日，怀念从前。这哭泣也是幸福的哭泣，因为这个刚刚长成的女人已经找到了自己所钟爱的男子。虽然她不曾和女儿谈过，但她总不时地为女儿担忧，害怕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会找不到丈夫。她早已意识到伊芙琳不愿同埃尼订下终身。她担心除了埃尼外，再没有男人能看到掩饰在伊芙琳平平的相貌和谦逊的举止之后的甜蜜。现在她感觉到，不管纳特·鲍姆是怎样的一个人，既然他有这个眼力看上伊芙琳，那么他一定本身就是个甜蜜可爱的年轻人。

西蒙·艾德华兹则保持沉默，他考虑的是女儿的将来。

“这个纳特·鲍姆是做什么职业的？”

“他很快要去哥伦比亚研读美国政府的军事法案。”

“那样的话，他怎样养家糊口呢？做为学生，他是养活不了妻子的。”

“他能养活我，爸爸，我知道他一定能。他会很有出息的。”

西蒙没有被说服。

“你知道，你不能光靠爱情来生活。”他说。

“嗨！爸爸，我知道。我们会过得很好的。我知道我们会的，等你看到纳特，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但愿如此。”她爸爸说。

西蒙从未想到自己的女儿对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此肯定。他明白，如果他反对他们结婚，伊芙琳就会有生以来第一次拒绝服从他。这一意识使他吃了一惊。另外，他推想到，伊芙琳也许是对的。这个纳特·鲍姆可能确实前途无量，不仅会是个好丈夫而且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庭生活的承担者。西蒙决定暂且不做结论，他要等到见了纳特·鲍姆之后再做定夺。

毕竟，西蒙想，战争才刚刚结束几个月。很多退伍军人，刚刚离开军队，必须经过一段调整期才能适应正常生活。有关定居的问题再次出现在每天的报纸上。没有工作，前途无着落都不足以用来否定一个青年人，尤其是一个在军队里成功地获得了上尉军衔的青年人，如果一个年轻人有雄心，肯努力，毕竟还是大有希望的。仔细想想，西蒙自己的父亲创业时，所有的就只不过是背上的衣服和缝在外衣里子上的几个金币罢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象西蒙和自己的儿子彼得一样幸运，有兴旺的家业可以继承。再说，西蒙爱自己的女儿胜于一切，他希望她幸福。假如纳特·鲍姆能够使她幸福，那……”

“如果你爱他，宝贝，我相信他就是你说的那样。”

“你会喜欢他的，爸爸，我相信你会的。”

“你会喜欢我父母的，我知道你会的。”伊芙琳说。他们正驱车向南，驰向新泽西。“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伊芙琳为纳特指着路，他们终于来到了艾德华兹家的住处。它离开公路有一段距离，是一座真正的中产阶级的住宅，但没有一点虚夸的味道。白色的墙壁，灰色的百叶窗，擦磨得锃亮的青铜门把手。这是一幢诺曼·洛克威尔也会愿意油漆的房子。

“你一定是纳特了。”西蒙·艾德华兹打开房门时说。他握着年青人的手，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颇赞同他的装束：外衣、领带以及剪得很干净的头发，然后庄重他说：“欢迎光临。”“谢谢，先生。”纳特答道。他站在那儿与西蒙握着手，显得既英俊又严肃。伊芙琳简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足够的爱可以表达她的感受了。

伊芙琳的母亲什么也没说。她眼里噙着泪水。有好一会不知如何才好。然后，她走上前去，激动地吻了纳特的面颊。

他们在厅里坐走后，伊芙琳的母亲用一个银盘端来了小杯的雪利酒。有一小会儿，无人打破沉默，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自在。

“伊芙琳跟我说，你们打算结婚。”西蒙·艾德华兹打破了紧张的气氛。“我还记得当我到诺米家求婚的时候，我浑身颤抖的样子。我不想让你也这样。”这个对那一传统场面所开的玩笑使每个人都轻松地笑了起来。笑声止后，纳特说话了。

“真谢谢你，”他说。“说真的，我刚才紧张极了。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你只要告诉我你爱我女儿，并准备照顾她就行了。”

“那就简单多了，”纳特答道。“我爱伊芙琳我愿意尽我的余生关心她，爱护她。”

席间，西蒙对纳特完全平等相待了。他就杜鲁门该如何处理叩六年早些时候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询问他的看法。他们谈到达洛菲·夏佛被任命为罗德与泰勒公司的总裁和她那每年七万五千美元的收入。西蒙还问纳特他是否已看了瑞典籍电影新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影片。她那一年主演了三部影片，都极为成功：《女式旅行箱》，《坠人情网》和《圣玛丽的钟》。

纳特对西蒙的评论反应机敏，彬彬有礼。他吃掉自己盘子里所有的东西并要求再添。他夸赞烧鸡皮香脆，土豆泥可口，这使诺米·艾德华兹觉得这是她做过的最好的饭了。

伊芙琳几乎未说一句话，只是看着纳特，欣赏着他，注意观察父母对他的反应。他显得成熟，自信，但没有一丝她喜欢而她父母会不赞同的自傲。她尤其对他们上周末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感到惊异。她确信她的这些灼热的思绪一定会显露在脸上，但显然无人注意到。等晚饭结束后，纳特·鲍姆已被默认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了。诺米·艾德华兹请他留下来过夜，他可以睡在客人室。纳特接受了邀请。伊芙琳的父母对女儿所选中的人感到很满意，所以，很快他们便上楼就寝去了，让纳特和伊芙琳单独待在一起。

伊芙琳情绪极佳，这个世界上她所热爱的人们都爱她，而且彼此相爱。她觉得他们的爱是一个堡垒。有了个这堡垒，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她身上，永远不会。

“他们爱你，就和我想的一样。”伊芙琳说。

“他们好极了。”纳特应道。

“他们对你会象亲生父母一样，”伊芙琳说。“他们会把你当亲儿子看待的。”

“我喜欢他们这样。”纳特说。他对自己的母亲只有零星的记忆而且都是悲伤的。至于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死了，他所记得的只是暴政和殴打。“有个家该多好啊！”

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纳特注意到窗上挂着厚重的村里子帷布，地板整个被厚厚的地毯盖住了，咖啡桌上的雕花玻璃瓶里插着鲜花。这些都不合他的口味--他不会这样装饰房间的。但他意识到这样的装饰意味着什么：财富和舒适。两者他都渴求，他更渴望得到伊芙琳--她代表着这两者。此刻，清楚地意识到她很快就会成为他的，但却尚未合法地拥有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了。

“有件事我觉得很糟糕。”纳特说。

“什么？”

“我要送你一枚订婚戒指。”纳特顿了顿，对自己将要说的话感到尴尬，“可我又买不起。”

“我不介意，”伊芙琳说，“我要你，我不在乎有没有戒指。”

“可我在乎。”

“对我来说有与没有没什么两样。我爱你，这是唯一要紧的。”

“总有一天，”纳特说，他没有听到她说的话“我会送你一枚美丽的大钻石戒指。”

“纳特，你不一定非这样不可。”

“我明白我非这样不可。我要这样做。”他说。等到纳特和伊芙琳星期日离开她父母的时候，大家商定六月份举行婚礼。纳特和伊芙琳即将开始新的生活，这恰是美国这个绝对的战胜国，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代价最高、毁灭最严重的战争之后，做着金色未来之梦的时候，纳特和伊芙琳忙着定计划，列购货单，准备婚礼，同时尽享交欢。几个月在忙乱中很快便逝去了。1946年春是《开城》和疯狂即兴爵士乐兴盛的季节。爵士乐那暗示性的调情词句和节奏使做父母的震惊。这个季节也恰是房子短缺的时候，退伍军人返回故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第二件事便是生孩子。战后婴儿出生率的增长给美国建筑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改变了美国社会生活的进程和结构。

象威廉·莱维特这样的人从问题中发现了机会，建造了莱维居民镇，由此致富。住公寓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新成份。以洛山矶、芝加哥和纽约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联合体飞速增长，向多方向延伸出好几百英里，吞并了郊区，美国传统的乡村理想在人们涌入人口中心的浪潮里黯淡下来，社会学家对个性的丧失，杂乱和孤独等新现象进行研究。数百万美国人所采取

的新的生活方式在美国这个流动不安的社会中的反响是多方面的，--社会本身，经济界、政治界以及艺术界皆可感受到其影响。治安部门注意到暴力罪行猛增；道·琼斯股票平均指数涨至212的新高度；温斯顿·邱吉尔在密苏里州的福尔顿做了铁幕讲演；画家和雕刻家，如汉斯·阿波，瓦西里·康丁斯基，康斯坦丁·布朗居基和马舍尔·杜查博与自己过去的艺术追求一刀两断。

西蒙·艾德华兹对伊芙琳和纳特说，他将给他们买幢房子做为结婚礼物。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伊芙琳很想到格林威治村住；她也曾喜欢上纳特在阁楼舞会和乌烟瘴气的爵士酒吧里使她接触到的放荡不羁的生活趣味。但是伊芙琳觉得诗情画意的充满霉气和蟑螂的漆黑的地下室，却只能使纳特想起自己从中长大的房子。伊芙琳很快在纳特面前让了步，于是他们接受了她父亲的礼物。

买房子一事给纳特上了戏剧性的一课，使他认识到支票簿的力量。尽管报刊杂志耗费了成百上千万的词汇大谈“住房短缺”，但是，一旦拥有丰厚银行资本家的买主露面，这种短缺便奇迹般地无影无踪了。这种经济力量的作用使纳特终生难忘。

同房地产经纪人商谈了五个星期天后，纳特和伊芙琳决定买下大耐克街区一条林荫道上的一幢价值两万的农场主错层式住宅。错层式是建筑业最现代的概念，是摆脱自本世纪初开始垄断美国建筑业的维多利亚式和美国早期建筑模式的先锋。农场主错层式住宅是最新式的。了解了其风格与地位后，纳特和伊芙琳兴奋极了。

当签字手续办完，房契到手后，伊芙琳着手装饰她的新家。虽然在此之前她从未装饰过任何房子，但她对式样和色彩。结构和形状的布局却新颖别致。每个看过的人都大为赞扬。伊芙琳从未意识到自己还怀有某方面的才能。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她才能的展示，与纳特爱她并将娶她为妻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在伊芙琳的心里，她把这一切归功于纳特。是他激励了她的才能。所以她不接受任何赞扬，坚信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除了购物、计划和梦想，还有性爱。订婚与结构之间这数月对伊芙琳来说，充满了激情和肉欲。那个周末，他们在新希望旅馆所做的尝试性探索，怒放为难以摆脱的缠绵。

他们常常回到那间他们整夜做爱、最后精疲力竭的房子阳台上去。他们在红色的哈德森汽车里做爱。一次，他们非法闯入泽西城海边的一幢没上锁的房子。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是谁。淡季的霉气和那张属于陌生人的凹凸不平的床使他们的做爱啻了一种非法的亦是强烈的陶醉感。

伊芙琳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恣意纵情，她变得敏感，能够意识到天气和周围的人、物以及颜色的细微变化。她觉得自己处在幸福的颠峰，世界在她周围熠熠闪光。然而，美中不足，无限的快乐中隐藏着某种担心。

她担心会怀孕。

避孕药尚未发明。四十年代未婚的姑娘，没有去生育控制诊所要子宫帽的。没有泡沫也没有避孕环。只有按民间传说的土法，用可口可乐灌洗阴道。

每个月，伊芙琳都焦急地望着日历和自己的身体，注意是否有早晨呕吐或是尿液变浓的迹象。伊芙琳只知道这两种怀孕征兆。如果月经迟到一两天，她便会手足无措，坐卧不宁。她不知道一旦怀了孕她该怎么办，对谁说，纳特是否还会爱她还要娶她。性交是她的肮脏秘密，而对怀孕的恐惧便是她为纵欲狂欢所付的代价。

但是，她捱过了那六个月。就她所知，结婚那天她尚未怀孕。

婚前第六周，即四月下旬，西蒙·艾德华兹邀纳特与他共进午餐。他问纳特是否愿意到位于纽约的艾德华兹毛鬃公司去任职。西蒙有个想法，准备让纳特大吃一惊。他简直迫不及待地要看看纳特有何反应。

那想法是三月份早期才想到的，来得非常突然。西蒙甚至想，为什么他没早想到这一点。

西蒙与纳特接触越多，对他的印象就越深。纳特在军队服役时干得不错，显然在市民生活中同样会干得不错。尽管他不具有埃尼所受的正规训练，但他仍会成为艾德华兹公司的一大笔财富。

西蒙征求彼得对他的打算--让纳特成为彼得的伙伴共同经营艾德华兹公司--的看法。西蒙说，这样也可算是平分产业的方法。西蒙早已和两个孩子打过招呼，他准备把财产一分为二，不偏不倚，彼得没有理由不同意。再说，彼得喜欢、钦佩自己未来的妹夫。他觉得自己虽有能力，胜任自己的工作，但有点过于操劳。他认为纳特胆大、自信，而这两种品质恰是自己较缺乏从而希冀和追求的。西蒙的建议不花他分文，而他却得到了一个坚强的伙伴，会受益匪浅，所以，他欣然赞同父亲的提议。

得到了彼得的完会赞同，西蒙便开始按自己的想法进行安排。他让人把彼得隔壁的办公室

漆刷一新，铺上了全地板地毯，然后搬入一张桌子和一张皮椅，它们和彼得的一模一样。西蒙力图给纳特造成一种完全平等的感觉，而不只单单是一个女婿--一个由于婚姻关系被纳入家庭企业的外人。

共进午餐的那天早晨，西蒙让人用吸尘器清扫了纳特办公室的地毯，掸去了各处的灰尘，并把玻璃桌面擦得锃亮。当接待员通报纳特到了时，西蒙亲自出门相迎。尔后，陪他来到自己的楼角办公室，关上了身后的门。西蒙一切都已计划好了：他提出自己的建议，纳特欣然接受。然后，西蒙把他带到走廊的那一头去看那间装饰一新的办公室，纳特又吃一惊。如果纳特愿意，西蒙想，他当天下午就可办公。

“我想我们该正正经经地谈一次了。”西蒙说着，示意纳特坐下。纳特对西蒙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派头感到震惊。在家时，他多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可是有趣的对照。“我意思是说只有我们男人，没有女人在身边，好好谈一次。”

纳特点点头。

“女人，我爱她们。”西蒙说，“但别在办公室里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开场白过后，西蒙开始切入正题。他谈了将来。这是从艾德华兹毛鬃公司的往来帐谈起的。往来帐表明情况越来越好，订货数目大大超过了公司的现有存货。在欧洲、远东和南美，公司都派去了业务代表，出高价战胜竞争对手，购进鬃毛。经艾德华兹公司加工后，再卖给众多的制造商。西蒙谈了毛鬃业发展的广度，其范围远远超过人们最常见的毛发和牙刷，尽管这两种产品的需求市场是艾德华兹公司发展的基础。鬃毛有很多公众一般不大了解的用途。在医学上如此；在工业方面亦如此，不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金匠和钻石磨制匠需要极为精巧的刷子；象胡佛公司，电器公司这样的企业则需要重量适中的；而象波音、福特、通用汽车和克瑞斯特勒美国钢铁这样的重型大企业，需要的却是经久耐用的粗毛刷子。至于将来，西蒙总结道，除天空外，我们的企业的发展领域将没有任何限制。

“这个将来是你的天地。”西蒙最后点了题。

纳特点点头，没说什么。

“相信我，这并非因为你将娶我女儿。如果你是一个大街上的过路人，我同样会雇你。”西蒙接下来谈了他这提议的细节：年薪一万美元--与彼得的相同；股票所有权各占一半；纳特将做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与彼得分担公司的工作。西蒙说他和彼得已经考虑过了，准备让纳特暂时负责推销和重辟市场，而彼得则负责工厂的运转和一切内部事务。

“当然，”西蒙很快补充道，“如果你和彼得觉得需要另行分配，我当然没说的。咳，纳特，我要退出了。我要好好享受享受了。你和彼得就全权负责吧，一切都交给你们了。”

西蒙说完后，靠在椅背上等待纳特的反应。他知道自己慷慨的提议会使纳特大为吃惊。一九四六年那时候，很少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薪能达到一万美元的。有了这笔钱，一个人简直可以象国王一样生活。

“非常感谢，先生。”

西蒙从椅子上站起身，绕着自己的办公桌走过来。他想和纳特握手，然后就带他去看为他准备的办公室。西蒙满意极了，满脸堆笑。他急于要看纳特第一眼扫视那间办公室时脸上呈现的表情，简直急不可待了。

“您的提议，我非常感激。真的，非常感激。”纳特说，“可我不能接受。”

西蒙以为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你还有别的工作？”西蒙想知道那是个什么工作，然后用自己的提议超过它。

纳特摇了摇头。

“不，没有。我想自己创办实业。”

“噢”

西蒙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另外，”纳特补充道，“尽管我非常喜欢您的提议，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接受。那样会使我觉得自己无异于寄生虫。”

“我并非在向你发慈悲，”西蒙说道，感觉颇不自在，他不习惯于防守。

“我们吃午饭吧，”纳特说，“我会告诉你我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在一家光线暗淡的酒馆坐下，要了迪瓦尔饮料和半熟牛排三明治。纳特边吃边向岳父谈了自己的计划。

饭后，西蒙陪纳特走到艾德华兹毛鬃公司总部处的停车场，那儿停着红色的哈德森。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纳特上了汽车，驰回曼哈顿。

当西蒙·艾德华兹走向自己的办公定后，他才意识到他一直未得机会让纳特看一眼为他精

心准备的办公室。西蒙想，他的小女儿选了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他希望女儿能柔情似水，体贴入微地对待他。

伊芙琳过六岁生日时，比妮姨妈曾送给她一个音乐盒子，外形与婚礼蛋糕别无二致。当最上面一层被拉出时，盒子里便传出“新娘来了”的乐曲，直到将最上层按回原处，音乐才停。那年圣诞节，伊芙琳要求并且得到了一个披着金发，穿着长长的婚礼裙的布娃娃。象大多数女孩子一样，伊芙琳最喜欢“扮新娘”的游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能说服哥哥扮新郎，她便会饶有兴致地玩起来。伊芙琳认为，做新娘是女孩子一生的最高峰。也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伊芙琳想着自己的那一天。

她把那一天想象得千姿百态，而且不断地增添细节，修改细节。她要花好几个钟头来决定到底穿何种白色的裙才好：是牡蛎白还是香槟白还是烛光白。袖子要长得能遮住手的，这她已想好；可裙裾要多长的，面纱要什么式样的却一直没定下来。她想象着戒指、项链、伴娘、伴郎、持鲜花的姑娘们……她翻来复去地想着那一天，自己成了新娘，童话中的公主，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而自己嫁的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子。

当婚礼真的到来时，实际的情况超出了她孩子气的设想。

1946年6月11日是一个绝美的日子。蓝天无云，和风习习，艳阳娇好无比。婚礼在艾德华兹家的草坪上露天举行。粉色白色的山茶花正鲜花怒放，葱郁的灌木前摆放了一圈盆装粉玫瑰和白玫瑰。花匠还搭了一个花坛，摆放了更多的白玫瑰粉玫瑰。同时，他还为伊芙琳准备了一束绝美的白兰花。婚礼仪式是由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主持的。他满头白发，威严庄重。这使婚礼增添了恰到好处的肃穆。仪式后的招待会是酒席备办人的杰作。一个白色的大帐篷里摆了好多桌子。桌面上的食品极为丰盛：鱼子酱和香槟，新堡调味汁泡龙虾，斯多格诺夫调味汁加鲜鱼片，三种不同风味的冰糕，巧克力奶油冻和一个四层的塔状结婚蛋糕——个糖果商的狂想作品，外表由白糖冻结，最顶层立着一个新娘和新郎。

新娘的母亲穿了一件灰色玫瑰裙。当伊芙琳和纳特向苍天起誓，然后长时间充满柔情地接吻时，她被感动得哭了。新娘的父亲容光焕发，充满自豪。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她身穿海蒂·卡耐基长裙，看起来非常美丽。他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感到骄傲，同时亦为自己骄傲，他为女儿举行的这个绝妙婚礼，将成为今后几周内人们谈论的话题。

来宾共有一百五十位，全都着了迷。女人们喝多了香槟酒，格格地傻笑个不停。孩子们兴奋得都吐了，然后便在客人室里睡着了。男人们身穿晚礼服，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谈生意，谈政治，谈优秀棒球手鲍伯·菲洛的投球。一个四重奏乐队在花园里转来转去，不停地演奏取自电影《俄克拉荷马》，《旋转木马》和《演艺船》中的所有浪漫歌曲。

伊芙琳几乎什么也没注意到。她所想的只是仪式中的誓言以及怎样在今后的每一天里履行自己的誓言。她将爱他，尊敬他，服从他。

当与家人站成一排，接受完亲戚朋友们的欢呼，亲吻和良好的祝愿后，伊芙琳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换上了与结婚礼服同时购买的为度蜜月准备的浅灰蓝色套装，它包括一件松紧式双层衣肩，一件带荷花边装饰的夹克衫，一件长及小腿的连衣裙和一顶带面纱的无边女帽。象她的结婚礼服一样，这也是海蒂·卡耐基的原始设计，正风行一时。

伊芙琳的父母将这对新人送到等在外面的大轿车那儿，他们将乘车去肯尼迪国际机场。伊芙琳的母亲哭了，吻了他们两个；伊芙琳的父亲吻了吻女儿，然后同纳特握了握手，递给他们一个装有一千美元的封了口的信封。

纳特和伊芙琳乘的是一架半周一次飞往百慕大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行共需五小时，所以他们在机上吃的晚饭——香槟和精美鱼片。当他们在旅馆登记时，接待他们的服务只称伊芙琳为“鲍姆夫人”。这是别人第一次用她的新姓氏称呼她，伊芙琳的脸刷地红了。她知道她会永远记住这一时刻。

百慕大温柔而浪漫，白天明媚，夜晚柔和。伊芙琳学会了在开着灯的情况下纵情做爱。

一周的时间飞逝而去，短如瞬间。在飞回纽约的途中，伊芙琳想着新添的托儿所，现在空了，正等待着新的婴儿，而纳特想的却是生意。星期一早晨他要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杰克·桑德斯。杰克·桑德斯上校是纳特在军服役期间的上级。退役后，他和维克多亚重操旧业。他欠着纳特的情呢。

纳特告诉杰克·桑德斯说军队检阅表演时，他在后台作钢丝录音。过了一会儿桑德斯说：“你现在所需要的是孩子和一录音室。”

桑德斯又要了第三瓶马提尼酒。他跟纳特相识有九个月了，从那时起，杰克已经赚了二十个英镑和一个妻子。他向纳特透露了他在占巴跟“第二号”离婚的事。还告诉纳特说，他刚刚在梅尔堡外与跟他同居的小妞结婚了。在办理结婚一事期间，那姑娘可让他吃尽了苦头。因此杰克说，他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他不得不付给前妻赡养费，这无异于谋杀。然而下付出代价怎么会有现在。他告诉纳特说，他手头还河一些热门股票，是他父亲留下的。他父亲在世时在圣路易斯当证券经纪人。除了在维克特罗拉挣的钱外，还有不少外快。象从预购代理人手中赚的小额回扣，从那些忍饥挨饿的音乐家手里得到的“咨询费”。这些人都是急于寻找勉强活命的活计：给歌界巨星们灌制单人唱片时作伴唱。杰克说，要是真的想找第三个妻子，总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一想起自己要的第三个妻子，杰克便欣欣然。

杰克的祖先是英国新教徒，是圣路易斯下层社会中的贵族，个个都有一种金钱难买的口音和仪容。可杰克绝不是那种古板的人。他抛掉自己的高贵姓氏，就象富兰克·雷恩，沃恩·门罗和安德鲁姐妹一样。他曾带纳特到“21”号来吃午饭。杰克·克罗勒跟他打招呼好象他是这家餐馆的主人一般。

纳特想，杰克·桑德斯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青你大有宏图可展啊，纳特。”杰克一面说着，一面呷着昂贵的酒，好象被纳特的主意打动了一般。

“我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纳特说着，一口喝下第三杯马提尼酒，这时他才注意到杰克根本就动“21”的汉堡包，真叫人纳闷。

杰克从上衣兜里掏出个三寸宽五寸长的猪皮本了，翻开一页，用金黄色的铅笔潦草地写下一名字和一电话号码，然后撕下来递给纳特。那名字是艾迪·史密特。

“艾迪会给你制出一个主盘（原本唱片）。”

所谓主盘就是可以复制成成百张唱片的原版唱片磁盘。一旦有了主盘，就可以做买卖了，当然还必须有人喜欢的东西。多亏那次军事检阅，纳特才有这么棒的唱片：步兵帕克，迷人吉尔帕，J·C·金伯森。

“艾迪长了一个电脑袋。这家伙的脑袋简直就是一副电路图。只要给他五十美元，他会觉得自己象上了月球一般。”

杰克在合同上签了字，并解释说维克特罗拉愿意为午饭掏钱。杰克的工作部分是扩大音乐与唱片成交合同的范围。既然纳特也参予这笔生意，那无疑他又扩大了合法生意了。

“我总是相信每张合同上都应该塞上几个合法的名字。”当他们跨出酒吧，踏着七月那雾气蒙蒙笼罩着的五十号大街时，杰克说道，“让信息唱片处的那帮家伙入不敷出吧。”

杰克开心地笑了一回，然后向西信步走回离蒂麦斯广场不远的维克特罗拉的办公室。纳特走进第五第六大街之间的第五十二号街上的一家药店，给艾迪打了个电话。

艾迪·史密特十九岁，德国血统。他跟父母住的昆西街是德国人聚集的地方。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了一份他十分痛恨的工作：处理听众来信。他的抱负本是负责音响效果。他曾想过先进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打通控制整个播音的道路。二次大战期间，他上高中。由于父母的德国口音，他蒙受了许多咒骂和侮辱；因此艾迪便产生了居于高高的统治地位的强烈欲望。他时常想象自己头戴送受话器，隔着厚厚的玻璃窗，神气地被大堆的无线电，麦克和电子管所包围，指挥着演员与播音员们。若是没有他艾迪的命令，谁也别想动一动。然而现在他却推着那种家庭主妇买东西时推的小车，分信、送信，每天还要他娘的忍受着三十五块钱一周的折磨。

纳特·鲍姆说：“我有几盘钢丝唱片录音。杰克说你能替我作几个主盘。”

艾迪说没问题，这事他全包了。不过他这么上心，他不知道纳特准备出多少钱。

“杰克说出五十块你才肯干。”

“加上花费。”

“加上花费。”纳特答应道。

他们又定好，艾迪可以租一间他比较熟悉的汽车修理间。那天晚上他们就花了十多块钱，纳特说当然他去付这十块钱。纳特一想，这个车库可能就是艾迪自己的，这样他还可以外赚几块租金钱。要是他是艾迪的话，他也会这么干的，因此他没打折扣就答应了。

那大傍晚五点钟，纳特开车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前，麦迪逊485号去找艾迪。他们穿过女五一中街隧道，一路开出曼哈顿。按照艾迪的示意，他开过昆西街那些陌生的街道，直到艾迪说：“停！到了。”他们才停下。

这间所谓的车库原来是一间小偏厦，紧挨着一幢又黄又脏、需要彻底粉刷的房子。几株随意乱长的树聚在一起渴求着生存，一片阴郁暗淡的沙果草漫过车道向小偏厦延伸而来。艾迪推

了一下木门栓，他们进到屋子里。艾迪随手弹了一下一个开关，于是挂在橡皮绝缘的大号电线上的三盏光秃秃的灯亮了，照在那伤痕累累的工作台上。精密的录音设备纤尘不染，与周围的污秽肮脏成鲜明对比。车库里并没有轿车，艾迪告诉纳特说那张工作台就处在音响效果的中心。

这个设备看起来价格昂贵，纳特虽然一句话未说，但他心里已经意识到不光是他自己这样的想法。显然艾迪自己也可以从事这一副业，他可以私制一些非法唱片的主盘。

纳特把磁盘递给艾迪，艾迪把他们装在灰色钢丝盘上的链轮齿上，这台设备技术上要比纳特原先制作主盘的手提式设备先进得多。艾迪把磁带倒回到机器上的磁带上。机器上的磁带挂在一个艾迪称作平衡机的机器上。艾迪打开录音设备，仔细地听了起来。随即他调整了平衡器上一连串的转盘，使声音减慢，以便能以最大的精确度把它转录下来。

“杂音太多。”艾迪说，这是他对纳特唱片内容的唯一评价。

纳特原先害怕艾迪问他在什么地方怎么搞到这些录音的。可他根本没问。因此他也没必要自找麻烦，去告诉艾迪说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在梅尔堡现场录制的。那些“杂音”是在场观众的掌声，叫喊声和口哨声。这就不关他艾迪什么事了。

“录音时要使高低音有一个最佳的平衡度。”艾迪一面在平衡器上微微地调动着高低频，一向解释着。调了一会儿，他终于对音质感到满意了。纳特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明白了；艾迪关心的是如何摆弄录音，而不是录音的内容。哪怕录音是从“辛辛监狱”的死牢里录来的，他也不在乎。艾迪是个技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音响效果而不是道德水准。

艾迪现在对交响音质很满意，于是他拿起一盘空白醋酸纤维板，放在唱片制作床上的工作台上。纤维板是他让纳特在西47号街的一家磁盘供应店买的。他开动车床，把刀头放到纤维板边缘，然后开动钢丝录音机。他离开工作台向后退了几步，坐在一把破旧的条板椅子上听了起来。

“声音效果越精确越好，”艾迪说，“否则容易失真，那就什么也听不出来了。”

第一个主盘制好了，艾迪从转动台下取下刻满音纹的磁盘。象唱片出售商店卖的一模一样，就差标明歌曲名和演唱者的名字的彩色标签了。艾迪把纳特递给他的每张纤维板都如法制作，平滑光亮的醋酸纤维板变成了满是音纹的78号唱片。他们一直干到凌晨一点。现在纳特已是拥有世界一流爵士音乐家们实况演出的唱片主盘的人了。

纳特算了一下开支：艾迪五十元，车库租金十元，唱片和防护纸几元。共计六十几块的本钱，纳特就搞起买卖来了。

眼下要作的就是寻找买主。他心里明白这事很容易。麻烦的是后勤工作。

他把艾迪送到一家沙龙，然后驱车回到了大耐克街的家。

伊芙琳，跟先前一样，一直没睡，在等着纳特。他们一起听起了那些唱片。

开始，录音里夹的吵闹声——欢乐声与掌声——很刺耳。他们部听惯了那种在录音室里录制的清晰的唱片。等他们习惯了这种喧闹的唱片之后，他们立刻感觉到了它所特有的激动人心的新鲜感以及专业录制唱片所缺乏的直接性。

“忒棒了，”听完后伊芙琳说。纳特以前教过她一些俚语，她也特别喜欢说，可有时她又害怕说错了。

“这肯定是热门货，”纳特说，“奔儿新。是直冲着观众录制的实况。保证小青年们会疯抢。”

“没错！”伊芙琳也无法猜透究竟纳特鼓着多大的劲，有多高的热情。“你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她说。

“我就是为这个才挣命的。”

他们关掉灯，躺到那张舒适的大床上搂在一起。这时伊芙琳说：“这事怎么办？你不是要花好多钱才能开始吗？”伊芙琳在家时，父亲和她兄弟谈买卖谈生意，她经历得较多了；所以她也知道一点什么资本呀，企业管理费呀，开工费等那些个劳什子。

“放心吧，钱的事我会办的。”纳特安慰说。

那大晚上纳特心里得意洋洋的，情绪也异常激动，这使他们的性生活也增添了亢奋的色彩，快睡觉时，伊芙琳又开始琢磨他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那大浪漫了：新买卖开张，新娃娃降世，同一天夜晚。

纳特对时间的选择简直是天才。

青少年们，如同战后公园，如同契约集团和人造奶油，是我争期间留下的产物。战前，十三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几乎看不到什么文化刊物。没有什么刊物是为他们编辑出版的，没有音乐是为他们谱写的。然而所有的成年人都不见了，男人们当了美国兵开赴海外；女人们，象铆工

萝西，把美好的青春都消磨在工厂里了。除去那些无所事事的老人们——他们当然不会去白白花钱，满街上就剩厂那些尚不到应证年龄的十来岁的青少年了。

私营企业家们简直有非凡的才能，他们发现这些年轻人形成好多互不相干但又有高度凝聚力的群体。这些青年人都具有不同凡响的旨趣、礼节、欣赏力——还揣着大笔大笔的钱。摆一个极简单的算式就可以得出一个诱人的结论：上百万的青少年，每一家都要给自己的子女一些零花钱，加在一起可达上百万美元，纯粹是一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收入。一旦作出上面的结论，那么随之不用动脑就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当大人们集中全副精力去赢得那场可怕的战争时，那些男孩子们却在集中全力去对付同龄的女孩子们。

对于那些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少年们来说，没有比舞厅更吸引他们的地方了。那些上了高中的学生们个个穿着小短袜和小白鞋，工装裤和肥大的毛衣外套，每到午饭时分便跑到校礼堂跳起舞来了。放学后又都跑到当地的甜食铺里去了；星期六晚上他们聚到专为不满二十的孩子们办的小卖部里。这批美国孩子们跳着琳达舞和吉特巴舞，兔子般蹦蹦跳跳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摇摇晃晃大摇大摆地活象美国兵；他们为一个来自后波肯名叫富兰克·西纳特拉的那个瘦骨鳞峋的少年，而神魂颠倒，他们把追求各种爵士乐：节奏疯狂的，一般流行的，新奥尔良派的等等作为生存的目的。

自动唱机每年要吞掉五十亿枚五分钱的硬币，而且还在不停地吞噬着。唱片节目播音员们急需录音，竟连弗莫罗姆314号的琳达·苏也要把《麦乐兹的偏爱》献给痞子们；把《悠悠小舟去中国》卖给格雷这样的人。每个周六晚上九点钟，幸运钟声电台的“流行乐曲展播”节目都需要新的流行曲。等到烟消云散，一切恢复平静，再把所有的唱片数目加在一起，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仅1946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维克多和达卡两家分公司分别出售了一亿七千八百万张唱片。

卖唱片是赶时髦赚大钱的买卖。纳特就等着大把大把地点钱了。

七月底八月初，天气热又潮。《每日新闻》头版头条登着有人在人行道上煎鸡蛋的照片，哈莱姆的小黑孩把消防笼头打开，《康妮岛》每周都报道着那些个旷世新闻，而且是周周不少。倒霉的天气使大家都变得懒洋洋的；那时空调设备尚未出世，人们都喜欢凑到荫凉地，手里捧着柠檬汁对着电风扇。而纳特·鲍姆压根就没注意到什么气温高还是雨水多的事。

每天清晨，早早的，纳特就吻着妻子，带着他的那些原版唱片，钻进他们那辆红色哈德森牌小轿车。他把工商行分类簿当作向导，走访了曼哈顿，布朗克斯，昆西，布鲁克林，拿梭和沙弗克，维斯彻斯特和北新泽西州等每一家唱片零售商店。每天十四个钟头，天天不拉，除了星期六商店不开才罢。纳特把他的原版唱片放给店主们听，然后带回他们的订购单。

到八月中旬，纳特的约定数额几乎已经达到八万张。他挑了个星期天，带着那叠定货单到东奥兰治给他岳父看一看。他的岳父西蒙·艾德华兹对爵士乐一窍不通。他痛恨那些少男少女们和他们疯狂地赶时髦，那简直是傻瓜，不过对于一笔好生意，他是不会放过的。纳特连问都没有问，半个字未吐，西蒙就掏出自己的支票。那天晚上纳特离开丈人家时，手里已经揣着二千五百美元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纳特带着支票来到长岛印刷厂，当即印了一万张唱片。五一劳动节的周末后的那个星期三，唱片印刷完毕。纳特从印刷厂拉回唱片，把他们的客厅作了仓库。他卖掉了那辆供玩乐用的哈德森牌轿车，换回了一辆实用的运货车，然后用它把唱片运往各家商店。

到了十一月初，纳特已经拥有一家公司了——赫普·凯特唱片公司——一间办公室，两间布瑞尔楼上的房间，可以鸟瞰大楼拐角处的通风井。等到月底他已能开始偿还岳父的钱了。

迷人的大歌星加上阅兵式上那充满爱国激情的雄壮歌声引得人们争相订购，纳特对这飞来的定货单真有些招架不住了。

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不时地去零售商店转转，记下哪些唱片是畅销品，那些是蹩脚货。他在柜台上摆上精心设计的样品，落实畅销品的重新订购等。他与工厂方面为更快使商品流通，毫不客气地谢绝那些想为赫普·凯特公司录音的虽有抱负但无天赋的音乐家们。他支付钱，整理发票，订购唱片标签和唱片套，他讨价还价，要把戏似地调度着收入与支出，让钱总是能派上用场，再赚回更多的钱。

对于纳特，一天十八小时真是转瞬即逝。可是对伊芙琳，这些时间却不得不一分一秒地熬着。

住在大耐克街的那幢美丽的错层建筑物里，她觉得孤寂无聊，终于请求纳特她是否可以帮他在办公室里作点什么。纳特非常高兴。

每天他们俩一块驱车进城，他教她如何经营管理办公室，如何作笔记；教她哪些帐目应当

立即支付，哪些可以稍候；开始，她打字技术简直就跟鸟啄食似的，可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准确。起初，这工作既十分诱人又富有挑战性，纳特，无论何时，只要是在办公室里，他就总是一成不变地手举着电话，一面喋喋不休，狂吼乱叫，一面哄蒙拐骗，威胁利诱，要不就好好言抚慰，讨价还价。而他若不打电话时，他肯定下在办公室里。他走访唱片商店，竭力结交店主、顾客和店员，与之共进午餐，下班后他的车里总是挤满了人。若是他不跟店主在一起，他便在布瑞尔大楼里的熟食店中吃午饭，甚至这时还要了解发行公司中的人，他们手中有大量的标签，还要了解批发商、批发销售商、全才代理商和录音间歇时闲逛的音乐家们。

生意是男人的世界，它融化了纳特，排除了伊芙琳。没过多久她就明白了，她还是喜欢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吃她的三明治，而下愿意觉得象是土耳其蒸汽浴池里的唐突者。

每天到城里去的新鲜劲过去之后，伊芙琳发现办公室与家中空荡荡的房子一样的无聊。纳特总是那么忙——忙得没空跟她说话；忙得没时间带她去吃饭。这个家就他们俩，再没别人了。

办公室是令人作呕，令人沮丧，被原主人抛弃了的桌椅早已变得破旧难看。而办公室所处的位置又大靠西边，所以伊芙琳想在午饭期间到五号大街去买点东西都挺费劲。

对于工作，一旦常握了就再也不那么富有挑战性、那么令人满意了，只不过是无止境的机械动作和重复。先前是在家里一个点一个点地按时间等待纳特的归来，现在则是在机关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磨蹭等候纳特开车到办公室来接她回家。

伊芙琳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抱怨。不管怎么说，纳特如此地卖力干，还不都是为了她——为了他们，真的：为了他们的未来。她觉得很内疚，怎么能因为他一心想着工作怠慢了自己就抱怨生气呢？如果自己真的是个好妻子，那就该为他的

伊芙琳红了脸。

“你的乳头更敏感了。每次我一碰，他们就变得更硬起来了。你的乳房也大多了；它们在你的乳罩里鼓起来。而且你比先前湿得快多了。”

“纳特！”

伊芙琳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对这种下流话太不习惯了。他们在卧室里的谈话总是那种亲昵的孩子般的悄悄话。从来没有这样毫不掩饰，没有这么直截了当过。纳特这样煞有介事一字不漏的描述，使伊芙琳又激动了，乳头也鼓起来了。尽管他们没有作爱，可她感到下面却开始潮湿了。

那天晚上他们根本就没吃什么东西。而他们性生活又有了一种新的温柔和性感。这是从来未有过的。怀孕，不仅使伊芙琳梦寐以求的梦想成为现实，而且也使她对性高潮有了焕然一新的感受。平生第一次，伊芙琳觉得自己更象一个女人了。

那以后，纳特建议伊芙琳不要再去办公室了。他可以出钱去雇一个秘书。他要让她放松放松，体味体味怀孕的快乐。现在，伊芙琳快要作妈妈了，当然还是妻子，纳特便想做出一家之主的樣子。他对自己的童年刻骨铭心；很早就失去了母爱，没有了父子间的情谊，他不能让自己的家庭也出现那种父亲抛开传统的角色、离家出走的悲剧。他吸取了父母的教训，这使他感到宽慰。从自己的心理发展过程看，他知道这是他成熟的标志。

现在伊芙琳怀孕了，她非常愿意呆在大耐克街的家里面。再也没有了孤独与寂寞之感。她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也许是她盼子心切的缘故，她听着阿瑟·戈德弗雷德的歌，成串成串地列着名字，有男孩的，有女孩的。圣诞节购物，然后是期待。伊芙琳与自己，与丈夫，与她的最终目的一直保持着不变的序程。

感恩节过去了，接着圣诞节降临。纳特和伊芙琳无法想象明年这时休产假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过感恩节时，他们的孩子就五个月了，到了圣诞节就六个月了。每到夜间，他们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哭闹或是象别的婴儿那样哼哼叽叽的。他们的孩子会象杂志上的孩子那样惹人疼爱；可爱的酒窝，甜甜的笑容。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小俩口也明白，不过他们却一直在编织那美妙的梦。

他们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会使他们更亲密，赐给他们和他们的爱以永恒。

过完圣诞节的那天下午，他们离开了伊芙琳的父母家驱车回家。这时她问纳特：“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呀？”

“无所谓。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会不同于第一个的，所以我说这是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是吗？”

伊芙琳点点头。“只是，”她说，“我希望第一个是个男孩。”

“若是儿子我们会爱他；若是女儿我们也会爱她的。”纳特说着，一只手拍拍伊芙琳尚未

凸起的腹部。

“你想没想过我们会生一对孪生子？”伊芙琳突然闪出这个念头。

“噢，我的上帝！”纳特大笑起来，仿佛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过新年除夕的头一天晚上降了一场大雪，夜半时分伊芙琳冻醒了。她记不得是不是自己忘了关窗户了，便点上夜灯。当她掀开被子要下床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睡衣全湿了，上面一大片血，粘在大腿上。床上也早已湿透了。伊芙琳伸手碰了纳特的手一下。

她只说了一声“纳特”。

纳特爬起来去请卡尔曼医生时，伊芙琳一直在发抖，强迫着自己不去想会出什么事，卡尔曼大夫就问了一个问题，有关血的颜色。

“非常红。”纳特答道。

卡尔曼大夫告诉他去叫辆救护车，说他在纳索医院的急诊室入口处等他们。伊芙琳被放在一个担架上，上面盖着保护垫，血仍旧不住地流着，她几乎意识不到在那个漆黑的雪夜，飞快的救护车所发出的尖叫声。

卡尔曼医生在等候着，两名护理员把担架抬到检查台旁边。

“能保住我们的孩子吗？”

当人们把伊芙琳放到检查台上时，她问道。

头上面耀眼的灯光刺得伊芙琳什么也看不清；即使卡尔曼大夫回答她的话，她也没听见。她的腿直挺挺地伸开着，脚踝被套进了脚蹬里，她纳闷为什么一点都没感到疼痛。看到雪白的磁砖地上那一大滩血，她觉得很尴尬。把这纤尘不染的地板上弄得一团糟，可是没等她来得及道歉，她便不省人事了。

当伊芙琳再次醒来那，已是1948年的第一天的凌晨两点钟了，用不着说，她知道孩子已经失去了。没有言语，没有询问，没有解释。她知道了。

伊芙琳流产后的第三个星期，她去看了卡尔曼医生。他给伊芙琳作了一次全面检查：探查，触摸，扪诊。她则躺在那冰冷的金属检查台上，脚跟放在脚蹬里，身上简简单单地蒙着一层布。一名护士警觉地立在旁边，一方面安慰着病人，另一方面作保证人，以免大夫被歇斯底里的病人控告行为不轨。

伊芙琳穿好衣服后，护士带她到卡尔曼医生的办公室，关好门，让大夫同病人单独地在一起。卡尔曼医生的办公室，象他本人一样虽然破旧却很舒适。整个房间是木板镶嵌的，有两面墙摆放着各色医学书籍。书脊有深红色的，有墨绿色的，有深蓝色的。一面墙是从棚顶挂到地下的衣饰，模糊晦暗的。乱七八糟的书桌上放着一盏老式的学生式台灯，洒下一片柔和的光。象大夫本人一样，这间屋子没有令人畏惧的地方。

“你不该再想着那孩子了。”

卡尔曼医生说。

“不该想？”伊芙琳莫名其妙地重复道。

“流产是自然保护生态的一种方式。”卡尔曼医生个子虽不高，却是大腹便便。看上去象是一只笨拙的企鹅，一点都不象东海岸上的几位凤毛鳞角的妇科专家。他曾执教于列诺克斯黑尔大学，在第八十号公园街以及大耐克街开有诊所。女人们常常挤满他的诊所。她们喜欢称自己为卡尔曼医生的姑娘，而且没有一个不爱上他的。伊芙琳也不例外。卡尔曼能使她不担心，而她更是对他充满信心。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报上登的医生病人一样：病人绝对相信医生，医生控制病人。

“我有病吗？”自流产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伊芙琳。她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失去了那个孩子？她这究竟是怎么啦？

“你怎么也没怎么。绝对没问题。你的生殖系统状况极好。”

“那为什么——”

没必要等她问完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前在成百上千的同类病例中他曾被提问过成百上千次了。对于一个刚刚失去了盼望已久的婴儿的产妇来说，这种经历无疑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而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病例。医生们要作的，不过是给她们吃点定心丸，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胎儿不能正常发育。这比人们想象的要发生得多得多。”卡尔曼大夫尽量避开谈论具体和的太接近于临床诊断时的分析。可他发现这种办法使这个病人心烦意乱。

“你是说我的孩子不正常？”伊芙琳被这种想法吓呆了。她想知道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么可怕。

“我不知道，”卡尔曼大夫说。

“不知道？难道你不愿意告诉我吗？”

“除非作一次尸体解剖。”他不想去听她那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因为这不会有任

何结果的。

伊芙琳颤抖着。“尸体解剖？在孩子身上？”

“你的孩子虽然那么小，但有时从表面上可以得出点症状，可不一定能确诊。”

伊芙琳仔细地回味了一下医生的话。她不晓得自己肉里出了什么故障。自己不能得知，自己也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帮助。

“那么是什么毛病呢？”

“您在询问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你很清楚，鲍姆夫人，我们医生并非超人。有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是不知道病人有什么病。”

“告诉我什么可能会出毛病。”

伊芙琳就是无法得到安慰。于是大夫开始背诵起来。

“可能性实际上是无限的。因为要使胎儿正常发育成熟，完整地健全地降生，亿万万个细胞要正常地生长。它们有正常的连结顺序。其中最普通的病症可能会发生在心脏和肺部。

有时胎儿会被脐带勒死；有时会被羊水溺死；实际上就是淹死了……你真的还想听下去吗？”

“就一件事，”伊芙琳问道，“是我的错吗？”

这个问题是来这之前一直折磨她的问题。她确信自己作了什么错事，确信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她觉得很内疚。她认定失去孩子是她自己的错。她根本就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女人流产后，都有这种内疚和责任感。四十年代后期，女人们从不互相谈论这类事情。只是在痛苦的孤独中挣扎着。当医生们告诉她们说，这种心情是极普通的反应，多半的女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医生对她们的安慰罢了。潜意识告诉她们医生在撒谎，而通常她们又都点头同意，但仍觉得内疚。卡尔曼医生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明白虽然自己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可这绝不会起到什么安慰作用的，然而他还是说。因为他使尽浑身的解数也只能作到这一点了。医生，与他们的病人一样，无论男女，都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阶下囚。

“是我的错吗？”伊芙琳默默他说。

“不，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您的错。您一定要消除这个怪念头。一次流产并不是世界到了末日。”

“可我觉得好象已经到了。”

伊芙琳让大家都失望了——纳特，她母亲，她父亲。以前大家对她都那么满意，可她却辜负了他们。

“好啦，这不是世界的末日，也不是你的错。”卡尔曼医生真是出奇地爽快。

“我该怎么办呢？”伊芙琳能够听到自己哀诉的声音，这使她很尴尬。她需要人来告诉她怎么办。如早有谁知道得比她多，并告诉她如何去作，那她一定会去作的，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你该把这一切全部忘掉。回家，去作你的事。再要孩子，越快越好。这是最好的补救方法了。”

伊芙琳第一次笑了。

“真的那么容易吗？回家，再次怀孕？”

“就那么容易。”卡尔曼医生朝候诊室作了个手势，那里坐满了孕期不同的妇女。“女人们从来就是那样做的。”

卡尔曼医生的处方开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过了三年，伊芙琳才又一次怀孕。可是刚刚过了九个星期，在1951年3月初，她突然又一次自动流产了。没有任何迹象，只有一次严重的疼痛性痉挛的袭击。夜阑人静，没有尊严或是救护车的警报声，只用了十分钟在她的洗澡间里，就一切都结束了。

随后的那些日子里，伊芙琳绝食了。她拒绝离开房间，拒绝穿衣服，拒绝告诉任何人其中的原因，但是一看到妇女或孩子——在超级市场里，在药店，在人行道上——她就无法忍受。她害怕路过学校，游乐场，甚至于陈列着儿童服装的橱窗。她害怕周围的世界，因为她所目睹的是孩子们微笑中的控告，母亲的皱眉，空荡荡的婴儿车。

看到伊芙琳这种样子，纳特和她父母都很着急。她越来越瘦弱、恐惧和焦虑。她们齐心合

力终于说服了她再去看卡尔曼医生。母亲驱车把她送到医生办公室，陪她走过去，跟她一快坐在候诊室等着。倘若只有她一个人，她绝不会作任何事情的。

卡尔曼医生给伊芙琳作检查，告诉她他的确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事实也确实如此。她排卵正常，但有些妇女即使排卵不正常也同样生下了健康的婴儿。他只能说某些妇女比另一些妇女更难怀孕，某些妇女比另一些妇女更难怀到期。不幸的是，伊芙琳似乎就是她们之中的一个。他只能建议她坚持再试。

他的话并没能消除伊芙琳的焦虑，或恢复她的信心。虽然他犹犹豫豫的，但到底还是给她开了一镇静剂。

镇静剂似乎产生了奇迹。伊芙琳强烈的焦虑消失了，到1951年5月份。她又一次怀孕了。

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卡尔曼医生无论如何还是对的，而她自己也肯定，绝对的肯定，这次是不会出任何差错的。原先的流产是自然的残酷而又无常的错误。这一次她将要给纳特捧上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她静下心来等待着，确信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不幸的是，她，又错了。七月份，她第三次流产了。

卡尔曼医生——现在被她视为死敌——又给她开了那种镇静剂。但这次毫无效果。伊芙琳吃了那药，可她再也不相信他们了。她不再相信她的医生，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大夫。纳特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将可爱的宝宝，她根本没有什么病，不管怎样，他都会永远爱她。可她却认为纳特是对她撒谎，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她没有能力作成千上万的女人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1947年，三百八十万婴儿出世；1948年，三百六十万婴儿出世——这个数目年复一年地继续到五十年代。正如科学家早已预计到的，战后出生率增长了。伊芙琳体会到在内心深处她仍在企盼着。她不正常，无生育能力，而与此同时，纳特的生意却是兴旺发达。她兄弟彼得三年前结的婚，他妻子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子，而且又怀孕了。埃尼·考夫曼娶了他在宾夕法尼亚结识的一位姑娘，他们已有了三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周围到处是财富与生命的迹象，而她却只看到自己没有妊娠与生育的能力。

性，曾经是欢乐的源泉，现在却成了生儿育女的必要条件。伊芙琳几乎绝望地期待怀孕甚至表现在她的性生活中。纳特射精之后，她象冻僵了一样一动不动，不想让自己不正常的身体毁掉他给她的健壮的细胞。她克制自己，不去享受性高潮。

谢天谢地，1951年9月，伊芙琳又怀孕了，这是当年的第三次，根据卡尔曼医生的建议，她要在床上躺完九个月。由于不活动，她长了四十磅。到1952年6月她终于生产了，通过剖腹，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女孩，在庆贺宴上，为她取名为乔伊。

五十年代真正开始是从一九五二年。当时艾森豪威尔以三千三百万张压倒多数的选票，在大选中获胜。豸养鬃毛狗和穿紧身运动裤成为一种时髦。美国人在家里看的电视节目是《我爱露西》和《德雷格纳特》。

当伊芙琳对妇科学入迷的时候，纳特正专心经营他的生意。但他从没告诉伊芙琳他的生意不顺利。爵士乐以它那强烈、嘈杂的节奏，和令人惶恐、伤感的曲调在疯狂的四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现在时代变了，战争已经结束，战后的庆祝也已告终，美国人开始移往郊区，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他们穿的是灰色法兰绒服装，听的是象透过灰色法兰绒似的沉闷的音乐。他们要听的是玛丽奥·兰儿托尼·贝内特和佩里·康默。人们花钱去听帕蒂·佩奇，和《田纳西华尔兹》，人们花钱去听乔·斯塔夫，凯·斯塔和特丽萨·布鲁尔，人们花钱去听莱斯·保罗，玛丽·福特和《月亮有多高》。

爵士乐已经死亡，爵士乐演奏者也正在消失。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多种原因，纳特·鲍姆关闭了他的公司。这个果断的决定使他免遭了经济损失，摆脱了许多麻烦，保住了名誉。

在爵士乐演奏者存在的六年里，尽管纳特出售这些音乐家的演奏磁带，他却从没付给他们一文钱。他之所以不付给他们钱是因为他同他们没有任何契约。而这些音乐家们只有碰巧看到一盘爵士乐演奏磁带，才能知道他的作品正被人出售。纳特之所以坦然地做这种事是因为他的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小生意不能和大生意竞争，而他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是不付给那些音乐家钱。纳特想观的具体内容虽来自经验，但必然具有空间和时间这两种先，这也许不道德。但是既然干他这行的人都这么做，而且大家都心照不宣，他为什么不能去做其他人所做的事呢。见鬼，他也有权力生存。再说，你也可能永远不会被抓住。大多数演奏家都是黑人。他们觉得无人给自己作主，因此大部分人都是忍气吞声，他们已经习惯于被那些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夜总会老板们所敲榨，习惯于被那些冒牌的公司所欺骗，习惯于被一个仍称他们为黑鬼的国家所虐

待。在这个国家的南方，他们被隔离使用入口处、公共设备和休息室。到了1952年，他们的音乐不再流行了。他们这些人不是酗酒，就是吸毒，再不就是死去。大部分人已心灰意冷，与世无争。他们听任自己的天资被偷窃，要为此而打官司就得付出许多代价，他们也就不想再去抗争了。

然而，还有些人雇用了律师、会计和打手。他们称纳特是非法贩卖磁带者，是海盗，扒手。他们威胁纳特说，如果不付给他们钱，他们就要控告他，让他蹲监狱或是打断他的腿。后来，双方达成了一项经济上的协议。那段时期对纳特来说，真是可怕的、令人惊恐不安的时期。当磁带销售额的减少又加剧了他的困境时，他决定停止发行爵士乐磁带。

随着流行音乐取代爵士乐而来的是乐器上的一场变革。老式的七十八种乐器逐步被淘汰，换成四十五种，而它们又完全被长期使用的三十三种乐器所取代。音像行业整个价格、生产、销售结构都在剧变之中。在一段时间里，纳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足够的钱去维持生活，去在股票市场上碰运气。他在等待时机，他不能成为天才。他也不想拿那些来之不易的钱去在一些没有把握的事上下赌注。而且，宣传一个新东西得花一大笔钱，要收买公众，要暗中行贿，而你可能会失败。最后，纳特决定，他要寻找音乐之外的东西去灌制磁带。他知道，他一定会成立一个新公司，生产出一种新产品，而且他将完全正大光明地去经营它，他再不愿被称为骗子。但他的问题是，他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当他第一次背叛伊芙琳时，他产生了成立艾尔法公司的想法。

那个女孩是杰克·桑德斯与他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帕尔梅，她刚刚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在大学时，她曾是返校节上的皇后。她想在音像行业中找个工作，但是坚持不到大公司里去。她想样样都学，而达到此目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小公司里当个能干的女职员。因此，杰克给纳特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帮忙。

“如果她有一对大乳房和漂亮的大腿为什么不可以？”“嗨，别忙，她是我的独生女儿。”杰克说，一半感到骄傲；一半感到受了侮辱。

会见是在四点钟。当帕尔梅·桑德斯走进纳特的办公室，他惊呆了。她高高的个子，表情冷淡，金色的头发，体态优美。她那蓬松的头发下面有一对蓝蓝的眼睛。纳特用审视的目光望着她。

“你应该去做一个一年挣一百万美元的模特。”他说，“你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埋没自己呢？”

“因为爸爸也是这么做的。”她耸耸肩，“再说，我需要钱。爸爸把他的钱都花在他妻子的身上了。我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靠一星期45美元吗？”她看上去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就象他父亲看上去是个有教养的男人一样。然而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影子。所不同的，只是一个表现出的是有牢固的金钱基础，一个表现出的是享有特权的美国白人的自信心，他们拥有美国，而且他们确信这一点。“你为杂志封面做广告每小时可以赚45美元。”

“听着，你是对雇佣我感兴趣还是对勾引我感兴趣？”

她的直率解除了纳特的戒备，他对这么直截了当的女人不太习惯。纳特忘记了调情的那些乐趣，他记得自己对此是很拿手的。

“两个都感兴趣。”他说，“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

“要去吃晚餐吗？”她问。

“当然。”

帕尔梅坐在那听纳特给伊芙琳打电话。他告诉伊芙琳晚上有个工作晚餐，他将在城里过夜不回去了。当纳特说话时，他意识到几年来，他已经为自己立下了方便的惯例。以前，他每次在城里过夜，都是因为一个合法的工作原因。通常是吃晚餐，去夜总会，然后独自睡在阿斯托旅馆。纳特的商业同僚喜欢的那些妓女都不合纳特的口味，他喜欢的是有地位的女人。再说他十六岁时曾发过誓，他永远不会为这个花钱。那些个夜晚都很无聊，同他在一起的大多数人都是商人类型的，讲的全是些听厌了的粗俗的笑话。但是从赚钱上来看，却是值得度过那些无聊的夜晚。因此纳特决定他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

晚餐之后，他们来到帕尔梅的住处。这是帕雷街一幢棕色建筑里的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房间里的家具是货真价实的古董。纳特暗想，它们肯定在帕尔梅的家族里流传了几代人。因为它那幽深的颜色，耀眼的光泽，只有经过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女佣人多少年精心的擦拭才能达到。它使人感到，只有富贵的家族才能买起它，而这种富贵给纳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刚一关上门，帕尔梅便开始脱衣服。

纳特想，若是她能不做预备动作就做爱，他也能。在里面那间卧室的小单人床上，他们俩

赤身裸体躺在一起。当纳特俯在帕尔梅身上时，他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背叛伊芙琳，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不是为他的通奸，而是为他过去六年对伊芙琳的忠诚。任何一位男人都敢说他们对自己妻子忠贞的时间会比他长。

第二天早晨在一个陌生的床上醒来时，他感到既奇怪又兴奋。

“你父亲知道你到处与人睡觉吗？”纳特问。“谁说我到处与人睡觉？”

“她告诉纳特，她的行为不关他的屁事。他明白了她的暗示，便不再说下去。当帕尔梅在客厅里那原是壁橱的小厨房里煮咖啡时，纳特躺在床上吸烟。他注意到床头柜上有一本英法短语集。

“Avez-vous du sucre？”（有糖吗？）他按书上带音标的翻译句问。

“Et voulez-vous du lait？”（你还要点奶吗？）她也用法语问，把两个杯子放在床头柜上。

“Oui，”（要）纳特继续读书上的句子。“Tous les deux，S'il vous plait.”（两样都要）

她又返回客厅，一会儿拿来奶油和糖。

“我一直在想，如果找不到工作，我也许去巴黎。”她说。“我想，学点法语也许会有用的。”

“密苏里大学不教法语吗？”

“教，但我没学。”

他们一起笑了。帕尔梅是个漂亮的女孩。她的美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它可以使她不用去啃书本就通过必修的法语课。这个商品允许她随心所欲去做任何事。她的美是通往自由王国的通行证。它比金钱更有价值。纳特想，漂亮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她们能够得到一切，而从来不必去做一点努力，从来不必有不安安全感，从来不需要去乞求。

纳特把书扔回到床头柜上。他们喝完了咖啡，又开始做爱。

“我喜欢早晨做爱。”纳特说，心里想他和伊芙琳早晨从没做过爱。因为他总是匆忙起床，穿衣，喝咖啡，然后赶到那该死的长岛去。

“我喜欢早晨，中午，晚上。”帕尔梅说。

她对性的反应敏感，热烈。她的身体稚嫩、柔滑而又结实，完美无暇。纳特想再见到她。他还想再一次占有她。但是他意识到她对自己是个危险。她身上有种刺激和淫荡的东西吸引着他。她使他感到笨拙，满足不了她的需要。尽管他早就把那些上衣及膝、裤子狭窄的爵士迷服装扔掉了，现在穿着由布鲁克兄弟剪裁的服装，他仍觉得自己有股犹太人气，他在她那冷淡的、享有特权的白人所具有的自信心面前，对自己缺乏信心。纳特不愿意与帕尔梅这样的女孩子纠缠，她们都是对性关系毫不隐讳、而又坚持独立的女孩子。他被她们所吸引，却又惧怕她们，而这种惧怕总是缠绕着他。

而且他又想，他不愿意去伤害伊芙琳。

他爱她，他非常喜欢女儿乔伊。他不想弄翻这只小船。从另一方面说，他才三十二岁，他不必在今后一生中只勾引这一个女人。最后他决定，最好的办法还是睡一个晚上就了结。

纳特吻了吻帕尔梅，又在她穿着男式丝绸睡衣下的身上，拍了拍，便离开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第七大街。他把办公室的地址告诉了司机。车开到服装商业区中央遇到交通堵塞。纳特坐在小车后座上，等待着出租车再次起动，突然他想起了那本短语集。

他想起了几星期以前，他在星期口《时报》上的旅游专栏里，读过的一篇关于旅游热的文章。飞机比以前又大、又快——从纽约到伦敦只需要十个小时，订座全爆满：美网人到欧洲去参观博物馆，去购物，去观光，去品尝新美味佳肴，去看看外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一位旅游业发言人预言说，美国到欧洲旅游的人数每一年都会递增。飞机票价格将会下降，飞机将只用六小时就完成这一航程。虽然这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最终肯定会实现。

纳特意识到，每一要去欧洲大陆旅行的游客，却将设法去打破语言上的障碍。而美国人，除非自己的父母出生在国外，没有几个除英语之外还能说出一句其它任何语言。纳特想，倘若从一本口语课本上学几句基本句子肯定会比从短语集上学容易；而且，如果游客能在旅行之前买那些短语集，他们也可能买磁带在家里练习。

他把身子俯向前，告诉司机改变了主意，他不去原地方了，他要司机把他送到布朗塔诺。

1953年2月，艾尔法音像公司成立的法律性文件，由纳特的律师维克多·海尔顿起草。艾尔法的名字在纽约州被登记注册。公司固定的收入税及经营执照号码都被记载下来。纳特·鲍姆又一次做起了生意。

纳特之所以选择了艾尔法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意思是开始。纳特想要一个新的自我。他

的烦躁不安，在外表上表现是显而易见的：和帕尔梅睡觉；购置新衣服——他的灰色法兰绒西装，一直扣到底的牛津布衬衫，这些都是在布鲁克兄弟和杰·普莱斯服装店买来的；再就是停止发行爵士乐磁带。而他的烦躁不安在内心的表现，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他想让过去的他彻底消失。他想擦去上帝留在他身上的可怜的犹太人的所有痕迹。他想从艰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忘却所经历过的挣扎与饥饿。也许艾森豪威尔执政期是个稳定可靠的时代，但是纳特鲍姆想成长起来，想改变自己，而艾尔法则他自我转变的契机。

在纳特第一次与人通奸的那个早晨，当他离开帕尔梅之后，他到布朗塔诺书店把库存的所有版本短语集各买了一本。纳特以它为指导，编写了一本口语课本，内容从“你好、谢谢、欢迎”到“最近的医院在哪儿？明天晚上我可以再见到你吗？”纳特在他那一瞬间的远见卓识中，意识到的是任何可以从书本上学的东西，都可以更容易、更不费力地从磁带上学。

艾尔法以录制三种最流行的旅游语言为基础，开始了它的生意。这、二种语言是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很快，纳特就发现艾尔法把他从零售磁带的困境下解救出来。他再也不用为得到有益处的展销去行贿；他再也不用为说服一个店主签下一笔大额定货单去设酒席宴会，陪他们打牌；他再也不用去四处奔波了。他新的生意大部分都是通过邮件来处理。纳特在艾尔法开业上，最大的花费是付那些整篇幅的广告费，这些广告登在所有的女杂志上——《麦考尔》杂志，《妇女家庭》杂志，《同伴》周刊。而当艾尔法开始显示出它已赚取了利润时，纳特便在《生活》，《希望》，《星期六晚邮》一些大销路的杂志上，买下整个版面来作广告。

纳特经营艾尔法公司最小的花费，是制做磁带。纳特与汉特、哥伦比亚以及纽约大学的一些语言学教授会晤。最后他发现了一些无论是嗓音还是发音都很悦耳的教授。他付给他们每人二百美元，请他们在一处租来的录音棚里，对着麦克朗读他编写的课本，他们签订的合同规定，艾尔法公司可以在它的广告和宣传中使用这些教授的名字和学位；而他们除这二百美元外，不得再索要真它报酬。

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生意。它与过去在那颓败的街道上一间肮脏的破车库里，非法录制磁带的情形相比，真是天上地下。纳特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了，他喜欢现在这样。

爵士乐曾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纳特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基础时，它曾是快速收入的一种方式。爵士乐是四十年代的产品，而艾尔法却是五十年代的产物。它是长期获取资金的可靠来源。

当第一批录制的三种磁带为纳特建立了市场之后，他便开始扩展他的生意。他经常出没在布朗塔诺和都布雷书店的非小说营业部。他发现，美国人对自我改善似乎特别感兴趣——减体重，增强记忆力，改善心境，锻炼健美，自我催眠法，医治酒精中毒和健忘症。美国人对成为美食家的厨师感兴趣，对遇占术家给他门算的命运感兴趣，对在学业上超过朋友，给别人以影响感兴趣。所以艾尔法的前途就象美国本身一样前途无最。

纳特更大胆了。他对任何一个看来会有销路的事物部做试探性的广告。如果足够的反响证实了他的预感，他就干下去，把它灌制成磁带。他以统一价格雇佣一批令职作家，撰写成书，然后再以统一价格雇佣一批演员，来朗读这些书一般时间总是很急迫。如果一个题目没什么反响，他就不去理它。艾尔法成为一个安全可靠的生意。纳特事先就知道哪些磁带会销路好，那些不会。孩子们的迫随时尚和对狄克·克拉克和马雷·克的喜爱对艾尔法公司毫无影响。艾尔法对那些来自马菲亚的控制着自动电唱机的暴徒们要求分摊收入的压力置之不理。艾尔法的生意兴隆。它是纳特单枪匹马创建起来的，所有的风险都由他独自承担，因此所有的利润也都由他独自占有。

到1957年，纳特·鲍姆成功了。没人能用手指指着他称他为犹太佬。他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受人尊敬，有了身分。为完成这个偶像，纳特从布瑞尔楼角落里那两间屋子搬了出去，他让艾尔法搬进了麦迪逊大街第五十四条马路上，一座旧式建筑的三层楼上一个大套间里办公。

对纳特来说，艾尔法是真正的起点。

对伊芙琳来说，艾尔法标志着一个纷扰与不安的开始。她感觉到纳特变了，感觉到她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最令伊芙琳感到可怕的是，她丈夫不再与她交谈。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纳特经常与她交谈。他向她吐露他的梦想，他的雄心大志以及他的恐惧、他的不安全感。他们经常拥抱着到深夜，相互倾述各自的往事以及他们的未来，可现在，假如纳特还有什么梦想和雄心、恐惧和不安，伊芙琳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因为他不告诉她了。当伊芙琳向纳特为什么他不再与她交谈，他只是简单否认他停止那么做了。

“我一直都与你交谈。”他说。

伊芙琳不知道怎么回答。是的，他们是交谈。他们总是交谈几句。他们谈话的题目不外

是：车是不是需要修，防雨窗是不是应该装上，是不是应该给“老杜蒙”买个新显像管，或者是买个全新的电视机，每个月应该给草坪剪几次草，再不就是纳特要乘哪趟车。他们谈的这些事情并没有使伊芙琳感到与大夫贴近。她逐渐地、肯定而绝望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正在分裂。

她不把这一切归罪于纳特。事实上，要是怪罪的话，她把它归咎于自己。卡尔曼医生曾告诉她，她不太可能再生孩子，尽管坚持努力是可以的。所以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乔伊身上，每天上午两次喂奶，训练她大小便，引导她迈出第一步，说出第一个字。她关心乔伊的身体，她的安全、她的幸福。伊芙琳知道为了孩子她忽略了丈夫。但是她以乔伊的婴儿期是短暂和珍贵的为理由，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再说这段时期很快就会结束，之后伊芙琳向自己许愿，她将要为纳特做些弥补。

婚姻危机的细微征兆伊芙琳心神不安。但是只要乔伊还是个婴儿，还需要经常的照料，这些细小的迹象很容易被忽略。乔伊使伊芙琳感到被需要，乔伊使伊芙琳感到不可缺少，乔伊充实了伊芙琳的生活。

1957年，乔伊五岁了，她开始去幼儿园。就在那个冬天，伊芙琳不得不正视她日趋恶化的婚姻和她的丈夫逐渐远离她而去的现实。回忆起他们婚后早期一段时光令她感到痛苦。那时，纳特为发行爵士乐磁带，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而她整天独自一人呆在家里期待着他的归来，在居住在大耐克街的十一年里，伊芙琳发现，她唯一的兴趣是做家务。她曾去参加过妇女投票权者组织，她对填写信封或用电话进行选票游说感兴趣。她也试着去过花园俱乐部和妇女读书俱乐部，但她发现，她对小城镇的政治活动缺少才能，而且她也缺少与那些生活、兴趣都同她一样狭窄、闭塞的女人交朋友的能力。她不喜欢午后的桥牌。也不喜欢咖啡座谈会，在那个富有的犹太人的家眷居住区内，没有一个地方适应于她、使她感到惬意。

对伊芙琳真正上至关重要的是她的孩子、大夫，她的直系亲属。在1946年，她盼望着纳特回家来，期待着那随之而来的性生活，现在到了1957年，经过十几年婚姻生活之后，那最初的性冲动很正常地消失了。伊芙琳又开始整日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只是除了乔伊能从幼儿园平安归来，她再无其它可期待的了。

伊芙琳的生活开始萎缩，尽管她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当她去纽约时，她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非常邈远的、过了时的女人。纳特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有吸引力，愈发引人注目。而她失去了青春的光彩，变成了一个没有腰身、也没有前途的中年妇女。有时候，伊芙琳整日啜饮着饮料。她安慰自己，既然它的味道不象酒精而更象苏打水，它就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她知道它是有害处。

因此，1958年的春天，当富裕的美国人都离开大城市，跑到那有“良好的学校”和“种种益处”的绿色郊外去居住的时候，伊芙琳却提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她问纳特他们搬到纽约去住怎么样。

伊芙琳已准备好了她的理由。

“我们能够经常见面，我们能去听音乐会，去看节目；我们可以招待更多的朋友。你不用再来回通勤——你知道你是多么恨长岛。再说，”伊芙琳说，“我会有更多的事去做，我要去上烹饪课，去体育馆。”

伊芙琳一古脑说完了她的理由，停下来，等待纳特的回答。她不晓得她期待的是什么。她痛苦地想，这正是他变得疏远的一种表示，要是在十年前，她肯定会知道。

假如他不同意，伊芙琳已准备好了要同他抗争，在她过去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她不去抗争，纳特就是其中一例。现在既然她已嫁给了他，她就准备为保住他去抗争。她说不出为什么，但是从大耐克街搬到纽约市将会帮助她。她知道自己已经被抛在后面。因为她从她周围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多的生育使她们体形变得臃肿，繁重的家务耗去了她们的聪明才智，远离大城市的闭塞生活又使她们付出感情的代价。她不想消极地袖手旁观，看着她的青春容颜、她的丈夫离她而去。她知道如果他们搬去，她还会有个机会。

她等待着纳特的回答。

“我想这好极了。”纳特说。

“是吗？”她做的完全是与他争辩的准备，他爽快的同意反倒使她大吃一惊。

“几年前，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但是我想你喜欢这个地方我恨这该死的郊区，它使我讨厌得要处。”

“我怕是。我想是我让你讨厌。”

现在他们开始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了。伊芙琳发现，要表达出一直烦扰她、伤害她的那个想法，并不很困难。她早就感觉到纳特对她的疏远，对她兴趣的消失。她曾认为这是她自己的过错。

“不是你让我讨厌，是郊区。是穿百慕大短裤的那些股票经纪人，他们谈论的不是道·乔斯就是他们的高尔夫球比分，再不就是星期六晚上喝醉了。而他们的老婆更糟糕。我在这十年，从没有过一次聪明的谈话。”

“我担心，我变得令人讨厌。”

“你一离开这地方，就不会令人讨厌了。你会有许多事情去做，有许多乐趣。”

纳特回忆起他刚认识伊芙琳时，她对新事物是多么热情，她怎样由一个普通的、腼腆的孩子变成一位时髦的，引人注目的姑娘。对她的转变他确曾起了一些作用，但那并不都是他的功劳。她是位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姑娘。纳特感到惊奇的是她至今仍旧如此。令人悲伤的是他竟忘记了他妻子是怎样的人。

“乔伊怎么办？”伊芙琳问。乔伊是使她担忧的一个难题。把她从愉快的郊区生活中带走，关进大城市的一所公寓里合适吗？专家们不赞成。“什么乔伊怎么办？”

“你知道，他们对在城市里抚养儿童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我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活下来了。”

“他们说郊区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最好的，而且空气新鲜，绿树——”伊芙琳觉得她应该为自己孩子的权力辩护。

“他们是谁？就是那些为几本妇女杂志写点文章的“专家”吗？我们可以把乔伊送进私立学校，她在中央公园能看到各种绿树和草坪。她会超过其他所有儿童三级。”

“那么你同意了？”

“我迫不及待离开这里。”

纳特指了指这个错层式的大牧场；在伊芙琳的父亲买下这个牧场的那个时候，它曾是中产阶级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纳特离开中产阶级好多年了，因此那个阶层的种种抱负也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找房子？”

“我明天给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

那天晚餐，他们喝了酒，夜里做了爱。就在伊芙琳睡觉之前，她突然意识到了她如此高兴的原因，是这么多年来她和她丈夫第一次进行了一次谈话，一次真正的谈话。

那年夏天，伊芙琳在寻找房子和看护病重的父亲中度过。她上午与房地产经纪人打交道，下午在医院里看护父亲。

她父亲患的是胃癌。当手术表明癌已转移时，医生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了。这意味着病毒的扩散正超过可用手术摘除癌细胞或是用放射线治疗的极限。而医生没有讲出来的、留给伊芙琳、她的母亲和她的兄弟自己去发现的是癌将一点点吞噬西蒙·艾德华兹。他们没说它将发出一种臭味，臭得将使使呆的那间屋子令人难以忍受。他们没有说他将会在他们眼睁睁关注枯萎，并且一刻也不停止地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他们没有说，到最后，他甚至认不出他们是谁。

到了七月底，当西蒙·艾德华兹在六十二岁死去时，这个家庭所有成员都感到了一种解脱。因为他们早已经历和忍受了痛苦，所以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和默认了这悲伤。

1958年10月，纳特和伊芙琳在七十四与七十五条马路之间的第五大街上的934号买下了一套八间房的公寓。那些宽敞、明亮的大房间正对着中央公园。在纳特的坚持下，房子选在三楼。

“你要记住，我是在高楼层里长大的。所以我觉得住在高层象落入了陷阱，假设电梯坏了？或者失火了怎么办？在三楼住、你有机会逃出去，在十二层住，你必死在里面。”他解释说。

“我从没那么想过。”伊芙琳说。象以往一样，丈夫对安全问题表现出过份关心使她感到诧异，他的童年与她的是那么截然不同。她的生活从来都是安全有保障的，因此，她从没有想过生存是否会受到威胁。

“你能把人从房子里带出去，”纳特说，“但你不能把人的房子拿走。”

“你仍然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最有幽默感的。”

伊芙琳用了两年时间，才把他们的公寓布置妥当。她在第三第五十九大街的商业大厦里耗尽了无数个日子；选购合适的丝品，壁纸、最舒适的沙发，精致的咖啡桌，搜寻与这些东西相配套的摆设，最有价值的古董。她经常光顾帕克勃奈特的拍卖后，麦迪逊大街以及乡村里的古董商店。她在室内装潢上的才能还没有消失。她记不得了，当她看到一间屋子随着她的装饰，

安排，重新布置，逐步成形时，心里有多满意。她也记不得了，受到别人注意和称赞是多么惬意。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称赞伊芙琳所做的出色的工作。纳特也对此称赞。有人甚至对她说，既然她对室内装饰这么精通、她应该去做个挣薪水的装潢师。

“我？去挣钱？”她问。她笑了。

除乔伊的问题之外，对伊芙琳来说，六十年代基本上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期。她照料家，雇佣并训练了一个女佣人，这是她从来没干过的事。开始她对向佣人发号施令有点难为情，逐渐便开始习惯了。她每星期开车去东奥兰奇一、两次，看望她的母亲。她先后在詹姆斯，比尔德和迈克尔·菲尔兹那里学习烹饪。她学会了做龙蒿鸡、炖牛肉、鲑鱼马铃薯、油炒肉丁。她在家举行晚宴，向朋友们展示她的烹调手艺。最后纳特也同他的朋友一样对此赞叹不止。

然而，也有一些事情，伊芙琳虽然努力去做了，却没有成功。她曾强迫自己去体育馆。尽管她一点也不超重，可她身材敦实，胸部扁平，没有腰身，臀部象个男人。她听说，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使她胸部丰满，腰围变细，别人告诉她，最好的体育馆就是第五大街尽头，第五十六条马路上的库诺夫斯基体育馆。她到那去了，预订听十次课，她买了一件紧身衣，从体育馆领到一个带有印花图案的包，上面贴着她的名字。可是尽管她强迫自己坚持下去，她还是被其他学生吓的不敢去。那些学生不是完美无暇的时装模特，就是照片经常出现在《妇女时装日报》上的社交界女人，那些模特谈论的是经纪人和摄影师。而那些社交界女人谈论的是画展开幕式和最好牌子的长筒袜，这两种女人都穿着时髦，身材苗条，她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伊芙琳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等，她们的谈话中，讲的那些人，那些晚会，她只是在报纸上读过。所以她离开了。在上第四次课之后，她就再也没回去。

伊芙琳的第二个失败是在服装上。六十年代初，她接受了肯尼迪·杰奎琳使之流行的那种服装款式和第一夫人留的那种讨人喜爱的、向外膨起的发式。无袖连衣裙显示出伊芙琳漂亮的胳膊，也把她略粗的中间身材遮掩起来，而那蓬起的头发式样，也适合她那小巧的、椭圆形的脸庞。而到六十年代中期，当被称作是青年动乱运动爆发时，当玛丽·奎特的迷你装、威达尔、萨森的几何图形式的发式开始流行的时候，伊芙琳突然从时髦的行列中被抛出来。她快四十岁了，而时髦是属于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象许多妇女一样，伊芙琳不习惯穿那种几乎把大腿全露在外的裙子，而且那种有棱有角的发式，也不适合于一张眼角布满皱纹的脸。象许多妇女一样，伊芙琳还是喜欢穿六十年代初朝那些宽松的粗布连衣裙。她知道自己穿着过时，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对自己的失败看的一清二楚。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能有二十岁人的身材，去穿二十岁人的服装，剪二十岁人的发式。

伊芙琳作为家妇和妻子的成功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微不足到的失败。在她丈夫那些朋友和工作同僚们的眼中，她是一位谦和的女主人。她掌管一个毫无瑕疵、令人仰慕的家庭，她饭菜做得精美，把需要水洗、干洗的衣物及时洗好。她使丈夫一心忙于自己的生意，永远不为家务中的小事烦扰。

真正地证实伊芙琳是个好妻子——并且纳特也如此认为、欣赏的是——他们的性生活又恢复了。虽然它很少有他的恋爱期间和蜜月里爆发出的那种强烈的激情，但是，乔伊出生之后那一段无性生活的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有节奏的性生活：这种新节奏是每周一至两次性生活，它使伊芙琳觉得自己对丈夫还有魅力，就象丈夫对她有魅力一样。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伊芙琳不敢肯定自己是个好母亲。乔伊已经到了青春期，易怒、好挑战。伊芙琳疑惑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不能和女儿交谈。有时，乔伊公开蔑视她。有时候，她担心乔伊可能成为一个吸毒上瘾的人；有时候，她担心乔伊会成为一个未婚的母亲，或者一个囚犯。学校的顾问告诉伊芙琳，这不是她的过错，她和她女儿之间的困难，大多数孩子们的父母都有。他们说这是代沟造成的，不是伊芙琳造成的。

纳特同意学校顾问和心理学家们的意见。当乔伊公开侮辱伊芙琳时，他就让伊芙琳不予理睬。他说，这只是一段时期，他告诉她不必把事情看的太严重。

伊芙琳常想知道，纳特在内心深处，是否真不想要个儿子。她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他好多遍。而他每次的回答都是不想要。他说一个乔伊顶任何数量的男孩子。

乔伊和她父亲很亲近。他们之间仿佛有种默契，而它把伊芙琳排除在外。他们背着她讲笑话，他们喜欢就他们俩人在一起——星期四到普拉扎吃午餐；到那些放着摇摆乐，灯光闪烁的妇女时装用品商店去购物；到詹姆斯影院去看电影；晚上到戴利的旦德里昂去吃汉堡包。

伊芙琳妒嫉乔伊与纳特的亲密关系。但既然她对此毫无办法，既然她不想去冒风险使女儿与她更疏远，她也就不去管它了。她只是从心理学家的哲理中寻求慰藉。他们说，乔伊是刚刚

进入一个生理期，所有的孩子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1964年，鲍姆夫妇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塔克特岛上幸福街买了一幢房子。这一方面是因为纳特想要个避暑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因为乔伊的好朋友的家里也在这岛上有一幢房子。

买下这幢豪华的别墅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鲍姆夫妇都是相当富有的。纳特每年可以从艾尔法公司赚取八万美元的收入。而且在六十年代哄抬价格的市场上，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伊芙琳从她父亲留给她的财产中所获的收入，每年又给他们增添了二万五千美元。

“钱是用来挥霍的。”纳特说

他们的确是挥霍了。他们买下了一幢十八世纪的豪华住宅，对需要给住宅装设管道、供电、给室内外全部彻底翻新毫不介意。

伊芙琳两个夏天和乔伊同住在附近米克街一间祖来的房子里，她监督，指挥着幸福街上那栋房子的装修工作。纳特每个周末来到南塔克特来。即使飞机场上空大雾笼罩，航班破取消了，他也会开车一直到沃兹霍勒，从那乘船回来。

经历了所有的坎坷，跌宕，生活同1946年伊芙琳当新娘时梦想的一模一样，她度过的岁月，是从使她知道困难总皂暂时的，而生活的真正根基，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是永远存在的。他们将保护她，使她有依靠，给她以舒适和满足。

六十年代在幸福中度过。直到1970年，当纳特开始谈起五十大寿，谈起卖掉艾尔法，谈起要到波利西亚岛上去时，这一切都开始崩溃了。

1970年是肯特州的爱情年，又是纳特·鲍姆的五十岁生日。纳特生日是7月12日，伊芙琳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筹划一个煞费苦心、出人意料的生日晚会。她在码头边的养虾池里买了龙虾，用她自己种植园采摘的绿色叶片做成蛋黄酱，为吃龙虾时用。她定了两只烤小牛。她从每天早上停在大街商业中心前面的大卡车上，买了新鲜的西红柿、大葱、黄瓜、莴苣。在那个地方堆满了从岛中部汽车农场运来的产品。她还订做了一个咖啡夹心生日蛋糕。订了加冰块香槟酒。她把酒柜里装满了威士忌、芹酒、伏特加、柠檬汁、酸橙、苏打水、奎宁水。她还买了十几只盛在彩色玻璃罩的生日蜡烛，准备放在花园里，或者一旦下雨，放在有顶棚的门廊里。她又买了几十盆天竺葵和几株翠菊、雏菊花来欢迎纳特回来过这盛大的周末。

她向坎塔克特岛上的所有的朋友发出了邀请——那些来自纽约或波士顿，在岛上有避暑别墅的人；岛上的画家或是画展主办人；纳特在低地华盛顿街船坞里的朋友，在那个坞里纳特有一条用来捕鱼的小船；她还邀请了纳特的律师、他最好的朋友维克多·海顿，他和他的妻子弗兰西内从纽约乘飞机来这里过周末。

当伊芙琳做着这些准备的时候，她意识到今年是纳特的五十岁生日，而明年六月将是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她想，在相接的两个夏季里庆祝两个重大的事件是令人高兴的。

伊芙琳让每个人、包括乔伊在内都发誓保守秘密。她规定直到星期六晚上，客人们开始到达之前，不能让纳特知道一点生日晚会的事。当然，伊芙琳知道纳特会有所期待，因为整整一年，他一直谈论他的五十岁生日。

“这个五十大寿，真使我恐惧。”他总是说，“老了，我老了。”

“你不象。”伊芙琳说。他是不象。他那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没有一点稀疏和衰退的迹象。他留着时髦的长鬓脚，他穿的衣服都是从圣·劳伦服装店买来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运动装，他在那里花了一大笔钱。他一点肚子也没有，也不过胖——他那五英尺十寸一百五十磅的身材行动起来如同年轻人一样轻松自如。事实上，伊芙琳想，纳特从没有现在这么有魅力。

“你越老越潇洒。”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变老，而且变得更潇洒了。”

“我已经变老了，别向我说那些废话。”

“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

类似这样的谈话在以前六个月中有过许多次。而且它们都是以纳特承认他当然不会真的被到达五十岁所烦恼而告终。他只是开开玩笑。

“毕竟，最好的人才能到五十岁。”他说，然后他们一起大笑起来。

十一日，星期五的下午，伊芙琳开车去机场接三点三十分的飞机。纳特在夏季星期五总是早早离开办公室。戴尔塔航班总是或早或晚点到达。伊芙琳站在把乘客与简易机场隔开的铁栏杆外的阳光下，她望着旅客走下飞机、穿过小飞机场。她见到一些每个星期五下午都能看到的熟悉的男人面孔，这些人的妻子、儿女，都在坎塔克特避暑，而他们在城里工作，周末回来同家人团聚。伊芙琳同他们打着招呼。她几乎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即使叫不出名字。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被邀请去参加纳特的生日晚会。通常纳特是第一个走下飞机——他喜欢坐在前面。可这

一次，她没看到他。有时候，他晚到拉瓜地亚机场，就不得不在飞机后面找个座位。

更多的旅客走下了舷梯，他似乎是拎着旅行包，外交用的公文包，或是网球拍，她看着地面工作人员从飞机行李仓卸下了自行车、手提箱和高尔夫球袋。

最后，旅客下完了，尽管伊芙琳肯定纳特会随时出现在舷梯顶上，可他还是没有出现。显然，他错过了这次班机。

这个周末有点奇怪，伊芙琳想。他没想想，纳特有个会没完，或者是一个工作午餐比平时拖的时间长。她开车回到家，问丽迪亚，鲍姆先生是否来过电话。女佣说没有。

伊芙琳便给纳特办公室打电话，她同他的女秘书通了话。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秘书经常换，纳特说雇到一个好秘书不大可能。不是他解雇了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离开了。现在的女秘书说纳特先生十二点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还没有回来。

“他的公文包还在吗？”纳特总是把公文包带回坎塔克特——但他从没打开过它。这是一个好长时间的家庭笑话。

“它还在这。”秘书说。

“谢谢你。”伊芙琳说，“他回来，请让他给我回话。”

伊芙琳挂上电话，有点迷惑不解，但她并不焦急。她本能地拨了他们那套公寓的电话。也许纳特回去拿他忘记的什么东西——一件运动前克衫，或者是那台他总焯带在身上，却又总忘记的价格贵重的短波收音机。伊芙琳拨了212，然后转他们纽约的号码，她听电话铃响了八次，正想挂上，突然有人拿起电话。

“喂？”

没有回答。

“纳特吗？”

默然无声。

接着是电话被轻轻挂上的声音。

现在伊芙琳开始焦急了。假设房子里的是个窃贼呢？不，不会的。一个窃贼不会去接电话的。那么是他吗？伊芙琳竭力想把记忆中的那些可怕的詹米斯·威利谋杀犯驱赶出去，她们被称作是职业女谋杀犯。而且她们碰巧就住在离伊芙琳家不远的一栋豪华楼房里。就伊芙琳所知，他们的公寓应该是空着的。清洁女工每天早晨过来为纳特整理房间，但是现在已经是四点钟了——她一点钟就离开。而纳特是唯一还有房子钥匙的人，那么一定是纳特，不对吗？只是纳特不会拿起电话，然后又挂上。这讲不通。

伊芙琳又给楼里打电话。阿莱克，那个善良的，有点傻的看门人接了电话。他告诉伊芙琳，鲍姆先生之点钟回来后，还没有下来。

伊芙琳坐在幸福街那座别墅大厅里电话机旁的温莎椅子上，透过玻璃窗向外望着，她弄不明白。冰箱里装了龙虾和香槟酒，房间里摆满了鲜花，她心中充满了期待。显然，纳特被堵塞在他们纽约的公寓里，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他没有真的被五十大寿扰乱。

难道他是真的？

显而易见，他是真的。

伊芙琳每半小时拨一次电话，但是象她多多少少预料到的，没有回答。她回忆起自己到四十岁的时候，她没有特别地高兴。那是在人们、包括她自己的女儿都宣称，他们不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时代。四十岁使她意识到用不了几年她就会闭经。闭经了她就再也不会有孩子——虽然这些年来，她已习惯了不会再有孩子的想法。四十岁使她意识到时光的流逝，但既然她对此无能为力，她也就接受广它。

而这一点的确是她与纳特之间的不同之处；她接受命运的安排，而纳特同它们斗争。伊芙琳不知是接受好，还是斗争好。有时候她想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要与不可征服的命运上抗争呢？另一些时候，她不希望自己能象纳特。假如他不去抗争，就不会有他们之间的婚姻，不会有艾尔法公司，不会有幸福的生活。然而伊芙琳仍然弄不明白反抗五十岁的到来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你怎么反抗，你永远也不会赢。

她不断地拨电话。终于，午夜过后，纳特接电话了。

“我一直设法与你通话。”

“我知道。”

“是因为五十岁吗？”

“不是。”他的语调不让她再问下去。

“你知道。”她说，不知再说什么。“你还可以乘明天的早班飞机。我没有告诉你，但是

我安排了一个晚会，一个让你出乎意料的晚会……”当她喋喋不休地讲话时，她感觉到自己像个傻瓜。“我还邀请了你所有的……”

作为回答。他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伊芙琳打电话给所有的客人，告诉他们生日晚会取消了。然后，她乘八点半的飞机去纽约。

十点钟，伊芙琳按响了三楼的门铃，没有回答。她又按了四次，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回答。她对闯进去有点犹豫，因为她对纳特的心情有些恐惧。她又敲了一会儿门，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她便打开手提包，取出钥匙。尽管这是她自己的家，她却有种入侵者的感觉。她对进去感到害怕。她不知她将看到什么？是被截肢断臂的尸体呢，还是难以形容的行为的迹象呢？她告诫自己，她的想法是荒谬的，便走了进去。

“纳特。”她推开门时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回音。她环视了一下厨房，两瓶开口的苏打水放在台子上，一壶速溶咖啡泼在水池里，被水龙头滴下的水冲成一个黑棕色的泥洼。

客厅是空的。除了散扔的星期五《纽约邮报》，满满的一缸烟灰和两个瓦斯酒瓶，一切都整整齐齐。

“纳特？”

他不在书房里，乔伊的房间也没动。伊芙琳继续向前走，来到他们的卧室——她和纳特的卧室，房地产代理人说它是绝佳的卧室。房间里遭到了破坏。床罩被从床上掀了下来。床罩被撕破了，纳特赤裸裸地躺在床垫上一一酣睡，不肯人事。伊芙琳摸了摸他的前额，她的手汗渍渍的。

天花板上那座古香古色的大吊灯歪歪扭扭的垂挂着，上面六个蜡烛形状的小灯泡全被打碎了，床上、地毯上撒满了玻璃碎片。一个陶瓷台灯被摔在墙边。一滩呕吐物一直通到了洗手间。纳特平时放的整整齐齐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领带挂在门把手上，衬衫一半夹在衣柜里，一半露在外面。裤子扔在伊芙琳的梳妆台上。内衣裤被踢在床下。在闷热的七月里，房间里散发出的味道就仿佛是在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大屠杀。

“纳特？”他死沉沉的，没有反应。

伊芙琳走进洗澡间，去取毛巾和浴巾，她至少可以为他揩去汗，使他清醒过来。可当她看到洗澡间，她呆住了。她的几瓶香水全撒在瓷砖地上。所有的毛巾——浴巾、擦手巾——都扔在地上，浸泡在香水和玻璃碎片中。房间里所有易碎的东西全被打碎了；洗面池上的镜子、镜子两侧化妆用的灯，淋浴间的门，盛放化妆品、洗液、漱口液的三个玻璃架。一管牙膏涂抹在浴室防滑垫上。胭脂撒得到处都是。最后在澡盆对面墙上，是用红唇膏写的几个鲜红的字母：滚你的。伊芙琳贴在墙上和天棚上的粉白色壁纸被彻底糟塌了。

她有好一会儿环视着周围被破坏的一切，对房间遭到的暴力和愤怒迷或不解。猛然，她注意到便池后面那个胶膜避孕套。那上面还沾着阴道流出的粘液——伊芙琳感到诧异，是精液吗？

是纳特的精液吗？

哦，纳特，你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里来？不管她是谁，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你不象你其他朋友们那样把她领到一个旅馆或者是汽车旅店去？为什么你偏要把这肮脏的秘密带回家来？

伊芙琳从柜子里拿出一条浴巾，在冷水龙头下弄湿、拧干。她小心翼翼地绕过洗澡间地上的玻璃碎片，回到卧室里，把毛巾摊放在纳特脸上。

他没动，没睁眼睛，也没说话。

伊芙琳开始收拾房间。她把纳特的衣服都拾起来。在床底下，她发现一条天蓝色比基尼短裤。在床头柜前，她拾到一个陶瓷的窗帘拉手。它是被扯掉了，窗帘绳也断了。她把这些全扔进垃圾桶里。

伊芙琳来到厨房，从装日用品的柜子里拿出畚箕、刷子，开始清理洗澡间。她先把地上大的玻璃碎片捡起来，用拖布擦去撒在地上的香水、漱口液，和到处都是的胭脂。然后用吸尘器吸地上的小碎片，她能听见它们被吸进去的声音。吸完之后，她开始擦洗洗面池和澡盆。她用克力耐克斯手纸捡起那个避孕套，把它连同那个比基尼短裤、窗帘把手一起扔进了垃圾桶。接着她开始用干洗剂擦抹用红唇膏和涂在墙上的字。她只是把字母弄得模糊了。在墙壁纸上留下一道漂白的痕迹，这壁纸得撕去重贴。

伊芙琳又小心翼翼地拾起地上所有的毛巾、浴巾；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然后把它们送到楼层的垃圾通道。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七月的周末，第五大街上的934号几乎是空的，因此，当垃圾从三楼的通道滑向地下室时，伊芙琳能听到陶瓷拉手落地的声音。

她希望她能象扔掉垃圾一样容易地把脑中的想法和记忆都扔掉。

伊芙琳回来，把厨房清理了一下，给自己弄了杯咖啡。她把咖啡端到卧室，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她仔细观察纳特，仿佛通过观察她能够理解他。他在吸尘器的嘈杂声中，在自来水的哗哗流淌中，在她的喊声中，一直呼呼大睡。她奇怪，除了酒精之外，他还喝了什么。

那天下午三点钟，他醒了过来。

“你在这干什么？”他问

“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

“我不想谈这个。”

“我想。”

“以后吧。”他说，接着又不醒人事——或者是酣睡，或者是什么。

“这没什么意思。”纳特在谈那个女孩。“我但愿没发生这事。”

“她是谁？”

“我不知道，我从酒吧问带来的。”

“你为什么把她带到这儿来？”

伊芙琳不愿意扮演一个被出卖的妻子的角色，她不愿意去逼问纳特。可是她是名正言顺的妻子，纳特知道这个。他能这么做，她就有权力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带到我的卧室里来？”

纳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了这些。”他用手挥了一下这个房间。被毁坏的痕迹很明显——歪曲的吊灯、沾满了污渍的地毯，扯断了的窗帘绳。

“你们扭打了吗？”伊芙琳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纳特不知道是谁毁坏了这个房间，是他自己，是那个女孩，还是他们俩一起。他纳闷，究竟什么样的魔鬼附在他身上。他惊异，那魔鬼能在他身上，而他却无法知道它，不能去控制它，他害怕那魔鬼，也害怕他自己。

到了八点半钟，伊芙琳煎了一些鸡蛋，烤了几片面包，纳特就着两筒可乐把它吃下去。他们在卧室里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

“我当时醉得很厉害……”

“那么你领来的也是醉鬼？”

纳特点点头。

“我只是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我晕了过去，现在我感觉很不好受。”

“是醉酒后的作用吗？”

“比那更糟。”纳特说，“是自责、悔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但愿你没把她领到这儿来。”

“我明白。”

“你可以把她带到旅馆去。”

“伊芙琳……”

“只是别把你的娼妇带到我的房间里来。”

“伊芙琳，就这一次，一个晚上，它说明不了什么。”

“对我可说明了问题。”伊芙琳好多年就已经知道或者说是猜到，纳特瞒着她干这种事。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做这种事。但是，只要他不领导家里来，她就可以装作没有那事或者即使有，她也不怎么在乎。

“这样的卡不会再发生。”纳特说，“我保证。”

“什么事不再发生，是你不再搞女人呢，还是你不再把她们领到这儿来，”

纳特看着她。

“不要折磨我了，伊芙琳，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够厉害的了。”

纳特睡了几乎整个星期天。醒来时，只是吃了点冰淇淋，喝了几瓶苏打水。他看了一会电视节目，星期一早晨他说感觉不好。

“你为什么不到坎塔特克岛去过一周。”

这是一个勒索，但，是一个有意义的勒索。这是伊芙琳对纳特以往忠贞肯定的一个方式，也是纳特承认自己罪过的途径。如果这只是一笔商业交易，而不是婚姻，你会认为它是不错。双方都可以取胜。伊芙琳挽救了她的自尊心，纳特以他的忏悔，得到了她的饶恕。然而，他们谁都意识到，那自尊心只不过是感情上的装饰品，而且那饶恕是没有价值标签的。

纳特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他要休一周假，伊芙琳订电话，找人来在浴室重安一个淋浴门，并更换墙壁纸。她交给看门人一串钥匙，告诉他让来干活的人到三层楼来。

她很高兴。当他们看到乱涂在墙上的“滚你的”那几个字时，她不必在场了。

翌年，伊芙琳发现了一个过去自己从未意识到的问题：她发现自己是孤独的。

乔伊搬出去独自住已经有一年了。伊芙琳的母亲搬到福特·罗德代尔一套小公寓里去住，在那，她的全部那光用来打纸牌或是上瑜伽课。纳特整日独自饮着威士忌。他总在冰箱里放一瓶威士忌，每晚上一回到家，便一边读报一边嚼饮着冰镇的威士忌。晚饭后，他又重新喝起来，直到酩酊大醉。

他不向伊芙琳发火，他不辱骂，侮辱、责备她，他只是不理她。

伊芙琳有许多事想与他谈，却不敢提起；她想与他谈谈那避孕套的事，乔伊的事，纳特的酗酒，他们的婚姻的精神迈向欧米伽点，天人合一。上帝是进化的最终归宿。他们名存实亡的性生活，她想帮助他的渴望，谈谈将来和过去。伊芙琳脑中有许许多多的想法，而每一种都是一个布满荆棘的陷阱。

偶尔，纳特也会半醉半醒地滔滔不绝讲自己的失败。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雄心大志——都变得令人失望他说没有一件事，象他二十五岁时设想的那样。他没有在爵士乐这个领域里成为强人。他没有做过他希望的那么多旅行，他没有勾引上那些最迷人的绝色女人。他只是另一个人——为赚钱，去为那些穷人生产一些知识磁带，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去求教十一个心理学家、老师或者是宗教导师。现在他已经五十出头了，可他整个倒霉的一生毫无成就。

伊芙琳竭力向他说明，他的想法是不对的。她说，他在事业上已经很成功，他已经赚了多少钱；她还仍然爱他，需要他，乔伊崇拜他，听信他的每一句话；她说他拥有一切——聪明的头脑，健壮的身体以及足够的钱去做任何随心所欲的事；他有相貌、精力、幽默及魅力。

纳特告诉她，她说的全是谎话。

伊芙琳渴望能有个人与她谈谈。她的女儿她很少能见到，而且她公开地蔑视伊芙琳，对她母亲在婚姻问题上的教诲不屑一顾，并且运用“你总是把好事想成坏事”来回敬她。

妇女解放运动的那些领袖们正在谈论着意识的觉醒和妇女同胞会的问题。伊芙琳有时希望自己是三十岁，是被解放的女人，而不是四十四岁，孤独的女人。过去她从没意识到自己没有朋友：她只顾忙于照料家庭，抚育孩子，迎合丈夫，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当然，她也认识一些女人，但是她们也象她完全一样：都是妻子和母亲。她不知道她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她想知道她们是怎样处理的。可是她永远无法知道，因为她们这一代妇女是在不能谈论“私人生活”的教育下长大的。伊芙琳则是一个保持缄默密约的牺牲品，这个密约使她与外界隔离，孤独寂寞。

1970年很快就过度到1971年。伊芙琳决定关闭坎塔克特岛上的别墅。除了害怕的原因外，她说不出为什么这么做。乔伊和她的男朋友到欧洲去了。伊芙琳告诉纳特，她想在城里度过这个夏天，陪伴他。

纳特说，随她的便，他不在意。

两个重大的时刻就象两座锯齿的山峰，迫在眉睫：一个是他们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一是纳特五十一周岁生日。有意无意地，伊芙琳感到紧张。她从没跟纳特谈过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场灾难，从没跟他讨论过他的行为。她太恐惧了。现在又有两个重要的时候要到来，她更加恐惧。她想象不出最可怕的会是什么。她明白不能去搞什么大的庆祝，她只是小心谨慎地等待纳特有所暗示。他一直是奇怪地平静，伊芙琳对这个纪念日是如此紧张，所以当纳特在纪念日那天送给她那个难以置信的礼物时，令她大吃一惊。

乔伊从哥本哈根打来电话，祝他们幸福愉快。晚上，他们独自去考特巴斯克吃晚餐。当他们喝咖啡时，纳特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盒，送给伊芙琳。盒里是一个圆的大钻石戒指，上面镶着一颗五克拉的绿宝石。

“你不必买这个。”

“你不记得了吗？我曾许诺给你买个钻石戒指。”

伊芙琳想起了那个诺言。那是他们刚订婚不久，纳特许下的。当时他们就坐在她父母家客厅里的沙发上……真难以相信二十五年过去了。

“只是我觉得，绿宝石配绿眼睛比钻石更美。我答应你一”个钻石戒指，但我觉得绿宝石更漂亮。所以来个折衷：我两样都给你买了。”

伊芙琳把戒指戴在手上。它的份量很重。它使伊芙琳悲伤地意识到自己这双字在二十五年

中的巨大变化，手背上筋骨凸出，长着一块块、棕色的斑。伊芙琳痛恨岁月使她这双手变得不如那戒指漂亮。

“谢谢。”她说，然后又重复一遍。“你不必买这个。”

“你应该得到这个戒指，为了你对我的容忍，”他说。

他说话时，脸上戒备的表情没有了。这是他对给自己给伊芙琳造成的伤害所表示的最多的歉意，它使伊芙琳回忆起几年前，偶然见过的那个没有信心的男孩子。回忆使她热泪盈眶，绿宝石在泪光中闪烁。连纳特，这个总是把感情隐藏起来的人也似乎被感动了。有好长时间，他们谁也没说话。那天晚上，他们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睡在对方的臂弯里。

纳特的举动使伊芙琳鼓起了勇气去问纳特他生日喜欢搞点什么。她总是喜欢大场面，而他总是恨大场面。最后，他们达成一个互相让步的协议。邀请海尔顿夫妇来吃晚餐。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维克多·海尔顿，同往常一样，厚颜无耻地向伊芙琳调情，而弗兰西内·海尔顿，也同往常一样，一声不响地陶醉于威士忌。她从来不习惯自己的丈夫这样公开地勾引别的女人。酒帮助她对丈夫的行为视而不见。

夏天悄悄地过去了。到八月底，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事。

“我合法了！”纳特大声喊着。他衣冠不整地从正门跑进来，一只胳膊下夹着一瓶冰镇花盖酒，另一只胳膊捧着一大束红、白玫瑰花。他这么激动，使得伊芙琳担心他是否喝醉酒了。

当他们喝香槟酒庆祝时，纳特向伊芙琳讲了他同J·S公司的所有交易。看起来是与J·S公司的联盟，和J·S公司已建立起来的声望使纳特变的如此激动。象以往许多次一样，伊芙琳对丈夫，口此看重声望感到迷惑；对纳特仍然如此拼命地奋斗，而还是个可怜的犹太人感到迷惑。

“到五十岁，生活还没有结束！”纳特说。

“看，”伊芙琳想反驳，却不能。“我当时告诉过你。”

“我当时不够精明，听不进去。”纳特说。他们到市中心艾尔法罗餐馆，要了西班牙风味，又庆祝了一番。

整个秋天、冬天，纳特心情一直很好。他谈论自己今后的打算；谈论成立一个出版公司；谈论也许卖掉艾尔法公司。他说，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有些是很诱人的。还有时间扩大他的生意，真正的大生意。纳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辛勤工作，他在办公室里花费的时间更多了。有时候，甚至星期六也不回来。他仿佛发现了一个新的精力和热情的源泉。而他的心情感染了伊芙琳，她觉得自己又有了生命，而这完全归功于纳特。因为他和她交谈，他和她做爱，他使她幸福。

伊芙琳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所庆祝的那个快乐的事件竟是纳特对另一个女人征服的成功——一个更年轻、更漂亮、更值得弄到手的女人。

这种三角关系要存在下去，需要三方面的努力。纳特的努力是积极主动建立起了这种关系。巴巴拉的配合是知道这种关系，而伊芙琳的默契是不出场。伊芙琳接受了这种关系，她对纳特的种种借口和解释从没追问过。尽管事实上她有些疑问，但是她害怕得到回答。所以也就从没问过。

这种三角关系要存在下去，还需要三个补充的要素：爱、权力和危险。它们就象物理学上的那些成份一样，一旦被混合在一起，就会爆发出所蕴藏的极大热量。

纳特。鲍姆象其它沉浸在三角关系中的人一样，开始他认为是能够主宰这种关系的。

纳特象所有的人一样，喜欢爱，而且他在其喜欢被两个女人所爱。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两倍的爱意味着两倍的精力。他从巴巴拉的床到他妻子的床，都得到了性的极大满足。巴巴拉的爱使他相信伊芙琳的爱，而伊芙琳的爱又使他坚持了对巴巴拉的爱。最后，他开始爱自己。这种自爱超过了他从那两个女人身上获得的爱。自自己是纳特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三角关系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情报偿。

象所有人一样，纳特也需要权力。而他在办公室里的权力——雇佣和解雇权，表扬和批评权——早已变得枯燥无味。他已经证实他有力量比他父亲、他的朋友赚更多的钱。纳特需要更多的权力。他需要绝对的权力，而一个民主社会能允许实施这种绝对权力的唯一竞技场，是操纵两个为争夺他而搏斗、竞争的女人。

象所有人一样，纳特发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构里，危险都是不可阻挡的。对权力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引导他去铤而走险。而且这种危险是有麻醉性的，它使你的欲望永远不能得到满足。而且，对权力的欲望会越来越大。

象所有人一样，纳特并不明白三角关系的动力学。他只知道很久以来，自己第一次对生活这么有激情，这么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年轻、有力，主宰一切。他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强

求更多的爱，实施更多的权力，增加危险这个麻醉剂的剂量。最后，他认为被自己所控制的三角关系主宰了他。

对纳特说来，这种三角关系是一件艺术品，而他则是制造这件艺术品的艺术家。他觉得在同一天里邀请妻子和情妇分别在相继两周里到伊罗萨拉陪伴他，特别令人心满意足，富有诗意。他知道当一架飞机把巴巴拉带走，而另一架飞机把妻子送给他，会使他感到特别高兴。他不只是觉得自己控制着这三角关系，还觉得自己也控制着那两班飞机所经过的航线。

他一直以向巴巴拉求婚这个想法自娱。一次他开玩笑，称她为纳栅·鲍姆。他爱巴巴拉，向她求婚是增加那危险程度的一个方法。但他也意识到求婚可能使他陷入绝境，所以他抵制住了那不可抑制的想法，一直没做任何明确的表示。直到在机场上，他一时冲动，请求巴巴拉和他结婚，他在最后一刻里，在巴巴拉无法回答他的时候提出了这个请求。而她的无法回答使得他的赌注没有输。他又一次冒了风险——又一次赢了。

他爱巴巴拉，所以他向她求婚那一刻里，他是真心的。然而，三小时之后，当伊芙琳乘坐的飞机抵达时，他的确是非常高兴见到她。

与妻子度过的一周和与情妇度过的一周，情趣截然不同。

纳特和伊芙琳利用了那间奢侈大房间里提供的所有设施，他们包了一架单发动机的小飞机到附近一座无名岛上。他们在那白色、耀眼的沙滩上晒日光浴，吃着早晨厨师给他们包装好的快餐。玫瑰葡萄酒使他们有点醉了，在返程的飞机上，他们昏昏沉沉睡了一觉。

他们乘小渔船到附近去钓鲸鱼。这是一个极好的运动。但是当伊芙琳听说鲸鱼不好吃，并且听说那天晚上他们要吃的是鱼片而不是他们自己钓的鲸鱼时，她有点失望。

他们滑冰，游泳，潜泳，或者乘蓝白色的小帆船。一天晚上，他们去了纳索，在赌桌前过了一夜，走时赢了一千一百美元。

纳特喜欢桑纳洛，而伊芙琳在大理石浴盆中放松自己。她有趣地望着水龙头流出的水把洗澡油驱散开。这种奢侈的生活只有电影明星和那些女继承人才有能力享受。他们每天晚上，穿着整齐到外面吃晚餐。他们坐在擦的焊亮的餐桌前，品尝由一位高级印地安厨师做的精美饭菜，并由一个带白手套的男仆为他们服务，斟酒。

他们有一次曾在房子前面私人浴场的阳光下做爱。并且，他们每天晚上都在那间大卧室里的大床上做爱。

然而，没有一丝痕迹显露出一个星期以前，曾经有另一个女人同他睡在这张床上。

在巴巴拉·罗斯打电话给伊芙琳告诉她纳特想离婚之前，没有一点迹象向伊芙琳表明巴巴拉已闯入了她精心编织的平静生活，伊芙琳没等巴巴拉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她下想再听下去——但是巴巴拉的声音在她脑中却无法抹去。

伊芙琳很想知道纳特与那个给她来电话的女人来往有多久了。她奇怪为什么自己连一次也没向他提出过心中曾产生过的疑问，而且很快地把它们压了回去。然而，她最想知道的还是巴巴拉·罗斯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长得什么样，多大年龄，在什么地方买衣服，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了纳特，谁勾引了准。

伊芙琳决定等纳特回来。她要让他讲出这事。她要把耐他的愤怒、谴责、威胁全爆发出来。她要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她要让他回答她的每一个问题，并且她要弄清楚他打算怎么办。可当黑夜逝去清晨来临而纳特还没回来时，伊芙琳除了那种她自己几乎无法控制的愤怒之外，又不由自主地陷入对纳特的担忧之中。她担心纳特会发生什么事。他没有回来的事实对伊芙琳是最严重的惩罚。这使伊芙琳精疲力尽。她忘却了他的不在，他的残酷无情，他的炫耀。到后来，她甚至怀疑那个电话会不会是个笑话，她是不是听错了。

第二天早晨十点，当伊芙琳听到开门钥匙声时，她曾希望是纳特回来了。但不是他，是女佣人丽迪亚。一刹那，她想到把纳特睡的那一面床弄乱言两大学派。这两个学派之下又各有分支派。人工语言学派，因为她不愿意让女佣知道她丈夫整夜没回来。

但是她抑制住了这种冲动，觉得这样做很虚伪。丽迪亚对纳特不回来睡觉已经习以为常。假如说她对此有什么想法，她也从没说过一字。因为按照纳特的说法，那些夜晚他不是费城、波士顿就是在芝加哥。现在，伊芙琳明白了，那些夜晚，他是与巴巴拉·罗斯睡在一起的。

那天，伊芙琳没有去梳洗打扮。她准备出去。她恨自己这么做，但她不愿错过纳特的电话。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希望他回来时，她在家里。

晚上六点钟，她听到他开门的钥匙声，她用长袍紧裹着睡衣。尽管她演习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对话，但她还是紧张得不知要说什么。她从卧室出来，走进客厅。

“上帝。”纳特把邮报扔在沙发上。“你看起来很糟糕。”他在酒柜前给自己搅拌威士忌加苏打水。“想喝点吗？”

“你到哪去了？”伊芙琳问。他随便地、毫无准备地站在那，小心为他的饮料切着柠檬，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外面。”他说，“你知道我们男人。”他向她眨了眨眼睛。

“你要离婚吗？”伊芙琳问，想结束与他兜圈子。她想让他自己讲出那件事。

“哦，是那事。”

“是那事。”

“我们当时都有点头脑发热。你知道会怎么样？”纳特坐在沙发上，象以往那样，脱掉鞋，把脚放到不锈钢玻璃咖啡桌上。伊芙琳料想他可能会把报纸翻到股票市场那几页，看结尾的价格。

“是我们吗？”她问。

“是我和巴巴拉。”他说。

“她是你的情妇。”这是一句断言。

“每人都有。不对吗？”纳特说，“我是说每人能养得起的人。”

“这不是一件东西，你可以去买。”伊芙琳说。

纳特耸耸肩，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

“你想怎么办？”伊芙琳想要一个回答，她想要他做出一个决定。房间里弥漫的生气和活力令她难以忍受。

“我要做什么？”纳特大声问自己。他好象是想了一会儿，然后，他望着伊芙琳，脸上一副茫然的神情，这是他第一次正视她的目光。他答道：

“没什么，我不想做任何事。”

当护士把伊芙琳领进莱奥·阿姆斯特医生的办公室时。她的病例卡放在医生的办公桌上。阿姆斯特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鼻上架着一副宽边方形眼镜。尽管他为纳特、伊芙琳和乔伊做家庭医生有十四年了，可伊芙琳仍然不能肯定，他是否确切地知道她是谁，或者他只是按照病例卡上的记录来判断他的病人。

“失眠，我睡不着觉。”她说。

这是真的。并且失眠的原因是纳特引起的也是真的。可是你怎么能请求医生去医治由于丈夫不忠带来的病症呢？

“你睡不着觉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星期，”伊芙琳说。

是巴巴拉打电话之后的两个星期。是不知道纳特能否回家来的两个星期。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伊芙琳也知道了，纳特便随心所欲地住在外面，他把这当成是签了字的许可。

“有其它症状吗？”医生问。

“没有。”

丈夫有个情妇的事实也是个症状吗？

“大便正常吗？恶心吗？有没有不正常的流血？月经规则吗？饮食习惯有变化吗？”

“都没有。”

“让我来看看你。”

他给她听了心脏，试了血压和体温，检查了乳房和腹部。他又看了看她的耳朵，几年前他曾给她治过中耳炎。护士从她中指取了一点血做化验，又给她一个搪瓷容器，让她留点尿化验用。这两个化验就在阿姆斯特办公室里进行的。

“你多大年纪？”他看了看病例卡。“四十六岁吗？”伊芙琳点点头。

“就我看来，你身体很健康。”

“可我睡不着觉，精疲力尽。”

“想要睡觉药吗？”阿姆斯特医生对使用各种伪装的症状，来骗取巴比士酸盐处方的那些人们已习以为常。鲍姆夫人甚至不加伪装。

伊芙琳不知怎样说要，所以她说了个不要。

“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愿意开这种药的处方。”医生说，“让我们再重复一个问题，你的月经正常吗？”

“来得很准时。”伊芙琳仔细想了想。“也许血比以前少一点。”

“流血少吗？”医生问。

伊芙琳点点头，“我想是这样的。”

医生笑了。

她说的什么话使他开心了？

“流血减少，”他喃喃他说，“这是不科学的。但考虑你这个年龄，也可能是绝经前兆。”

“什么是绝经前兆？”伊芙琳从没听说过这个同。

“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全身系统正准备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忧虑的。许多妇女都有这个预备症状：恶心，疲倦，失眠。”阿姆斯特医生又笑了笑。他不喜欢他的患者有他无法讲述的症状。他喜欢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他要做的。

鲍姆夫人开始哭泣。

又一个症状，医生想。他很高兴自己的判断被证明是对的。哭泣。他默默地从桌子上的盒子里拿出克里耐克斯牌纸巾递给她。

衰老，绝经。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她才四十六岁，还很年轻。绝经对她还太早。

“不要哭，这没什么可哭的。想一想，你再也不必被那每月一次的麻烦事所订扰了。”

阿姆斯特医生想，压抑是另外一个症状。它很呵能是体内内分泌系统巨大变化的结果。奇怪的是，一些妇女竟一点也不受到影响。阿姆斯特医生认为这只是医学界里无数神秘事物中的又一个奥秘。

他给伊芙琳开了一个伊拉维尔的处方，并告诉她这药能帮助她度过一段虽然困难，但在妇女生活经历中却很正常的时期。

伊芙琳拿着处方去卡尔里勒旅馆的药房去取药。当她等着医生拿药时，她意识到她喜欢那个每月一次的麻烦事。因为它使她感到健康，感到完整。她喜欢它，欢迎它每月的到来。她感到自己是个女人，她不愿意任何东西、任何人把它带走。她不愿意时光、年龄、或阿姆斯特的话能把它带走。

药剂师递给她一个装着药片的小圆玻璃瓶。当伊芙琳去付款处时，她冲动地拾起一包唐帕克斯，因为那熟悉的蓝图案使她感到有希望。它比阿姆斯特医生那些话更有效。它使她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一切都没有好。

伊拉维尔没有起作用。纳特比以前更公然，更着迷、更坚定。伊芙琳没法与他面对面交谈，去阻止他，让他做出抉择。但是一切都没有用。假如在他的盔甲上有道裂缝，假如他有某一处易受打动，伊芙琳也不知道它们在那。她不知道怎样去了解他。而他却以他的魅力、愤怒和冷漠，日复一日地在摧毁她。

魅力是：

“你打算怎么办？纳特。”

“什么怎么办？”

“你明白，关于我和巴巴拉。”

“也许那是一时的迷恋。”他说。

“什么是一时的迷恋？是她还是我？”

“你们俩。”他会说。然后设法，有时会成功地把她弄到床上。——

愤怒是：

“纳特，我无法忍受这个。”

“我也忍受不了你的唠叨。”“纳特，不能这样下去了。你不能一脚踩两只船。”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受不了，这使我感到耻辱。”她总设法忍着不哭出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随时可以走开。”

“但我不想走开。”走？她到那儿去？她能做什么？走是最不可能的选择。“那么给你自己找个情人。”他说，“只是别烦扰我。”

冷淡是：“纳特，这状况什么时候能结束？”

“别问我，我不知道。”“纳特，你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事。”

“我不想谈这个。”他是折磨人的大师。而她没有对付他的武器。一件也没有。

五月转瞬间进入六月，六月一眨眼又到了七月。纳特告诉伊芙琳，他要到阿蒙哥塞特去过国庆节，并明确表示不邀请她去。

伊芙琳坐在床上——他们的床上——看着纳特打点行装。

游泳裤。在海滩穿的条纹毛巾长袍。白亚麻裤子。

“你真的要走。”

“我告诉你了。”

苏珊洗液，刮脸用具，牙膏，牙刷。

“我没真的相信。”

“那是你的不幸。”

“可是，你想找会干什么？”

“任何你喜欢干的事。我们是现代化的婚姻。”

“纳特……”

海军运动茄克，淡蓝色白条衬衫，内衣内裤。

“纳特，我要去看精神病医生。”几个星期以来，伊芙琳直考虑这件事，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赌博。她甚至不能肯定自己会有勇气去赴约。她希望，或许纳特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意识到他已把她推向了近乎绝望的边缘。

“祝你走运。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精神医生。”

“你也想去吗？”伊芙琳小心地问，“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

“我。”

开士米羊毛衫，大蓝色佩兹利领带，网球运动短裤。

“我不会去付别人钱，让他们使我变得畏缩。我感兴趣的是别人付给我钱。你知道我能使一些精神病医生成名吗？”

“它可能会帮助——你——我们。”

纳特背向伊芙琳，她看着他找衣柜底部鞋架上的鞋。

“喂，你知道我的网球鞋在哪吗？”

在中央公园西部一座豪华的旧式建筑物——曼彻斯特楼柯雷格·莱顿医生那间难以形容的米色办公室里，伊芙琳开始接受治疗。

从七月初开始，伊芙琳每周四次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她从七十二街下车，穿过几条马路到曼彻斯特楼，然后，来坐黑铁门的老式电梯到七楼。她走进莱顿医生的办公室里，躺在他的长沙发椅上，开始哭。很明显，莱顿医生办公室里白色的克里耐克斯牌纸巾有源源不断的供应。伊芙琳觉得在医生这一行业中克里耐克斯肯定是必备的附品。她感到自己至少用完了莱顿医生一年的克里耐克斯。她一生中从没流过这么多眼泪。而哭对她是一种极大的解脱。这奢侈的泪水很值得每五十分钟花四十五美元。

伊芙琳问莱顿医生能否给她一些镇静药。

“你没有它不行吗？”他问“我倒希望你能设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什么？我花费了整整一生去设法控制我的感情。而你看看，现在它把我带到哪来了？这里。”她用手指着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

患者说得有道理。医生给她开了处方。瓦利姆有镇静作用。当伊芙琳第四次来时，她不哭了，开始谈话。

“我伤心。”她说。

“什么使你伤心？”

“所有的事。”

他们开始进行对伊芙琳生活方式的剖析。她生活的方式都是失败的。

伊芙琳惊奇地发现她与乔伊的关系与她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完全一样。伊芙琳和她母亲曾是很疏远的。她们从没有一次在一起亲密地交谈过，她们也从没有一次相互吐露过自己真实的生活。对伊芙琳来说，她母亲是个谜。现在她意识到她自己对乔伊也一定是个谜。这两种关系唯一的不同是，伊芙琳生长在一个孩子们把尊重父母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时代；而乔伊生长在一个孩子们把仇视、公开反抗父母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时代。然而，这两种以伊芙琳为中心连接起来的两种母女关系都是以疏远、分离、完全缺乏亲昵关系为特征。

伊芙琳对自己不能再生孩子，性的冷淡以及因此在纳特身上产生的反应都做了检查。结果，她惊奇地发现，她期待从她丈夫身上得到的是，同她认为理所当然从她父亲那得到的完全一样：她要求他的是完全忠诚，自己则是彻底地从属于他。她想让他成为父亲，自己成为孩子。“但是父亲与丈夫是不同的！”她惊奇他说。这是伊芙琳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我是一个四十六岁的婴儿。”伊芙琳说。他们继续剖析她的生活，找出她为什么不能自信，她为什么不能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为什么在与乔伊的关系中失败，她为什么在与纳特的关系中失败。假如失败这个话题使人感到压抑，那么伊芙琳对自己失败的发现对她来说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启示。

纳特椰榆伊芙琳，能得到纽约唯一的一个享有白人特权优越感的精神病医生治疗。

“所有好的犹太精神病医生，八月份都离开这里。”纳特说，“我打赌，这个讨厌的家伙二月份要去某个异教徒胜地。”

“假如你能停止侮辱我的精神病医生，我将非常感激，”伊芙琳说。

纳特没说话。

这是伊芙琳第一次在与纳特拌嘴中说了最后一句话。上帝，二十六年才第一次。

九月，黑人恐怖主义者侵袭了慕尼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鲍比·费歇尔决定性地击败了鲍里斯·什帕斯基，就在这月中旬一个星期二，伊芙琳从莱顿医生那出来后没有直接回家。她在市区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来到杰里·本戴尔。在一楼，她买了价值两百美元的象牙手镯。在二楼，她花三千美元买了一件猞猁裘皮大衣。在三楼，她在索尼娅妇女时装用品专柜花四百五十美元买了一件针织紧身裤。在四楼，她在美容部花了十美元学习美容。在五楼，她买了六个透明胸罩，六个丝织比基尼内裤，一件双绘睡衣和一件丝绸长袍。

她对自己纵情地挥霍感到特别高兴。

“我在本戴尔花的钱要同纳特在圣·劳伦特花的钱一样多。”她对医生说。

伊芙琳不知道，患者开始在自己身上花钱是病情好转的最典型标志。她也不关心这个。按照医生的理论，这是增强自我的初期表现，是患者想要买一个新的自我的强烈愿望。伊芙琳不知道这个理论，也不懂它的重大意义，她只知道，自从五月份以来，自己第一次心情异样，不感到难受了。

伊芙琳身着紧身裤、猞猁皮大衣，脸上化了妆，去参加一个她不情愿去、而纳特要去的晚会。杰克·艾克斯顿是个股票经纪人。六十年代，他曾创造出一种以哈姆莱待为基础的摇摆音乐，至今仍享有上演税。杰克给纳特的影响很深，尽管纳特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娱乐行业中的某些东西至今仍吸引着纳特。参加杰克晚会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中，经常包括戏剧界的人士。

“天啊！太漂亮了！”西莉维娅·艾克斯顿惊叫着。她用手抚摸着伊芙琳的皮大衣。“是什么皮的？”“猞猁。”伊芙琳答道。纳特小心地吻了吻西莉维娅，他知道最好别去碰坏她脸上的浓妆和假睫毛。之后，他便朝酒吧走去。

“猞猁？我从没听说过。是新的吗？西莉维娅流露出一种悲伤和绝望的嫉妒。

她从伊芙琳身上脱下皮大衣。“我试一下，你介意吗？”没等伊芙琳回答，西莉维娅的一只胳膊已经伸进了皮大衣。

留下西莉维娅在那过分地赞扬那件皮大衣，伊芙琳去向奈德和艾伦·布鲁克打招呼。奈德有时候为纳特撰写一些特别广告。然而他看起来更象个会计，而不象有所成就的广告作家。

布鲁克夫妇正在讲他的十四岁儿子的问题。那个男孩子阅读能力很差。尽管他们愿意付给私人教师一笔钱，请他们帮助那孩子赶上其他孩子，但没有一家好点的私立学校愿意接收他。

“我奇怪，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做了。”伊芙琳嘲弄他说。“我是说，有时候我奇怪为什么我们要了孩子。”她认识的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在内，都与他们的孩子有些麻烦。而他们也曾经是那么热切地盼望有这些孩子。

“谁知道呢？”奈德说，“我那时二十六岁，艾琳二十二岁。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只是有了他们后才明白。”

“我是克拉伦斯·休萨。”伊芙琳身旁一个声音说。他挤进这个小圈子里来，他的酒杯象一把武器举在前面。“我想见到你。”他那毫不掩饰、令人讨厌的目光直对着伊芙琳。克拉伦斯·休萨同他的照片一样漂亮。“我经营不动产。”

“我知道。”伊芙琳说。

克拉伦斯·休萨的房地产生意以其译常的赢利和里面的丑事而闻名。这些高高的，塔式白色建筑都在第一、第二条大街上。里面住满了单身汉——男光棍，空中小姐，养鬃毛狗的寡妇。他们抱怨其它房东的房子质量差。克拉伦斯·休萨原来默默无闻，后来他赚了钱，便盖走了这些楼房。并且每星期天在不动产专栏里登载全篇幅广告和他本人的照片。现在，克拉伦斯·休萨是这个城市里最富有的房地产主。

“我喜欢你的体形。”他对伊芙琳说，贪婪地盯着她的乳房、臀部和大腿。

“这是我丈夫。休萨先生。”纳特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一手拿一杯饮料，把一杯递给伊芙琳，然后向克拉伦斯点点头，休萨电向他点了一下头。他意识到挑战，决定不去竞争。他向纳特做了自我介绍。

“我住第一和第二条街。所有的热闹活动都在那。”

“我们住第五大街。”纳特说。他想让休萨知道，至少他和他是同一等级的。

“我们也是，”休萨说。尽管他在性竞争上退下阵来；但在其它任何方面，他都不愿放弃竞争。“上帝，就是你付给我钱，我也不会去住在我的那些房子里。我只是说所有的热闹活动部在那里。你干哪一行？”

纳特开始回答。伊芙琳走开了。

她停下一会儿，向已经有点醉了的弗兰西内打个招呼，然后她朝房间后面走去，想找到洗手间。尽管克拉伦斯·休萨令人讨厌，但他那粗俗的奉承话却很使她高兴——并且它引起了纳特对她的注意。伊芙琳想找到一个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样。

她把洗手间的门关上锁好。她脸上的妆——粉底、腮红、眼影、口红、一点也没被破坏。出于某种原因，伊芙琳突然想起十四岁的时候。她想起了父母给她买的那个假鼻子。在那之后几年里每当她照镜子，她都仍然会看到那个难看的鼻子。她想起了那次把头发弄直。尽管理发师用了那么多化学药品，尽管理发师技艺高超，尽管她离开理发店时头发是那么漂亮，然而它都没能永远保持下去。在第一个雨天，她的头发根上就出现了小卷。因为美发师害怕伤了她的头皮，在头发根上没使用化学药品。她回忆起母亲根据《十六岁》杂志上的最新建议给她买的那些服装。她想起不管她外表变化有多大，而她内心感觉总是没变：腼腆，内向，保守。她又想起了在他们初恋的一段时期里，和婚后的头几个月里，纳特如何使她确信自己的确很有魅力。

现在，克拉伦斯·休萨那粗鲁的举动在她身上产生了同样的魔力，他使她觉得自己很有魅力。而另一个男人，一个医生，一个向她收费的人帮助了她：他曾鼓励她去花钱给自己买东西，去争回她的魅力，赢回她的丈夫。男人们对她产生影响的威力使她感到恐惧。她担心，假如在她生活中没有一个男人使得她能真实地感受，她会是什么样，她是否能真实地感受。

她在唇上又涂了一点口红，便离开了洗手间。当她打开门时，维克多·海顿正站在那。

“你今晚很漂亮，的确击败了所有的对手。”

维克多向后退了一步，他用手托着伊芙琳下颏，仔细地看着她。“我一直说你是合乎我口味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哪天一起去看场节目。”

“哦，维克多！”伊芙琳已惯于维克多的调情——那种使弗兰西内醉酒的调情，那种也许并没什么伤害的调情。

“不，我说的是真的。你知道，伊芙琳，我真的想得到你。”

“维克多，你醉了。”当他向她逼近时，伊芙琳能闻到他嘴里喷出的酒味。

“我没醉。弗兰西内是个讨厌的母鸡，而我是好色的。我打赌，你在床上肯定是性欲很强的，是不是？”维克多向伊芙琳逼近，把她挤靠在墙上。他用于托起她的乳房，把嘴压在她嘴上。他嘴唇湿漉漉的，他张开嘴，用力将舌头伸进伊芙琳紧闭的牙齿。她掉过头。

“转过来。”他说，“你象我一样想这样做。”

吻又开始了。伊芙琳让它继续了一会儿。维克多说得很对，她很激动。接着，她突然感到害怕，她猛地推开维克多。他向后翘起了半步，看着她，眼里充满了情欲。

“你喜欢。”这是一个谴责，也是一个挑战。“你很激动，别不承认。”他又向她走去。

“不许动我妻子。”纳特在大厅下面出现，向他们走过来。伊芙琳惊恐不安，不知纳特看到了多少。“不许你的脏手碰我妻子！”

纳特怒气冲冲，他以拳击手的姿势望着维克多，准备挥手向他击去，维克多向后退了一步。

“只是吻了一下，”他说，“只是轻轻地吻了一下。”

纳特用目光挫败了他的律师。他又一次在控制别人。

“走吧，伊芙琳。咱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你今晚很漂亮。”当他们到家时，纳特说。他给自己对了一杯轻度威士忌。

“谢谢。”伊芙琳说，“我很高兴你喜欢。”

“我喜欢我的女人漂亮，这有助于我的形象。”

“你的形象？”

“不知道吗？单枪匹马，抗拒历史的潮流。独自保持男子汉沙文主义的传统。”

他半开玩笑、半认真他说。伊芙琳从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这种心境。假如她这样，他会那样。她永远也不会赢。

“纳特，你还与巴巴拉见面吗？”话一出口，她就希望自己没有说。她和莱顿医生决定了最好不去问纳特。大多数时候，伊芙琳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是大多数时候，但不是所有的时候。

男人想要的一切鲍姆都有了：妻子。情妇。她们都爱他，都想得到他，都心甘情愿为得到他去拼搏。

巴巴拉的要求是歇斯底里的，它建筑在他作出过的、但没有遵守的诺言上；伊芙琳的要求是令人窒息的，它们建筑在他的罪过和她对他的占有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纳特从巴巴拉的寓所出来。她要求他离开伊芙琳，搬过来和她住在一起。象以前许多次一样，她以再也不与他见面相威胁。他们进行了一场痛苦的争吵，最后在床上和解。之后，纳特穿上衣服离开巴巴拉的寓所。在回家的路上，他在韦斯伯旅馆的保罗酒吧停下来买个睡帽。

巴巴拉，伊芙琳。巴巴拉，伊芙琳。

在法律上。在感情上，伊芙琳占有他。艾尔法公司百分之六十属于她。当她说如果他要永远离开她，她要让他分文皆无时，她并非在毫无根据的威胁。而且她还占有他身上那一部分——忠诚，温柔，依赖。所以他需要她。

他也需要巴巴拉，她给他以快感。她有地位，有身分。他对她的情欲比对以往他遇见过的任何女人都持续得长久、都更强烈。他不断地想，也许他性的能力会逐渐衰退。但是它没有衰退；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夺战看起来只是增强了这种能力。

伊芙琳，巴巴拉；巴巴拉，伊芙琳。他恨她们，又需要她们。这使他陷入了疯狂的境地。

纳特要了第二杯威士忌，这时他注意到酒吧间最里面那个女孩长得很可爱。金是的长发，小小的乳房，没戴乳罩，大约乔伊那个年纪。她朝他笑笑。他示意让她过来，她便拿起酒杯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他给她付了饮料钱，又为每人要了一杯。喝完之后，他们一起离开酒吧间，到第八大街道东部一个地方她的那套小公寓房间去。

脱衣服时，纳特突然想起了帕尔梅·桑德斯。

他意识到他三十岁时比现在聪明。那时，他知道睡一晚上就结束，没有感情纠缠的性关系对他最合适。

当他与这女孩做爱时，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轻松自由，对付女人的唯一办法是拥有更多的女人。

纳特希望他的妻子和情妇现在能看见他。

1972年10月，杰克·罗伯逊逝世了。他在纳特与伊芙琳恋爱时，曾做过纳特的情敌，诺曼·诺尔也逝世了。他曾为伊芙琳设计了一件晚礼服，她度蜜月时带在身边。1972年10月，伊芙琳正在为她的生活拼搏，然而她失败了。

纳特脑子里的那个想法不断增长，到最后他无法抵制住它了。从办公室回来的路上，他在德拉克旅馆停下来，喝了几杯饮料，然后让一个女孩搭上他的车。她说要去汉特，纳特邀请她到他家里去。

“伊芙琳”他说，“我想让你见……嗯……”

“珍妮。”那女孩子说，表情有点迷惑。她看了看让自己搭车的那个男人，又看看这个女人。她猜想，这女人是他的妻子。

“珍妮？”伊芙琳不知道什么珍妮，她从没听纳特提起过珍妮。珍妮是谁？

“珍妮是我的一个朋友。对吗？”纳特递给珍妮一杯饮料，自己蹣跚自己那杯饮料。他的话含糊不清，他开始有点醉了。

“是这样，”女孩子说。“我们刚刚认识。”

“事实是，”纳特说：“我刚在途中让你搭上了车。不是吗？”

那女孩有点不自在。她是性解放这一代人中的一员，她喜欢非正式的性关系，特别是与有魅力的陌生人，但她不是妓女。

“听着。”那女孩说，“谢谢你为我付了酒钱，”我最好离开这。”

“见鬼，不行。”纳特说，“戏还没开场呢。”

那女孩子从沙发上站起来。突然，伊芙琳明白了纳特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想与这女孩上床睡觉，而且他想让伊芙琳看着他做这事。

“我想你最好走，”伊芙琳对那女孩说。

“很抱歉。噢，伊芙琳。”那女孩说。

“我想我们会很愉快的。”当伊芙琳在那女孩身后关上门时，纳特说。伤害、羞辱和愤怒使伊芙琳想杀了他。她希望自己能把他消灭掉。她对自己这一愿望的强烈而感到害怕。

“滚出去。”她尖叫着，“从这里滚出去！”

“亲爱的。”纳特说。

“滚出去！”她叫着，她一直这样叫喊着，直到他离开了家。

伊芙琳一个星期没听到纳特的消息。最后她接到维克多，海顿的电话。他说，他是以纳特律师身分来跟她通话。他的委托人想知道伊芙琳是否要离婚。

“他呢？纳特想要离婚吗？”伊芙琳对自己不得不向第三者打听她丈夫的想法感到有失身分。

“他没有这么说。他想知道你是否想这么做。”维克多说。

伊芙琳不想离婚，她想要纳特。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还想要他回来。她恨自己想要他回来，因为这意味着要他再来伤害、欺侮、凌辱她，然而她还是想要他。

“维克多，纳特为什么不自己来问我？”

“我不知道，也许是他害怕。你知道你曾对他很粗暴。”

“我？我对他粗暴？”这真是难以置信。伊芙琳疑惑纳特究竟和维克多说了什么。

“他说你把他赶出来了。这很伤他的心。”

“他告诉你他是怎样伤害我的了吗？”

“瞧，伊芙琳，我不是婚姻辩护人，我只是一个律师。”

“维克多？”

“什么事？”

“你也是个朋友，对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当然，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来吃午饭？我想和你谈谈。”

维克多犹豫了一下。

接着，他接受了她的邀请。

“明天吗？”伊芙琳问。

“明天。”维克多说。伊芙琳不能肯定他是否明白了她的意思。也许那人他醉得大厉害了，记不得说过的话了。但是他即使没喝醉时，也总是挑逗她。

伊芙琳给丽迪业放了假。她自己准备了虾仁馅鳄梨，并把水果点心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银制托盘里。她心情很紧张，但很坚定。她想让纳特回来，维克多是使纳特回来的筹码。

他们一直谈些表面的话题。直到吃完鳄梨，伊芙琳才问维克多，自上次见面，他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她让他想起艾克斯顿家的晚会和晚会上发生的那件事。

“有几个星期了。”维克多躲躲闪闪他说。他看起来不大自在。伊芙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局面。她原以为维克多会主动的。毕竟他一直都是很放肆的。

“你喜欢吃点甜食吗？伊芙琳走进厨房，端来那盘点心。她把咖啡壶从餐柜上的加热器上拿下来，给每人倒了一杯咖啡。

“我猜你和纳特有些麻烦事。”维克多说。

“所有的婚姻都有曲折。”伊芙琳说。“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我的婚姻。”

“噢。”

“事实上，我想，我们也许，你知道——”伊芙琳尽可能地直截了当。“你知道，你那天晚上说的话。”

“说什么？”维克多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有点噎住。他从桌上的瓶子里倒了一杯白葡萄酒。

“说你……你和我……”伊芙琳不知道怎么说下去，用什么词，她伸出手臂，把手放在维克多那昂贵的黑丝绸外衣袖口上。看他没有躲开，伊芙琳的手又继续向下移动，开始抚摸他的手背。

“你是让我和你通奸吗？”维克多的表情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他猛地把手拿开。

“你说过你想。”

“我说过许多事情，”

“那个吻……在门厅里。”

“看在上帝的面上，伊芙琳，我是吻了你。可谁知道？也许我还抚摸了你的大腿，那并不说明……”

“不说明什么？”

“我想与你睡觉。”

“你的意思，你只是出于礼貌？”

“有点。”维克多的目光游移不定，他没有看伊芙琳。“人人如此。你知道，我是说讲空话。”

“我不这样。”

“那么你是个例外。”

伊芙琳意识到谈话已转到她这方面来，她恨自己说话的那种嘶嘶的语调，那语调在她听来谨小慎微，就象在大学里，当她告诉埃尼她不能那么做，因为本分女孩干部不那么做时一样。

现在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伊芙琳向一个她以为想得到她的男人先迈出了一步，非常严肃的一步，而他却告诉她，他并不想到那么做。

“维克多，我只是想我们在一起也许不错。”

“伊芙琳。”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喝完杯子里的酒，又倒了一杯。当他喝下一半之后，他的不自在表情仿佛消逝了。“瞧，伊芙琳，我刚过五十六岁。这些日子，我的精力和冲动是有限的，时间很短，但我希望它是为二十岁的女人准备的。我喜欢她们年轻，因为这使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即使只有那么一会儿。”

他靠在椅背上，解开前克衫的扣子，闲手掐住腰。这时，伊芙琳能看见被精心裁剪的衣服掩盖起来的圆滚滚的肌肉。她头一次注意到他面颊上，鼻子上布满了细碎的毛细血管网。他使人感到厌恶。想到他那圆滚滚的，膨胀的身体压在她身上，令她毛骨悚然。她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维克多·海顿上床睡觉。维克多·海顿，湿漉漉的吻。软弱无力的性功能。

“我想，等你六十岁时，你想要二十五岁的。”

维克多摇了摇头。“那时，我想要十五岁。”

“我明白了，伊芙琳说。令人伤心的是，当他六十岁时，他能找到十五岁的人。而她现在还没到五十岁，却不能找到任何人。任何年龄的。”

“瞧，伊芙琳，如果你觉得精力旺盛，给你自己找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能整夜保持不衰的小伙子。相信我的话，你会觉得非常愉快的，值一百万美元。”

“我会想想的，维克多。”

“再见，孩子。”雏儿多走对说，伊芙琳注意到他免去了通常的吻别。

她独自呆在房间里。她把干餐用的碟子堆放在厨房的洗碗机里，把那些座垫放进洗衣篮里。她把维克多留在咖啡桌上的酒杯拿走。又倒空了烟灰罐。当她干完之后，房间看起来仿佛没有人来过。

然而她无法擦去留在心中的痕迹。伊芙琳卸了妆，脱掉衣服，本能地冲了个澡。她习惯于用浴缸，但她觉得淋浴会洗得更干净些。她洗了头发，又用她弟弟送她的一个骆驼毛刷用力擦洗身子。洗完之后，她擦干身子，走进一个大的壁橱，找出一件睡袍。她的衣服挂在衣橱的一面，纳特的挂在另一面。她看见纳特那些昂贵的西服，运动前克衫，裤子，全都整整齐齐地挂在贵重的木制衣架上。纳特喜欢服装，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象个女人：每当他心情不快，他就出去，买些衣服回来。这些衣服都很贵重。都贴着最好的商标，得诺尔，圣·劳伦特，麦拉丹迪，巴塔利拉。她拿出一件前克衫，把它举到鼻子上，那衣服的味道跟他身上的味一样。

伊芙琳走进厨房，拿起一把大刀。那刀是她在詹姆斯纳学烹饪时买的。她把它拿到卧室，她坐在壁橱里的地板上，先从一件棕褐色的马裤呢前克衫开始。纤维织物很难割断，而且那前克衫还是两层，伊芙琳下停地砍，她终于把那件衣服砍成了碎片，变成毛茸茸的一堆，堆在地板上。

接着，她又切碎了一件从麦拉丹迪买来的前克衫。突然，她对砍前克衫感到厌烦，又伸手从衣服挂上拽下一条灰色法兰绒裤子。她先从裤腰开始，切下拉链。不一会，她就把它切成了碎片。

按此方法，她把壁橱里纳特所有的裤子都砍得残缺不全。做完之后。她站起来，关上门，走出来。在壁橱的地板上留下那一堆被毁坏的衣物。

她走到走廊里，拿起一瓶没启封的威士忌，把它拿进洗澡间。她吞下一整瓶的“瓦力母”，它几乎是满满的，因为她上星期才开的这些药。她只剩下十几粒“西科纳尔”胶囊，她便把它们全吞下去，然后把剩下的“乙拉维尔”也吞了下去。她又吃了六片“阿比西林”，那是她耳朵发炎时拿的药。接着，她又把纳特的“唐乃泰尔”，还有医生开的晕船药“康帕基”都吃了下去。医药箱里剩下的唯一药品是半瓶止咳糖浆，她把它也喝了。

当她关药箱时，她照了照镜子，发现她刚洗过，还没有做的头发几乎干了。让头发自然地干，不用卷发器和吹风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它仍然象她十四岁时那么卷曲。她还是不喜欢它。

伊芙琳躺在床上，拿着那瓶威士忌。她迫使自己把它全喝下去。
自由了，她终于自由了。
一个她这个年龄的女人要自由究竟干什么呢？

电话铃响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四十五分了。乔伊坐在沙发上正织着她那条一年前就已开始的麻科罗米肩带（一种粗线编织物），而特里则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餐。特里和乔伊都比较放荡，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开放。这天是星期二，根据贴在公告板上的工作日程，今晚该他做饭。

象往常一样，乔伊拿起了电话。她父亲知道她和特里住在一起，但她母亲不知道，乔伊还不想让她感到震惊。

“爸！”除特里之外，她父亲是乔伊在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能谈得来的人之一。如今她同特里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

“孩子，我有事要告诉你，但不是什么好消息。”

“噢！”她感到纳闷，他究竟想要她干什么。也许她母亲已下定决心，准备强迫她去上一个“象样的”大学，以便使她健康的发展。当乔伊搬出父母家的时候，她母亲就不同意；当乔伊宣布她准备去上大学的时候，她也没有同意；她不喜欢乔伊的那些嬉皮士朋友，也不赞成乔伊在纽约大学旁听的那些电影课程。她母亲不赞成乔伊的生活方式，她不能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时地想方设法使乔伊改变它。尽管这样，她常常还是没有勇气直接同乔伊谈，而让纳特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她父亲是站在她这一边的。他公开大声说，如果他也象她这么大年纪，而且有一个富有的爸爸，他的所作所为将会和她现在一模一样。

“你妈想自杀！”

“什么？”

“她把那些药全吞下去了。她现在正在医院呢！医生们已把药清洗出来，他们说她会好的。”

“她真想自杀？”乔伊简直不能相信。她母亲过着一种世界上最单调乏味的生活，是什么事情如此重要以致使她想要自杀？除非是厌烦，或者是巴巴拉·罗斯？

“是真的！她是真想自杀！”

“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说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乔伊的母亲对她来说完全是个谜。她曾经想，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妈妈呢？她们一直是死对头。从乔伊开始记事起，她们就是对头。当她小的时候，有时她曾想，也许她真是一个孤儿，她父母只是收养了她。只有这样想才能解释她母亲对她的所作所为。“什么事使她想自杀？”

“我”

“你？”突然，乔伊恨起她爸爸来，尽管她真正恨的是她妈。也许他们俩人她都恨，也许她甚至爱他们。毫无疑问，此刻她搞不清楚了。

“我是个该死的东西。”纳特说道。

“是因为巴巴拉吗？”他父亲曾向她介绍过他的女友，但乔伊不知道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或是他父亲和巴巴拉现仍常在一起？乔伊和他父亲双方都同意，各自不打听对方的私生活。

“孩子，你能来一趟吗？我会告诉你一切的！只能是当面告诉你，不能在电话里。行吗？”

“当然可以。”乔伊回答说。她注意到，她父亲并没有回答她提出的问题。

“谢谢！你在我身边，事情将会好些，我需要你。”

这真是大好了。

“至少我还有点用处。”

他们安排七点半在沃希思医院见面，那时晚上探视时间刚开始。

他们道声再见，就挂上了电话。

到这时，乔伊才开始哭泣起来。

尽管他们已立下规矩，晚饭前不抽烟。但乔伊还是问特里，她今天是否可以破例抽一支麻叶烟卷。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我需要它。”

泪珠仍然在她的脸上滚动着。特里把克里耐克斯纸巾盒拿过来。他已把做好的晚餐端下炉

灶。他坐到乔伊身旁，拥抱着她，试图给她些安慰。特里喜欢照料她，但她几乎从不让他照顾，她喜欢独立和自我满足，每当他要拥抱时，她总是把他推开，她说接吻是小孩子的游戏，只有这次她没有反对，接受了他的拥抱，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最后，那烟草开始发挥作用了，使她冷静下来。她对刚才的哭泣，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我家那老太婆自己想寻死，没死成。”这时，乔伊停止了哭泣，紧绷着下巴，下牙紧紧咬住上牙，她努力控制着自己。

“可怜的乔伊！”特里知道，对乔伊的感情作出反应要比对她的话作出反应好得多，他们经常处于直接的对抗中。

“你能想象得出吗，我母亲居然想自杀！”乔伊仍然在努力使自己面对现实。“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使她这么伤心。我猜想，我们家那老头子这次一定把事情弄得很糟，看来他有些不安，我是说他真感到有些不安。”

“我希望是这样。”特里说道。“如果你要想寻死，我也会感到特别不安。”

“是啊，可我还没有想寻死。”乔伊上即反驳道。特里知道，不宜再争论下去。

“我猜想你母亲现在一定没事了。”

“我想她睡一觉就会好的！”

“你要我陪你一块去医院吗？”特里非常想跟她一块上。但他不希望让她感到太明显。

乔伊摇了摇头。

“也许我会对你有所帮助。”她的拒绝使他感到有些难过。特里爱乔伊，但乔伊又是一个爱起来十分困难的人。

“你不要想去，那将是一个令人忧郁的场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会处理的。”乔伊感到，特里总是想帮助别人，他的麻烦就在于他这个人待人太好了。他让大家包括她自己，都从他身上踩过。

“我爱你！”特里说。

“我饿了。”乔伊说道。抽过烟草后，她总是有这个感觉。

特里已把晚饭做好：鸡，大米饭，南瓜和白葡萄酒。当他把饭菜端到日光室里的桌子子上后，乔伊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坐下吃饭之前，她紧紧地拥抱住特里。

“我也爱你。”她说，“尽管我是个坏女人。”

乔伊经常说她自己是个坏女人。这样她既辱骂了自己，同时又坚持了自己的权利。当她受到威胁时，她就表现得象一个坏女人。这是她学会的唯一的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她越是感到害怕，反抗得就越厉害。这既是她进攻的办法，也是她防御的办法。

乔伊是个坏女人，也是一个善于抒发感情的人。她是一架制作极其精巧灵敏的收发机械装置，极其脆弱，而又极其小心翼翼。她感情外露。她也曾努力使自己的感情不外露。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认识到，她母亲是她的敌人，而她父亲则是她的朋友，那时她已学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她知道怎样打败她母亲，怎样拉拢她父亲。

1963年，当乔伊才11岁的时候，六十年代开始显露出时代特征。

摇摆舞在六十年代十分盛行。1963年，披头士乐进入美国，并征服了美国。在六十年代，先是口香糖摇摆舞，后来是艺术摇摆舞，最后发展到幻觉摇摆舞。随着这些摇摆舞的演变，先后出了约翰、保罗、乔治和赖因戈等明星。

六十年代的广播、广视上也尽是摇摆舞曲。

肯尼迪总统遭枪击，电视记者立即赶往现场并转播，其葬礼电视台还安排作为特别节目播出。奥森与哈里特，会飞的修女，我心爱的火星人，越南战争，约翰尼·尤里塔斯，约翰尼·卡森以及万宝路都在同一频道使用同一功率播出。电视使乔伊着了迷。电视给她带来即刻的欢乐，即刻的痛苦和即刻的兴奋。事实与虚构混杂在一起，由模糊产生幻觉。

这是一个电子时代，是全球性时代。十一岁的乔伊对能耳闻目睹这一切感到满足。1964年，当乔伊十四岁时，她则想亲自参与到这个世界中的事情中来。

秋季，乔伊就要到一个叫阿兹利的新学校上学了。这学校名望颇高，因此她父母把她转入这个学校时也经历了一番周折。她接受了两次测试，当她最终被接收入学时，她父母曾不止一次地对她说，她是非常幸运的。然而，乔伊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她对什么事都不愿意多告诉他们，每当她一想到新的学校和新的伙伴时，她就感到害怕。她同老学校的朋友们都已相互混熟，她对是否会喜欢新伙伴或新伙伴是否会喜欢她感到没有把握。

她母亲想带她到商店买些新衣服。尽管她事先就估计到，在买何种衣服上，她会同她发生激烈的争论，她还是默默的同意了。她母亲在她穿什么衣服的问题上，留什么发型问题上一直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乔伊有着一头披肩秀发，她每晚洗一次，然后用吹风机吹干，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使她妈十分生气。她告诉乔伊，这样经常地洗头发对头发没有好处，会导致脱发，并使她变秃。她说，她不明白乔伊把头发吹干怎么会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她说她不明白，乔伊的披发甚至把脸都遮住了，她是怎么能看见东两的。她问乔伊，难道就不能把头发向后扎成一个马尾发型吗？一个利利索索的马尾发型？

大部分时间，乔伊尽量使自己保持不说话，让她母亲唠叨，但有时她和她母亲则大呵一场，然后她回到她的房间，呼的一声把门关上，在立体唱机上放一张唱片，把声音开到最大音量。乔伊知道，她对音乐的爱好也会使她母亲发疯。

乔伊想到帕拉弗纳尼亚商场去。她想买玛菲昆持超短裙、贫民毛线衫、花长筒袜和一件戴格洛牌半透明维尼尼龙雨衣。但她母亲说帕拉弗纳尼亚商场的东西便宜，而且做工不好。

“波维斯商场有更好的东西。”她母亲说。

乔伊再不争辩，让她母亲拖着她到了波维斯商场。她们先上少年儿童商店。在自动扶梯的右侧是一个时装用品小商店。这里装饰着五彩灯光，播放着摇摇舞曲，陈列着时髦的服装。乔伊朝这个时装店走去，她母亲也跟了过去。有一件紧身短马甲，其钮扣象铃按钮式的，乔伊很喜欢，拿给她母亲看，她母亲端详了一会，然后递给乔伊。

“我们为什么不光去买些上学穿的衣服，然后再来这？如果你仍然喜欢这些东西，买回去周末穿。”

她母亲装出通情达理的样子，因此，乔伊也装得很通情达理。她母亲没说不让买带铃按钮式的衣服，只是她不能现在马上买。乔伊跟她母亲来到七楼的中间。这里架子上堆满了裙子，毛线衫，便裤，和短外上衣。乔伊坐在一个粉红色沙发上，她母亲则和一个年老的女售货员挑了一大堆东西：有一此方格呢裙子，一些羊毛套和一件背后带一条腰带的红呢子大衣。乔伊同她们一道把这些东西拿到一间试衣室，然后那老售货员便离开了她们。

乔伊的母亲坐在一张小小的法式椅子上，把钱夹拿出来放在她的膝上。她脸上露着笑容，乔伊可以看出，她是准备为她买一大堆东西了。

“那件方格裙真可爱，为什么不先试试它？”她母亲说着，递给乔伊一件“黑表”牌裙子，乔伊伸手接住裙子，就在她准备脱掉她正穿着的那条已退了色的牛仔裤时，她把那裙子扔到了地板上。

“乔伊！别把东西扔到地板上！”

“那不是我的，我讨厌它。”

乔伊的突然爆发使她母亲不知所措，她完全没有预料到。没有说。她和莱顿医生决定了最好不去问纳特。大多数时候，伊芙琳都能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是大多数时候，但不是所有的时候。

“讨厌，伊芙琳。别说了。”纳特又给自己倒了杯饮料，这次加强了浓度。

受到谴责的伊芙琳默默地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当她在梳妆台前坐下开始卸妆时，纳特出现在门口。他倚在门上，手里拿一杯威士忌。

“你对他着了迷，是不是？”

“对谁着迷？”伊芙琳努力使自己若无其事，但她感到喉咙发紧。那么他看见了维克多吻她——以及她的回吻，尽管只是那么一小会儿。

“那个讨厌的家伙，莱顿。”

伊芙琳松口气，吃惊地问：“你发疯了吗？”

“你看上去这么漂亮肯定有什么原因。我估计你同他有了关系。我听说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干这种事。他们同他们的患者干这种事，并且就在他们的长沙发椅上。”

“纳特，他比我小十五岁。再说，他是个半舌头，大肚子，出汗很多。”

“这是个好职业。”纳特继续说，“他们不但可得到性欲的发泄，而且还能能力他们的这一特权赚到钱。告诉我，他同你性交了吗？”

伊芙琳转过身，刚才她是看着镜子里的纳特，现在她转过身，直接望着他。

“你嫉妒。”她说。纳特嫉妒她。这真是滑稽，令人难以置信。“啊！上帝，你的确是在嫉妒。”

他无法控制使她证实自己是的那种表情，但马上他强迫自己控制注自己，那一刻过去了。

“不，一点也不。每个人部该得到他能得到的东西。就是你在地铁里抬起个男人，然后把

他扔到中央公园，我也不会去关心。”

伊芙琳没有回答。

她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武器。

她不知道是否纳特要强迫她使用这个武器。

男人想要的一切鲍姆都有了：妻子。情妇。她们都爱他，都想得到他，都心甘情愿为得到他去拼搏。

巴巴拉的要求是歇斯底里的，它建筑在他作出过的、但没有遵守的诺言上；伊芙琳的要求是令人窒息的，它们建筑在他的罪过和她对他的占有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纳特从巴巴拉的寓所出来。她要求他离开伊芙琳，搬过来和她住一起。象以往许多次一样，她以再也不与他见面相威胁。他们进行了一场痛苦的争吵，最后在床上和解。之后，纳特穿上衣服离开巴巴拉的寓所。在回家的路上，他在韦斯伯旅馆的保罗酒吧停下来买个睡帽。

巴巴拉，伊芙琳。伊芙琳，巴巴拉。

在法律上，感情上，伊芙琳占有他。艾尔法公司百分之六

“它是一件废物！”

“宝贝，你小声点好吗？”

她母亲由不知所措变得难为情起来。她母亲的这种态度使乔伊感到，好象她活着就必须向别人道歉。她怕什么呢？是怕那个老掉牙的售货员吗？

“我不！”乔伊以她最大的声音嚷道。

她一方面具有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也想懂点规矩。她量她母亲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嘘……”她母亲低声道。她母亲面呈羞赧，乔伊感到厌恶。

就在这时，那老售货员把头探进试衣室，她脸上的笑容是假的。她装着对试衣室里边发生的事什么也不知道。

“一切都好吧？”她问道。

“一切都糟透了。”乔伊答道。

老售货员望着伊芙琳，想找到一点答案。

“她要来月经了。”乔伊的母亲说。在场的人都知道她是在说谎。

“好吧，如果你们决定了要买什么东西。就去找我，我叫容兹丽小姐。”说着，老售货员退出了房间。

安吉·容兹丽回到大厅。她知道，这个女孩同她妈妈的争执，女孩一定会赢，这笔生意是做不成了。这种事安吉每天要经历十几次：母亲和十几岁的女儿为购买何种衣服激烈争吵。她们全都是富人。她们身上穿着名贵的衣服，身上戴着珠宝，她们中大多数入甚至连服装上的价格牌也不看一下。她们完全相信，不管多贵，她们都买得起。从这些就可以知道，她们是富人。

安吉力图使自己不感到伤心，大部分岁月她都没有虚度。她已六十一岁，离退休年龄已超期一年，因此，她把一切都看透了。安吉·安吉丽娜是她的名。她在波维斯商场已工作了整整三十年。其中二十七年是在贝特服装部工作。昔日，妇女们都知道怎样购物。服装一件一件地中给她们舌，就好象是最贵重的珠宝似的，这样，你和顾客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保持多年。你向他们提供婚礼、宴会游轮、丧礼、洗礼、毕业典礼、春夏秋冬及生活中其它礼仪场合的全套服装。但那是过去的事了。

两年前，时髦女子服装的销售量开始下降，安吉被调到青少年部工作。这是另外一个大地——质地低劣，价高，款式不优美。安吉不喜欢这些。安吉阳她母亲住在福勒斯特山坡

每天晚上当她回家后，她们就会重温一天的工作。波维斯时安占来说就象电视对乔伊一样，是她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实与幻想混同起来，想象则象交易中的股票。

安吉站在大厅，客气地向每一位顾客打招呼，问是否需要她提供什么帮助。大部人的回答是否定的，甚至连看也不看她一眼，继续在衣架上翻腾着。安吉对这新一代感到悲伤。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失去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购物本身也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高雅的活动。现在这艺术已丢失，堕落成一种获取的欲望。购物的欢乐、质量和高贵则让位于速度、数量和快速的付款。这太糟糕，安吉暗想，但这是他们的损失，而不是她的损失。

安吉站在大厅观察着，她发现那小家伙和她母亲已踏上了下行的电梯。那女孩远离她母亲站着。如果她不知道刚才这一切，安吉一定会认为她们根本相互都不认识。很显然，她们之间没有讲话。电梯门关上了，这时安吉感到一阵高兴，因为她从来没结过婚，也从来没有过孩子。安吉不知道会使她更吃惊的事：孩子们都有反抗精神，爱骂人，母亲们不能或无法管住他

们。

使她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生活并不是她的生活。

那位站在帕拉弗纳尼亚商店门后面的粗壮结实的保安员请伊芙琳把购物袋留给他保管。

“只有些书。”她说着，举起了购物袋，好让他看见，这些东西是从道伯尼迪买的。

“这是规定，太太！”没等她递过去，他就从伊芙琳手中把购物袋拿过来。

从喇叭中播出的摇滚乐声太大，使人无法交谈。伊芙琳跟着乔尹，她们穿过一楼的时装部，来到位于商店后部的楼梯口。她们来到楼上的普通服装部。乔尹让她妈坐到一个象拖拉机坐椅式的铁椅子上。伊芙琳坐上后感到有点不舒服，因为椅子的形状使她坐上后两腿向外微张。波维斯商店里那把仿造路易十四时期的椅子与帕拉弗纳尼亚商店里拖拉机坐式的椅子的差异，就是伊芙琳和乔尹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异。

伊芙琳看着乔尹挑选了一些裙子、上衣和一些裤子，转身走进了一间试衣室。伊芙琳再看看这些女售货员，全穿着超短裙，全神贯注地听着音乐，心不在焉，当一个年轻的顾客向她们提问题的时候，她们也是毫无表情。

乔尹从试衣室走出来，选中了几件衣服。两件超短裙，一条牛仔裤，和两件上衣：一件印有唐老鸭的白色汗衫，另一件是看来象缎子、其实不是缎子的闪闪发光的上衣。这件上衣的身体部分是红色，左袖是绿色，右袖是黄色，她们下了楼。在楼下，乔尹挑选了一件黑红色的大衣，扣子是金属套控扣，伊芙琳到柜台去付款。

帕拉弗拉尼亚在接收付款时要三个身份证件证明：一个驾驶执照和二个信用卡。站在柜台后面的妇女是商店里唯一与伊芙琳年龄相仿的人。她仔细地检查了信用卡的号码。当她点头表示同意后，伊芙琳填上支票。她什么也没有说，但对商店这么重视安全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很显然，商店对盗窃、扒手行窃和假支票是非常关注的。这就是对可爱的一代最生动的评价。

伊芙琳高兴地离开了商场。她感到高兴是因为她离开了那吵闹的音乐，取回了那道伯尼迪购物袋；还有，买衣服的危机也已经过去。她问乔尹是否愿歇一会，喝杯汽水。

“这汽水容易使人发胖。”乔尹说，“等我回家后喝塔布汽水。”

乔尹继承了她父亲细高的骨架，经常几乎是挨饿性的忌食。伊芙琳为她的身体担心并设法劝乔尹关心自己的身体。每当她提起这事，总是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乔尹到厨房拿了一包盐 and 一瓶克罗克斯洗涤剂，然后就回到了房间。九点钟的时候，伊芙琳过去看了一下，她想让她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伊芙琳敲了一下门，乔尹叫她进来。房间里既有小女孩的玩具熊，又有十几岁少女的披头士乐队的宣传画。乔尹洗澡间的门开着，伊芙琳问她是否可以进去。

“当然可以。”

乔尹穿着下午买的那条牛仔裤坐在浴池里，就在她母亲走进洗澡间的同时，乔尹把大量的盐倒在已湿透的牛仔裤上。乔尹坐在满盆凉水的浴池里一定非常难受。

“这样浸泡后穿起来会更合身。”乔尹说。

伊芙琳对她女儿笑了。

“已得我象你这么大学龄的时候，”她说，“我们常用的旧袜子扎头发。每与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父亲就会气得发疯。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旧袜子扎人发，袜头在头上飘着。只有在上学或约会的时候找才换掉，”

“你是说我们这一代不是唯一发疯的一代？”

“是的！”伊芙琳说道。她俯下身去亲她女儿可爱的乌发。乔尹突然仰起头，这次亲吻就成了相互亲吻。

“十点钟我就上床睡觉，”乔尹说，“我保证。”

“祝你做个美梦。”伊芙琳说完，就离开了她女儿的房间。

第二天，丽迪亚问伊芙琳怎样处理乔尹洗澡间里的一条裤衩。伊芙琳同女佣人一起进入洗澡间。乔尹的裤衩平铺在一条放在地板上的毛巾上，乔尹的屁股、大腿及膝部的压痕印在上面，上面支放着一块板，写着：危险！易爆！

伊芙琳笑了，她告诉丽迪亚，这以是小孩们目前流行的作法，不要动那条裤衩。丽迪亚耸了耸肩，开始清洗脸盆。

阿兹利学校位于公园和莱辛顿之间七十七街的一个漂亮的街区，是一座褐色沙石建筑。它曾经是上世纪末一个铁路巨头的办公楼。楼梯是大理石的，楼内有水晶吊灯，法闰式的门。打汗后门，就可以进入后花园。每当春季和秋季，遇上好天气，老师们就把这门打开。在乔尹被阿兹利接收之前，她已上过很多学校。村子里的一个学校，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教学，另一所是位于西岸的学校。那里黑人孩子经常抢劫白人孩子的零花钱，晶体管收音机和手友。第三个

学校在格兰莫西公园，该校自称采用了古典法国教程，该校全部教师为修女。

乔伊的母亲一直想让乔伊上阿兹利学校，因为无论是学生的声望，还是所教的课程，这个学校在全市来说都认为是最好的。《生活》杂志曾刊登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阿兹利的优秀教学法。而其它一些私立学校也声称他们采用了“阿兹利教学法”。这种教育法声称综合了自由教育和传统教育的长处，自由教育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而传统教育则只提供了语言、科学、数学和哲学的基本知识。

这样听起来是不错。但当乔伊到了学校后，她发现这里和她上的其它学校也没有多少区别，老师花了大部分时间讲课，让学生们闭上嘴，聚精会神的听；学生则尽量听从老师们的安排。

与其它学校不一样的是阿兹利的学生们。他们全是著名电影明星、政治家和大公司总裁们的子女，甚至还有一名九岁的法国伯爵。这些孩子们把乘坐轿车和私人飞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经常来往于欧洲和美国西海岸。他们使用的书包是谷溪生产的。女孩子们到肯尼斯发廊去做发，男孩子们只要一拿到汽车驾驶证，便会拥有他们自己的“波士奇”汽车。乔伊认为，她被接收入学，这是学校为了表明民主。乔伊知道她爸爸富有，但她很快就发现在一般的富有和超级富豪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

乔伊和其它同学的不同之处是，亲生父母只结过一次婚的只有她自己。大部分孩子都有继父、继母和半亲兄弟姐妹。他们大都知道怎样利用离过婚的父母来获取更多的零花钱、更多的衣服、一条帆船或一套新的立体音响。他们谈论性生活也比较多。其中一个女孩子就发誓说，她跟她后进入家庭的哥哥一起睡过觉。她也知道，这被认为是一种乱伦。一些孩子们也同意这种说法。而另外一些孩子则认为这不是什么乱伦，因为他们是继父、继母带进来的兄妹，不是真正的亲兄

刚刚开始的时候，乔伊感到非常孤独。她没有最好的朋友，也不属于任何一帮。她每天上学都是一个人来回走路，星期六也没有人约她去玩。她不想做诸如为了得到一个朋友，去用自己的零钱买大麻，然后同其它孩子共同分享之类的事，那样就是用钱去买友谊了。乔伊自尊心太强，是不会做这类事情的。她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有人先主动来找她。

十月份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机会终于来了。坐在乔伊旁边的艾维·海尔曼问她是否愿意帮她捎个条子给老师，请老师星期四下午准艾维半天假。那时正在卖披头士乐队巡回演出的票，艾维想去花园售票处去购票。乔伊同意了。她知道，这就是她所等待的邀请。她递上了用海尔曼的精美信纸所书写的假条，假条这样写着：艾维与牙医已约定，星期四下午看病，特请假半天。

那天下午，艾维告诉乔伊说，老师接收了假条并信以为真，因此准了假。

艾维十分随便地问乔伊是否也希望得到一张票。

乔伊和艾维很快就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了。

艾维住在公园七十三号一套十四间房间的二层楼公寓套房里。她父亲是个律师，负责处理富人和名人的离婚案。有时他陪同名人进入法庭，他的照片就会出现在当天的报纸上。他的外表看上去高贵，他本人就是极少几个著名律师之一。

艾维的母亲出生于弗吉利亚州。她大部分时间往来于老西伯利之间，她是那里一个打猎俱乐部的成员。她的照片有

一次还刊登在《城市与乡村》杂志上，照片上的她穿着一条骑马裤，手里拿着马鞭。下面的文字说明说她是美国最好的女骑手之一，她最喜爱的服装设计师就是唐纳德·布鲁克斯。

艾维的父亲是她的继父，她亲生父亲是中部一家造纸厂的继承人，艾维说，她父亲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就是她母亲为什么要跟她离婚的原因。艾维说一天下午，她母亲发现，她父亲正和她的室内装修师在床上睡觉。她父亲那时应该去他的俱乐部，而装修师则应在舞厅监督贴墙纸，她立即给杰克·海尔曼挂了电话。海尔曼不但帮她办理了离婚和分得了一大笔财产，而且同她结了婚。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因为多年来，杰克·海尔曼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标准的单身汉之一。他们结婚时，他四十八岁，艾维的母亲三十三岁，他是第一次；而她则是第二次。艾维感觉到她继父以前的真面目并未被人们所认识。她问乔伊，一个正常的男人到四十八岁才结婚这意味着什么呢？

乔伊回答说不知道。也许他曾有过很多风流艳事。

后来她们又谈论了男同性恋在床上所干的事情。她们知道“口淫”一词。可她们不清楚具体的含意，在这个问题上她们无法继续谈下去，最终放弃了这一话题而转向她们最喜欢的话题：她们自己和她们的欲望。

艾维说，她希望能和麦克·杰格发生关系。尽管所有的娱乐杂志都说他目前正和玛莉安妮

关系十分亲密。待她和麦克的关系破裂后，艾维计划成为一名诗人，然后变成一个两性人。因为她想去经历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她还想在某处荒僻的海滩上，也许在突尼斯，买一幢大房子，用来招待她的情人。

乔伊还没想好她倒底想干什么。她只知道她不想干的事：她不想长大，然后结婚，象她母亲一样生活。

她为她母亲感到难过。她所做的一切就是告诉佣人打扫照片框顶部的灰尘；到美发厅去整理头发；每晚倒出柠檬水和冰块，以便她父亲回来后立即可以喝。尽管她只有十二岁，她已看出，她父亲过得日子比她母亲好多了，他每天上班、打网球，持有观看足球赛的月票。他控制了所有“的钱，下管什么时候，她母亲即使想换一下沙发套，也得问一下她父亲是否可以。不管电话铃什么时候响，总是找他爸爸的。除了乔伊那讨厌的叔叔彼得或者五金商店通知他们餐厅吊灯的特殊型号灯泡到货外，没有任何人打电话找她母亲。

乔伊还十分肯定，她父亲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这么想呢？”艾维问道。

“有时他整夜不归，我想决不是什么公务。”

“你母亲是怎么想的呢？”艾维对家庭丑闻已司空见惯，因为这是她父亲成功的尊基石。她感兴趣地追问着细节。

“她什么也没想。”乔伊说，“她相信他。”

“如果我是你母亲，我也和别人发生关系。这样我就觉得平衡了。”

乔伊不愿想象她母亲和别人发生关系的事。“不管怎么说，我是肯定不准备结婚的。”

“可我是肯定要结婚的。”艾维说，“我估计，我会有三个到四个丈夫。”

“你父亲会帮你离婚的。”乔伊说，说完，她们在艾维的床上打着滚，对这一想法咯咯地傻笑。

当她们笑过之后，乔伊说：“我不会。我永远不会结婚，永远！如果我最终的命运象我母亲一样，我就会自杀。”

一九六六年是宝瓶宫时代的开端，是大麻叶、烟泡、和男女乱交的时代，每人都在做爱，都在寻欢做乐。

大家都在做爱。可乔伊除外。

那一年，乔伊到七月就满十四岁了。象已经十五岁的艾维一样，乔伊对性生活着了迷。乔伊还是一个处女，而艾维和学校的心理学教师卡林先生已有了不正当的关系。他长得潇洒，看上去身体单薄、疲倦。可艾维说，他在床上可象一只老虎。有一天，她的数学老师把她赶出教室，送她到卡林先生的办公室，她就引诱了他。在阿兹利有一条规定，谁在课堂上表现不好就会被送到学校的心理教师那去。校方认为，孩子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克服出现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乔伊对艾维的这种不正当关系感到有些嫉妒。她希望她也和别人有着这种不正当关系。她问艾维，她是怎样引诱卡林先生上钩的。

“我对他编了一大套故事。”艾维说，“我告诉他我下流的童年以及我父亲怎样做同性恋，然后我开始哭泣。接着，他就用胳膊搂着我。这当然是从心理学角度来安慰我而做出的动作。接着我就用胳膊抱注了他。当他吻我的时候，我张了嘴。再往下，事情就容易了。”

艾维十五岁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个十分性感的妇女。她两年前就失去了少女的贞操。她在乔伊面前扮演了一个教师的作用，向她讲授并鼓励她去实践。她经常给乔伊讲她“第一次”的故事，那是发生在缅因夏令营中的事。

“夏令营有舞会。我父母不愿让我整个夏天都和他们呆在一起，观看他们和他们朋友们之间的淫乱。那时我才十三岁，因此每年七月他们都把我送走，我说的他，是一个夏令营的游泳指导，我想，他可能是威廉斯的一个中学的三年级学生，可能是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发生的？”乔伊问，“我是指你都做了些什么，他都做了些什么？”

乔伊时刻都想着两性关系，可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想象不出俩个人身体各部分怎样配合在一起——胳膊、肘、腿以及膝盖。她甚至看了艾维的一本做爱的图片，但对她来说，这些图片好象仍不是真实的。她的主体空间关系测验总是不及格。因此，她把她对性爱想象的失败归结于她缺乏主体感悟解力。

“我知道他喜欢我，当他教我澳大利亚式自由泳时，他不断地触动我的乳房。因此，我就约他见面。等大家都睡熟之后，我就溜下床，我们来到水边的游艇库。他们在这里存放着独木舟，脚踏船，帆船和其它一些东西。我穿着睡衣。因为我知道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想如果穿上衣服就显得太愚蠢。”

“你不紧张吗？”

“不紧张。”艾维说完，又想了一下。“嗯，老实说，我紧张，有点紧张。”

“但不至于吓得你想缩回去，对吧？”

“绝对不会。我当时太好奇了。”

“他说什么啦？”乔伊问，“我是指他是怎么提出那事的？”

“他没说话。他穿一条白帆布裤，他脱掉裤子，后来，事情就发生了，象照片上一样。”

“你感到非常兴奋吗？”这是乔伊感到最好奇的问题。她看到一些书上描写这种时候说如何感到大地在颤抖之类的东西。正象两性关系的其它方面一样，这也是十分令人难以想象的，她希望从她所了解的一个人，这个人并且亲身经历过的，从她那里得到证实。

“作为第一次来说感觉还不坏。”艾维说，似乎那是多年前的经历。“我没达到高潮，但我装着达到了高潮。”

“你怎么知道该做什么动作的？”除了艾维之外，乔伊是不会向任何人承认她这种无知的。然而，因为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她们发誓相互之间什么都不隐瞒，即使是最坏，最隐私的东西也不隐瞒。

“我们家那老鬼，就是我的后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他在我们的乡村别墅里放映那些下流的电影，我曾偷偷溜进去观看，有些事情是很容易的。”

“我希望我也能与人发生关系。”乔伊说，“我敢打赌，我现在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处女。”

“我想可能还有几个，只是她们不愿承认罢了。”艾维说。艾维通过观察得出这个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在撒慌，因为她试图来以此安慰她的朋友。“你会遇到一个人的。”

“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我愿尽早尝试一下。”

事情竟这样可悲：她们本是小女孩，却希望成为大姑娘。她们认为发生性关系是她们要去做的事。她们认为性行为是一件该去“尝试”的东西。

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们就应该这样做。她们的父母没有，她们在书摊上买的淫书没有，她们在父母书架上抽出的性画报也没有。

乔伊没有问的问题是，性行为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不理解那种感情，所以她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词来提出这个问题。

别人好象都知道。他们看起来都很内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都具有这方面的丰富知识，而且把这件事看得很随便。但没有任何人与乔伊分享这种内心的隐秘。乔伊发现她生活在一个性生活过度的世界里，而她却还不具备对付这种局面的能力。当她认为自己缺乏经验，害羞，对集体性爱感到害怕，还有周围尽是些脱光上衣跳迪斯科舞的人以及一些性爱旅店，她对这一切都感到惶恐不安。乔伊自己内心十分肯定，如果她开始和别人做爱，她一定会做些不该做的事。事情将会是一团糟。她和那位男孩都会知道，她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行。

从来没有人告诉她，性爱并不是比赛。

尽管艾维是乔伊最亲近的人，艾维却没有安慰过乔伊。艾维第一次获得性爱的方法很机械，可以肯定他说无感情色彩。艾维直呼那些别人难以启齿的名称，并对使用这些词感到很自然。乔伊使用这些词时感到很不自在，好象是个骗子。

她一直在希望她母亲能告诉她一些关于性爱的事。既然伊芙琳从来什么也没说过，乔伊当然是无法知道。伊芙琳对性爱感兴趣的程度和乔伊一样浓厚。她感到，她应对她女儿进行些关于性的方面的教育，但她又无法克服谈论性爱时她自己感到的罪恶感和困窘感。伊芙琳总是不断这样告诉自己，等“明天”，他将和乔伊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但是“明天”之后总有“明天”，伊芙琳的沉默终于迫使乔伊先说话了。结果是一场灾难。她问了她母亲与她父亲的事。她母亲脸色变得通红，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她含糊的说：“啊！亲爱的，当男人准备好时，女人也就准备好接收他了。”

她母亲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乔伊对她母亲可怕的害羞感到束手无策，从此她再也不敢冒险对她母亲提起这个话题。

乔伊感到，她母亲这一代在性爱问题上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性爱是肮脏的，是只能在黑暗中干的事情。

乔伊这一代人认为性爱是自然的，公开的，也是“美妙的”，对此他们感到满足。乔伊同意她这一代人的看法。她希望性爱是自然的、公开的和美妙的。问题是没人向她解释，怎样才能从害羞、不自在和害怕过度到公开、自然和“美妙”上来。

这种神秘感变得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在她十五岁生日就要来临的时候，最后她决定要强

制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她要使她父母明白她的性欲要求。即使是去乞求，她也要和人发生关系。

乔伊对付她父母的办法和她在阿兹利学校使用的办法一样。她保持冷静，一直等到他们先开始说话。六月初，也就是她生日的前二个星期，乔伊的母亲终于开口了，这是她一直等待着的。他们在一起吃晚餐，丽迪亚端上来烤鸡和花菜，然后又回到厨房。这时，乔伊的母亲问她想要点什么做为她生日礼物。

“购买避孕丸的地方。”乔伊说，“我对到黑市上去购买烦透了。”

乔伊上在椅子向后仰着，她想，这时她一定象“波利与克莱德”中的弗·邓纳威。她自己感到象波利：高傲、自信和大胆。

“你到黑市上买避孕丸了？”乔伊的母亲问道。不知是哪件事使她母亲更感到震惊：是她购买避孕丸呢，还是那高贵的阿兹利学校竟有一个黑市。

乔伊没有回答。因为她说的是谎言。除了有时在阿兹利黑市上买点大麻外，乔伊没在那里买过任何东西。当然，在那里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到：避孕丸，可卡因，唐纳斯毒品等。但乔伊害怕重毒品，她害怕弄乱她的思维，大麻是可以的。偶尔乔伊也和艾维一起抽烟泡，但一般总是在艾维的卧室里抽。她们抽的时候窗户大开，因为担心某一个佣人会发现她们。她们一点也不担心艾维的父母：她父亲总是在工作，而她母亲总是在打猎。艾维的卧室是最为安全的地方。可乔伊的卧室一点安全感也没有，她母亲几乎总是呆在家里。

纳特最先讲话。

“噢！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他说。他看上去非常高兴。很难分清他是对她或他自己这样具有“希比”精神，对她提出的令人意外的要求而能泰然处之并保持冷静的态度感到满意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们她还没长大。”伊芙琳说。她对纳特说话时，好象乔伊根本不在房间。“甚至还不到年龄。”

“你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纳特说，“想想你所失掉的那么多快乐！”

她父亲的声调使乔伊产生了一种特殊感觉。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她父母之间谈论一点带有性色彩之类的话题：好象他们之间还有秘密她不知道。乔伊第一次真正感到她父母发生过性交。这事她曾在脑海中想象过多次，但她怎么也想象不出那是真的。但刚才她父亲对她母亲说话的腔调，说话的方式，那笑容，还有那没有说明的含义，使她的想象变得真实。突然问，乔伊肯定，她父母曾在一起睡觉，并进行得非常热烈。

“老大呐”，她母亲说，“你已经……”

“我还是个处女，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话。”乔伊说，“纯洁得象白雪一样。”

“好啦，我想我们对这种状况也该做点什么啦！”纳特说。他的声调仍和刚才一样：性感、会意。这些话既有些肮脏，屯令人兴奋。

一星期后，乔伊来到一个专为十几岁女孩子看病的妇科医生的办公室。他是一个约六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人，非常平淡无味，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她。他对孩子们的性病、堕胎以及那些十五岁就怀孕而变得歇斯底里的女孩子们都习以为常，这是乔伊无法知道的。就他本人而言，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开避孕丸处方只是个人道主义问题，况且她母亲事先还跟他预约过时间。

乔伊拿到了她第一个月的避孕丸，然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避孕丸和艾维的一样。一个圆形塑料盆，边上有些小槽，每槽里装一九，一大吃一颗。乔伊要急于给艾维看，便装着很随便地放在她的包里东西的上面，这样当她打开包时，大家都可以看得见，都会知道她现在已经开始吃避孕丸了。

象往常一样，那大晚上十点缺一刻钟的时候，伊芙琳来到乔伊的房间道晚安。乔伊正坐在床上观看《度蜜月》。

“请你关掉电视，我想和你谈一谈。”

乔伊可以肯定，她母亲要问她关于医生的成千上百的愚蠢的问题。她按下了床头柜上的遥控开关，屏幕上的图象消失。乔伊打起精神，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胸。“好啦！”她用舌头舔了舔脸颊。她脑海中闪现出彼利和那些子弹来。

“乔伊，别这样。我并不想干涉你的事。看来问题在于我们总是没有机会好好谈一谈。”

“有什么可谈的呢？反上我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这我下怀疑！”伊芙琳想起“绝密”二字，但在这里却显得多么不足啊！她不愿意乔伊也有“她的感觉：迷惑和被遗弃感。”我可以肯定，你知道所有的技巧，但这不是我跟你谈的问题。你知道，乔伊，性爱不仅仅是和某人一起上床睡觉，享受快感，而是你的整个感情也牵涉到里面。”

“也许你是这样。”乔伊说，她喜欢晚饭时和她父亲的谈话。“我可不是。”

“你也是，你不会例外。”她母亲很少这样肯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男人也一样，他们也有感情。人们的性器官和感情并不是分离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涉及到其中一个，就会影响到另一个。”

“这是胡说八道。”乔伊说。“性爱是一种自然欲望，就象饥饿一样。我吃汉堡包仅仅是因为我饿了，并不是因为我真正爱上了汉堡包。”乔伊不想把艾维出卖出去。艾维到处和人乱搞，从不固定和某个人。这就是乔伊现在所谈话的含意。但她不想把这事告诉她妈，因为她有可能再把此节告诉艾维的母亲。

“乔伊，你还是个小孩，你并不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无法阻止你所想要干的事。我所能做的是提醒你，当心点，当心你自己，当心你的男朋友，感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尊重你的感情。”

伊芙琳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乔伊冷淡的表情显示出对抗和冷酷，她不明白，一个刚刚十五岁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样脆弱、这样谨小慎微、这样戒备。这可爱的一代啊，他们根本不知道爱的含意。

“记着，乔伊。”她继续说下去，“没有仅仅是上床这回事，不仅对你没有，对男孩子也没有。”

“如果我找女孩子睡觉呢？这你想过没有？”

她母亲好象被乔伊掴了一巴掌，过了一会，她才恢复过

“哎！乔伊。”她叹息着说，然后接下去就无话可说了。她想在她女儿脸上亲吻一下，乔伊推开她妈，钻进被子，让她妈去亲吻空气。乔伊蒙着被子，使劲不让眼泪流出来。伊芙琳垂头丧气地很快离开了房间。

乔伊自己也不明白，她怎么会变得象一头自负的小驴。她母亲想说服她，看来真是做出了努力想说服她。但乔伊不知道怎样才能收回以前所说的一些话。她等待着，保持着冷静，等待着她母亲开个头，她再去抱歉，但她从来也没有去道歉。

一九六七年夏天，艾维·海尔曼和她父母一道前往欧洲丹提毕斯一个祖来的别墅度假。乔伊和过去一样，和她母亲一起前往南塔基特。

乔伊曾向艾维发誓，秋天回来的时候，一定不再是处女。她心中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博尔德·科尔曼，他是主要目标，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念书，是一个网球运动员。他暑假在园林队打短工，他特意挑选了这份工作，因为这工作可以使他在野外接触太阳，也因为这份工作很消耗体力。博尔德满头金发，太阳把他的眉毛染得几乎和头发一样，几乎难于分辨。博尔德的父亲是一个股票交易市场的老板，而他母亲则整天坐在山克提海滨俱乐部喝酒。乔伊第一次见到博尔德就被他迷住了。

乔伊的第二个目标是戴弗·戴维斯，他住在大学城。戴弗的父亲拥有一个建筑公司。在南塔基特，人们认为他是很富有的。戴弗穿着不和协的衣服：一件白色内衣，袖口高高挽起，一条牛仔裤义者。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平等、博爱和自，裤脚边向外翻，和一双工兵长统靴。他长着短连鬓胡子，在乔伊周围所认识的人当中还没听说过谁也有连鬓胡子，但如果你能正确地端详他，你可以自认为他有点象詹姆斯·丁。

戴弗被认为是小镇上的一头小公牛。据说他和南塔基特所有的女孩子都发生过关系，至少是那些自愿的。他在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乔伊看他整天开着一辆上面印有“戴维斯建筑公司”字样的红色小货车到处跑。她发现他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在希斯科海滩，这里是作冲浪运动的最好的海滩。戴弗有一个冲浪板，尽管他冲得不好，可也能以每个浪头上冲过来。

当博尔德邀请乔伊去看名叫《卡萨布兰卡的阴谋》的电影的时候，乔伊想，他会成为她的第一个。乔伊不管谁会成为第一个：他们俩人都使她着迷。博尔德用车接她去电影院，并一直坐在那里看完了电影。这时，他拉起乔伊的手。她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她估计他们会把车开到什么地方停下来。

“这电影真棒！”当电影结束时，博尔德这样说。“‘山姆，再来一次’，你说这棒不棒？”

“对！”乔伊说，“汉弗里·伯格特这个人物真是令人愉快！”

“但根本不可信。”博尔德说着，帮乔伊打开了车门并扶她坐进车。她真想知道，如果他脱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他的体形好极了。

博尔德发动了车，把车开到用碎石铺成的缅因街，并在一家果品店门前停下来。他们走进

商店，博尔德和乔伊都各自要了一杯“塔布”汽水。他告诉她，他对体重非常注意，因为即使是增加一磅重，也会影响到他打球。

十点半钟的时候，博尔德开车送乔伊回家，把车停在欢笑街上，他把头伸过去，用没有张开的嘴亲吻了她。乔伊想起艾维曾告诉过她，艾维和卡林先生亲吻时，她张开了嘴，以后的事就接着来了。她还不明白到底该怎样去做。她希望博尔德能主动点，但他没有主动。他搂住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也就是这些。

“我十一点钟必须得睡觉。”他说，“我夏天也坚持训练，我要参加校第一代表队。”

“那太好了。”乔伊说。她想使自己显示出热情的样子。他想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她也不想伤害他的感情。

“你星期二想去看电影吗，”他问道。“他们正上演《酷热的夜晚》，我挺喜欢西德尼·伯蒂这个人物。”

“我特别喜欢罗德·史蒂格。我认为他是性的象征。”乔伊内心想，这真是一个可笑的评价，因为罗维·史蒂格很老，而且长着一个啤酒肚子。她格格地笑了，可博尔德好象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星期二见。”说完，博尔德钻进那辆雷乌车开走了。乔伊有点纳闷，他是害羞不好意思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第二天，乔伊坐在康登药店门前的板凳上同来自罗德岛中学的几个学生闲聊。这时戴弗开着他的小货车驶过来，停在药店门口，他跳下车走进药店，他穿的牛仔裤十分紧。每走一步，乔伊都可以看见他裤腿后面扎线的裂缝。

“呀！多难看哟！”来自利斯迪的一个女学生指着戴弗

乔伊一句话也没说。看着他下部凸出的地方，她觉得他走起路来真性感。

“喂！”当他走出药店的时候，她打了声招呼。

“你好！”他答道。两年前的夏天，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她母亲要把那个门厅改建成一个带玻璃天棚的日光浴房间。改建的活全是戴弗干的，如锯木头、铺地板、刷油漆等。乔伊还记得，他干活的时候整天都喝着“巴德”汽水。

乔伊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别的，其他孩子都盯着她，使她感到不舒服。他们互相看着，站在那里。最后戴弗转身说：“以后见！”

“好！”乔伊说，“再见！”

那个星期六，乔伊特意到希斯科海滩去。她躺在沙滩上，看一本叫《飞行之王》的书。这时，戴弗走过来坐在她的身旁。他穿一条红黄格的尼龙游泳裤衩，真是很丑。乔伊真想知道，他是从哪里买来的。

“挺好吗？”戴弗指的是那本书。

“挺好！”乔伊说。

“我从来没读过这本书。”戴弗说。“喂，听着，你今晚想到博克斯去吗？”

乔伊从来没去过那儿。那是一个低贱的小镇酒吧。这间酒吧也是那些随度假人群而来的黑人佣工们常去的地方。乔伊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丽迪亚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常去那儿。

“我还不够年龄。”乔伊说。在马萨诸塞州，到二十一岁才允许喝酒。

“怎么着？”戴弗说，“让我拉你去吗！”

“好！”乔伊说。她尽量克制自己，不朝戴弗的大腿部看。那里很粗，尽是些黑毛。

那天晚上，戴弗在那辆小货车里打电话叫上了乔伊。坐在那辆旧货车高高的驾驶棚里，开起车来真是开心极了。车厢里有一些油漆浸透过的抹布，一个柴油桶。车底的弹簧的跳动使乔伊难于在车上坐稳。待戴弗停下车来的时候，乔伊惊奇地发现博克斯酒吧外面有那么多轿车和卡车。戴弗来到前门，站在门口那位满头白发的老黑人朝他尊敬地点点头。乔伊认识到，戴弗是这镇上一个重要的人物。戴弗也没问乔伊想喝点什么，就到拥挤的酒吧要了二杯姜汁酒，他们靠一张桌子坐下。桌面上还残留着上位顾客留下的酒杯和装土豆条用的纸盘。当地一个摇滚乐队演奏着经过改编走了样的著名披头士乐曲。乔伊往周围一望，一半白人，一半黑人，可没有一个她认识。她意识到，在南塔基特，还有着另外一种生活，而她过去竟一点也不知道。

在那吵闹的音乐声中要谈话是不可能的。乔伊习惯喝葡萄酒和抽大麻，她认为生姜酒太厉害，喝起来不舒服。然而，她还是喝了一杯，接着又喝完了第二杯，这时，戴弗一声没吭，起身又从柜台要了两杯。

当他们喝完酒，他往桌子上放了一张五美元的现金，然后说：“走吧！”

他把车开往通向机场的路。走到一半时，他又转向一条泥土道。小货车在那条满是车辙，没有铺柏油的泥土道上颠簸着。乔伊知道要到这里来干什么了。

戴弗踩了一下车闸，熄灭发动机，并关掉了车灯。

“啊！”戴弗说着，伸过手来，一把搂住乔伊。

戴弗很粗鲁，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感情，叫抚慰，他象他那台小货车的发动机一样，是台机械……

乔伊把他嘴里的香烟拔掉，“让我来数一数你……”

整个夏天，乔伊都在等待着他母亲问，她和戴弗在一起呆到凌晨两点，都在干些什么。乔伊知道，她母亲是醒的，因为她每次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听见她在床上翻身。但她母亲一个字也没说。自从那天她拿到避孕丸并同她妈谈完话后，乔伊和她母亲之间就变得微妙起来，并越来越疏远。

尽管这年夏天乔伊得到了很多性的欢娱，但她惊奇地发现，她感到特别孤独。没有人和她交谈。她每星期同博尔德看一次电影。八月下旬，他们甚至也发生了关系。但结果使她大所失望。同戴弗比较起来，他差得很远。戴弗的毛病是他完全不擅言词，他出身于完全不同的家庭。他除了等他父亲退休后接管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外，没有其它任何志向。戴弗不愿交谈，并说谈话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乔伊明白，正象她利用他丰满足自己一样，他也是利用她丰满足自己。

乔伊非常想念艾维。艾维是世界上唯一的使乔伊感到可亲的人，但她目前正在法国。往来的信函怎么也比不上在纽约时的四个小时的长谈。

那年夏天，乔伊满十五岁。她和她父亲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事情开始于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纳特星期四来到这里。星期五晴空万里，是一个标准的海滩日，伊芙琳要去参加一个园艺俱乐部的会议，因此，纳特和乔伊就独自来到杰特斯海滩。午餐他们吃的是热狗和冰淇淋，午餐后他们沿着海滩散步。他们一路走过一个个的太阳伞和拥挤的人群，走到克利福海滩。这里人们聚集在一起谈论免税、离婚、结帐以及不动产的价值。富人们总是谈论着钱。

“今年夏天你弄了不少，对吧？”纳特突然问道。

他们漫步中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问题象一声晴天霹雳。

“我和别人发生了许多次关系，如果这是你的问题所指的话。”乔伊答道。

“还有？”

“还不满足。”

“你是说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

纳特把这句话说得好象是一句问话，而实际上是一个结论。

“差不多。我感到孤独。”这是乔伊第一次向别人承认。当然，她一直有艾维在身边做伴。除了刚去阿兹利上学时以外，以前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单。

性爱和孤独同时闯入了她的生活中。

纳特和乔伊坐到一个很陡很长的木梯的最下面一节。这个木梯的悬崖上的房子一直通到下面的海滩。

“别人不是一样呢？”乔伊问道，“我是说单单发生性关系并不感到满足。”纳特点了点头。“男人也是人。”

“那大家为什么都对性爱象做交易一样呢？”

“和合适的人就会完全感觉不同。”纳特说道。

“和合适的人在一起，你就不会感到失望吗？”

“对！”

“我猜想，只能是一方评价另一方是否合适。这样事后就不会感到失望。”

“象其它任何事情一样，你可以试一试。”纳特说。

有时她感到父亲说的话使她觉得他的感情和她完全一样。她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也“弄了很多”，但也仍感到不满足。她真希望她有勇气去问他。即使她有勇气，她也不会去问，因为她不愿听到这个问题的回答。

“你愿告诉我，你是和谁吗？”他问道。

“戴弗·戴维斯。”

“是那个建筑太阳房的小伙子？”

乔伊点了点头。

纳特再没有说话。

“你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吗？”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

“我想也没有什么好告诉你了，最重要的部分我已告诉你了。”

“是的！”纳特注意到，乔伊低下了头。好看来非常悲伤。

“好啦，只当它是实习。”他这样说，是想使她高兴点。“这不应当说是完全的失败。”

他迫使她女儿看着他，他们俩人都笑了。他们第一次分享了秘密。他们起身，朝杰特斯海滩走去。这时刚过四点。风停了，一切异常安静。水面平静得象湖水一样，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你曾遇到过合适的人没有？”乔伊问。

纳特点点头。

“妈妈吗？”

他再次点点头。

“她现在还是合适的人吗？”

在纳特回答之前曾有一个短暂犹豫。

“我们还是夫妻。”

作为反应，乔伊拉起了他的手。这是他们分享的第二个秘密。

他们再没说话。他们走完了海滩。乔伊脑子里在考虑她的爸爸。她在想，如果她爸爸遇上另外一个合适的人，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她把另外一只手的手指头交叉成十字状，希望他不会找到合适的人。

如果他一旦找到，她担心，她会失去他。

那年夏天，乔伊和她爸爸爱好上了同样东西：穿男式中山装，观看詹姆斯·邦德电影，到海边钓竹荚鱼，到海峡码头餐馆吃炸毛蛤，到糖果店去吃孔雀石冰淇淋。他们在一个周末，一同乘飞机前往观看一九六七年博览会。他们是鸽子而不是鹰。他们认为格拉斯伯洛会议是一派胡说八道，从而加大了信用差距。他们观察注视着发生在底特律、伯明翰和西班牙

·哈伦的民族骚乱，并一致认为，如果他们穷，又是黑人，他们也会偷彩色电视机的。

一九六七年，当世界好象进入高潮时，乔伊和她父亲成了亲密的伙伴，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那年秋天。他们一起去马球场看球，一起吃哈利·斯蒂芬的热狗，一起喝“巴德”啤酒，尽管这个赛季的球输了，他们还是高兴。他们去位于八十六街的斯洛克电影院看电影，他们成为那种女人勾引男人的电。影和比基尼海滩电影的欣赏行家。他们吃奶酪，听摇滚音乐会，他们上各种不同的商店购物，并在百事达喷泉处发现了成群的吸毒者。

就是在那年秋天，乔伊和艾维有了新的发现：她们发现偷窃盛行。

乔伊和艾维是第一代超级消费者的成员。在电视、杂志、广告之类的提倡下，他们筹划着怎样去买、去花钱。为了买更多的新东西，他们扔掉旧的东西。他们讲究时髦，讲究用后即扔掉。

当乔伊和艾维都满十五岁后，她们变成了超级消费者。每个星期六，她们都去商店。为了能买到诸如最新形状的口红之类的东西，她们往往从一个商店逛到另一个商店。

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她们来到罗德·泰勒的纽约人商店买富强毛衣。乔伊已决定买一件红的和一件黄的，而艾维则在紫色和绿色之间还没拿定主意。她拿起一件乔伊买过的红色毛衣。艾维更喜欢紫色的，但紫色的不如绿色的能和她其它的衣服相配，真是难于下决心，她们来到试衣间·艾维再次穿上绿毛衣，并决定最后下定决心。

“你为什么不三件都买？”乔伊问。

“那样我那老太婆会掐死我的，她看到我买衣服的帐单准会跳起来。”艾维对着镜子照起来。“我准备要件绿的。”她说。乔伊从她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还是喜欢紫色的，但她最后还是决定现实点。

艾维脱下绿毛衣。就在她把毛衣翻过头，毛衣暂时遮住了她的视线的一瞬间，乔伊冲动地把那件紫色毛衣塞进了她的手提包。

她们来到付款台，用她们父母给她们的罗德·泰勒信用卡付了款，售货员把毛衣上的标签扯掉，填好售货单，然后把毛衣装进了罗德·泰勒购物袋。

“现在我们去干什么呢？”她们走出旋转门时艾维问道。今年十月，天气反常地冷，她们俩人都穿着假毛皮大衣。

“我膝盖都冻僵了。”乔伊说着用大衣把她同自己裹在一起。

“这发时髦。”艾维说，然后她们又分开了。

“走，到金·卡罗饭馆去。”乔伊说，“我想吃点东西，”

她们走过一条街，来到麦迪逊大街，登上了去市区的公共汽车。她们坐到后门后边的一排座位上。

“我给你一件礼物。”坐定后，乔伊很随便他说。说完，她伸进她的手提包，把那件紫色毛衣递给艾维。毛衣上的标签仍然在上面。

“你偷的？”她说。

“没事！”

“啊！”艾维抚摸着毛衣。“真漂亮！”

这就是乔伊和艾维称之为“发展阶段”的开端。她们对这种犯罪生活还很内行，一个店她们从来不偷两次。她们不想去冒那种有可能被认出来的险。刚开始，她们非常谨慎，只偷些诸如纱巾、耳环之类的小东西。有一次她们从麦迪逊大街的一个化学品商店拿走七支不同的眉笔；她们还拿走笔，长筒袜，和指甲磨锉。当她们对此有点厌烦时，她们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因此也加大了赌注。乔伊过去偷的最贵重的东西是，帕拉弗尼拉商店里的一件维尼雨衣，而艾维偷出来的最大的一件东西是，从麦迪逊五街的自由音乐商店盗出的一台索尼收音机。

十月份过去了，迎来了十一月，又进入了十二月。她们发现那些圣诞节拥挤的购物者造成了混乱，这使她们的盗窃变得比平常更容易了。乔伊和艾维对做这些事从来没有感到内疚，她们也从来没使用过她们所偷的东西。她们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偷来的东西。有时，她们把偷来的东西扔到街上的垃圾桶里；还有些时候，她们扔到公共汽车上。她们从来不把偷来的东西带回家，因为她们在家没有一个能安全隐藏东西的地方。不管她们的母亲或者是佣人都会在衣橱的后面发现多出的东西。

她们从来没意识到，她们的所做所为是犯法的，如果愚蠢的商店把商品放在那些伸手就可以取走的地方，乔伊和艾维不会愚蠢得不敢去拿走。在她们看来，商店在向她们挑战，而她们是不会辜负这种挑战的。

就在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六，她们来到布隆明戴尔商店的食品部施展他们的才能。她们拿了一瓶水果罐头，一听斯堪的那维亚鱼卷，一个七磅重的蘑菇罐头，上面还贴有标价六十五美元的标签。她们一个一个地看，专拣那些有着奇特名称的东西。这些东西她们从来没听说过。她们对蘑菇罐头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价格特别贵。她们决定从商店侧门溜到五十九街去，然后去第三街的伍尔沃斯，找一个开瓶刀，打开罐头来一顿野餐。第一次，她们找到了可以吃的东西，吃完后别人又无法发现。她们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早点想出这个主意。

她们挤出了拥挤的商店。艾维紧跟着乔伊，就在她要踏上便道时，一个男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艾维答道，她还以为他在为冲撞了她而向她道歉呢。

“我认为你这里可能有我们商店里的一些财产。”

没等艾维反应过来，那男人拿过那个与乔伊一样的帆布包，然后打开。

他取出那听罐头。

“我可以看看你的收据吗？”他特别地客气，但他的手却紧紧抓住艾维的肩头。乔伊首先想到的是跑掉，但她很快意识到，她不能丢下艾维自己跑掉。

“我们没有。”乔伊说，她知道撒谎是没有用的。

“那么就只好请你们跟我走一趟了。”

他一支胳膊抓住一个，带她们回到商店，穿过风味食品部，来到一个上面写有“职工专用”的电梯前。

“如果你把‘专用’偷去，那样是否你也成了职工？”艾维问道。

乔伊格格地笑了。但那男人没笑。他们下了电梯，来到九楼，穿过一个两边都有玻璃门的狭长走廊，来到一个大办公室。在那里，一些人坐在质量低劣的长沙发椅上和木折叠椅上。艾维想知道，他们是否也都偷了商店里的东西而被抓住了

“好！”那人指了指艾维，示意她跟他走。乔伊也站起来跟他们一起朝一扇封闭的玻璃门走去。

“你不要来。”那人说，“你坐下。”

乔伊走到那破旧的沙发处，她开始感到紧张。要不是这事，他们也不会把她和艾维分开。

几分钟后，艾维由那男人陪着回来了。她看来有些害怕。当那人让乔伊跟他走的时候，艾维推了一下乔伊的胳膊说：“别怕，你也会钻他们空子的。”

听了这话，乔伊感觉好了一点。可等她进入了没字的门后，她的腿直发抖，并想要解小便。她对她们要怎么对待她有些害怕，她一点也不清楚事情会怎样。

小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旧木桌，二把椅子，一个老式的绿色文件柜，上面摆着一个玻璃花

瓶，瓶里插着一束半死不活的菊花。乔伊奇怪地发现，坐在桌子后面的竟是一个女人。那男人把门关上，这时房间只剩下她们俩人。

“你叫乔伊·鲍姆？”那女人看了一下档案卡片。

“是的。”乔伊说。她想回答，可喉咙里好象粘了一块什么东西，声音只出来了一半。

“坐下。”那女人仍在看着档案卡。

至少他们这里没有胶皮管。乔伊坐下。那女人把卡片的两面都看了，最后，她抬起头来看着乔伊。她大约四十多岁，黑头发，发式陈旧，月牙型脸蛋。乔伊注意到，她那深藏在那丑陋的塑料眼镜后面一双眼睛，还是很漂亮的。

“你多大了？”

这问题使乔伊吃了一惊，她原想他们一定会象电影里那样，对她严加盘问。

“十五岁。”

“是什么原因使你们想偷一个价值六十五美元的蘑菇罐头？”

她们的赃物散放在那女人的桌子上，她盯着乔伊的眼睛。

乔伊耸了耸肩。

“你们饿吗？你们不是因为饿吧！”

“不是因为饿。”

“那因为什么？”

“我不知道。”乔伊说。这是实话。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想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一条也想不出来。

“你对布隆明戴尔商店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那女人问道。

“嗯……”乔伊突然感到轻松起来。他们不会伤害她。她们感兴趣的是收集一些关于人们是否喜欢布隆明戴尔商店的信息。她对布隆明戴尔一点感觉也没有，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都没有。

“你家在我们这里的帐户已有二十年时间了，我们同你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那女人挥了挥档案卡。

你是说他们都是按时付款罗，乔伊想。

“你妈妈知不知道你和你朋友星期六下午干的事？”

这女人可能发现过去所有的偷窃行为了，这想法在乔伊脑子里闪了一下。然而她又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她接着回答了她的问题。

“还不知道。”

“如果她知道了，你认为她会说什么？”

“我想她一定不会高兴的。”乔伊说，“你要告诉她吗？”

那女人看着乔伊。乔伊说不上这女人到底是好还是坏。乔伊已认识到，这事没有多大关系了。她只是在尽她的职责。

“是的，当然要告诉。”那女人对乔伊竟能问出这种问题感到震惊。“然而，我们不会控告你的。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和你家有着长期的关系。”

乔伊突然明白，可能正是她母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从布罗隆戴尔买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才使得她今天免进监狱。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你准备告诉她些什么？”

“在商店行窃。”

“就这些？”

乔伊放松了下来。果真是什么事也没有。他们会训斥她一顿，然后就没事了。大人们真是废物！

“我们还将劝告你母亲，让她送你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

“让我去看精神科医生？”乔伊十分愤怒。“我还没疯。”

“我们只能提出忠告和建议。”那女人以非常冷静的声调说。“但对付你这样的小姑娘我们有多年经验。你需要帮助。”

你也需要，乔伊内心说道。女警察！你大概羡慕男人奸淫的大案！但乔伊没敢大声说。她还不不想惹怒这个女人。

“你可以走了。”那女人说道。“但我想警告你，盗窃商店东西可是严重犯罪行为。我们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不想在这里再次见到你，你明白吗？”

乔伊认识到，这女人所说的“这里”是指她的办公室。她并不是禁止她再到布隆明戴尔来，而是不让她再偷东西。

“是的，明白了。”乔伊嘟囔着，她害怕了，但她不愿承认，即使对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她离开了那女人的办公室，和艾维朝电梯走去。

当她们下了电梯，走出旋转门，来到莱辛顿大街上的时候，她们开玩笑说，这下可“记录在案了。”她们想留下指纹印这种事真令人兴奋。

乔伊直等到晚饭前，才回到家里。她不太特别想见她父母。她完全知道她父母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她母亲会变得歇斯底里，她父亲则会保持冷静。她回到家里时已经七点半，这时她父母刚坐下来准备吃晚饭。

当她刚一坐到桌边，她母亲就朝她大叫大嚷，说她偷东西，犯了法。她威胁说要给她惩罚，发誓要把她的电视机搬走，并坚持要她去看精神病医生。乔伊坐下来开始吃饭，听着她妈发出的威胁。但她知道，她妈不会有任何行动。她过去也曾发出过威胁，但从来不见任何行动。乔伊一点也不在乎，她让她妈唠叨下去。最后伊芙琳冷静了下来。

“乔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偷。”她说，“你有信用卡。你可以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只是付款就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偷。”

“如果不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的。”

“也许我可以。”她母亲说，“至少我可以试一试，对吧？”

她母亲看来好象很诚恳，因此，乔伊决定冒险告诉她实话。

“我觉得偷好玩。”

“好玩？”她母亲看来有些震惊。“好玩？”

“好玩。”乔伊说。她知道她母亲是不会明白的。“刺激，你知道吗？我干它就是为了寻求刺激。”

“但这是盗窃。”她母亲说。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女儿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看你这个样子，好象是杀了人，我没杀任何人。”乔伊说。

“偷盗是不光彩的。”伊芙琳说。“你听了这个就感到那么舒服？”

“实话告诉你，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纳特，你看？”伊芙琳朝纳特看着。纳特一直听着，没说一句话。“纳特，你告诉她错了。”

伊芙琳指望他来帮助她。当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乔伊时，他却可以。她在等他说话，等他让乔伊明白，她做一件什么样的错事，为什么错了。

“乔伊，”纳特问道，“告诉我，是好玩吗？果真是好玩吗？”

“还可以。”她说。“我是说这事不可怕，也不吓人，还可以。”

“你还准备去干吗？”她爸爸声音平静得就好象问她下周是否还去看电影一样。

“不去了，我也接受了教训。”她尽量装出诚实的样子。事实上，如果遇到机会，她可能还会再去偷。

“是实话吗？在胸前画十字了吗？”她爸爸真了不起，几乎可以知道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希望是。”乔伊说。这次她是说的真话。

丽迪亚端上甜点、冰淇淋的时候，大家都没讲话。她摆上三个玻璃碗，端来咖啡和杯子，并为乔伊端了一杯“塔布”汽水。

“你要知道，”纳特呷了一口咖啡。“你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偷布隆明戴尔的东西！那是一个一流的商店！我小时候偷的全部东西也就是从手推车上偷的一些苹果和旧裤子。这在当时的下西城，大家都是这样。那些富人的孩子是要什么有什么。”

“是啊！”乔伊说。他们都笑了。“我猜想，穷的日子一定很难过。”

“你想知道我们偷过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

“什么？”

“有一天，我到熟食店为我母亲买酸奶，另一个孩子从柜台上偷了一条面包，那小店的老头发怒了，追赶到街上。这时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收款台旁放着一大罐压制杏卷。我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了，包括罐子和其它东西。真是有趣，我居然还付了酸奶钱。我在收款台上留下了硬币。我抓起罐子，拼命地跑。”他说，“好玩。我完全理解你所说的意思。”

乔伊和她爸一起笑了。伊芙琳感到她被排除在外了，就好象他们是一对情人，在谈论着隐私的笑话，而她只是一个陪伴。

后来，在他们的卧室里，伊芙琳关灯后，她决定要说话。

“我真希望你没跟她讲你偷杏卷的事。”

“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偷。”纳特说完，就翻身要去睡觉。

伊芙琳叹了一口气。她去说什么呢？说她从来没有偷盗过吗？说她一直怕她爸，服从他妈？说她从小就受到教育，要尊敬长者？

这样纳特会告诉她，她这些思想已经过时了。

他会告诉她，应该跳出这些；日框框。

伊芙琳躺在那儿，想着她的女儿，冷酷固执，散漫与对抗。她已认识到她已不喜欢她了。这种现实是无法接受的。伊芙琳起身吃了一片安眠药，这是她那又晚上唯一能使她睡觉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巴巴多斯的珊迪·林旅馆，乔伊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

珊迪·林旅馆是一个很大的旅馆，坐落在巴巴多斯的一个月牙形白色海滩上，附近唯一的建筑物就是那些金融家、退休明星及贵族们的别墅，别墅外面都有铁栏杆围墙和长长的汽车道。珊迪·林旅馆既长又低，它有几英里长的走廊，迷宫般的进出入口。它的佣人，司机、服务员、酒吧招待、清扫和维修工、厨师、职员以及电话接线员全都是黑人。他们昼夜工作，以保证提供完美的服务。珊迪·林旅馆有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三个酒吧，二个餐厅，一个舞厅，一个高尔夫球球场，还有可供出租的帆船、水下呼吸器和水橇设备。在这里呆一天每天要花一百美元，乔伊和她父母在这里共呆了两个星期。

她爸爸要了一个套间，二个卧室，合用一个洗澡间。乔伊自己拿一把钥匙。她穿一条比基尼裤，戴着太阳镜，坐在长廊的椅子上看书。乔伊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和她爸爸身材一样优美，加上她长长的头发和洁白的牙齿，她就象广告中的模特。当伊芙琳看着她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她养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仙女。但问题是，在她对乔伊感到爱和自豪时，她也不得不付出小小的代价。如果说她和乔伊一直相处不好的话，伊芙琳想，大家现在都在遭受代沟的折磨。做父母只是一种责任，好坏都不由己。

在假期的第三天，乔伊预约好了要去上练习滑水橇课。她对滑水橇倒没有什么兴趣，可她对那教员却有兴趣。温什顿是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具有一种非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俊气魄。他身着白色比基尼裤，全身象雕塑一样优美。当他不教课的时候关外部世界的直接知识统统“悬置”起来，以便“面对事物，他就在旅馆门前的海湾表演翻、跳等滑水技巧。乔伊知道，他只是一个水上表演舞台上的演员。然而，他仍是珊迪·林最能吸引人的男人。那些也同父母们一月来度假的同年纪男孩子们对乔伊来说似乎大年轻了。那些令人感兴趣的大学生们都去弗兹德或阿斯本滑水橇去了。他们付不起在加勒比海度假的费用，他们都大了，不愿和父母一起活动。除了温什顿之外，没有任何人能使她感到刺激。

滑水橇很好学。乔伊第一次站到水橇板上，在第一次授课结束后，她已经学会怎样越过小船掀起的浪了。乔伊想，这可是一项极简单的运动。授课结束后，在小船的棚库里，当温什顿填帐单的时候，乔伊让温什顿模了她一下。

“明天见。”他朝乔伊身上挤了一下，他眼睛深情地盯着乔伊的眼睛，就好象是在开玩笑一样。她不知道他是在哪个电影里学到这个镜头的。他是这样明确，她简直难于相信。

“一定！”乔伊答道。温什顿故意把他比基尼突出的部分让她看。她知道，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在何时间和他发生关系。她想，如果她特别想做这件事的话，她会去找他的。

那天晚上，乔伊和她父母坐在舞厅边上的一个凳子旁边。她和她母亲轮流同她父亲跳舞。当她父母跳的时候，她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掺了汽水的薄荷酒。这时，一个穿着白法兰绒裤子和海军前克衫的男青年走过来，请她去跳舞。她以前没见过他，不知道他在这里于什么。他大约二十六岁左右，说起话来带一点外国腔。

他名叫克劳斯。以前她没见到他的原因，是他白天在城内的泛美航空公司办事处工作。他是管理这家珊迪·林旅馆的瑞士总裁的儿子。克劳斯是在世界各地的一流旅馆里长大的。他父亲曾在马拉喀什的马罗尼亚旅馆、依什托尼尔的帕拉科旅馆、伊斯但布尔的希尔顿旅馆以及巴黎的克尼伦旅馆工作过，他走到哪里，就把家搬哪里。克劳斯不愿长期住旅馆。他说这是一种谋杀——无穷无尽消耗时间，糟糕的帮助，和川流不息的宾客。然而，他喜欢旅行业务，因此在加勒比海的泛美航空公司办公室做一名经理助理。他说，他来珊迪·林时，碰到她也在这里，他感到十分幸运。

跳完舞后，他们又回到桌子旁，伊芙琳开始同克劳斯讲话，问他关于旅行方面的一些业务和他的抱负等之类的东西。最后，她爸爸站起来拉住伊芙琳的手说：

“好啦，该去睡觉啦！孩子们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

“别呆得太晚了。啊？”伊芙琳一边说着，一边几乎是让纳特施出了舞厅，看着她父母消失后，她说：“老天呀！”

“父母们，”克劳斯说着，笑了。“全都一样。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们直到乐队停止时才停止跳舞。“想去当地一家夜总会吗？”

“当然愿意。”

他们来到停车场。克劳斯扶乔伊进了他的MG车。他们在炎热的夜晚开车来到一个不甚出名的地方，这里有一些简陋的棚子。

“欢迎来到伊丽莎白女王城。”他说完，俩人都笑了。他替乔伊打开了车门，帮她下了车。他的风度真是令人愉快，乔伊想。

克劳斯带她穿过一条狭窄的泥土道，来到一个四周无墙壁的棚子，边上只有几根木柱子支撑着茅草屋顶。除了几根蜡烛和那支吵闹的乡村乐队，上面还有一支灯泡外，这里是一片漆黑。当乔伊的眼睛适应了这里的黑暗后，她发现除了她和克劳斯外，这里全是黑人，而且他们都用眼睛瞅着她和克劳斯。她感到有些害怕，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一时间她甚至怀疑，她是否能活着从这里逃出去，她似乎无法控制这种来自内心的恐惧。克劳斯对投来的目光似乎毫不在意。他要了几杯饮料。乔伊尽量装出喜欢的样子，并紧靠克劳斯；过了一会儿就再也没有人看他们了。乔伊的恐惧感也消失了，她开始高兴起来。如真想早点把这一切告诉文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当地人夜总会，可不是那种塞满了美国富人的度假旅馆。

乐队演奏的全是当地的乡土乐曲，乔伊也习惯了它的节奏。她长时间的这样紧靠着克劳斯跳舞，使她感到非常刺激。她感到他的小腹贴着她，他们双方都感受到了乐趣。他们一直不停地喝着一种琥珀色的酒。克劳斯说，这是一种非法酿造的当地酒。这种酒超过一般度数，喝起来象糖浆一样。克劳斯告诫她注意点。他说这种酒很厉害。

他们一起跳舞、喝酒，最后乔伊问克劳斯，他是否也觉得够劲？

“当然。”他说。他告诉她，他十四岁就开始抽大麻。那时他父亲正在马罗尼亚旅馆工作。“在摩洛哥，大麻叫凯弗。”他说。乔伊对他这样老于世故感到震惊，但她什么也没说，保持着冷静。

“你要大麻吗？在布里奇顿（巴巴多斯的首都）有大麻贩子。”

“我家里有点。”乔伊说。

“我们走吧。”克劳斯付完款后说道。

在开车回珊迪·林旅馆的道上，乔伊开始感觉头昏。她知道，这是酒在发挥作用。她估计，如果她呆着不动，这种感觉就可能消失。她向后躺在座位里，闭上眼睛，让昏迷感包围着她。这种感觉是舒服和不舒服奇异地混杂在一起，就好象是一场飘浮的梦幻不断地变换成下跌的恶梦一样。

“你没事吧？”克劳斯问。

他们又回到了珊迪·林旅馆的停车场。乔伊没有感觉到车已经停了。

“头有点昏。”她承认说。

“我曾警告你，那酒厉害。”

“我知道。”

他们下了车，静悄悄地穿过回曲的走廊朝乔伊的房间走去。乔伊用手摸着粗糙、凉爽的墙壁往前走，以免撞到墙上。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乔伊的房间。乔伊把她的小编织袋递给克劳斯，他立即找出钥匙，插进钥匙孔。他双手扶着乔伊走进了房间。她脸朝上猛地倒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直觉得天昏地转。她无法使这种感觉停下来，甚至旋转的快慢速度她也无法控制。

克劳斯紧靠她身边坐下，他非常缓慢、轻柔地开始亲吻她。

乔伊感到她犹如堕入了温暖的海洋。她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她喜欢这种感觉，好象她自己没有意志，没有知觉，没有自制力，随意让她的身体对这种感情做出反应。她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有了情夫，这个情夫比她更世故，更懂得爱

乔伊的身体在床上扭动着，用时支撑着，身体向上，身体的剧烈动作使她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她躺在床上就开始呕吐起来。克劳斯从床头柜上抓了一把卫生纸巾递给她，她用手中纸捂住嘴跑进卫生间。呕吐物从手中纸角流出。当来到便池旁，她的肚子出现胃痉挛，把晚上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继续干呕，就好象她的五脏六腑都要从嘴里吐出来似的。

卫生间通向她父母一侧的门打开了，她妈穿着睡衣，站在门口。

“我的老天，乔伊！你怎么啦？”

伊芙琳看见乔伊双膝跪在地上，脸朝着便池，双手扶着便池。直到她的眼睛习惯了从乔伊

房间射来的光线，伊芙琳才发现克劳斯。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腰带和他的白色法兰绒裤均已解开。乔伊再次呕吐起来，并发出尖叫声。她的衬衫被掀起来，她的长发落到尽是呕吐物的便池里。

“我看你最好还是离开这里。”伊芙琳对克劳斯说。

“她病了。”他指着乔伊。他不想扔开她走掉。

“离开！走！滚开！”

伊芙琳穿过卫生间，当着克劳斯的面砰地一声把乔伊房间一侧的门关上，把他一人关在乔伊的房间里。他除了离开，没有别的选择。乔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此时她身体太虚弱，病得太厉害，无法干预。

“乔伊？”伊芙琳把一只手搭在乔伊的肩上。“乔伊，他对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什么也没干。是我自己的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

伊芙琳几乎听不清她的声音。由于剧烈地呕吐，使她上气不接下气。

纳特来到卫生间的门口。

“她喝酒过多。”他说，“没别的事。”

“但她病得太厉害。”伊芙琳说：“你看看她。”

“她就是喝得过多。她明天会因为醉酒而感觉不舒服，然后就会没事。”

“那我该怎么办？”

“让她一个人呆着。”

纳特记得他过去也有几次曾因喝酒过多，而剧烈呕吐过。一次是因为喝了两整瓶帕斯酒。那次他也吐得象乔伊一样厉害。那次他父亲用地毯棒揍了他。几年后，他在西52街的一家爵士酒馆里喝了些非法酿造的威士忌酒。酒是一个演奏家从新泽西州南部带来的，他表哥在那里有一个酿酒场。那次他酒后昏迷四十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对纳特来说，这些是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一段很正常的历史。

“她那儿有个男人。”他们帮乔伊擦洗干净，送回她的房间后，伊芙琳说道。

“她都快十六岁了，当然她那会有个男人。”

“纳特，她可是你的女儿。你难道就一点也不关心她？”

“我关心她是否生活得快活。”

“你认为这也叫快活？你女儿扶着便池拼命地呕吐，她的乳房露在外面而旁边还站着一个男人，裤子都已解开。你真认为这叫生活得快活？”

“我认为这叫生活。”纳特说，“酒醉后她会感到十分不舒服，她会从中吸取教训。”

“我还不完全肯定。”伊芙琳说。她想，酒醉后的不舒服感不足以使她从中吸取教训。她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不让乔伊见到克劳斯。他对她来说年纪太大了，太世故了。她想，现在是她该下决心管一管的时候了。

乔伊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感到有些头痛，肚子痛，手发抖，眼模糊，皮肤上有斑点，腿发软。她既不想吃，也无法入睡。她躺在那里，望着加勒比海太阳照射出的阴影，她极力地回忆着，她和克劳斯是否做爱成功，但她记不清了。

两点钟的时候，服务员送来一把花束和一张克劳斯的名片，约她吃晚餐，并说晚七点会来接她。三点半钟的时候，她父亲送来香草冰淇淋、姜汁啤酒和同情的问候。

他告诉她自己年轻的时候喝酒的经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笑了。看看她现在的情况，她是学到了东西。

“你妈，客气点说吧，有点令人讨厌。”当他们停止开玩笑后，他说道。

“那么，有什么新东西？”

“新东西就是她不想再让你见到克劳斯。她说，他对你有坏的影响。”

“这太严厉了。我今晚要阳他一起吃晚餐。”乔伊胳膊抱在胸前，显示出一付反抗的样子。

“我建议你不要去。”

“是建议，还是命令？”

他父亲犹豫了一会。

“我想是命令。”

“如果她不想让我和克劳斯一起出去，她为什么不自己来于这卑鄙的事，她可以自己来告诉我嘛！”

纳特注意到，乔伊每次提到她妈的时候，从来没说“妈”或“我母亲”，而总是“她”。

“孩子，你和你母亲到底有什么说不到一块的事呢？”

“她生活在中世纪，而我则生活在一九六八年，这就是不同。”

纳特·鲍姆对他身边的这两个女人十分感兴趣。她们好象十分对立。简直难于相信，她们之间有着亲密关系，更难于令人置信的是，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伊芙琳性格内向，害怕冲突，有高度责任感，但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执行则没有把握。乔伊具有反抗精神，自信，好冒险，和她妈不一样，她的感情外露。纳特很少对他自己承认，他感到他女儿象他，他则为此感到自豪。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承认过，一方面他需要他的妻子，另一方面他喜爱他的女儿。

“她仅仅想保护你。”纳特站在伊芙琳一边说。他感到对她还是要有点忠诚的。

“你也不想让我再见到克劳斯？”

“坦率他说，我根本不管你谁约会。我就是把你妈说的话转告你。”

“如果她认为如此重要，让她自己来告诉我好啦。”

六点半钟的时候，乔伊起床，她已恢复过来，为外出晚餐开始打扮起来。

“你想上哪儿去？”她母亲从卫生间走过来。

“和克劳斯一起出去。”乔伊一边梳着头，一边答道。

“不行。”伊芙琳说，“今晚不行，以后也不行，”

“可以，不但今晚可以，如果我想去的话，明天晚上也可以。”

“你打电话，把约会撤掉。”

伊芙琳指着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台老式黑色电话。乔伊继续梳着头，抚摸着头发。她站在壁橱门后面的大镜子前一动也没动。

“没门！”乔伊说。

“如果你不打，我打！”

“你不会的！”乔伊停止了梳头，望着她母亲，以为她不敢拿起电话。伊芙琳冷静地拿起电话，让接通克劳斯的房间。当他接电话的时候，她告诉了他她是谁。

“乔伊感觉不好，我想她不得不辞掉你的约会。”

“她在撒谎！”乔伊拼命叫喊着，以便克劳斯能听见。“她在撒谎。”

乔伊走过房间，想把电话从她母亲手中夺过来。她母亲迅速地挂上电话，并使劲按住电话，使乔伊无法使用。

“你撒谎！你根本没有胆量告诉他真实情况。怎么回事？你难道不喜欢他露在外面的肚皮吗，”乔伊站在她母亲面前吼叫道。

伊芙琳打了乔伊的耳光。她使劲地掴在她的脸上，掴的力量之大，使她向后退了三步，脸上充满了泪水。母亲和女儿相互凝视着，她们对她们之间相互产生的仇恨感到震惊。过了一会，伊芙琳急匆匆地走过去，准备离开房间。当伊芙琳走到门口时，乔伊朝她吐唾沫。伊芙琳轻轻地把门关上，装作没看见。

当乔伊停止发抖后，她立即挂电话给克劳斯。她告诉他，她感觉好多了。她可以按原来的约会行事。他犹豫了一会，然后说，他感到非常抱歉，他还有别的安排。

“噢！”乔伊说。

“我非常抱歉，真的抱歉。但我目前无法改变原来的安排。”

他的话听起来十分诚实。因此乔伊决定再冒险地问一下。

“明天呢？”

“明天我要去安提瓜。”

“安提瓜？”

“是为了工作，我经常旅行。”

“噢！那你什么时候回到巴巴多斯？”

“九天后。安提瓜之后，我还要去马尔顿和克罗依克斯，然后再回来。”

“九天后，我要回约纽了。”

“真对不起，我真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乔伊说，“好吧，祝你旅途顺利。”

“也祝你假日愉快！”

“好哇！”

“也许明年……”他说。

“也许。”乔伊说。

明年根本不可能，这一点他们俩人都清楚。他们决定不再相互客气了，道了声再见，就放下了电话。

乔伊知道，她的情绪太低，没心思到餐厅吃晚餐。她不敢坐到桌子边上，即使饿死。此刻

她也不愿和她母亲坐在一块。她让服务员把饭菜送到房间来，在她等饭送来的时候，她抽了一支大烟。她回忆着昨晚她和克劳斯的亲昵的有趣情景。她翻了翻从飞机上带下来的一本《魅力》杂志，她真希望她的立体音响也在身旁。房间里没有电视，她有些坐立不安。等晚餐送来的时候，抽完大烟，她可真有点饿了。她对晚餐的到来感到高兴，因为这使她有事可做了。

乔伊迫使自己在房间里呆到十点半。最后，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孤独。她穿上裤子，梳了梳头，离开了房间。走廊里除了几个服务员一边推着备品车，一边格格地笑着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她下楼，来到一个现在已经空荡无人的大餐厅。她穿过那些已为明天早餐而摆好的桌子，走到门外。再往下走两节楼梯就是舞厅，乐队奏出的音乐向上飘来，舞厅的地板和海滩得于同一水平面。乔伊倚在墙上，寻找着她的父母。他们一般坐在舞厅边上的桌子旁。棕榈树环绕着半圆形的舞厅，灯光照进了树丛。多么美丽啊，就象电视机里的电影的画面，美妙的音乐伴随着海水轻轻拍打海滩的声音。

她看见了她的父母。他们和来自圣·路易斯一对夫妇在一起，他们已相互成为朋友。纳特此刻正和那位妻子在跳舞，那女人一头金发，性感得近乎于轻浮。伊芙琳正和那位丈夫在跳舞，他穿着晚礼服，扎着领带。乔伊不情愿地承认，她母亲穿着一身白色衣服，露出已经晒黑的胳膊，在柔和的光线照射下，显得非常漂亮。另一个男人挽住她母亲的胳膊，这对她来说还是陌生的。她怀疑他是否看上了她。

在观察那些跳舞的人时，她发现了克劳斯。他和一个姑娘在一起。这位姑娘乔伊曾在海滩上见过，但没说过话。她穿着一身土气的晚礼服，梳着在头顶上卷起的发式。乔伊想，她看起来象是个讨厌的人，但克劳斯却不令人讨厌。她并不能责怪他。她期待着什么呢，难道期望看到因为她母亲说他对她有坏的影响而坐在那里悲哀吗？

乔伊观察着跳舞的人们，每人都有一个舞伴。当她穿过舞厅往远处看时，她看到白色的海滩在月光下微微闪光。一排排的椅子已为第二天进行日光浴的人们整齐地安放好。乔伊发现，有一对情人坐在外面。当她朝月牙形海滩望去的时候，她注意到那水榭棚。

温什顿看来还是个不坏的情人，只是有点近似于粗野，但仍比一般的要好。乔伊和他躺在床上，乔伊连通往卫生间的门也不关。

“乔伊？”这是她母亲在叫。

“嗯？”乔伊连动也没动。温什顿想起身，她却用腿把他压住。她可以听到她母亲从卫生间地板上走过的声音。

因为卫生间处于半黑暗状态，在乔伊的母亲还没看清她时，她就看见了她母亲。当伊芙琳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后，她看到了乔伊为她安排的这一幕戏。她只是张大了嘴喘息着，发出了很微弱的声音，而没说一句话。

“你现在可以走了。”乔伊告诉温什顿。他起身，非常迅速而又静悄悄的穿上了他的白色比基尼裤，然后离开了房间。乔伊在想，这种事他还不知干过多少次呢！也许有很多次。他也许认为这是他的工作给他的优惠待遇。

乔伊爬起来，全身一丝不挂，慢腾腾地走过房间，故意当着她母亲的面关上卫生间的门。

“明安，妈，祝你做个好梦。”

第二天，在伊芙琳的坚持下，他们三人离开了巴巴多斯。一个星期之后，在伊芙琳的坚持下，乔伊第一次约会看了精神病医生。

理查德·史波丁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公园与麦迪逊之间的62街里的一幢优美的褐色大楼里。这里有一个二层楼高的大理石门厅。楼梯宽大而弯曲，窗帘遮盖着后墙上的窗户。

乔伊按了一下蜂音器，并得到答复蜂音，她推开通往里面办公室的门。这是一间很大、比例协调的房间，天花板很高，里面的装饰追塑到十九世纪末叶。史波丁医生的办公室最近刚喷刷过，地毯呈海军深绿色，家俱显然都很贵，并合适地摆放着。

史波丁医生的皮肤是茶青色，淡褐色的头发，棕褐色的眼睛。他穿一件褐色上衣，马裤呢裤子。他个不太高、身材修长，大约有四十岁左右。

“你就是精神病医生罗！”乔伊说。

史波丁医生轻轻地关上了她身后的那扇沉重的门。只有他们俩个人在办公室里。他指了指长沙发椅，他自己坐到了一把皮手扶椅子里，并跷起大腿，细心地调整了他裤子里的突出部分，在乔伊看来，有点过分谨小慎微。

“你搞同性恋吗？”她问道。

“你会发现沙发很舒服的。”他说。

尽管长沙发一头有枕头，她也知道应该躺下，她还是故意坐在长沙发上。她也学医生的样子，跷起了大腿，她的超短裙下面露出了长筒袜。

“我建议你躺下。”医生说，“躺下方便检查。”

“可别告诉我，你准备同我发生关系！”乔伊打着呵欠说。乔伊自己也不知道她准备同这个讨厌的人闹到什么程度。

“我准备为你提供些帮助。”他说。

“好啦，”乔伊说，“发生很多次关系。”她懒散地向后靠在长沙发上，她估计史波丁博士可能要告诉她让她坐直或躺下，或要求知道她的童年或是否恨她妈妈，或是否想同她父亲发生关系等，对此，他表现出一副蔑视的态度。他什么也没问，最后，乔伊对这种沉默产生厌烦情绪。

“你要问我点什么吗？”她问道，感到挑衅并没有赢。

“也许你想说点什么。”史波丁医生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不高不低。

“滚你的！”乔伊说。她下决心再多一个字也不说。她对她母亲强迫她来看精神病医生感到愤怒，好象她真是一个疯子。她没疯，她妈无法说服她。她可以唆使世界上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来攻击她，即使如此，她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害怕。乔伊静静地坐在那儿心中激烈地翻腾着。史波丁可以用刀和枪来折磨她，甚至给她注射能讲真话的麻醉药，但他不会从她嘴中得到一个字，一个音节也不会得到。

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有人觉得快，有人觉得慢。最后，史波丁医生站了起来。

“你的诊断结束。”他说，“我星期四再给你看。”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一个字也没说。”乔伊说。在她朝外走的时候，她用她的乳房碰了他的胳膊上。

“我们下次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史波丁医生说。

还没等她来得及再说一句话，他已关上了门。把她关到了大厅的外面。

她母亲控制不住她的好奇心。

“医生说什么啦，亲爱的？”乔伊一走进房间，她就问。

“没说什么。他能说什么？我又没疯。”

乔伊一边说，一边穿过起居室，朝她自己的卧室走去。

“没人说你疯啦。”她母亲说。

乔伊使劲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她使得劲太大，墙上的灰泥变松，慢慢地象雪花一样落到地毯上。没关系，丽迪亚可以去打扫。

乔伊真希望她是个杀人的凶手。她坐到她房间的窗台上，朝下望着74街上那些匆匆而过的人群，如果她是个杀人凶手，她需要有一支手枪。乔伊竖起右手大拇指，闭上左眼，用右眼对着大拇指瞄准，她的目标对准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妇女，她牵着一对德国种小猎狗，它们正对着上面写着禁止停车”标牌的铁柱子撒尿。她认真地瞄着，然后扳动了扳机。那妇女抬起头温和而惊奇地看着她，然后她的腿在她身下弯曲下去，非常缓慢地倒在人行道上。她既没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血。只是在她左胸有一个整齐的黑洞。那狗好象没有注意这些事，继续撒着尿。这么容易，乔伊感到有些惊奇。

接下来，她开始枪杀一个送花的黑人孩子；一个看起来高贵的白胡子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幅很大的用纸包着的油画；和一个满头金发、戴着一副太阳镜的女孩，她看起来有些象坎迪·伯根。

她看着他们都一个个静悄悄的死去，就象在电视里重新播发刺杀肯尼迪的慢镜头一样。肯尼迪遭枪击时，乔伊才十一岁。他的被杀是留在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事件。有趣的是，电视台当时还播放了死者临死时的痛苦。

“我杀死了四个人。”乔伊星期四说。

“是吗？”史波丁医生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其中有一个女人，大约四十五岁，牵着两条狗。我直接射中她的心脏，她死的时候连叫都没叫唤一声。”乔伊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史波丁医生没说话。因此，她继续描述了送花的男孩，那老人和那位漂亮的姑娘。她想，她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她愿打赌，她也许是史波丁医生所有病例中最有趣的一个。她在等待着他对她的评价。

“你认为这些人都代表着谁？”他问道。

他的平静使乔伊感到愤怒。

“他们谁也不代表。他们仅仅是我那天击毙的几个人。”

“有没有可能，那女的是你的母亲，那老人是你的父亲？也许那漂亮的女孩就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否有人曾经告诉过你，你是满嘴胡说八道？”

“经常。”史波丁医生说，他的声音仍然非常平静。

乔伊判定，他一定有一群非常感谢他的病人。也许他们会给他送来砒霜作为圣诞节礼物。但她决定再不说话。为什么要在他面前耗费精力呢？

剩下来的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史波丁医生起身，打开门，一句话也没说。乔伊再次离开了大厅。她看了看她的米老鼠手表，这时正是四点十五分。

那医生脑子里一定有一个钟，一个布谷鸟钟。

乔伊恨史波丁医生，她不愿去见他。在艾维的帮助下，她对他编了一套最令人不能容忍的谎言，而他居然这么笨，还相信了。他不断地问她诸如她是否认为自己 and 坎迪·伯根一样漂亮之类非常严肃的问题。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她，而史波丁医生就是个白痴。到了六月份，乔伊认为她对史波丁医生和他的工作已经厌烦了。她问她爸爸，她是否还真有必要继续去找他。他说，他已安排了同史波丁医生的约会，等到那时再决定吧。

“这样行吗？”他问道。

“只要是你去，而不是她。”乔伊是指她母亲。

过了一个星期，纳特见到了史波丁医生，之后，他约乔伊一块吃午饭。

“史波丁医生说你对人怀有敌意，具有破坏性和铁石心肠。”

纳特要了鸡尾酒，他和乔伊在爱德华餐厅靠窗户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这是一个下等人常来的地方。但乔伊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她喝了一杯玛丽酒，但里面没有掺伏特加。她感到特别的颓废，就好像一个酒鬼再不能喝酒了，感觉就象过去的酒鬼电影明星一样。

“敌意。破坏。心肠硬。不错。”乔伊说着，呷了一口酒。“他还说我是否发疯了？”

“他没这个，”纳特说，说完他们俩都不再提这个话题。

乔伊知道她到家就自由了。

“你认为他怎么样？我是说他个人？”她问道。

“一个笨蛋。”她父亲说着，打开了菜单。“你中午想吃点什么？”

“这样我就不用再去了吧？”

“我再跟你妈商量一下。”

“一盘沙拉和一盘鸡，只要白鸡肉，”乔伊说。“嗨，爸？”

“什么？”纳特答道。

乔伊想到她爸，他多么潇洒，多么气派，多么好啊！她妈不配他。她只希望她也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

“我爱你！”

“我也爱你，十分爱你，”她爸说，“现在点菜吧！”

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自1929年以来最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要在美国举办奥运会，还要进行总统选举；这一年是黑人权力扩大的一年，是嬉皮士的年代，是鹰派与鸽派的年代，是静坐罢工的年代；马丁·路德·金四月被暗杀；罗伯特·肯尼迪六月被暗杀；这一年世界科学双螺旋线年代——詹姆斯·华森阐述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和基因裂变；这是一个美元地位开始下降的年代，是一个灾难之年，分界线之年，是六十年代开始走向结束之年。

1969年9月，人类在月球上行走两个月之后，乔伊说服了她父亲和她母亲，终于离开了父母家，搬进了公寓。这是一个普通的三间半居室公寓。为了安慰一下她母亲，乔伊到纽约大学学习电影课程，只要她看来是在于一点“正经事，”她母亲就不至于找大多麻烦。

她母亲担心乔伊吸毒；担心乔伊怀孕；担心乔伊堕胎；担心乔伊与某一个男孩子同居，担心乔伊和她的未来，当乔伊告诉她，艾维要同她男朋友结婚的消息后，她母亲感到非常不安。她的男朋友叫杰克·洛加，他是一个美国人与黎巴嫩人的后裔。乔伊从她母亲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母亲担心乔伊会跟着艾维学，也许会同一个中国佬结婚，或甚至更差的人结婚。当然，她母亲从来也没有这样公开说过。

艾维的母亲和继父已经分居，并向法院正式提出离婚。当艾维告诉乔伊，说她准备同杰克结婚时，乔伊问道：“他是否将是你的第一个丈夫？”

艾维原来预计她至少要结三到四次婚。

“不。”艾维说，“我跟他结婚是要跟他白头到老。我受不了那么多次离婚的折磨。”

乔伊自己单独住的第一年也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也使乔伊由被动变为主动，由破坏性转变为创造性。这一年，乔伊感到生活中充满了爱。

乔伊实际上喜欢纽约大学。她的同学们都象她自己，而不象阿兹利学校的那些受到庇护的富人的孩子，他们反抗性强，不守规矩，并不幸福。她这些同学有来自富人家庭的，也有来自穷人家庭的和中产阶级家庭的。他们中间有黑人、白人，也有犹太人和新教徒。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象乔伊一样，他们都是性发育过早，感情不成熟。象乔伊一样，他们都是生长在六十年代。对这样一个迅速转变的社会发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感到迷茫。

这使乔伊感到，她的行为并不乖僻。她发现，其他人在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们究竟想要什么的问题上也同样遇到了困难。他们被告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到了十五岁、十六岁，他们仍然还大小，因而不能知道他们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到了十六岁、十八岁，他们还都在探索着自己的个性。正是在这变更的年代，乔伊遇到了特里·巴斯。

乔伊和特里都在同一电影班里学习。他们在一起研究电影历史，从无声电影到最新的影片。他们分析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爱因斯坦，威尔斯，肖邦和德·米勒；研究制片厂的发展过程：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福克斯和帕拉芝特；研究战后现实主义：迪·希卡，弗尼米；研究五十年代的新潮和名导演的出现：特鲁福特，戈达德、布尼尔和安东尼奥尼；他们谈论现在，研究库罗沙瓦，波戈丹洛维奇和伯褒曼。

电影就是他们的快乐，就是他们的感情。他们从《派登》到《爱情的故事》，从《飞机场》到《麻西》，什么电影都看了。他们认识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好奇心、理想和志向都是受电影的影响而形成的。他们是接受来自于电影胶片反射到屏幕上的图像、印象和信息的第一代视觉观众。麦克努翰是他们的预言家和哲学家。根据他的理论，他们都是世界村的居民。

他们分析了共同的热情，共同的公民感，他们很自然地发现，他们有着相似的去。就象乔伊和她爸爸志同道合，而对她们妈心怀不满一样，特里的母亲是他的同盟军，而他父亲则是他的敌人。他们发现，乔伊通过反抗来表达感情上的疏远，而特里则把感情隐藏起来。当他们发现各自的防御后面的真情，他们产生了相互的信任感，成为要好的朋友。当他们相互吐露得越来越多，当他们感到不用担心对方会背叛自己，当他们共同分享着秘密、屈辱和梦想的时候，很自然，他们也就成了情人。

事情发生在1970年5月5日，也就是在肯塔基发生枪击事件后的第二天，纽约大学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个人安全受到威胁。就在美国四月三十日在柬埔寨采取行动后，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爆发了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入侵的请愿书由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传递着并签上了字，然后送到白宫交给尼克松总统。示威是平静和有秩序的。特种警察部队接受命令开进了公园，他们双臂交叉，挂着手枪站在那里。而发言人则在那里讲演，谴责美国入侵亚洲，请愿书传递着，签上字后又送回到组织者手中。当这一切结束后，抗议者渐渐散去，他们有的回到教室，有的到图书馆，有的则出去上咖啡馆。警察也悄悄地撤走，示威游行结束，而没发生任何事故。

肯塔基外枪杀四名学生使全体学生都感到震惊。非常容易，非学容易地会想象到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曼哈顿。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便衣警察的发痒的指头扳动扳机，一个经常侮辱别人留长发，对别人吼叫“法西斯猪”的便衣警察。

当天晚上，礼堂举行了蜡烛悼念活动。全部学生和教师都参加了，每人手里都端着一支蜡烛。空啤酒瓶，盛冰淇淋的纸杯，弯曲的铁丝大衣架，装纸巾用的纸板卷以及瓷器茶几都被改造成了蜡烛台。在黑暗的礼堂中，只有成百上千的蜡烛火焰在闪烁春。学生会的主席做了关于平等、自由、真理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力的短暂、简单的讲话。当他讲话结束时，礼堂里沉默了一是。这是没有计划而一致的行动。因此，更具有力量。由于悲剧而团结在一起的人群静静地、缓缓地排队走出了礼堂。

乔伊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不想独身一个人呆着。她在人群中发现了特里，他们一起朝第六大街的赫沃德咖啡馆走去。

“被枪杀的也有可能是我们。”乔伊说完喝了一口咖啡。“那样我们现在就可能死了。如果我们去了肯塔基州，被枪杀的也许会是我们的。”

“我原想，他们最多会象在芝加哥所做的那样对待我们。我原想他们最多只会是用催泪弹驱赶人群。但现在如果你与他们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杀了你。”

“去年他们在月球上行走，”乔伊说，“而今年他们则在地球上杀人。我真不知道他们准备什么时间到月球上去杀人。我猜想，一旦他们准备在月球上杀人，他们会让我们从电视里观看的。”

“记得《花的力量》吗？”特里问道，乔伊完全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问题。

“还有《海特——阿希伯里》和做爱，而不是战争？”

“最后一个好年头是一九六七年。”特里说，“当时人们还存有希望，至少我当时就有。”

“我也有。我从来没想到希望会结束。还记得《不尽的夏天》吗？现在要记住这些都很难了。”

乔伊沉思了一会，想起那首《头戴鲜花走向旧金山》的歌。据说那应是宝瓶座时代的开端，遗憾的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乔伊感到，她还没有经历完过去就已经失去了过去。这是她被骗走的另一件东西。

“那就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特里说。“令人可笑的是象我们这么大年纪也怀念过去。我原想，只是当你老了以后才怀旧。”

“我想等你老了以后，等待你的就是死。”乔伊说。

“我已有两年没和任何人睡觉。”乔伊说。他们喝完了咖啡，在第八街上朝东走去。明亮的路灯说明现在没有危险。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有靠在一起。乔伊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她从来没告诉过别人，连艾维也没告诉过。和她睡觉的最后一个男人就是巴巴多斯的滑水橇教练温什顿。自从那时以后，她对性交完全失去了兴趣。她认为这种关系只有欺诈，保证，而没有真正的赋予，就好象她小时候从电视商业广告中选订的低贱的塑料玩具一样，它们都很精致，包装讲究，看一眼就会给你以无穷的欢乐，但一玩就会散开。她原以为性交，就象一件新玩具，一件新衣服，一个新口红一样会改变她的生活，会使生活得更好，更有趣，更令人兴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就好象又一个保证没有得到实现一样。

“如果你不想的话，完全可以。”特里说，“我理解。”

特里也曾对性交产生过失望。当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发现，每次去参加和平游行肯定会得到性交的机会。那些追求大赦、种族平等和大麻合法化的姑娘们也追求性解放。每次游行或静坐示威之后，参与者们都一双一对地用性生活来代表新时代报答他们所做出的努力。过了一段时间后，特里根本记不清他曾经和谁睡过觉，和谁没有睡。他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的过去以及她们的梦想。但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最终她们都似乎变成了同一个姑娘，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有着同样的长头披发，穿着同样的牛仔裤。

“我的确想。”乔伊说。他们来到了特里在东十街的房间，他们上了床，在一种怀念过去、永恒、相互依恋的情感中做了爱。

那年夏天，珍妮·乔夫林之死的夏天，纳特·鲍姆五十岁生日的夏天，乔伊和特里买了机票飞往巴黎，并访问了欧洲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哥本哈根和马德里。他们沿途免费搭乘别人的便车，住青年旅馆，抽大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就唱民歌。在马德里，他们租了一辆菲亚特车，他们开车南行经过西维里到达科什达。他们超过美国和德国的一些旅游者，最终到达阿耳黑西拉斯，从那里，他们又乘坐渡轮到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在丹吉尔，他们游览了苏克，喝带糖的薄荷味茶，并得知这里叫大麻为克凯弗，这使乔伊想起珊迪·林的克劳斯。她真想知道，他现在在于什么。

夏天过去了，乔伊和特里回到了纽约，他们决定搬到一起住，他们搬进了乔伊的房间，但没有公开宣布，他们自己说，他们选中乔伊的房间是因为这套房子大一些。他们不愿承认，他们觉得特里的邻居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的房间一年之内被人盗过三次。一个波多黎各女人在离特里房间三个门远的地方，刺伤了一个波多黎各男人。他们曾怕每一个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但要承认这一点就违反了他们的原则。因此，他们互相告诉说，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乔伊的房间大一些。

特里重新开始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学习，乔伊继续旁听她感兴趣的课程。但比其它任何事都重要的是——比他们的课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同龄人都重要，这就是他们相互之间感兴趣，他们热衷于学习怎样生活在一起，怎样相互分享而不令人窒息，怎样在建立共同感情的同时，而又保持各自的个性，怎样取得一个满意的独立平衡，最重要的是，不重犯他们的父母所犯过的错误。

他们想打破在家庭里那种分工，正是这种分工，使家庭的和睦受到削弱。他们把家务活平均分：做饭、购物、洗衣服，清扫，付款，整理床。他们在经济上联合起来，碰巧，他们收到的补贴都一样多：每月五百美元。纳特每次同乔伊在大厦吃午餐的时候都给她支票。特里的父亲寄支票，并附上一封由他的秘书打好的信，询问特里的学习和身体情况。他们所有的家庭开支都来自于这笔资金。不管剩下多少，然后再均分，各自分到的钱愿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必向对方做出任何解释。

乔伊的愿望被认为和特里的同样重要；她对隐和、表达和舒适的需求被认为和他的一样平

等。他们摒弃了关于“女人的位置和男人的世界”之类的世俗偏见。不管谁发现对方有旧意识抬头的倾向，就会立即被指出来并加以解决。

共同生活使他们两人都比从前感到快乐。

1972年9月，乔伊决定把她和特里住在一起的事告诉她爸爸。她对这件事一直是偷偷摸摸的厌烦透了。她觉得，现在是把一切都公开的时候了。

“爸，”当乔伊坐在他们常坐的桌子旁后，眼望着中央公园的北部，她说，“现在你该知道真相了，特里和我住在一起。”她等待着，不知她爸会说些什么。

“我知道，我很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什么也没说？”这出乎乔伊的预料之外。她对她父亲接受这一事实时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震惊。他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事还能使她感到震惊。

“这不关我的事。”

“你不管吗？”

“只要你幸福。”纳特说，“看来你是幸福的。”他的手抚摸着乔伊的脸，她把脸稍微侧了一点，这样她就可以亲吻到他的手指。

“你准备告诉她吗？”

他们俩人都知道乔伊指的是谁。

“也不关她一事。除此之外，”纳特说，“为什么要烦扰她呢？”

乔伊笑了。她想谢天谢地，她有这样一位好爸爸。

“也许，”巴巴拉·罗斯说，“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起吃晚餐。你，特里，你父亲和我。”

“也许。”乔伊说。她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几个星期以后，当乔伊在老地方与她父亲一起吃午餐时，她父亲把巴巴拉·罗斯介绍给了她。乔伊想，噢，她把事情公开了，现在她父亲也在做同样的事。

“你好。”乔伊以非常平静的声调说，隐藏了心中的不满。她不希望有第三个人同他们一起吃午餐。她从来没拖特里来。

“见到你很高兴。”巴已拉说，“我听说过关于你的很多事情。”

“都是些坏事，我敢打赌。”乔伊试探着巴巴拉。

“各占一半吧。”巴巴拉说。

“很好。”纳特说。介绍她们相互认识是一种冒险，但冒这种险还是值得的。“她是一个好孩子。”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叫我‘孩子’的人。”乔伊伸过头去在她父亲的嘴上亲了一下，重申了过去的要求：“一盘沙拉……”

“我知道。”纳特说，“一盘鸡，只要白鸡肉。”

巴巴拉看着这父亲和女儿，他们的骨架一样，都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都具有幽默、智慧的风格。但乔伊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佳，是因为她的年龄的关系吗？还是她母亲的基因作用？伊芙琳有这样中间厚两角薄的嘴唇吗？伊芙琳有过这样不加任何点缀的长长的秀发吗？伊芙琳也是一样极易招致责难吗？伊芙琳一直在努力回避她吗？巴巴拉一直在推测着这位“夫人”，她从来没有想象过她的头发没有任何点缀。

就好象乔伊也是一个地位平等的人，巴巴拉和纳特读到了一些涉及到印刷机和购买纸张方面的一些生意问题，乔伊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父亲谈生意。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办公。难怪他这么成功。他谈起生意来是这样生气勃勃。他的性格的这一面，乔伊从来没见过。这使她开始喜欢上巴巴拉来。她在帮助她父亲，她把乔伊当成平等人对待，她并不问诸如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啦，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啦，你们这代怎样看待事物啦等等这样一些平淡而愚笨的问题。

“这孩子一点也不懂生意，”当他和巴巴拉把问题解决后纳特说道。

乔伊耸了耸肩。“我为什么要懂？谁需要懂？”

“你听说过你爸爸的抱怨了吗？”巴巴拉的问题是一种申明，带有一点明了情况的幽默。

“我猜想你知道。”乔伊耸了耸肩。她不想承认，有些事巴巴拉知道，而她不知道，更不要说床上的隐私事情了。

“是的，”巴已拉非常自信他说，“我知道。情人一般是要分担他们的忧虑的。”

乔伊看了她爸爸一眼。她原以为他也许会窘得透不过气来。但他坐在那里冷静得象一根黄瓜。“情人。”乔伊佩服巴巴拉的诚实。而她要把特里的事告诉她爸，却化了好几个月时间。

“我想让你认识巴巴拉。”纳特说。他拉起巴巴拉的手，她的指甲精心修剪过并染成了时髦的红色。他拉着她的手，就在桌子上面，大家都看得见。

你们准备结婚吗？乔伊没有胆量去问。除此之外，她还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沉默了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巴巴拉建议他们四个人一起吃一顿晚餐。这说明她知道特里。这说明她爸爸把什么事都告诉巴巴拉了，甚至比告诉乔伊的事情还要多。

“听着，我得走了。”

乔伊急忙站起来，碰到了桌子上，差点把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水杯打翻了。

“再见，孩子。”纳特说着，拍了一下她的屁股。

巴巴拉的笑容没有显露出能表达任何意义的东西。

乔伊从大厦一直走回家。

她路过布隆明戴尔商场时，买了一瓶染指甲水。染指甲水的颜色叫“库尔”，售货员告诉她，这是法语、意思是“皮革”。并说这是今年最时髦的色彩。乔伊从来没染过指甲，她想知道染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她回到家时，特里问她午餐吃得怎么样。

“和平常一样。”乔伊说。

特里想，听起来她好象有些生气，但她什么也没说。因此，他估计，这可能只是他的想象。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乔伊问特里道。“我想咱们一起拍部电影，合作拍摄，因此，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特里对此事非常热情。“这太好了！”

“就象杰克和艾维一样。”乔伊说。尽管她此刻正在想着他爸同巴巴拉关于纸张储藏问题的谈话。

乔伊真羡慕艾维和杰克：他们好象总是在一起。他们住在索赫的一个阁楼里，而且自己对阁楼进行了装修。他们自己开办了印制衬衫业务。顾客只需付3.98美元，就可把任何照片或图像印到他们自己的衬衫上去。除此之外，他们还出售上面印有著名摇摆乐队，先锋派明星，反主流文化的英雄及标语等之类东西的汗衫。他们还在摇摆乐杂志、先锋派报纸上刊登广告，每天早晨，邮差都送来一大堆订单，并附有现款。他们说，简直是难于令人置信。他们挣的钱已经超过了他们所知道怎样支配的程度。他们经常把订单退了回去，因为有时他们不想工作。

他们信仰瑜伽，参加“交朋友”治疗（即现代美国的一种所谓精神治疗方式，受治疗者在组内自由地通过抚摸和交流内心感情来达到治疗目的）和集体作爱。他们谈论梦幻冥想的好处，谈论马拉松式的情感，使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谈论他们怎样在外面有外遇而又相互之间不产生嫉妒情绪。

有一天晚上，当大家都熟睡后，杰克和艾维邀请乔伊和特里同他们一起睡觉。他们说，他们尝试过三人作爱，正常的狂欢，但从来还没有尝试过四人一起作爱。

“为什么不试试，”乔伊看着特里，试探性他说，“也许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不！”特里显得特别冷静。“我认为作爱是两人之间的私事。”

“但四人也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乔伊说：“如果你不去试一下，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特里说，“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

乔伊感到她在情人和朋友之间遭受着折磨。太固执了，没有争论下去的必要了。她选择了艾维。

“好极了。”艾维说，“我们认为人们应该只做那些他们真心想做的事。我佩服特里在大家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时候敢于表明自己的意愿。是这样吧，杰克？”

他点头表示同意。乔伊真是希望特里不是那样地古板守旧。

在和艾维和杰克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之后，乔伊和特里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面平静的后面隐藏着紧张、不满的情绪。冲突迅速聚集，深深隐藏的失望情绪开始出现。

他们这些富人家的孩子们，居然为钱争论起来。乔伊认为多化几个钱买食品值得，可特里却不这么认为。特里想要一个四声道的音响，可乔伊想要一台彩电。乔伊认为特里买那些硬壳精装书是浪费钱，可以等到有软包装后再买。特里认为乔伊参加的锻炼学习班是一种浪费，她可以在家里做同样的锻炼而不需付任何钱。

他们双方都知道，也都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荒谬可笑的。但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因为在这背后的感情并不是荒谬可笑的。

他们为家务事争论，争论谁做得多。

他们为是否生孩子争论。特里认为生一个好。乔伊说：“什么？你要我的结局最后象我母亲一样？”

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乔伊总是生气，特里则总是处于守势。他们对自己不满意，对对方不满意，可他们谁也没想散伙。也许，如果他们耐心点，他们还会重新

合好的。

最令人痛苦的是十月的那天晚上，当乔伊的父亲打电话告诉说，她母亲企图自杀。乔伊感到震惊，内疚，同时又高兴——这也是离开特里的一个借口。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问道。

“我不知道。”乔伊耸耸肩。她从来没对他讲过巴巴拉·罗斯的事。

“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特里主动提出说。

“没事，我一个人去。”

“来个电话，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当然。”乔伊答应道。乔伊希望他早点停止安慰她。“我会给你挂电话的。”

“你肯定没事吗？”特里希望乔伊能让他帮助她，但她一直把他拒之门外。

“我父亲和我可以处理我母亲的事。”乔伊说。他们来到大厅，门岗给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父亲和我可以处理任何事情。”“乔伊，你知道吗？”特里在关出租车门的时候问道，“你和你父亲之间的关系不健康。”

“是的，”乔伊说，“我知道。知道怎么回事吗？”

“什么？”特里问。

“我喜欢这样！”

出租车朝北边的第一大街的沃希思医院驶去。当出租车开动的时候，乔伊竟没挥手道声“再见”。

沃希思医院专门医治女醉鬼，烧伤的电影明星，为做环球览的富翁们堕胎，为衰老的世界著名美人做整容手术。同时也医治上层社会企图自杀的病。

沃希思医院位于哈迪逊和公园之间的一条安静的街道，其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医院。这是一幢呈灰色的典雅幽静的小楼。前门上挂着一块十分光洁的椭圆形铜牌匾，上面工整地书写着“沃希思”几个字，一个穿着整洁的男接待员，坐在大厅里的那张古式希莱登桌子前，非常客气地询问乔伊的姓名。他对乔伊的牛仔裤、汗衫。旅行鞋和密针的警卫队毛衣，连第二眼也没有看。在沃希思，他们显然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她母亲的病房在三楼。乔伊乘电梯上楼。这是一个老式的电梯。开电梯的是一位身着灰色制服的黑人老头。他讲效率，待人和气，谨慎从事而又毫无陷媚之意。

伊芙琳·鲍姆的房间是3—F，朝南，从窗往外望去就是紧靠八十街的后花园。房间里铺着翠绿色的地毯，摆放着古董法式椅子。窗户上有半透明的白色窗帘和软百叶帘。还有一张上面铺有玻璃砖的化妆台，化妆台上有一块普通镜子和一块化妆放大镜核心，说明宇宙本质、构成、生灭、变化，提出“道生万，一个沙发椅和一个咖啡台。只是当乔伊走近窗台朝外望的时候，她才发现窗外还有一层粗铁丝网罩。尽管沃希思在室内装修得这样好，她还是一座疯人院，他们不想让住在这里的任何人往下跳。

乔伊的父亲不在那儿。她母亲见她走进房间，只是用目光看着她。

“妈，你好！”乔伊说。

她母亲没说话。她躺在那里，背后垫着花边枕头，没说话，没哭泣，没有任何反应。她看起来令人可怕盖公西汉道家学者。胶西（今山东高密县）人。治黄老，肿胀得象一只青蛙。她的眼圈红肿，嘴唇肿大得几乎可见唇内的下侧。她全身的皮肤就象一只充气过量的气球，被撑得太薄，似乎轻轻一摸就会爆炸。

“你感觉怎么样？”

她母亲仍是一言不发。她的双手放在床单上。她发现她的手也浮肿，就好象是生长在皮肤和骨架之间的一个大疔子。乔伊怀疑，她母亲目前的这种畸形外表可能是由于服药的缘故，她母亲一动不动，甚至连眼也不眨一下。她躺在那就象是一个日本产的低价的布娃娃。

“你现在没事，我很高兴。”乔伊说。最后一句话有些哽噎。她咽了一下，清了清喉咙。

她妈妈没做何反应。

泪珠不知不觉地从乔伊的脸上往下掉。她试图不让它流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盒纸巾，乔伊伸手拿出一张，擦了一下鼻子。她发誓她只准备擦这一次，她一定要控制住自己不流泪。

她母亲看着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好啦，”乔伊说，“你现在没事，我真高兴。”

乔伊走到床和窗户的中间，然后停下来。她曾有一阵冲动，想跑过去抱住她妈。但她不知道怎样处理这种冲动，因此，她什么也没做。

“看来你的情况不错。”乔伊说，“他们说你什么时间可以出院回家？”乔伊一直不停他讲着话，她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她真希望她母亲也能回答她的话。她为什么不说点什么呢？乔伊不停他讲着，这时，她母亲开始哭了，泪水从那一线狭缝中涌出。她没有企图克制自己，没有企图把泪水咽进肚里，没有努力装扮成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

“别哭了！”乔伊说。

没有回答。乔伊给她妈递过纸巾，她妈根本没接。泪水洒到了沃希思那洁白的床单上。乔伊又拿起一张纸巾，想擦去她妈脸上的泪水。她的皮肤滚汤、单薄、脆弱。这是自从她十二岁以来第一次抚摸到她母亲。

在她帮她擦去泪水的时候，她母亲在她进房间后第一次动了。她把头突然抬起，这样乔伊就摸不着了。

乔伊站在那不知所措。这时门轻轻地开了，一个护士走进来，她轻声告诉乔伊，请她离开房间。

“我还会来的，妈！我明天来看你，好吗？”

她母亲说了点什么，可乔伊没听清。

乔伊弯下腰去准备亲吻她，可伊芙琳·鲍姆又很费劲地躲开了她的亲吻。

“别费事了，这对我已不再重要了。”

乔伊想拥抱着她妈妈，想向她表示，这还是很重要，她还是很重视的。但那位护士把她拉开。

“好啦，亲爱的。”护士说，“你母亲非常累，你可以明天再来看她。”

伊芙琳两眼望着远处，甚至连乔伊离开房间时，她也没有注意到。乔伊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护士来到了大厅。

乔伊想，她爸也许会在那，因此她问护士，他是否来了。

“你难道不知道？”那护士说。

“知道什么？”

“你母亲拒绝见他。”

乔伊在沃希思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五街934号的地址。当乔伊回家时，她爸正站在大厅的小酒吧前，往杯子里倒酒。

“她死了。”他背对着乔伊说道。“医院刚打电话告诉的。”

“噢！胡说。”乔伊说，“全是胡说八道。”

纳特喝着酒，乔伊抽着大麻。他们坐在房间，思索着想说点什么。已经让丽迪亚回家了。在没做解剖这前，沃希思医院不让把尸体送往殡仪馆。这可没办法。

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感觉饿了，他们打电话订了两份牛排晚餐，等牛排送到家的时候，他们又把牛排扔掉。十一点钟的时候，纳特最终鼓起勇气说出他的心事。

“听着，如果我要出去的话，你不会介意吧？今晚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可以。”乔伊说，“我理解。”

他穿上衣服，然后就离开了。乔伊理解，因为她也不想一个人呆着。但她也明白另一件事。就她父亲来说，同她呆在一起等于一个人呆着一样。她认识到，就在她失去母亲的同一天，她也失去了父亲。

幸运的是，杰克和艾维都在家。乔伊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向索赫楼驶去，杰克和艾维十分理解人，十分具有同情心。他们坐在双人床垫上，一边抽着大麻，喝着酒，一边谈论着，人们从来不愿谈死，这真是可悲。谈论着悼念死者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以及悲伤的治疗效果。等他们抽足了，喝够了的时候，艾维和杰克同意乔伊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在一起谈了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他们互相作爱，乔伊感到这是她全天最高兴的时候。早晨四点钟的时候，她想起她曾答应给特里挂电话。铃声一响，他就拿起了电话。

“喂，特里。”乔伊说，她全身赤裸地躺在她最好的朋友和朋友的丈夫之间，“猜到我在哪吗？”

在1973年的圣·瓦伦丁节（情人节）上，巴巴拉·罗斯同纳特在纽约州最高法院的礼堂里结了婚。就当时的气氛来看，婚礼真够气派。新婚夫妇在安提瓜度了一周的蜜月，然后回到了他们在公园大街736号新购买的公寓，新郎和新娘都把他们原来的住房卖掉了。

1973年的9月，白宫的总统受到了水门事件的冲击，纽约足球队在七三年赛季中表现特别突出。一天晚上，纳特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他来到马克希韦尔酒吧喝酒。他挑选了一位金发

女郎，一起来到她在大第一大街的住处，他们发生关系之后，纳特便于七点半钟赶回家中吃晚饭。

两个晚上之后，纳特和乔伊一起在大厦的橡树厅喝饮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喝第三杯的时候，他把他和那位金发女郎的事全部告诉了她。他从乔伊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认为他是一个下流的老东西，下流的大男子汉，但他不在乎，他已五十三岁，他想让她知道，他的精力依然旺盛。

巴巴拉的办公室十分漂亮、宽敞明亮，家俱摆设考究。办公室的位置较高，可以看到两边的曼哈顿河。乔伊对巴巴拉的印象也很深刻。她穿一件烟黄色开司米毛衫，下配黄黑相间的裙子，她的头发梳理得很漂亮，她的化妆入时，令人喜欢。她做决定后发出的指令坚决而又自信。仅仅观察她，就可以看出乔伊喜欢她的所做所为，因为她做得特别好。她想，巴巴拉能做到今天这样，她一定付出了不少代价。乔伊佩服她，但她不想喜欢上她。

在房间里经常有人进来汇报问题，请示，电话铃也不断地响。乔伊最后终于对巴巴拉说，是否可以把门关上，不接电话，她想和她私下交谈。

“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得对。”乔伊说，然后她告诉巴巴拉关于纳特和那金发女郎的事。

巴巴拉静静地听着，让乔伊把话讲完。

“你不应该把这事告诉我。”巴巴拉说，“我希望你没跟我说这些。”

“对不起，我真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做。我希望把事情做对，对不起！”

乔伊在挂电话给巴巴拉和要求见她之前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决定，还是让她知道为好。如果有人及时告诉了她母亲的话，也许她现在还活着，也许她会采取点行动——斗争，迫使纳特的注意力转向她。自从她母亲死后，乔伊就一遍一遍地想，她是知道她爸爸的女朋友的，为了不让她母亲知道，她和她爸爸把他们肮脏下流的秘密完全隐藏起来了。乔伊记得，每当她父亲轻蔑、贬低她母亲的时候，她就对她母亲无力保护自己而感到高兴。她想起她和她爸爸之间的所有的欢乐，而这些欢乐却从来没让她妈来分享过。她想起每次她总是求助于她父亲，因为她知道，不管她母亲说什么，他都会同她母亲唱反调。她想到了过去所有的事情，她希望这一切能重新来一次——但不能了，永远不能了。

尽管巴巴拉只是她的继母，而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乔伊不想让同样的悲剧重演。她从过去的事中明白过来了。这一次，她是站在女人一边的。

“乔伊，请你再也别告诉我这类事。”乔伊可以看出，巴巴拉受到的伤害是多么深。她真希望她能收回已说出去的话。不管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似乎总是错的。

“乔伊，我知道你是好心。让我们忘掉它好吗？”

“当然！”

巴巴拉送乔伊到门口，说了声再见。她是那样地镇静自若，那样地深藏不露。乔伊真想知道，巴巴拉有这样的自控能力，这样的自我约束能力，她该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在乔伊乘电梯下楼后，巴巴拉拿起桌子上的私用电话，挂了普拉扎大厦的电话。

埃洛依·史万森曾是怀俄明州的一名牧童。他曾拍过万宝路烟的广告。他的一本关于一个精神病杀人凶手和一个追捕他的得克萨斯县行政司法长官的书正走红，成为最畅销书之一。埃洛依正在市里进行推销活动。上星期，当他们驾车在第五街上行驶的时候，他曾建议他们纵情欢乐一番。巴巴拉拒绝了他，说她已经结了婚。

当埃洛依拿起电话时，巴巴拉问他的邀请是仍然有效？他们约定当天下午四点钟在他房间里见面。

她母亲去世两周年的前两个星期，乔伊给特里挂了电话。他仍住在她以前的公寓里，她一直在考虑准备给他挂电话。自从她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开始，她就再也没同他通话甚至没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那天晚上她是在艾维和杰克的床上给他挂的电话。

“特里，我是乔伊！”

“我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熟悉。

“对不起。”乔伊说着，开始哭了起来。她并没有计划着要这样，只是自然发展成这个样子。

“别哭。克制点，别哭！”

“我没想到给你挂电话就会哭。”乔伊说，这时，她笑了。

他告诉她，他在电影毕业班学习，并在即将在波士顿开拍的一部电影中找到了一份实习的工作。尔后，他问乔伊：“你一直都在干什么？”

乔伊不想回答，她并不对她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你一直在于些什么？”特里再次问道。

“我曾怕告诉你，”她说。

“当面说是否容易点？”

当她乘车往市中心走时，她想到了她妈妈，她爸爸，巴巴拉和她自己。

她妈妈只想得到两件东西，这是社会告诉她应该得到的：丈夫和孩子。当孩子和丈夫离开她后，她自己也走了。留给她是什么也没有，只是空空荡荡。

乔伊说不好她爸爸。有时她认为他完全是一个杂种——感觉迟钝，专门摆布他人和自私。有时她又认为他和她母亲一样，也是个受害者，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生来就是为男人享受，如果一个男人搞的女人越多，这个人就越是一个男子汉。她父亲从来没有认识到那凄凉的平等，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乔伊不知道。

巴巴拉。巴巴拉曾希望得到比乔伊母亲希望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她得到了。但她付出的代价却值得人们永远警惕。乔伊感到，巴巴拉总是处于一种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反击，担心她所得到的东西会得而复失。因此总是不停地注视着这些东西。她自己呢？

乔伊在失去的岁月中，她每天，每时，每分钟都在思考着，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曾同艾维和杰克同居。他们三人曾尝试吃素。为寻求答案，他们曾求教于宗教教师和占星术家，精神病医生和看手相者，施行催眠术者和性生活指导者。一年后的今天，乔伊仍没找到和案，但是乔伊至少找到了。

“我不喜欢我自己。”她对特里说。对他们曾一起居住过的房间，现在再回来后，她感到有些陌生，“我恨我自己。我父母把我惯坏了，但我出卖了他们，因此，我不能什么事都责怪他们。我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我母亲，我错把她的脆弱当成了软弱。”

“我曾敬仰过我父亲，因为错把他的冷漠当成了力量。我曾不想做象我母亲那样的人；我曾希望象我父亲一样。不幸的是，我成功了。”

特里点了点头。他们喝着薄荷茶。黄昏的斜阳照进了窗台。

“现在我不希望象他一样。”乔伊说道，“我想改变一下我自己。”

特里再次点点头。

“特里？”

“嗯？”

这时，乔伊向他提出了问题。

“我不可能单独去做，你能帮助我吗？”